

CDHK Chinesisch-Deutsches Hochschulkolleg
Tongji-Universität Shanghai



同濟大學中德學院

自由与自律

(胡景北夜话集 2002-2008)

Freiheit und Selbstdisziplin

(Nachtgespräche 2002-2008)

Freedom and Self-discipline

(Night Talks 2002-2008)

胡景北 (HU Jingbei)

经济发展文论 Jingji fazhan wenlun
Arbeitspapiere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Working Pape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nstitute for Econommic Development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No 1860 2207

目 录

特 刊

Sonderausflage

Special Issue

04/2009

代序言	1
真善美的追求	1
一、学术自由第一位	2
1. 学术自由第一位	3
2. 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	5
3. 我思故我在	6
4. 我为什么不参与当前的劳动价值论讨论	7
5. 你思故你在	8
6. 夜深的对话	8
7. 儿童节的感想	9
8. 惜乎哉，刘树成	10
9. 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11
10.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13
11. 献身学术必须不惧危险	14
12. 我是一个自由研究者	15
二、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18
1. 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19
2. 为陶渊明申冤	21
3. 学者的衣着	22
4. 伦琴墓前有感	23
5. 创造历史的易和难	23
6. 从纪念胡寄窗先生想起	24
7. 我最初知道的孔夫子	25
8. 悼杨小凯先生	27
9. 说真话	28
10. 你最好一笑置之	29
11. 学者的无欲则刚	30
12. 请尊重学者	31
13. 邹恒甫应当说话	34
14. 再谈无欲则刚	35
15. 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	37
16. 送孙经纬	39
17. 为邹恒甫扼腕	41
18. 追忆陈岱孙先生	42
19. 从一本近百年未被读过的书想起	44
20. 悼念我的中学班主任储兆瑞老师	46
三、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50
1. 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51
2.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51
3. 取消学校录取新生的保留比例	52

4. 我为什么赞成留学生留在国外	53
5. 散步在北大	54
6. 交流的语言和平等	55
7. 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56
8. 父母亲和孩子	57
9. 要公平、不要照顾	58
10. 欢迎田国强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59
11.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60
12. 我为上海财经大学鼓掌	61
13. 建议大学实行教授转校聘任制度	62
14. 用年休假制度取代高校寒暑假休假制度	65
四、浅谈经济学直觉	67
1. 浅谈经济学直觉	68
2. 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71
3. 一般均衡和爱情	74
4. 文献引用规范谈	75
5. 还是说一说好	76
6. 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	78
7. 人的经济发展	81
8. 《农民经济学》译者后记	82
9. 经济学教育和数学	84
10. 提高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的若干体会	86
11. 中国经济起飞：认知和感悟	88
12. 谈谈读经济学原著	90
13. 用一张图解释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	92
14. 理解农民转移的经济学	94
15. 中国经济危机已成事实	95
16. 农民转移的宏观经济学原因和宏观波动	97
17.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意义	100
五、让穷人有希望、让富人有保障	104
1. 让穷人有希望、让富人有保障	105
2. 股民特权小议	106
3.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106
4. 人权、人的动物权利	107
5. 神舟五号：中国与世界	108
6. 实践民主	109
7. 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	110
8. 国企出售的公开化是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	111
9. “20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制度	113
10. 三十年农村变迁	114
11. 农民转移：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116
12. 年休假制度应当首先考虑农民工	117

13. 200 年的经济赛跑，我们中国失败了	119
14. 三、四月份之交的断想	121
六. 穷人需要的不是仁君，而是自由主义	123
1. 穷人需要的不是仁君，而是自由主义	124
2. 君主乎？人民乎？	125
3. 布痕瓦尔德的耻辱	126
4. 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	127
5.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	128
6. 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	133
7. “丛林法则”不是自由主义	134
8. 2008 年的中国，我希望	136
9. 我关注 1958 年开始的大饥荒的目的	137
10.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138
11. 自由主义者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	140
12. 五四运动、民族主义、封建主义和今天	141
13. 汶川救灾说明了中华民族向自由主义的进步	143
14. 自由、权利和责任——我看范美忠先逃事件	144
15. 谈谈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秩序问题——再谈我对 范美忠先逃事件的看法	145
16. 要法律，更要道德——三谈我对范美忠事件的看法	148
七、基本品行和社会制度	150
1. 基本品行和社会制度	151
2.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151
3. 资本主义起源和良好道德规范	152
4. 从农村村级财务公开问题想起	153
5. 善良的局限性	154
6. “权”与“礼”	155
7. 地震与非典	156
8. 再谈财务公开问题	157
9. “驶入黑暗”	159
10. 三八妇女节有感	160
11. 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161
12. 不把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再施加给别人	162
13. 宽容：现代人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	164
八、生活的约束，有效吗？	166
1. 生活的约束，有效吗？	167
2. 还是不做为好	167
3. 我所认识的生永	168
4. 放弃	169
5. 小说“项链”给我的感受	170
6. 不凡和不俗	171

7. 事业?	172
8.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172
9. 生命的短暂和漫长	174
10. 世事的难和易	175
11. 就这样风雨兼程	176
12. 做普通人	177
13. 我相信	178
14. 请爸爸多带孩子	180
15. 感谢批评和提醒	181
16. 转载: 给我未来的孩子(张梅)	182
17. 回乡有感	183
九、追求高贵	185
1. 追求高贵	186
2. 春节的作用	187
3. 五十而知天命	188
4. 男性“阉割”的责任	189
5. 34年前的今天	189
6. 信任	190
7. 五月的夜晚	191
8. 信任别人	192
9. 新年的感觉	193
10. 平安夜	193
11. 210感怀	194
12. 夏威夷观浪	196
13. 家父胡业仓九十大寿暨家父母六十婚庆祝辞	197
14. 春节感恩	198
15. 体会苦难	199
16. 从《寂静的春天》想起	200
十、从农家的小桌子想起	
我的青年日记 II (1971年1月27日—1971年9月9日)	201
1. 从农家的小桌子想起(第一本日记发表引言)	202
2. 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第二本日记发表引言)	203
3. 我的青年日记 I (1971年1月27日—1971年5月15日)	204
4. 我的青年日记 II (1971年5月16日—1971年9月9日)	236
后记	271

代序言

真、善、美：永恒的追求 ——一个人主页发刊词

在欢庆 2002 年到来的爆竹声中，我的个人主页，<http://www.hujingbei.net>，诞生了。

全世界现有的个人主页恐怕不下数百万个。在这数百万旁加上的一，简直就是无穷小。因此，正如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世界公民一样，我的主页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主页之一。

不过，每位公民都是普通中的一个特殊，每份个人主页也有自己的特点。我的主页将具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是以它自己的方式追求存在于每位公民心底深处的真、善、美。

什么是真？真就是世界的本原、人类的本性。本原和本性常常被表象掩盖和扭曲。地球自转这一物质世界的本原就被太阳东升西落的表象所掩盖，人的自由平等这一社会本原在中国被把城市人和农村人分成两个等级的户口制度所扭曲，在世界上则被国家制度所扭曲。而一个人的真心更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因此寻求真、揭示真、实现真是每个人不断探索和修养的过程。

什么是善？善是对他人对世界的爱，是孔夫子说的“泛爱众”和天主教说的他人之爱，是启蒙时代西方人说的博爱，是 100 年前中国人说的天下为公。善是站在他人他事物的立场上理解他们，是以爱人爱物之心对待别人对待世界，是做事出以公心。善是人与人关系中的真，是一个自由人获得幸福的最后源泉。

什么是美？美是真和善给我们的心理感受，美是被我们认为好的探索真和培养善的形式。市场经济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平等竞争的感觉；户口制度之所以不美，是因为我们这些城市人面对着农民不能不生出自责的感受。因此美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普遍原则和规则之上，要求我们仅仅选择被我们公认为好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我自认是经济学者，因此我的主页的特点将是从小学和学者的角度追求真、善、美。由于经济活动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因此经济学对真、善、美的追求又必须和人类精神相一致。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处在重大转变过程中。然而，比起二千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变，比起 500 年前欧洲启蒙时代的精神转变，比起 100 年前中国的制度转变，我们今天在中国经历的转变没有任何更加深刻的地方，所以，与那些时代的学者相比，我们不是更困难，而是更容易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如果说有文字的历史就是有学者的历史，那么，在任何时代，学者的真正使命总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之所以需要学者，也是因为人类在自己最脆弱的心灵内还有真、善、美的感觉，并把对这一感觉的坚持和发扬特别地委托给学者。我的主页将遵循对经济学尤其对学者的这一自我意识，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视为自己的永恒目标。

2002 年 1 月 1 日

一、学术自由第一位

1. 学术自由第一位

今天是教师节。

当教师从上大学始。那时我刚刚从农民转成城市清洁工。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兴奋，心情反而沉重起来：作为农民、作为清洁工，我能够得到和那个阶层相应的经济不拮据、又有一定文化水准的平静生活；同时，我可以评论社会却又无需为社会负责，因为无论社会好坏，那个阶层的人是很少责任的。但一入大学，进入高阶层，我个人就可能成为社会好坏的原因之一，我就必须对社会负责了：可我有能力负责吗？有勇气负责吗？我无法回答，因为当时的我对自己竟然能够上大学是毫无精神准备的。

可我还是走进了大学，并且再也没有离开过，以至于教师节也成了我的节日。

作为大学教师，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呢？我认为第一位的责任是学术自由。大学是学术的殿堂，是保存尤其创造知识的园地。而大学要做到这一点，学术必须自由。大学教师的第一义务是保证学术自由。这是因为，知识是思想的成果。思想是个人的。每个人在思想，而不是整个人类在思想。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同的，而一个人的思想又无法从外部控制，所以，正当的方式是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他们具有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能够进行系统性的思考。让他们没有恐惧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尤其是系统性观点，便是学术自由。没有恐惧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和系统观点，是每个有思想有观点的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要求。学术自由，不过是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这一要求。

人们常说教师的责任是教书育人。但它和学术自由相比，学术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学术自由，我们不知道应当教什么书，应当育什么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么多学生走上街头，疯狂地毁坏文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时的学校仅仅允许一种思想、一类书、一种人，完全没有学术自由。在那种环境下教育出来的学生，不懂得尊重别种思想、别种人；一有触动，容易走向极端。而在一个尊重学术自由的学校里，学生容易看到各个理论的正确性和局限性，感受到平等宽容的争辩讨论气氛，容易形成独立思想和正直人格。在大学里，学术专制把人当作特定观念的工具来教育，学术自由才把人当成具有独立思想独立品格的人来教育。大学教师要教书育人，可大学要做到正面意义上的教书育人，大学必须有学术自由，大学教师必须意识到自己对学术自由的职业责任。

大学是保存和创造知识的场所，教书和育人要用知识，因此，大学面临着什么知识具有保存和创造以及教育价值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学术自由环境下的竞争。有了学术竞争，有价值的旧知识和新知识才能辨别出来，大学也才可能执行保存、创造和教育知识的任务。没有竞争，我们不知道某种知识是否有价值；可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会有学术竞争，因为学术竞争的前提是思想表述的自由和表述者的没有恐惧。在学说上，正如在商品市场上一样，没有一种（思想）产品是完美的。任何有价值的思想知识，其价值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正是学术自由和学术竞争，才能够让各种思想各种知识的相对性暴露出来，让新思想新知识不断涌现。把某一特定思想、特定知识的价值绝对化，甚至用它“领导”其他思想和知识，其实就是否定学术自由，其结果自然是学术的衰落和思想的禁锢，是教书育人的失败。

自然，大学也是社会的一个机构。在部分行政色彩强烈的国家如中国，大学属于某个行政系统，有谁是领导机关、用什么方式来领导的问题。但它并不意味着大学里的学术存在领导权或者指导思想的问题。这是因为，学术自由无论作为理念还是原则，

都超越了具体的大学领导权和办大学的指导思想。和后者相比，学术自由是第一位的。学术机构的任何领导权、任何指导思想都不能够束缚个人头脑中的思维活动和学术创造，它们能够做到的，充其量是借助世俗权力来阻止个人表述其思想。因此，学术上的领导权、指导思想等等的概念，只是和学术专制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因为专制者需要的才是领导权，专制者需要的才是挑选出一种思想来“独尊”。只要抛弃学术专制，承认学术自由，学术领导权和指导思想的问题就成为假问题。

在我个人研究的经济学领域内，总有人提出独尊马克思。当然，一个人可以独尊马克思或者独尊她（他）偏爱的任何理论或学者，但她（他）同时应当尊重别人的偏爱。而这一点就已经是学术自由。如果所有人都偏爱同一个理论，学术自由没有必要；如果有人偏爱不同的理论，学术独尊没有理由。学术自由允许的，恰好是每个人独尊自己偏爱的思想；它所反对的，仅仅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偏爱强加给别人。那些要求每一个经济学者独尊马克思的人，忘记了马克思的格言是怀疑一切。当马克思让自己怀疑一切的时候，他自然也让别人怀疑一切。马克思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拒绝一切领导和指导的时候，他自然也会让我们在学术活动中拒绝一切领导和指导。这里，人和人是平等的，思想和思想是平等的，这就是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至少不会有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学术自由，已经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活力。马克思主义是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产生的，它也只有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教师的社会责任底线，同时也是愿意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教师的马克思主义底线之一。其实，正是因为我为马克思理论创造过新知识（<http://www.hujingbei.net/xueshutansuo/karlm Marx2000.htm>），我才对马克思主义有信心，也才体会到学术自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途径。那些强调独尊马克思主义的人，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泥塑的偶像，结果成为强迫所有经济学者独尊他们个人的某些“观点”。而他们个人的观点之所以不值得尊重（更不值得独尊），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把自己的研究放到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讨论。

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最基本的人文环境，也是我们大学教师、学生最基本的个人素质。意识到学术自由，我们便意识到自己观点的相对性。即使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充满激情，并且还知道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学术自由也会让我们下意识地拒绝自己观点绝对正确的感觉，从而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批评和讨论。同样，学术自由会让我们在严格挑剔别人观点时注意到其相对正确的地方。学术自由会让我们在讨论中更多地关注一个问题的视角、一个概念的提炼、一种观点的逻辑，而不会纠缠于动机、功用、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作为教师，我们特别在学生面前负有学术自由的责任。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论文导师从来没有要求和他的观点一致，因此我没有体会过迎合导师的烦恼。现在我当教师，同样不给学生这样的烦恼。学生论文只要概念清楚、逻辑明了即可。观点是否和我一致，是否“正确”，无关紧要。作为教师，我们有启发学生思路、揭示他们想法的模糊之处、帮助他们明晰概念和逻辑的责任，更有鼓励他们思维、尊重他们观点、熏陶他们学术自由素质的义务。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尤其需要尊重他们的版权，因为他们的论文是他们个人的研究成果。无论我们的指导起了多大作用，我们也只是指导，而不参加直接写作，因此，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的姓名列入毕业论文的作者内。同样，在基本上从毕业论文中抽出来的内容发表时，我们也不应当把自己视为作者之一。我们争取学术自由，不但是让教师学术自由，而且特别是让学生自由，因为创造性思维是学生的特长，因为学术自由是他们应当养成的生活习惯，因为学术的未来靠他们对学术自由的坚持。

有自由、学术兴；无自由，学术亡。大学要成为知识的圣地，传道解惑、教书育

人要成为高尚的事业，今天学者、学生的学术所为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学术必须自由。作为大学教师，我明白自己对学术自由的个人责任。这就是我在今年的教师节，回忆起我走进大学前的犹豫而生发的感想，遂写下这篇文章。

初稿于 2005 年 9 月 10 日
修改于 2005 年 10 月 10 日

2. 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

——关于本人的奖励项目实施细则的一点解释

2002 年 1 月 1 日，我在建立个人主页的同时，设立了一个奖金项目，奖励第一位指出我的一篇文章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逻辑矛盾的人。项目实施细则规定，某一批评文章是否达到获奖水平，由我自己决定并在网站上公开说明。这里，由我自己决定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是否达到某一水准，似乎违反了最起码的公正原则。对此，我想说明一下自己当时的考虑。

在我考虑设立奖金项目的时候，公正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如何才能保证公正性呢？我考虑的结果是只有公开性才能保证公正性。我们知道，网络技术为大范围的公开性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要说明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需要公开性来保证公正性。我的奖励项目虽然面对全世界，但它目前主要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有意义。而恰好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没有公开性便没有公正性。这是因为，第一，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能够充当“公正”的代表。你可以在美国、德国甚至中国港台地区任意选三、五位学者来仲裁，公众能够假定他们的仲裁是公正的。在过去中国的乡村，私塾先生通常是令人信任的仲裁者。今天的中国大陆当然不乏洁身自好的学者，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学者们已经腐败。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既不像西方人那样追求“真”，也不再像中国古人那样追求“仁”。在名、利面前，这个阶层的感受是“穷途末路”，因此不再独善其身。所以，从这个阶层中任意选择三、五位组成一个评奖委员会来仲裁，并不能保证公正性。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当今那么多奖励项目几乎都不具有公信力的原因，而这些项目的评奖委员会，哪一个不是由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的呢？第二，我的奖励项目与马克思著作《资本论》有关。在今天中国大陆，“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多在温室中成长起来、而且（如果他们自己不痛下努力的话）终生也离不开温室。在那里，他们或习惯于和风细雨的同志式批评，或擅长于义愤填膺的口号型讨伐，与本人追求的学术风气相去甚远。年青一辈的《资本论》研究者中，佼佼者有，但离“德高望重”相距尚远，在整个阶层腐败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让公众相信其公正。第三，假如《资本论》有一定之逻辑性，本人的文章也有一定之逻辑性，那么，从众多文章中确定那些指出两者逻辑不相容的文章，技术上不应当十分困难；而上发到我的网页上的时间，又清楚标识了最先指出两者逻辑矛盾的文章。因此，只要把所有参奖文章公开，只要把奖励过程公开，公众就可以判断我的奖励项目是否具有公正性。

当然，即使一切公开，如果作为当事人的仲裁者就是要把奖金发给不应当获奖的人，那么公开性也不能保证公正性。但是，世上还有其他东西能够保证公正性吗？可能没有了。不过，这一切既适用于仲裁者是也适用于他不是当事人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世间还多少有公正性可言，相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还多少有一点真、善、

美的感觉，那么，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便可能更多地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更多地顾及公正性。一件事情越是公开，仲裁者越可能公正，仲裁者舞弊的可能性越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公开性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保持公正性的唯一途径，因此我自己的奖励项目自始至终追求最大可能的公开性，以使用公正性答谢所有的读者。

2002年1月29日

3.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句名言。哲学家用意深奥，法文用词精巧，非我辈所能探究。仅从中文译文的字面看，“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一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在思考、在思索。一个人如果不思考，他就不再存在。严格地说，一个人可以在形体上存在，是一位现实的人；但是在人格上，他可能并不存在：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果他不思考的话。此时，这个人实际上依附于某一个他服从的人，后者的人格也就是他的人格。

三十年多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思考，仅仅单纯地跟着伟大领袖走。当时不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去思索，独立地思索，所以，当时即使有什么理解，也是在正统思路上的所谓“理解”，完全谈不上独立思考后的理解。因此，按照“我思故我在”的说法，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形体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索，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思故我在”，懂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特殊性，是以我思考的特殊性为前提的。没有思考，人云亦云，我就不具备特殊性，我的社会存在就可以被忽略。当然，这不排除我在许多场合下完全或者基本同意别人的看法，服从别人，可是，只有我的同意和不同意、服从和不服从是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结论，我才具备自我的人格，我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才是在存在的。

思考，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类文明在今天达到的成果，无一不和人的思考相联系。火的使用得益于火种的保存，而后者离开先民的思考便无法设想。同时，思考也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中任何一项与原有物品、原有观念、原有制度不同的东西，都是个别人思考的结果。正是这些思考的人，显示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可以平静地说“我在”。

“我思故我在”，还因为思考是每个人的内在权利。观察古今中外，我发现人类至今没有找出而且也不可能找出任何方法来限制个体的思考权利。某个社会、某种环境可以限制个人公开其思考结果，但是它无法限制个人思考，尤其无法限制个人思考的特定内容。我曾经思索过这一点是否各国宪法都保护个人言论、迁徙、人身等权利，而不提个人思考权利的理由，因为思考是无法从外界禁止和限制，因此也无需用外部力量来保护的个人的权利。所以，思考是人类每个个人的天然能力和内在权利，是个人具备独立社会人格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我乐意以我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2002年2月26日

4. 我为什么不参与当前的劳动价值论讨论

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如火如荼。从学术性最强的《经济研究》杂志，到中小城市办的报纸，从国家科研项目到个人论文选题，到处可以看到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这里讨论的当然都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我在今年开通的主页上，也放了自己二十年前写的一篇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见本网页相应位置）。当然，看一下我的网页，就会明白它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无关。于是，我就不得不面对朋友的问题：既然我有劳动价值论方面的知识，为什么不参与当前的讨论呢？

我想，我的回答应当包括下面三条：

第一，当前的讨论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当前的讨论更多地出于政府的需要，而不是学术本身的发展所致。出于政府的需要当然也值得研究，就像我们应企业要求作项目研究一样。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一个为企业作可行性研究的人，必须得出可行的结论，才能领到企业的经费；一个为政府政策而作的研究，也必须得出政策正确的结论，才能够算成果。在这种背景下，讨论的科学性和严肃性都将让位于获得经费和获得成果的考虑。对这样的讨论，我是不愿意参与的。

第二，当前讨论的层次浅。我读到的几乎每一篇讨论文章，都提及当前政府的想法和现实的需要。而劳动价值论是什么？那是马克思在“实验室”做出的研究结论。假如马克思的结论正确，从实验室结论到上市商品中间也有很长的过程，况且马克思做的还是非常抽象的“理想实验”。马克思即使天才，寿命也有限，不可能独自研究清楚这一过程。当前的讨论看到的是实验结论和上市商品不符，便想重新解释上市商品。这当然不错，但上市商品从实验而来，当前的讨论不愿意重新做实验，而是抓住理论和实践不相符的地方来批评理论，或者就实践来发展新理论，因此也就只能流于常识。我曾经读过几篇讨论文章。它们让我想起的是“皇帝的新衣”的另一个版本：某个会场上的听众差不多要被日心说讲演者的头头是道所折服的时候，一个儿童喊出了“真理”的声音：“但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的呀。”

第三，个人的兴趣。从我开始自觉思考的时候起，我思考的就不是『解放日报』在谈到我的时候所说的“出谋划策”。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一文，虽然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不是为出谋划策而写，而是个人兴趣使然。出谋划策需要人，我对那样的人也是尊重的。但社会也需要不为出谋划策而思考的人，而大学教师本来便应当是离出谋划策最远、距个人兴趣最近的研究群体。不过，当经费由需要谋、策的人所分配、成果由需要谋、策的人所评定的时候，出谋划策容易得经费出成果，出谋划策者当然多，出谋划策的讨论当然如火如荼。这都很正常。经费、成果是好事，也是我之所欲，只是不要违拗自己的兴趣。当年在农村，那么辛苦，也没有想起要扭转兴趣，为村上的“批林批孔”出谋划策，以图个轻松活计干干，所以离开农村几年，才能够写出二十年后不需要修改还可以发表的文章；如今占据了大学教师的职位，仅仅做好本职工作这一条，就更要求我尽力写出基础性强时效性长的文章，而不是不断参与理论热点的讨论。

2002年5月21日

5. 你思故你在

几个月之前，我就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写了一篇夜话，表示我之存在，是因为我思考着，是因为我用我的内在思考指导自己的外在行为。那么，你呢，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你何以证明你的存在，证明你的价值呢？我要向你说的是：你思故你在。

你思，首先表明你是一位合格的人，因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点就是思考，因为没有你、我、他这样一个个的个人在思考，人也就不成为一个特殊的类。你思，表明了你的独立人格。也许你的思考还没有或者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思考本身就证明你愿意依附于别人的结论，证明你与别人的不同。你思，还表明了你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世界让你觉得好奇，而你又愿意探索。像大多数人一样，你也想永葆青春，而在心灵上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就是好奇和思索。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如果我思考的结果不能够发表，我思考有什么用呢？我的回答总是你先把你的结果思考出来再说。在你没有思考出来之前，谈发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真的思考通了，你的结果发表与否对你也没有意义了：思考过程已经使你充实，成果发表只具有副产品的作用。当然，禁令或者出版费用确实可以限制你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你思考。如果你在禁令或者金钱面前放弃思考，你不应当把责任全都推到社会：你个人也有重大责任，因为在你距离限制条件还很远的时候便放弃了。

你也许不是因为结果难以发表而不去思索，而是因为你要交出一篇毕业论文、你一年应当写出多少字数的任务压力而没有时间去思索。是的，你有太多的人要应酬，太多的事要办理，太多的任务要完成，有时还有太多的书要阅读。是的，这一切都很重要。可是，即使你应酬了那么多人，办理了那么多事，完成了那么多任务，读了那么多的书，你的生活可能还是被动的，你的人格还是没有特点的。你更多地在应付人生。如果你想理解人生，如果你想把握人生，如果你想获得生活中的主动性，那么，还是抽出一点时间，让自己清静，让自己思考。思考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你才真的存在着。

当然，思考首先是一个过程。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个过程。也许你在聊天中会突然冒出一种伟大的想法，突然得到一句名言。但是，要把你的想法变成可以严肃讨论的命题，要让你的名言具有丰富的内涵，你必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时间的思考。其实，对你自己思想火花的深入思索，不需要你专门从事比如教师、科研工作者的职业：你在从事任何事务性或挑战性的工作之余都可以思考。这里的关键是勇气，是面对世俗的勇气，是坚持你个人的存在性的勇气。作为你的朋友，我祝愿你有这样的勇气。

2002年11月5日

6. 夜深的对话

明天又是双周的星期二。

2002年的第一天是星期二。那一天我为自己的工作建立了独立的网页。为了避免许多网页内容、面貌长期不变并不疾而终的结局，我决定从那一天开始，用每两个星期写一篇短文的方式来保证网页的常新。而由于我习惯于深夜工作，因此名之为“双

周夜话”。

既然是话，总有一个对谁而言、与谁而语的问题。天南海北、大洋彼岸；百步之遥、咫尺之距，都有知心的朋友可言可语。但夜深之时、苍穹之下，万籁俱寂，似乎却是外与上天、内与心灵对话的时机。上天总有太多的神秘之处，是我今生不可能理解的。宇宙之外又是什么、大爆炸之前的时间如何计算、类人猿为什么会在东非首先直立起来、大脑细胞的电运动能否区别出我思考的是经济问题还是数学问题，都是我不可能知晓的。就我自己的专业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是不是纯属偶然，腐败是否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统计资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实工资和农业土地制度的关系，亦是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说清楚的问题。至于反躬自问，回归内心，情感的空间似乎比宇宙还辽阔。什么是人生？平民的人生和名人的人生哪一种更值得？善良的人是不是对自己都很残酷？爱是什么？爱上帝、爱世界和爱某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都是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的问题。即使我们对某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解答，这些解答反过来又将导致更多的新问题。无论科学怎样发达，无论大脑怎样聪明，人类大概只能窥视茫茫宇宙的一星半点，探究短暂人生的几个片段。世界有太多的奇妙，人生有太多的奥秘。这些奇妙，这些奥秘，虽然可以和朋友一起讨论甚至争论，但它们也许更适合和上天对话，与心灵言语。夜深之时，苍穹之下，在静谧中感受搏动，在安宁中体会博大，自然而然生发出对宇宙的崇敬，对人生的热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而有所感受，有所“话”。所以，我的双周夜话，首先是写给自己的，是通过与上天和心灵的对话，澄清自己的想法，并记录以备忘。至于对错正误，则不在我的考虑之列，因为我还不敢确定思想是否有对错正误之分。

2003年1月13日于北京

7. 儿童节的感想

六月一日，儿童节到了。工作之余我来到同济大学校园内的三好坞公园。在以建筑专业著称的同济大学里，三好坞以其小湖、小山、小亭、小径，总把我带回童年时常常嬉玩的小公园。童年时看着新奇的世界，生发出无数的问题：为什么树叶放水不沉，为什么猫的名字是猫，为什么叔叔和阿姨那么高兴。我得到一些答案，又出现新的疑问。我读书、思考、争论，我希望有仲裁，但每一次父母的、老师的、哥哥姐姐的最后答案都不能让我服气。于是又读书、又思考、又争论，直到走进大学，直到走上讲台。

如今，年过半百的我已经了解，最后答案是不存在的；我也已经明白，童年天真地表现出来的好奇，好问、好辩天性，在成人这里虽然表现得更含蓄、更理智、更曲折，但正是这一天性保证了成人的活力。可惜的是，成人世界多了功利、权术和势力。在它们的日熏月侵之下，我的祖辈、父辈直到我自己渐渐地接受现状，不再新奇，不再发问、不再辩论。同时，接受现状又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功名和利益。然而，功利的化妆并不能够让人年轻。一个不再好奇、好问、好辩的人是真正衰老的人，由这些人组成的民族是衰老的民族。三百年前，康德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衰老的民族。当我看到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同胞不觉新奇、不敢疑问、不愿辩论的时候，我不能不承认康德的话有一定道理。一百年前，身为中华民族复兴一先锋的梁启超看到了少年中国的萌芽。回顾从那时以来的100年历史，我想，懂得仅仅为了强比欧洲、富敌北美，少

年中国之萌芽也是没有希望的。中国民族返老还童之本，不在于它的物质富庶，而在于它恢复好奇、好问、好辩的天性，在于它建立起适用于每一个人的让人好奇、促人好问、容人好辩的制度，在于我们每一个成人自觉地好奇、好问和好辩。三好坞把我带回童年，也令我梦想着恢复青春的中国和保持年轻的人类。

成于 2003 年 6 月 1 日

8. 惜乎哉 刘树成

难产而终于出生的 2005 年第 10 期《经济研究》，今天放到了我的书桌上。难产的原因是《经济研究》编辑部有人不同意发表已在网络上和其它杂志上发表过的刘国光文章。而这期《经济研究》带着刘国光文章出世，不啻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耻辱。因为刘国光的文章不具有任何经济研究的性质。说到底，刘国光的文章仅仅是被父母宠惯了孩子，刚刚发现世界不限于父母手掌大小时，而向父母提出的一手遮天的蛮横要求。

不过，最令我痛心的，不是刘国光竟然写出这样自毁名声的文章，不是《经济研究》竟然刊出了这样的文章，而是作为《经济研究》主编的刘树成，竟然容忍了这样文章的发表。

惜乎哉，刘树成！

原先便听说刘树成多次表示，如果有人强迫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刘国光这篇文章，他就辞职。然而，在《经济研究》第 10 期上，主编后面的大名，仍然是刘树成。

翻阅一下近五年来的《经济研究》，任何人都会发现，刘国光文章根本不适合《经济研究》的风格和水平。阅读一下刘国光文章，任何人，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也同样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篇研究型文章。因此，除了被强迫之外，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经济研究》发表刘国光文章，对这一点，天下人心知肚明。

在强迫《经济研究》发表刘国光文章的压力面前，如果刘树成以辞职抗争，那股强迫的压力也许会知难而退，《经济研究》的声誉、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也许会免受凌辱。即使刘树成抗争失败，而不得不辞职以抗议，那么，强权者也知道了，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来生活在奴化环境中，他们仍然是不可侮辱的。《经济研究》声誉虽损，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反而会升到新的高度，中国经济学家的整体人格反而会被世人刮目相看。

惜乎哉，刘树成！

在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上，我们记得的伟人是马寅初。在那毛泽东的话被奉为“句句真理”的时代，在那连巴金都“不违心”地写出献媚文章的时代，马寅初英雄造时势，单枪匹马与强权抗争，虽辞去北大校长而不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时势已变，连御用文人都再不敢言“句句真理”。在这个时候，只要刘树成应时而起，顺势而立，刘树成便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继马寅初之后的第二位英雄，刘树成便将青史留名。马寅初需要等待三十年才得到人心，刘树成三天都不用等待，立即就会得到人心的公认；他为抗争强权而不惜辞职的行为，亦将被后人永久铭记。

惜乎哉，刘树成！

有人对我说，如果刘树成辞职，他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不知道孩子在这里的作用，也不想了解刘树成妻子在这件具体事情上的看法。但是，强调“女人”的阻力，却仅仅是中国男性最受用可也最无聊的女性“祸水论”再版。占据要职的男性，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心悸腿软，却把责任归之于女性的“辫子长、眼光短”。其实，有几个女性不希望夫婿或知己是刚强正直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希望他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况且，今日经济之宽松，物产之丰富，即使刘树成辞职，衣食住行也不至于拮据，刘树成又何必为那微不足道的“主编补贴”屈膝？也许，为刘树成辩护的理由是他继续担任主编所能够从事的事业。然而，太多的男性把官位与事业混为一谈，把世俗名利与事业混为一谈，而把自己的人格缺陷推到女性名下。可是，在这里，我们只要想一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8 年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时，唯一举起反对之手的人，是一位女性，我们就会明白女性“祸水论”的荒谬，明白官位的考虑，毁了中国多少男性的尊严，也许这一次还毁了刘树成。

惜乎哉，刘树成！

在二十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中，安德烈亚说：“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个不幸的国家。”伽利略反驳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伽利略说的对。马寅初在 1949 年前没有成为英雄，刘树成在学术自由的国家里也不会遇到成为英雄的机会。一个每位国民说真话都不必恐惧的国家，是不需要英雄的。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因为那里大多数国民还在颤抖着、犹豫着甚至盘算着是否说真话，所以，这个国家才需要不颤抖、不犹豫、不盘算地说真话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才成为英雄。我们正是这样一个不幸国家的国民。让我们的国家走出不幸状态，是我们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但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在需要英雄的同时，又给它的国民创造出许多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机会。经济学是当今中国的显学，经济学家首当其冲地面对着社会变动、历史转折的重大考验，他们建功立业的机遇也最多。这样的机遇既可以是提出缜密思考的理论观点或政策建议，也可以是大义凛然地直面危机。当然，一个人遇到怎样的机遇，和他的运气有关；可一个人遇到机遇时能否抓住，则直接和他的个人品质有关。在后一种情况下，尼采说的完全正确，责任是一个仅仅对个人才有意义的概念。当今的中国需要英雄，当今的中国提供机遇，而一个人能不能抓住机遇，做出英雄的业绩，成为女中豪杰、男中丈夫，不但要看她（他）对人性脉搏和历史趋势的把握，同时要看她（他）挺身而立的勇气和决心。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把个人行为的责任推给集体、制度或者环境，尤其是刘树成这样被冠以或者自称为“经济学家”和“学者”的人。

惜乎哉，刘树成！

初稿于 2005 年 11 月 9 日

修改于 2005 年 11 月 13 日

9. 学术自由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由刘国光引起的关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争论，涉及的首先不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孰优孰次或孰本孰用的问题，而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对此，我的短文“学术自由第一位”已经做了说明。每个学者都可以偏爱或者研究某一个理论，而

无须接受特定的“指导思想”或者“领导”。在理论研究和争论上，学术自由是根本的。只要我们承认学术自由，刘国光提出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权问题就是假问题。

这场争论也涉及到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仍然有生命力，我们应当如何发展它呢？但我要提出的更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人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我的答案很明确：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一个学者如果不具备自由主义的情怀和理念，这个学者基本上就和马克思主义无缘，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说自由主义者才有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呢？我的理由如次：

1. 马克思本人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特征——自己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是马克思一生都在坚持的原则。马克思无论在他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还是在他憧憬的未来社会制度内，都把人的自由放在第一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是自由的，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是自由的，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投资和生产；同时，他们双方又尊重对方的自由。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更是自由人的结合体。人生而自由，每个人有研究并形成自己系统思想的自由，对马克思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李健先生最近在他的“重新回到马克思”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重新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像马克思一样，成为永远而坚强的自由主义战士”。

2. 就自由主义的学者来说，他们不但对现实社会持批判性态度，而且和马克思一样，对人类迄今为止的理论成就也持批判性态度。他们明白任何现存理论都有其价值和局限性。他们要做的是发现这些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并且推进旧理论的发展和理论的建立。没有这种批判态度，一切发展、一切创新都是空谈。而刘国光对“指导思想”不容置疑的态度，刘国光对马克思理论的辩护性态度，只会从根本上阻碍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和发展。

3. 自由主义者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他们尊重学术自由、承认学术上的自由竞争。因此，当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明白自己没有政府的保护伞，他们也不需要政府的保护伞。他们明白，如果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承认，那只能是学术自由竞争的结果。因此，他们必须仔细阅读马克思著作，理解马克思思想，认真推敲自己观点，防止任何可能不严密之处，并且准备与任何人、包括反对马克思的人平等地辩论自己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从其自由主义情怀和理念延伸出来的学术平等和严谨态度，是刘国光这样倚仗学术专制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难以理解的。

4. 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人，也都是自由主义者。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上推进了农民理论研究，但列宁一生都坚持言论自由，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言论自由。斯大林才把不同意见者视为异己而清除之。西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例如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斯威齐(Sweezy)、巴兰(Baran)，解释马克思理论本身的森岛(Morishima)、罗默(John Romer)等，在学术自由、个人自由的意义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而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什么贡献呢？没有，完全没有。

当然，在刘国光看来，斯威齐、巴兰、森岛、罗默都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曲解马克思，就是用数学方法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了。因此，无论邹恒甫或者其他学者如何介绍外国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刘国光都不会承认那些研究属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去世后研究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在就是他们了。所以，刘国光才敢说，不发表他的文章，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刘国光这些政治经济学专家教授们，囿于辩护性与灌输性的宣讲，离真正的研究差之何止万里。刘国光本人除了口头上喊马克思主义外，自己又做过什么马克思研究吗？没有，完全没有。在介绍刘国光获取中国经济学奖的网站，列出了刘国光著作近30种，但没有一本著作是直接研究马克思理论的 (<http://www.macrochina.com.cn>)

</prize/brt/liuguoguang.shtml>)。我们不禁要问，除了空喊马克思以外，刘国光懂得马克思吗？刘国光研究过马克思吗？反对自由主义的其他许多政治经济学的专家、学者，研究过马克思吗？懂得马克思吗？在他们中间，最有名的大概要数王亚南，《资本论》中文版的译者之一。刘国光和他相比，只能算后辈。我手头就有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可翻开这本书，我读到的根本不是研究，而是学习心得和思想汇报，充其量不过是《资本论》讲解。这样的书以《“资本论”研究》为名，既亵渎了《资本论》，又亵渎了研究这个严肃的词汇。我翻译过《消费理论》，但是我仍然不懂消费理论。由此我敢断言，翻译了《资本论》的王亚南，并不懂得《资本论》。他的《“资本论”研究》白纸黑字，不服者可以争论。

因此，要懂得马克思，要发展马克思，一个人必须是自由主义者，必须是学术自由的身体力行者。舍此，发展马克思便是空谈。过去，马克思在个人贫困生活中自由地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今天，如果舍弃自由主义，仅仅靠金钱、权力来发展马克思理论，肯定不会有结果。对此，我有发言权。我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学者中，我直接研究过《资本论》。我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http://www.hujiangbei.net/xueshutansuo/karlmarx2000.htm>)，试图把消费或劳动力生产过程纳入《资本论》体系并由此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也许我的文章有错误，但它至少是真正的研究型文章。王亚南、刘国光以及国内那么多缺乏自由主义精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授，发表的直接与马克思有关的文章何止千百篇。可他们没有任何文章在深度上可以和我的这篇文章相比，因为他们写的几乎都是学习马克思的心得文章。他们这类文章全部加起来，也不及我的一篇研究论文。这里不是数量之分，而是层次之别。我的文章也是白纸黑字，不服者可以争论。而且，我的文章是中文；没有数学，纯粹文字叙述；应用了历史方法；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因此完全符合刘国光要求的“规范”。我相信，读过我的文章，人们会发现这里存在另一种马克思研究，没有任何政治保护伞的马克思研究。与此相比，刘国光的马克思“研究”与研究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而我之所以能够做到研究马克思理论，就在于自觉地想象自己处在自由竞争的环境，没有任何权势，也反对任何权势，除了以理服人外，别无他途。而这已经是学术上的自由主义。偏爱马克思理论的学生，提倡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如果想达到研究的层次，就应当同时了解自由主义的精髓，培养自由主义的情怀，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承认学术自由。做到了这一点，中国人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有希望。

2005年12月8日

10.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资助方更替时的谢词

今年1月底，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Stifterverband fue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正式结束了对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的资助。从今年2月开始，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成为本教研室的资助方。在这里，我作为教研室主持人，向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和德意志银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重建于1949年。这是德国经济极其困难、德国科学极端窘迫的两个年头。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为维持当时的德国科学研究，以

及后来为推动德国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发挥了显著作用。2000 年开始，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成立了后来以经济学为方向的本教研室。六年多来，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给了经济学教研室大量无私的资助，为它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意志银行成立于 1870 年。在德国近、现代经济史上，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德意志银行是世界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业务遍及几乎所有国家。德意志银行 1872 年就在中国设立了分行，目前它在中国从事大量金融业务。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德意志银行十分重视它的社会责任，多方面地资助教育、社区建设和防病扶贫。德意志银行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为该教研室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经济保证。

在当代社会里，商业和科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类事业。科学的兴旺，离不开政府以外的商业界的支持和资助；商业的发达，既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现发明，更离不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启示的制度架构。但商业利益和学者良知又有明确区别。一个商业组织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股东价值，一个学术机构追求的首要目标则是知识增进。学术上的知识是超越了任何特殊股东群体、特殊人群和组织的一般知识。学者良知就是在任何可能出现机会主义的场合，都根据建立在宗教和传统上的良心，坚持这样的知识。因此，对学术来说，脱离于商业利益、政治利益的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比金钱资助更加重要。

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是德国学者洪堡 (William von Humboldt) 200 多年前提出来的。它在德国虽然几经波折，但五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包括德国商业界的共识和德国学术界的现实，也是德意志银行对科学和教育秉持的基本态度。研究自由、教学自由要在中国成为共识和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资助科学研究时，仍然要求学者的研究结论和企业利益相一致。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本教研室希望加强和德意志银行的协作，并乐意为德意志银行承担非学术性的研究工作。同时，本教研室的重点将继续放在与德意志银行或者其它机构、团体没有直接关联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上。这些学术活动将完全不受本教研室资助方意愿的影响，而仅仅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以学者良知为准绳。

作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持人，我相信，从长远看，一种以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结构、一种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的中国教育和科研制度，无论对德意志银行还是对中国、德国的任何第三方，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保障；而本教研室利用德意志银行资助资金的最好方式，就是为增进人类的一般知识、为促进中国的学术自由和社会自由做好自己的研究和教学。

修改于 2006 年 2 月 26 日

11. 献身学术必须不惧危险

今天，本网站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苗福生先生撰写的“需要价值论”，一篇是我本人的“物化劳动和人化劳动的区别及《资本论》的体系”。两篇文章都与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有关。苗先生文章试图建立新的价值理论。我的文章直接讨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其中涉及到对马克思的批评。我的文章本身便是争论的产物；苗先生亦希

望自己的文章能够获得大家批评。本网站发表它们的目的是体现学术自由、促进学术讨论。

在 1949 年以后的中国，马克思理论被官定为唯一真理。中国学术从 1911 年以前的独尊儒学转变为 1949 年以后的独尊马学。一篇以经济学的价值论为主题的文章，如果讨论其它价值理论而不加以批判的话，便意味着反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而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无论出于完善马克思的“好心”还是反对马克思的“恶意”，也被视为反对马学。反对马学在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就意味着错误甚至罪行。1949 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没有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学者没有长成，以独尊马学为标志的学术专制，无疑属于最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直到近日，还有人问我能不能公开讨论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没有危险。

首先，我要说，赞成而不是批评地讨论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中国是有危险的。只要中国一天不正式放弃“独尊马学”，今天让大家也可以赞成非马克思价值论的“网开一面”，便可能成为毛泽东 1957 年自称的“阳谋”。2005 年刘国光提出要把经济学研究的领导权重新夺回到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就是一例。从那以后，无论用“红色旅游”还是宾馆度假的方式，海外回归的经济学教师大都得根据刘国光的建议重新接受马克思主义再教育。什么时候再出现毛泽东第二、刘国光第二，重新禁止非马学研究、重新核定右派，都是难以排除的危险。

其次，即使现在还没有秋后算帐，但是要当官，研究结果要获得官方认可，获得什么研究成果奖，赞成地讨论非马价值论与非马学都有危险。也就是说，要想独立研究价值论，独立研究马克思理论，一个人准备承受没有官方资助、没有奖励、没有荣华富贵的现实危险。

但是，即使有这些危险，为着学术，为着自己的特殊兴趣，一个人也应当去研究非马克思的价值论，研究非马学，以及独立地研究马学。其实，即使研究官方马学也是有危险。谁能担保中国不会在我们见到的某一天宣布放弃“独尊马学”呢？谁能断言中国民间学术界现在西学、儒学引领风骚的局面不会长久呢？学术研究需要一个人的长久兴趣和长期努力。投机者可以在股市上风光，可无法在学术界立足。名人者如刘国光，虽然获得刚刚建立的“中国经济学奖”，但其“研究成果”，又有任何学术意义？不过给“中国经济学奖”、给我们中国人加上一个耻辱而已。

人的一生总是存在着各种危险。但人的一生又应当是大大方方的一生，建功立业的一生。学术界的建功立业最为可靠，因为学术成果不但有白纸黑字为凭，而且有时间可恃。但是，要想获取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一个人首先不能惧怕政治受打击与人世遭冷漠的危险，不能有任何投机的想法。中国学术的进步，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学术大国，不但需要学术自由的环境，而且需要若干中国人不惧任何危险的献身。

2008 年 8 月 5 日

12. 我是一个自由研究者

最近，国内与国外都有朋友和我谈起申请研究项目资助。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同时，我也明确表示我是一个自由研究者。我不愿意受项目束缚，我的研究不能受项目束缚。所以，我不申请项目资助。

首先，作为自由研究者，我只研究我乐意研究的东西。而我乐意研究的是距离政府和现实很远的经济学理论。我无法预见我的研究是否能够出成果，更无法预见什么时候能够出成果，因此我无法申请具有明确时间计划的研究项目。

其次，作为一个自由研究者，我不愿意说假话。在中国，所有社会科学项目都要求研究成果不违背马克思主义，不违背社会主义。但既然是研究，事先就无法预期研究结果。一个人在研究之前怎么可能保证他的研究结果不违背这两个主义呢？将近三十年前，在绝对专制刚刚松懈的时候，我在自己撰写的学士论文上加了一句“作者的话”：“本文追求的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体系的一致。对可能得出的结论，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是的，我的论文追求的是和马克思《资本论》逻辑体系的一致，而且我当时笃信马克思，可我在撰写前又怎么能够知道自己得出的结论不会正好揭示《资本论》逻辑体系的错误呢？在科学史上，弟子诚心诚意地研究先生的理论并且也证明先生理论正确的例子很多，但发现先生理论错误的例子亦不胜枚举。哪位先生能让弟子保证其研究结果不违背先生理论呢？如果一个先生这样做了，他让弟子从事的就只是写作学习心得，而不是研究。一个政府这样做了，它让“经济学家”写的也是学习心得，而非从事研究。我做的是研究。我要保证我的研究结果不违背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我便在说假话。因此我只好不申请研究项目，或者说我不愿意申请违背自由研究精神的资助。

再次，作为自由研究者，我需要的是正常生活条件，而非特殊项目资助。在中国，许多获得项目的人可以通过“项目经费提成”增加个人收入。我希望增加个人收入，但我知道，项目申请要填明经费用途并且没有申请者个人收入补贴一项。因此，项目经费若按申请用途使用，个人提成便无从谈起。所以，在个人提成的情况下，任何审计员只要一对照项目经费申请用途和经费实际用途，就会发现经济犯罪。虽然我们中国同胞喜欢说“罚（法）不责众”，但违法总是违法，是无法用众与不众来推脱的，教授这样的高地位人士尤其无法用“从众”来推脱责任。

我完全同意针对成果可预见、时间能明确的研究实行项目方式。可至少就社会科学来说，大多数研究成果难预见、时间难明确，因此并不适合项目形式。为了繁荣中国学术研究，政府和大学应当做的是保证研究者的适当收入，让他们安心地自由地研究，而非用项目方式让他们去挣钱，让少数项目很多的人富起来，而置多数尤其是年轻研究者生活在艰难之中。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校长应当懂得这一点。据说，在亚洲太平洋经合组织（APEC）的上海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看到外国元首在屏幕上用曲线解说本国经济，会后便提出拨款搞项目，让经济学家在几年内也搞出中国的曲线图来。可是，如果不想让外人贻笑大方的话，中国领导人拿到 APEC 上介绍的理论，就不是用项目、用钱能够创造出来的。中国政府现在资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据说出一本书给 200 万元资助。但我可以说，那绝非研究项目，而只是少数学术骗子在糟蹋和骗取老百姓的钱。正常生活条件下的自由研究，是发现和创造的基本条件。我坚信这个在科学史反复证明了的道理，因此不去申请特殊的资助。

第四，作为自由研究者，项目资助也不是我从事研究的必要条件。相反，项目方式更可能阻碍我的研究。项目申请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万幸地得到批准，还得按时完成项目，得把项目成果发表在某一等级杂志上等等。我从事自己的研究，无须批准，没有时间压力，没有发表压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能够认真思索一些问题。比如我从 1998 年发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后，一直思索着如何把这一机制转变成分析性模型，直到今年年初才突然有了思路，并且建立了中国经济的短期分析模型（也许它才是中国领导人在下一次 APEC 会议上解说中国经济时需要的曲线图！）。如果十年来我不断从事短期见效的项目，虽然我的收入多了，小小成果多

了，但我不可能做出今天这样的重大成果。

在学校的评比中，我是落后的，因为没有研究项目。在中国的研究者中，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能够自由地研究并且还获得了一些成就。感谢上天，感谢朋友，让我做一个心灵无拘无束的自由研究者。

2008年9月10日

二、 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1. 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对“匿名”先生留言的若干答复

谢谢“匿名”先生11月4日用仁义礼智信评价我的辞职的留言（见本文末）。我的答复牵涉到我原来的一些思索，所以可能长一些，并可能跳出就事论事的范围。

“匿名”先生对我提出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从仁义礼智信角度考究一下，我辞职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比如第一条不智，就说得实在。像这类事情，如果在西方国家，那是肯定上法院，而且对我这样起诉的人是胜算在握；即使在中国，至少也应当到法院一试。法院在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确证当年几位校领导的口头许诺，以及检查学校是否发生了某些不可抗力的事件使它无法履行诺言。这自然可以请求法院调阅学校讨论我的问题的会议记录；我相信学校领导重视个人品行，不会否认其诺言，那么连调阅那些材料都不必要。西方国家正是靠许多人在受到不公时勇敢地对簿公堂，才使惯于机会主义的一些人类似的毁约想法不敢实行，使那里的法治得以实现。因此，我承认我不诉诸法律（不管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不管法院是否立案。现在的问题是根本没有去试探这条途径）而仅仅辞职的做法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做法，就此而言，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指点。

应当说，我的身上确实缺少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相反地，我具有的基本上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自重、自强、自省，简单地概括是自尊，洁身自好。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不诉求外界。如果外界条件过于恶劣，不能让他们做到自尊的时候，他们就退避山野，做一个委屈自己的自得其乐甚至不得其乐的隐者；或者离开故土，到外界有空间让他们自尊的地方去生活，也就是孔夫子说的贤者避世避地。中国的老子、孔子都希望甚至实行了后一种方式。像陶渊明、张志和这样的人实行第一种方式退避山野后，根本不顾及外面是何朝何代，实际上也和故土的变更无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本质上只属于知识分子，而不属于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对他们来说是外在的，和他们需要的自重、自强与自省完全无关。这些退隐者的做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成为文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因为文人的根本是人格，是自尊自重，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他们愿意退出尘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文人在自尊和遂志的两难之间经受痛苦煎熬的重要时期。一是元初，一是清初。元初不少前宋文人既有做官之念，又知做官之耻，于是生造了“吏隐”一词，以表示自己虽为新朝之吏，但心同于隐者。清初文人在倍受精神折磨的时候逃入了青楼，便有了“狎妓不碍忧国”之论。但由于他们都放弃了文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自尊自重传统，因此为当时和后世所诟。我常常想，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可能仅仅是托词，他也许是在用一个弱女子身上表现出来的“三户灭秦”之志，衬托出男性文豪人格的分裂，也表明自己虽不能隐于山林、但却用公开不合作及生存方式上的退隐维护自己人格的决心。

然而，最早在西方大量出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不但是自尊（它既包括了对自己的尊重，也包括了对外界的尊重，这就是自由和让别人与自己一样自由的要义），而且要求外界对自己的尊重（要求别人让自己和他一样自由）。由此生发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性。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教授多少年来都像陶渊明、张志和那样行事，他们早就辞职回家种田了（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有田地），世界今天不但没有独立的大学和学术，而且根本不会有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他们不是那样，他们挺立着，因为错的既然不是自己，为什么自己要退避？为什么自己要离开？现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和传统知识分子不相上下，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同时要求社会尊重他们的个人自尊，而且明白对他的

尊重只有当每个人都得到尊重的时候才能够获得保证；而为了后者，强权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忽视自尊与尊人的文化就必须改变。所以，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仅仅追求内心的自由，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则在这个基础上，同时要求外在的自由，在整个世界的自由、在国家内的自由、在社区的自由、在就业单位内的自由，以及最后在家庭的自由，也就是说，从皇权往下一个一个层次地直到父权、夫权都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以保证每个人在良知、道德和世俗的法律下享受自由和平等。

根据我对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上述理解，我想对“匿名”先生提出的“不智”、“不义”和“不信”做一些解释。他对我的批评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不采取积极诉求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反而消极退避、辞职离开，所为实系不智，对我的同事、对我的学生，亦有不义和不信之处。就此而言，我对我的同事、学生始终怀有一种深沉的内疚，我愿意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道歉。

但同时，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我的辞职在基本面上也许很难说不智、不义和不信。否则的话，比如老子离开中国、孔子不愿为官、陶渊明辞职、陈寅恪拒绝出仕都可以如此而论了。尽管我无法和这些后来竟然成为圣贤的人相比，但人皆可以成圣贤。圣贤需要良知和勇气。我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良知而是勇气。可令我们难以做出果敢决定的常常也是对他人利益的过多考虑。据说陈璧君在战后的南京法院上为其夫汪精卫和自己辩护时义正词严，令审判者难堪，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从沦陷区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才成立了绥靖主义的南京政府。法国维希政府也这样为自己辩护。汪精卫政府和维希政府都不无道理，但人们仍然要把他们视为“伪”政府。而像比如耶鲁大学因在越战期间坚持自己独立精神而得不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无疑损害了该校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利益。章伯钧以自己的右派言论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带入了困境甚至监狱（其实，这也是强权者强迫某个人服从时常用的绥靖主义语言“考虑考虑对你家庭的后果”。）。再说陶渊明吧，如果他折一下腰，治下的百姓自然得福，家人也不至于跟他回乡（他的妻子、孩子能领会他的回乡之乐吗？）；如果他有学生在县城，又不能随他同行，他亦得抛弃学生。由他的不肯折腰之不智，自然就有了对百姓之不义和对学生之不信，更惶论对家人之不仁。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否定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境界，甚至否定了知识分子本身：因为在考虑到这批人群、那批人群利益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判，一切都可以委屈，自尊和洁身自好将不复存在，所以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将不复存在。

在今天的“现代化”时代，依然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特点，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令“匿名”先生哀吾不幸、怒吾不争的原因。“匿名”先生所说的不仁，和常见理解不同。但他揭示了一点，就是传统知识分子仅仅诉求内省的做法，无助于社会制度的演进。在他们用退隐方式获得一己之安宁的同时，却强化了大众对强权之畏惧。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提醒。长期的低调生活和读书中的思考使我成为传统知识分子。但无论如何，时代已经变迁，在建立让每个人能够避免人格扭曲、做到自尊自重的社会和文化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我衷心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并且希望自己能够走上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

2004年11月9日

附：[“匿名”先生留言](#)

主题：不智、不幸和不争（2004-11-4 17:21:31）

一怒之下，断然辞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职务，此举有三罪，吾今试举之：身为现代知识分子，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懂忿而辞职，此乃匹夫之怒，是为不智。如“赖”在院长位置上，再以院长身份与学校打维权诉讼，就凭此举的新

闻价值，恐怕学校早就履行诺言了也！

院长一职乃公器，非君一己之个人事务也，当年入选，曾对全院职工许下改革诺言，多少教职员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事实上你和他们已成命运共同体，如今你一走了之，置同命运的众人于不顾，别人地位与子不同，焉可如此潇洒？此是不义！

当年信誓旦旦，要把财大建成国内西方经济学重镇，培养一批人材，而今人材未成，莘莘学子望眼欲穿，而师长何在？此是不信！

仁义礼智信五者，君已五居其三，剩下的仁和礼两条就不上纲上线了，如要罗织，这二顶帽子也不是套不上的，如你放弃与财大当局对簿公堂的机会，使得财大当局失去一次受法制教育的机会，进而使他们失去一次幡然醒悟，公开向你道歉，表现自己闻过则喜，从善如流风范的机会，是谓不仁矣！

参见<http://www.hujia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2. 为陶渊明申冤

我喜欢陶渊明，是因为对他那句“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自白很有同感。我幼时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精读”的必要；拿起一本书来，一气读完，似乎有解，但又不甚解，也不知道要“求解”。后遂成恶习，以至于现在当了教师，也没有一份好好的读书或讲课笔记：无奈时，就拿先生的这句话来解嘲。

今天谈陶渊明，是想为他申冤，而起因则是无意翻到的现行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学生要读“桃花源记”，好像没有异议。但书上的说明，把这篇散文视为陶渊明逃避现实的表现，却使我迷惑。国内中学教科书都是（半？）官方出版物，因此不载明负责这些内容的学者或官员。查一下吴兆基 1997 年编译的“古文观止”，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吴先生在对其它选文的按语中，几乎都仅仅交代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略有评论，亦褒奖为主。但不知为何对陶渊明“独有钟情”，三篇选文的三段按语，都贬其消极避世、逃避现实。不过，要说这是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似也不妥。清人龚自珍便称赞：“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今人陈寅恪经考证后认为“桃花源记”乃“寓意之文亦写实之文”，手头虽无其书可查，但陈先生认为所寓非消极之意，好像是不错的。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里比较陶渊明和李白时，则肯定陶渊明对人事和社会好像是消极的，但人格却是积极的；而李白对人事社会好像还积极，但人格却是消极的。中学教科书对学者争论之事若难持公允之论，也应规避才是。

我对陶渊明其人其文其事没有“甚解”，为他申冤，使用的是自己的老办法：以事比事，以心比心。从文来说，如果陶渊明“桃花源记”是逃避现实，那么康有为写“大同书”是否逃避现实呢？假设今日有人写文章描写官廉政清，我们是否能因为文章中没有注明真实地点（那倒成了报告文学甚至假冒伪劣），或者没有提出几条建议（那更像奏折文学），就说作者在逃避目前腐败的现实吗？按照“逃避现实说”，所有给我们以生活和世界美感的文学，恐怕都在逃避现实。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作品，包括“桃花源记”使我们有意无意感受到的似乎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向善向美的熏陶，而这样的憧憬和熏陶，正为中学生和已走出中学校园的我们在现实中不失自我地生存所必需。否则的话，中学教科书又何必选入这些作品呢？

从事来说，陶渊明一生最大之事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田。如果由此而说他逃避现实，那更是大谬不然。以心比心，试想今日若有一县长不满省里官吏下

县视察时敲诈勒索而宁愿辞官种田（注意不是另有高就），我们应当说他敢于直面现实，还是应当说他逃避现实呢？我们只能说他敢于直面现实！宁愿下乡种田而保持自身气节，正体现了一个人面对现实的勇气。试想，假如一个省有三、五个这样的县长，省官即使想入非非，也只得多加收敛，现实的政治自然会清廉得多。倒是那些不情愿地（情愿的情形不在这里考究）满足上司无理要求的县长，恰如鸵鸟一样，在躲避社会堕落的现实，逃避自己的现实社会责任。所以，从事考察，陶渊明更是一位勇者。晋朝之不救，有气节之感的官员多回避现实，迁就贪官污吏，而竟无响应陶渊明者，不能不说是一大原因。现行中学教科书把敢于抗争腐败的陶渊明确说成逃避现实，亦不能不说是尚未真正面对现实的学生的一种误导。

2002年5月7日

3. 学者的衣着

前几天秦晖先生来上海演讲，听者踊跃。如今著名学者演讲很多，听者踊跃的状况亦不少。但有区别。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秦先生穿的衣服旧，很奇怪。我想，在如今这个“先富起来的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代，秦晖先生当然不会藏富不露，有意识地穿旧衣服来“新潮”。我去过秦晖先生家，知道他家虽然远远比不上我见到的另外许多学者住宅的豪华，但不能够算贫困，应当有一套笔挺的西装在衣柜里吧。秦先生不着西装而穿旧服，我想还是“心不在焉”而致。

“心不在焉”是学者特征。思索越紧张，思想越深刻，衣食上越可能心不在焉。因此，若一个学者衣食简朴，我们便可以估计他或她正在接近自己的学术顶峰。一到他有精力有兴趣有时间来考评食之味、衣之美，他或她便开始过时了。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厉以宁先生常常衣着不整，所居亦狼狈，而那正是厉先生在学术上辉煌的时候。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当数厉先生第一。秦先生如今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良心的学者之一，其学理分析亦正在辉煌时候，自然心不在衣食。好在当年我们听厉先生授课，今天的学子听秦先生演讲，想得到的是他们对学术问题的观点、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人生的启示，虽然人要衣装，但毕竟简单明确、屏去装饰的思想才吸引着我们。这不像观球赛、看演出，那要的就是赏心且悦目的享受，就是兴奋以极致的放松，如果演员的服装不能新颖而使我们眼睛一亮，我们的享受和放松就会大打折扣。

学者最辉煌的时候，不是他们成为大小圈子明星的时候，而是他们在思想豁然开朗之后展开自己思想的时候。在展开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关注的仅仅是逻辑，是论争，是自己思想的说服力。此时的学者自然心无二物，想不到衣着对逻辑的助力。一朝成为明星，或欲启蒙大众，需云集应者；或多思想火花，但闪烁不定；或虽盛名可炙，恐其实难副：为强化观众眼睛一亮的感觉，便先得挑选衣着，以强化亮点，烘托名声。后者需要追星一族，前者需要论争对手。秦先生现在属于学者，但可能很快成为明星，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始终是学者，即使他的衣着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2002年12月21日

4. 伦琴墓前有感

可能是小时候家里人都很健康的缘故，加上没有好好地上中学，所以我听说 X 光很迟，知道 X 光就是伦琴射线更迟。今年寒假到了德国的小城吉森 (Giessen)，没有想到伦琴 (Wilhelm Roentgen) 的墓距我的办公室不过二、三百米。很简朴的墓地，应当是伦琴父母和伦琴夫妇共用的，因为墓碑上刻着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和生卒日期，伦琴出生最晚，因此名字刻在最下面。墓前没有鲜花，只有倔强着寒冬的野草；也没有任何纪念伦琴伟大发现的标记，两侧和前后是其他人的墓地，和伦琴的墓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伟大的人，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02 年来，世界选出了 100 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几位呢？甚至伦琴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对大多数人也是陌生的。但有多少人不知道 X 光呢？病人不需要知道伦琴射线，“X 光”这个名词对他就够了。甚至伦琴也没有希望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自己发现的奇怪射线。他首先称这一射线为“X 射线”，首先请自己的妻子在射线前实验它的特殊显影作用。后来他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名誉，但他始终保持谦虚态度，沉默寡言，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更没有用自己的名誉去争取利益。他的一生也许就向他墓前的小草一样，简朴、倔强。他曾经被中学不公正地从开除过，他到外国才上了大学；后来，他甚至谢绝了政府让他担任帝国物理技术管理局局长的要求，满足于教授的在孤寂中探索的生活。他是在慕尼黑逝世的。虽然他生前就了解慕尼黑市政府会给予他墓地，但他仍然要求把自己墓地放在吉森这个小城市。

伦琴是个人道主义者。他对别人的困难非常理解，很少向别人要求什么。他连让助手为自己做事都觉得难以开口。他的发现迅速被应用于治病救人，也许和他的这一素质密切相关。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物理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许多物理学大师活到了二十世纪，看到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当时有资格领取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太多，所以很多人没有领到，至今还被科学界引为遗憾事。做出了比伦琴的发现更重要或者同等重要工作的同时代物理学家很多，但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伦琴的根据之一，就是他的发现拯救了无数生命，减少了无数病痛，带来了人类无法估量的福利。而这正符合诺贝尔本人的科学和人道统一的愿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着伦琴的成就，而他，仍然像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既坦然地承认“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但也“从不寂寞、从不烦恼”，静静地躺在这偏僻的小城，拒绝着世人的打扰。因此，我到他的墓地，也只能是孤独地去，静静地伫立，再孤独地回。

2003 年 2 月 11 日

5. 创造历史的易和难

创造历史往往很容易。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向教职员公布了财务状况。我不知道，在高校内的专业学院、系所成为具有财务自主权的独立财务单位以来的中国历史上，这是不是它们第一次公开财务？如果这样的话，创造历史不免太容易了。哪一所财务独立的高校能够公开财务，它也将创造中国历史。哪一位官员或者政府机关能够公开自己的财务，他或它也能够创造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在公开化、制度化上的空白太多，所以，几乎每

一个有权的人、有权的机构都能够在这方面做一点开创性的工作。

但创造历史往往又非常困难。

为什么在每个人都承认公开财务必要性的时候，财务又不能够公开呢？许多单位的重大事项不能够向职工公开呢？据说，最重要的理由是需要征求上级的同意。而我们知道，上级机构本身往往还没有公开它的财务，甚至没有近期公开的计划，那么，上级的“同意”是很难的。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需要上级同意呢？财务向本单位公众的公开，或者是向社会的公开，这两者都不需要上级和外人的同意。只要本单位人员有要求，只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做，只要当事人确实想制定一个公正有效的办事制度，公开就是必要的，而无须得到其他人的批准。

在中国，有权者很容易创造历史，而他们不能够创造历史的困难，可能还是马克思所说的他们心中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马克思在为“资本论”写的序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派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我们知道，英国高教会派之所以能够饶恕对它的信条的攻击，是因为相信这些攻击影响不了它的会众，但对它的财务状况的攻击会却会使它丧失人心并引起法律上的追究。在英国（即使在那么“黑暗”的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由于有制度，所以高教会必须聘请检查人员来检查它的现金收入，向它的会众公开财务，以便反驳对它财务的攻击。而正是在这篇序言里，马克思赞扬英国检查人员的“内行、公正、坚决”。有了制度，再有了这样的检查人员，即使有权者怀有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他们也无法采取激烈、卑鄙和恶劣的方式，而只能够根据法律和规范来争取自己的个人利益，这就像在英国，由于制度，由于一批“内行、公正、坚决”的人维护研究自由，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人再激烈、卑鄙、恶劣，他也不能够限制“资本论”的出版和传播。因此，在那些地方，也许确实到了“历史的终结”，没有创造历史的机会了。而在中国，我们现在既乏制度，又少“内行、公正、坚决”的检查人员，所以，在制度建设上创造历史的机会还很多很多。我相信，只要有权者能够唤醒自己心中“最勇敢、最神圣、最美丽”的感情，以内行、公正和坚决的行动去做，他们就会创造历史。

2003年10月28日

6. 从纪念胡寄窗先生想起

今年是胡寄窗先生诞辰百年。胡寄窗先生经历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小变动，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但胡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主导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培养了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人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胡先生的挖掘和研究。

我上大学的时候，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师很希望我能够成为这门学科中人。但我没有遵照师意，很抱歉地走了另一条路，和经济理论结上了姻缘。今天，在纪念胡先生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永远值得我们自豪。但我们今天能够留下什么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值得在我们作古后，在比如二、三百年后，让那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来挖掘、来整理呢？

我走上的道路，是一条应当为思想史学科的后来者提供学术资料的道路。如果走上同一条路的人们包括我自己不能够做好工作，那么，后人对今天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应当做的事情是承续经济思想的历史和继续创造历史，而把功过与否，让给以后的思想史学家来评论。

在经济思想上创造历史是困难的，尤其在中国和世界结成一体、从而以往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用“国内领先”来表示创造历史的说法不再可行的现代，创造经济思想的历史就更为困难。但如果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我们不向自己提出创造历史的任务，我们便容易自满于三流甚至末流水平，容易用个人小环境的恶劣来否认他人对我们的期望。其实，小环境是个人创造出来的。胡寄窗先生在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在关心宣教和实用的主流“学者”旁边，在缺乏项目支持、缺少领导重视的环境下，做出了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从而把同时代的主流“学者”远远抛在后面。胡先生的事迹再一次说明，创造历史的人也创造让自己发挥作用的小环境。创造这种小环境所需要的条件可能并不多，也许在政府面前保持独立，在社会风气面前保持独立就够了。跟着政府的意向走，研究政府最需要的东西，学者容易失去理论的一贯性和深刻性；跟着社会风气走，不愿意落伍于时髦，学者容易失去作为学者特征的气质和立场。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有资金支持，即使有领导栽培，即使有权力在握，风风光光，小环境不可谓不好（虽然也不可谓不劣，因为资金总有短缺，栽培总是不够，权力总是不全），但与创造历史恐怕无缘。胡寄窗先生总结的古代思想史证明了这一点，胡先生诞辰百年来的思想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纪念胡寄窗先生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无法回避，不得不写下这里的几句话。

2003 年 11 月 27 日

7. 我最初知道的孔夫子

最近整理书籍，竟发现了久违的《论语批注》。它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零级工农兵学员写作的，中华书局 1974 年出版，内部发行。按现在的规矩，内部报告等，只要受到市和市以上领导重视，便可计为学术成果，作为晋升教授、博导的依据。若能有中华书局这样著名的机构内部出版，身价自然更高。由此看来，这本当年的著作，也是不应当忽视的。

更重要的是，当年这本著作发行很广，几乎每个人都要学习（而不仅仅了解）的。所以，重新看到自己年轻时认真学习过的这本书，我甚至有一种亲切之感。我是在学习它和类似它的著作、文章的氛围中长大的。我不但习惯了那些语言，那些思维方式，而且真诚地认为它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虽然今天它们不再流行，可我往往还有一种“何日君再来”的感觉。因此，又看到这本书，我忍不住打开读起来。然而，即使我熟悉它们，即使我虔诚地相信过它们，我也几乎不敢相信我读到的是这样的内容，我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相信的是另外一些“好”的文字。但是，白纸黑字使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初的历史：我对孔子的最初知识就是从这样的“批判”中获得的。这本批注，按照《论语》的篇目顺序，一句一句地逐句加以注释、翻译和批判。这里仅列出《论语》中两句话和作者的批判，以忆自己青年所学，且为今日之镜也。

《论语》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批判：

孔丘创立的儒家学派，不仅是一个反动的思想流派，主要还是一个反动的政治集团。为了复辟奴隶制，阴谋篡夺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孔丘从鲁定公初年（公元前509年）开始，便开坛设教，广招弟子，大肆宣扬他那套反动说教，大造反革命舆论，拼凑反革命队伍，积蓄实力，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叫他的门徒专心致志地学习礼、乐、《诗》、《书》，把自己训练成复辟奴隶制的帮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要他们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说要不要怨恨执政者不任用自己，要善于搞韬晦之计，耐心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大干一场。

宋代反动哲学家朱熹，曾把《学而》吹捧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事实上，孔丘的那个“道”是反革命复辟之道，孔丘的那个“德”，是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德”。《论语》一开始就记载了孔丘办教育的反动目的，反映了儒家维护没落奴隶制的顽固立场。

（《论语批注》第1—2页）

《论语》9.29: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批判：

恩格斯曾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被各个时代反动派吹捧了两千多年的“智、仁、勇”，绝不是什么超阶级、超时代的人类美德，而是孔丘提出的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道德规范，具有鲜明的阶级内容。孔丘所谓“知者”，是指能精通周礼，并能够为奴隶主贵族出谋划策的人；所谓“仁者”，是指能“克己复礼”，并能按周礼进行统治的人；所谓“勇者”，是指能为维护奴隶制而卖命的人。孔丘力图把他的门徒培养成这样的人，后来的儒家著作《中庸》把这三种反革命信条称为“通行天下的美德”。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也一直把智、仁、勇作为培养反革命人材的标准。

独夫民贼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工农革命的目的，就曾以“智、仁、勇”为标准来训练他的党徒。抗日战争时期反共老手陈伯达与国民党反动派紧密配合，把“智、仁、勇”吹捧成“人类三种伟大的德性”，胡说“具有智、仁、勇三种德性，才是完全的人格”。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林彪又搬出孔老二的这套破烂货，胡说什么“仁”就是团结，“勇”就是斗争，“智”就是“唯物论”，用儒家反动思想冒充并篡改马克思主义，赤裸裸地继承奴隶主阶级和后来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糟粕，作为他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武器。

（《论语批注》第204—206页）

2004年04月12日

11. 悼杨小凯先生

杨小凯先生逝世了，刚刚 56 岁，还不到据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 58 岁。当然，寿命不是人生价值的决定因素。人不是为了维持个体的寿命而生活在世界上，以健康为生活目的的人亦难无疾而终。杨小凯英年早逝，无疑与他年青时受到专制政权的残酷迫害有关，但也与他后来的超负荷工作有关，不过，我宁愿按照我所理解的基督教的观念，想象成他信仰的主把他重新召回身边，让他平静地休息休息。是的，杨小凯已经做了他应当做的所有事情，已经做了远远超出他应当做的事情。我相信，在天堂上，他可以平静地说：他没有碌碌无为，没有随波逐流，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大同的事业。

杨小凯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他在经济学领域内开创的超边际分析。他通过分工的特殊作用，揭示了边际收益递增的一条新途径。为此他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经济学思想到经济学方法，从理念层面到技术层面，从专业论文到教科书，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对杨小凯这样一个起步很晚、最初在语言、数理工具到理念诸方面对经济学都完全陌生的人来说更不容易，我们必须牢记他的成就背后的艰苦劳动。

由于杨小凯强调超边际分析，他的观点体系和强调边际分析的新古典学派有很大不同。然而，无论边际分析、非边际分析还是超边际分析，都属于国内惯称的西方经济学范围。在国内，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指的是那种基本概念、基本分析工具从西方国家引入并可以而且也应当批判的经济学。当然，如果一个理论不可以或者不应当批判，它本身就不是科学。同时，杨小凯应用的分析概念和工具又是西方经济学的，所以他的工作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围内的工作。如果他的工作经受住了后人的检验，他的工作也是发展或者扩展、而非冲击了西方经济学。

杨小凯在经济学领域所做的探险无疑是辉煌的。仅仅凭着这些探险，他的一生就已经值得了。但杨小凯最值得我纪念的，是他超越了作为技术员的职业经济学家角色，而显示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的特点。

分工本来是杨小凯最得心应手的话题。现代社会的分工之深之细，造就了各领域的专门知识，也迫使过去的学者转变成技术员。但另一方面，分工愈深愈细，各类分工之间的联系便愈密切，社会作为各领域的有机整体愈重要，社会也更加需要超越了技术员的学者。杨小凯也许天生就是一位学者，还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学里，他就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小人物涉猎的非职业性文章。更可贵的是他在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之后，继续保持着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社会大问题的密切关心和理性思考。如果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只有红宝书可读的时代，根据官方口号和宣传而相信中国的出路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者的平等社会，并因此而被毛泽东（据我听他本人如此说，而非止于人们常说的康生）亲自指示投入监狱，那么，在他走出国门后，发现这样的问题早已经被仔细讨论过，而提出各种观点的人都无须担忧牢狱之灾，他的思考显然变得深刻和理性了。其实，除了经济学外，在一个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需要的亦是发展或扩展、而非冲击西方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杨小凯在国人沾沾自喜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的时候，向国人浇了一盆后发制度劣势的冷水，提醒国人注意制度扭曲下的经济发展的危险性。他的观点或有可商榷之处，但他针对中国所提出的后发劣势，将像幽灵一样罩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而挥之不去。我们知道，能够让社会意识到自身缺陷自身危险的学者如马克思、哈耶克才是伟大的学者。杨小凯也是这样的学者。而他的逝世，把他近 40 年前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又一次放到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我想，我们安慰

他的在天之灵的最好方式，也许是在仁爱、爱人的基础上思考和努力解决萦绕着他一生的这个中国人共同问题。

2004年7月29日

9. 说真话

刚从远离Internet的地方归来，就有朋友告知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许多教师被网民评论或者调侃了一番，希望我能够读一读。果然，在网址“<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4900>”上，一位化名为Skywalker的网民对经济学院不少教师做了简短直接的评论。我不知道其它教师读了这些对自己的评论有何感觉。我的感觉是他（她？）对我的评论是恰当的。在我现在的位置上，能够听到对自己的批评已经不容易，能够听到比较恰当的、确实说到痛处的批评更不容易。所以我很感谢很佩服。我想，这样的批评不但对我自己有好处，对我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也有好处。

应当说，我在不同环境下也做过若干次学术报告，但很少听到过直刺报告弱处和错误的评论。这也许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不愿意说“恰到好处”的话。“皆大欢喜”无疑有好的一面。不过，它同时阻碍了我们深入思考问题、思考自己。缺乏深刻性不但是许多文章给我们留下的感觉，而且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给他人留下的感觉。而它可能正是我们平时的“皆大欢喜”带来的后果之一。表面上的皆大欢喜带来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背后评论。既然不好公开说真心话，背后总能说吧。但“谁个背后无人说”结果，往往却让每一个人感觉到人心的叵测。

网络有助于缓解中国文化中的这个悖论。有了网络，有了虚拟，即使我们还不能够对公共事务公共人物说什么真心话，但我们能够对日常事务日常人士说真心话了。原先通过曲折渠道传达到当事人那里的对他的背后评论，现在可以直接和公开地被接收。原先传达过程中的信息损失、信息扭曲、参与传达的特定个人的喜怒善恶等各种情况，现在一下子都扫除了。由于网上评论是公开的，评论水平自有众目昭彰，对评论者动机和目的的全部猜测就变得不再重要。同时，网络上既然能够说真心话，直刺当事人痛处的评论便容易形成和表达。这样的评论本身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为前提。而当事人在这样的评论面前，也容易向深刻的方向改变。自然，这里要有前提，即当事人一要有精力去学习和思考，二不是鲁迅先生所称的“文氓”。

当然，网上的评论和网下的评论一样，不但不能做到完全准确，而且还可能根本不值一读。对此我们实在不必多加苛求。Skywalker对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诸教师的个别评论准确程度如何，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认为他（她？）说的是真心话，说得有水平（至少对我的情况），值得一读。网上评论比纸媒评论之所以更值得重视，便是因为它更多地表达了网民发自内心的真话。这是网络最可珍贵的地方。说真话本来是人的最原始要求。社会礼仪的发展虽然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真话做了范围、时间、环境的限制，与人为善的愿望又使我们在无伤大碍的情况下抑制自己说出对别人不利的真心话。但所有这些限制和抑制都是以说真话为大前提的。在比较重要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甚至必须不顾一切限制地说真话。也许，如果我们自己更多地说真心话，如果让别人更多地说真心话，我们大家才能像罗大佑希望的那样，

互相拥有对方“真心的面孔”，才会“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着明天会更好”。

2004年8月24日

附：Skywalker 对我的评论：

胡景北就不多说了，水平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仍然想指出胡景北的一些不足，这从他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小册子就可以看出。胡景北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方面是有一些个人探索的，然而他的建模水平有些不足，和他的经济学直觉不能相比。

Skywalker 的评论全文请参见 <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4900>，2004年8月24日，或<http://www.hujingbei.net/shuangzhouiyehua/Yehua2004No16.doc>。评论中有若干别字，请注意。

10. 你最好一笑置之

恰巧两个月前，我写了今年双周夜话第16期“说真话”，就网民 Skywalker 对我的评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把 Skywalker 的评论作为附录加在我的短文之后的时候，我有过一瞬间的犹豫，因为最妥当的做法是仅仅附上他对我个人的评论，而把他对经济学院教师的那篇评论全部附上，无疑有不妥之处。但我当时一下子没有想出如何把他对我的评论分离出来而又保证将来能够检索到，同时作为刚刚交班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我感到有义务让学院所有老师知道外界对他们的有一定水平的评论，即使这些评论完全是负面的。正如我向包括田国强院长在内的经济学院现领导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仍然是院长的话，我会把 Skywalker 的评论发给每位教师。

今天，Skywalker 真实身份已经被查出（据说仅仅是个本科生!!!）；他的评论已经从最初发表的网址删掉了；据说他受到了诋毁他人名誉的上诉威胁，生活受到了严重干扰。许多朋友劝我把他的评论从我的网页上删除，以消除“不良影响”并平息“公愤”。

然而，我不认同“不良影响”和“公愤”之说。Skywalker 的评论激起强烈反响和造成“不良影响”甚而“公愤”是两回事。他的评论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它是国内少见的对经济学教育有水平的评论。首先，他的评论直指个别教师，而不是笼统地就经济学院而言；但他的评论又触及了大批教师，所以又可以看成是对经济学院的总体评论。其次，他的评论是未来导向型的，爱憎分明。再次，他的评论直指要害，尖锐有力，在若干点上甚至恰如其分。让这样的评论从此消失，也许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史研究的一大损失。试想，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撰写包括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史，Skywalker 的评论可能会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我们今天写起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经济学教育之所以难有深度，部分原因不就是缺乏对那些年代经济学教育的批评性言论吗？那时没有网络，批评性言论（无论对否）无处可说，所以我们看到的文献都是褒奖性的，可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又传播了多少五十年后看确实有用的知识呢？让不同意见保存下来，是中华民族治史的传统，也是中国先进文化得以保存的条件。同样，让与自己不同甚至错误的看法保存下来，既能够激励自己，也能够让后人、外人更准确地评价自己。一个学者、一个学院不会因为恶意评论而垮台，

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学术和商业不同之处，况且 Skywalker 的评论整体上还算不上恶意评论。

其实，一个本科生能够写出这样的评论，本身便值得我们尊重：他至少在关心着经济学、关心着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思考着经济学院的未来。他的评论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首先，竟然还有学生对这么多教师做出如此的评价，可见学生眼光之犀利、要求之严格，绝非让我们沾沾自喜的学生座谈会发言所能够表现出来的。其次，我们真像评论所说的那样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学生有那样的印象？如何通过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工作改变那样的印象？确实，有 Skywalker 这样的学生，哪一位教师还能够自以为是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得奖后曾经说过，没有责难他的那些学生，就不可能有他的创造性工作。是的，没有这样的学生，学者只能靠孔夫子或者康德的“内省”来发展自己的学说。但内省习惯的修成比起得到学生的责询和外界的批判显然是更困难的，所以学术才需要公开批判，学者才需要接受公开批判，包括根本不如自己的人的批判。

当然，作为年轻人的写作，Skywalker 的评论没有全面地对待各位教师，没有指出他们处境的困难和他们取得的成绩，而且不乏过激之词，不乏对部分老师的苛评和错评。然而，要求年轻人“全面”与“平和”就几乎相当于要求他们“老龄化”。年轻人的特点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问题在于他们攻击的那一点是否正是我们自己的要害且薄弱之点。看来 Skywalker 在一定程度上是击中了包括我在内的不少教师的薄弱要害，不然的话，他的批判不会受到注意，更不会产生所谓的“不良影响”以至于“公愤”。

Skywalker 对我的评论是中肯的。也许它会在我的学生、朋友中造成对我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这能使他们对我的评价更客观，所以我接受这样的影响。对我过去的同事，我的建议是，即使 Skywalker 对你的批判过火甚至荒唐，你最好是一笑置之。如果你感到 Skywalker 没有尊重你，那么，你的反应若超过了一笑置之，你可能就是不尊重自己了。大学教师是一个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它之所以受到尊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对个人君子风度要求最高的职业。你和我一样，在年轻时想到高校教师的职业时都会心潮澎湃，都会下决心当一个谦谦君子、为人师表的教师。今天我们幸运地从事了大学教师的工作，我们不会忘记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大学教师的强处在于自己对学术工作的信心，在于自己为人处事的君子风度，而不在于别人（包括像毛泽东这样最有权威的和像 Skywalker 这样最没有权威的人）的批判或褒奖。所以，即使 Skywalker 对你的评论完全错误，你在提出自己看法的同时，在世俗行为上，也最好一笑置之，并且相信三、五年后或者历史会给出公论。

2004年10月25日

11. 学者的无欲则刚

“无欲则刚”从林则徐的名句“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来，说得是男子汉大丈夫（用这个词仅仅指男女皆可具备的某种人格，并无性别之意）的刚强正直源于其没有欲望。既然无欲，也就不必为欲而求人，自然容易刚强正直。这就像佛家说的“忍，无可忍”。既然无可忍，忍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别人需要忍受的东西，佛者平静处之，

没有忍受的感觉。但林则徐说的无欲，又和佛者不同。林则徐的无欲指的是没有功名之心、财富之求、升仙之念，而无欲所奠定的刚直，却为着实现个人良知、民族兴盛之欲。若再细细计较，其实功名、财富、升仙之欲望，都不能够算错。欲望能够促使人努力。“哀莫大于心死”，说得便是没有了欲望，既无所求，便乏进取，以至于近乎凄冷。因此，问题其实不在有欲无欲，而在实现欲望的方式，就此而言，林则徐的无欲又可以理解成欲望的实现不应当以良知为代价。

前几天和朋友谈到无欲则刚，便牵连到发表欲。既为学者，又为大学教师，不会没有发表欲。刚正不阿不在于发表欲的有无，而在于用符合良知的方式实现之。我在几年前寻求发表《略论服务业资本》时，有的杂志犹豫；有的杂志要求缩短，我皆以历史文件为理由，坚持原样发表。但是，在准备《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投稿时，我却犹豫了：我明白文章阐述的机制仅仅以市场经济为条件，是不是为便于发表，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那篇文章的内容完全不需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修饰词，但加上可能更容易发表。后一种考虑最后占了上风。文章是寄出去便发表了，可“白纸黑字”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痛。是的，无欲则刚，我当时的发表欲让我不能刚正，让我写下了当时就意识到不应当写的文字。因此，即使我的发表欲不能算错，但我为实现它而违反自己的良知，却使我在白纸黑字前自取其咎。

学者对无欲则刚的重视，应当高于其他人，因为其他人的行为都很难准确“再现”，所以“历史是什么”的答案众说纷纭；可学者留下的白纸黑字是其个人历史的见证。学者是知识的象征，他的行为无法用“无知”来开脱；他违反良知的文字不是屈服于世俗便是献媚于权势写就的。就此而言，学者和有志于学术的人下笔应当慎重，应当想到生前身后事，而不能把日常的科研考核治标放在首位。我们生活在一个扭曲的世界内，学术文章很难发表，宣讲性的媚俗媚势的文章大行其道；学术文章需要锤炼，考核却要求我们发表短、平、快的作品。但正是这样一种世界特别需要学者，需要坚守良知的学者，需要他人对学者的监督和自由批评。“无欲则刚”将成为我牢记的箴言。同时，我又强烈希望世界早日正起来，因为自律尽管非常重要，但他人对学者、对我自己公开的自由批评和苛刻要求更为必要：它们才是保证我本人在内的绝大部分学者坚守良知、自动实现无欲则刚的制度条件。

2005年2月28日

12. 请尊重学者

网友“落叶无痕”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对翻译质量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参见 <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04&ID=73199&replyID=73199>）。翻译质量问题完全应当呼吁。译者的自律、出版社的自律，以及公开的舆论批评，甚至监管，都值得我们考虑。在这里，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是最重要的。它是译者和出版社自律的最重要保证，也是监管者自律的最重要保证。因此，我对落叶无痕的公开批评表示支持。

落叶无痕同时批评我为王根蓓翻译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所写序言中对该书翻译质量不负责任的褒奖之词。我完全理解落叶无痕的感觉，我只要在书架上看到这本书，自己也会汗颜。考虑到这里涉及的是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而非仅仅王老师个人的不当，我决定澄清一下。王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三、四位最先从事高级

经济学教学的老师之一。她自学和教学非常辛苦。我愿意支持她。因此，她请我作序时，我很快答应并写完发给她。我了解这本书的英文版，但我没有读过出版前的译稿，所以我的序言对译稿质量没有做任何评论。《高级宏观经济学》翻译出版后，我看到我的序言被加上了正面评价译稿质量的文字，立即向王老师提出质疑，王老师向我表示道歉。今天，我在这里向落叶无痕和其他读者道歉。我没有事先要求阅读译稿，没有事先向王老师特别强调我未读译稿从而无法对译稿质量表态，这是我的疏忽。如果不是落叶无痕“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逼使我公开表态的话，我可能仍然不会澄清这件事。为此，我向落叶无痕表示感谢，并且特别感谢网络提供了一方自由天地，让“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有了可能。

不过，我澄清这件事，决不是对王老师个人提出指责：王老师也是目前制度的受害者。我想提醒的是国内不尊重学者个人的风气。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除了这次序言改动外，至少还有三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1. 1998年《经济研究》杂志对我的文章“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改动。它至少造成了该文文献引用的不规范，而这是我经常要求学生避免的。
2. 2002年上海财经大学用我的名字和文章申请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宣传和研究奖（并且竟然得奖）
3. 2005年同济大学用我的名字申请博士点。

所有这些都是在我完全不知晓的情形下发生的。考虑到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我不能不表示遗憾，对那些“荣誉”不能不表示拒绝。可更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发现这里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很少有当事者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检讨的地方!! 这就使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学术制度和中国人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

谈论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问题不是这篇短文的任务。在这里我仅仅想就学者的个人名誉问题说几句话，并且顺便向我过去工作的上海财经大学、现在工作的同济大学同仁们进一步说明我为什么表示遗憾。大家知道，学者之所以必须自律，公众之所以认为学者能够自律，就是因为学者留下的文字是可以对证的，学者留下的文字和其行为是可以对照的。学者是有知识的人。每一个普通公民可以像孔夫子说的那样，期望学者“行有余，而后学”，即不但有知识，而且首先有良心有道德。可仅仅有知识（这是学者之所以能被称为学者的原因）这一点，就剥夺了学者以“不懂”、“不知道”来为自己良心辩护的权利。一位在机关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德国肯定禁止读《资本论》的时候，我知道他缺乏知识。若一位学者说这样的话，我只能认为他撒谎，因为我不能说无知，也不能说他不懂不知处慎言的道理。所以，学者写错的文字、做错的事情，是不能够用任何社会的、强权压迫的、功利的、世俗的理由来辩护的：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必须负有个人良心和名誉的责任；白纸黑字，又使得学者无法像政治家、企业家、其他公民那样用事实不清为自己辩护。正因为如此，学者的名誉是透明的。

学者名誉的另一个特点是个人主义。学者的观点是他们个人的，学者的文章著作是个人署名的，民众和历史记得的是他们个人的名字。尽管他们的成就或失败有许多人的功劳与责任，但他们的成就或失败首先仅仅是他们个人自己的成就或失败。集体创造、集体堕落或者说集体责任，不适用于学者。巴金1949年以前的成功是他的个人成功，任何其他对他成功的贡献都很次要；同样，巴金1949年以后的失败也是他的个人失败，无论毛泽东的专制还是周恩来的引导都远远不能抵消他的个人责任。这就是学者的个人性。学者是以个人人格和知识立身于世的。学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李白、曹雪芹、马寅初，在国外，卢梭、牛顿、爱因斯坦、凯恩斯都是以个人身份创造历史的，他们和某个单位、某个政府、某个国家本

质上是无关的。孔子多次出国甚至要出海，卢梭曾是法国政府追捕的要犯，可今天中国和法国分别把孔子、卢梭列入本国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中。所以，学者的个人名誉独立于任何其他集体名誉和他人名誉，独立于例如家庭名誉、单位名誉、政府名誉、民族名誉、国家名誉、主义名誉甚至人类名誉（尤其在强权者把自己利益与这些名誉混同的危险仍然存在的时代里）。

学者名誉的透明性和个人主义特征，在促使学者自律的同时，也要求社会其他人尊重学者的名誉（学者自然也应当尊重他人的名誉）。一个个人、一个单位、一个政府的利益无论多么正当，都不应当以自己的利益来要求学者，不应当要求学者扭曲自己来服从其他个人的、单位的、政府的利益。由于知识的有限性和观察角度的局限性，学者会犯判断错误。但这样的错误却是社会应当公开批评但必须容忍的。为什么社会应当容忍学者的判断错误，应当给学者发表错误判断的机会？这里的理由就是学者在单位、政府利益前的个人独立思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个人责任，比起他们判断的正、误本身重要得多。用他们的判断错误来否定他们的独立思考，社会就容易失衡，文化就容易窒息，单位、政府、国家的错误就容易发展到极端。这样的教训，对我们中华民族是太深刻了。从历史上看，学者的判断错误尽管经常发生，但对学者声誉没有严重的影响。相反，学者声誉的毁灭或者严重损害，几乎全是因为他们个人良知的错误。学者有知识。就像巴金，1949 后的他不可能突然丧失文学史的知识。落叶无痕之所以因为我对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的上海财大翻译本的褒奖而起鸡皮疙瘩，根源在于他不相信我缺少翻译知识。因此，如果一个学者的判断错误使他人有理由认为不是其知识的问题（更不用说学者还自诩为有知识的人），学者就会受到公正性或非功利性怀疑，学者的名誉才真正会受到损害。毫无疑问，学者的名誉首先建立在学者的自律上。但同时，社会对学者名誉的尊重，社会不从其他方面“无意识”地损害学者的名誉，包括不用制度方式（例如每位教授每年应当发表多少文字或者获得多少科研经费的要求）或非制度方式“无意识”损害学者声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强烈地希望社会（包括个人、单位、政府）尊重学者的文字，尤其是出版社、杂志、报刊尊重学者的文字，因为这是学者的根本所在；我也强烈希望社会尊重学者的个人行为尤其是他们与学术相关的个人行为，尊重他们姓名的使用权，杜绝在他们不知晓的情况下使用他们姓名的作法。

2005 年 7 月 12 日

附：落叶无痕的批评 “上财翻译的两本 LJ!!!”

我们这个学期要学习高宏和高微，老师推荐我们直接购买英文的影印本，据说说的夸张点，中文的翻译比用“金山快译”译出来的还差。无奈兄弟们 E 文不好，还是弄来中文版对照。结果差点被气的吐血。

翻译的真的实在是让人无语。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拜读拜读。

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 戴维罗默著 王根蓓 译 陈雷 校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 杰弗瑞 A 杰里 菲利普 J 瑞尼 著 王根蓓 译 朱保华 校

胡景北先生给高宏中文版做序。看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特别是在学术浮躁甚嚣尘上的今天，从事翻译这项冷寂的事业，需要非凡的毅力与耐心。我的同事王根蓓能出色的翻译出《高级宏观经济学》，其中的甘苦只有内中人才能体味，其为学为人的坚毅与执着实属难能可贵，这也正是我乐意为她的译著做序的原由”

参 见 <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04&ID=73199&replyID=73199>

13. 邹恒甫应当说话

IAS（武汉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被关闭或者被拆分，邹恒甫应当说话，应当公开说话。这是因为，IAS 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来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的影响早已超出武大、超出北京、上海几个大城市，而波及到了全中国。它是中国高校推广和学习现代经济学标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的地位不亚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句话，IAS 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公共产品，而不再是邹恒甫本人或武大甚至武大某个学院的私人产品。这是邹恒甫为经济学（而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界）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所有其他中国人望尘莫及的。

然而，正因为 IAS 已经成为公共产品，IAS 的关闭或拆分（下面简称关闭）也就成了公共问题，而非邹恒甫或者武大的私人问题。邹恒甫和武大有义务向公众做出说明。由于我们不可能指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做什么说明，我们自然期望邹恒甫会向我们说明 IAS 为什么关闭，说明如果他不同意关闭，他采取或者将要采取什么步骤争取 IAS 的恢复。

这样一种公开说明，在美国是一种义务和必须。它是限制政府或某个机构重大随意性行为、提高政府行为可预期性的保障之一。在中国，这样的公开说明虽然刚刚开始出现。但邹恒甫有长期的美国经历，网络又在控制言论的中国开辟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公开讨论天地，IAS 的关闭更引起了网络讨论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邹恒甫不出面，是说过不去的。邹恒甫如果不公开出面向大家说明情况，关于 IAS 关闭的一切就会始终像黑幕一样为人不解，经济学在中国推广的这一章就会以一群疑团结束。这是因为，只有邹恒甫具有向大家说明情况的公信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的信誉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况且，邹恒甫是 IAS 的主任，IAS 关闭，他责无旁贷地应当向大家说明情况。

有人说 IAS 的关闭和目前中国政治气候转阴有关，而邹恒甫可能打算继续在中国做些实事，因此现在避避风头，不说话更好。但我不这样认为。即使政治气候转阴，邹恒甫也会有做实事机会的。十年前他开始创办中心时，政治气候比现在阴得多，他不是在一片怀疑声中办成了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今天阅读回忆 1957 年反右的作品时常常扼腕长叹，那么，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被后人长叹。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 IAS 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 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

当然，邹恒甫完全不必发表激烈的言论。邹恒甫应当以理服人、以情胜人；承认缺点，做出一定让步，以达到 IAS 恢复的目的。IAS 无疑有许多缺点。邹恒甫应当坦然承认这一点。同时，与 IAS 的成就相比，IAS 的缺点无疑不足以证明 IAS 需要关闭。因此，IAS 应当恢复，恢复后的 IAS 将采取措施，纠正其中最严重最紧迫的缺点，把 IAS 在原有基础上办得更好。

我认为，邹恒甫至少应当向我们大家说明：

- 1) 哪个部门关闭 IAS 的，关闭的理由是什么。
- 2) 如果他本人也不知道或者没有得到正式说明，他应当告诉大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关闭。
- 3) 如果他知道关闭的理由，他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可以公开；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充足。如果他不认为，他是否准备把 IAS 关闭的问题提交到上一级部门（如果是商

学院关的，提交到武大；如果武大关的，提交到教育部）审查，希望上一级部门能够撤销下一级部门的关闭决定。

4) 如果他不知道关闭理由，他应当向大家表示将向有关部门要求其关闭 IAS 的正式说明并要求公开其说明，并同时向上一级部门提出请求报告，请求它立即调查和审查 IAS 关闭事件。

5) 他应当许诺在一周或两周内再向大家说明进一步的情况和他为恢复 IAS 的工作进展。

以上只是我对邹恒甫的建议。他当然完全应当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出公开说明。关键是，只有邹恒甫说话了，希望恢复 IAS 的努力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邹恒甫是我极为敬重的人。我衷心地希望邹恒甫做好，尽力恢复 IAS，为学子、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经济学，为正在中国推广经济学的人，也为他自己。

2005 年 10 月 27 日

14. 再谈无欲则刚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学者的无欲则刚”，就自己当年欲发表文章而把明知不该用的词用上，做了忏悔和总结。前几天有匿名的朋友留言，提到这篇短文，认为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我知道这是好心提醒我无欲。在感谢之余，我想就“无欲则刚”继续写点心得。

无欲则刚，强调的是无欲。人能够修炼到无欲，那是进入上上境界，少数高僧可以，但大众不可。因之，老子提出下策：“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不让大众知道天下可以向往的事情，大众自然安心伏贴。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毛泽东领会老子建言最为彻底。我年青时，衷心地认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能够吃得半饱，比起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无论怎么高呼万岁都不能够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后来国门开了，老百姓见到外面那么多可欲之物、之理、之情，焉能不乱？乱中反思，才明白原来是毛泽东权欲太过。只可惜老子没有在其书上标明“献给皇帝和欲为皇帝之人”，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皇帝欲望的人，在读老子的时候，意识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

不过，今天我要讨论的，是顾名思义地理解“无欲则刚”可能引起的误解。既为凡人，岂能无欲？人不得不做的只是在各种欲望冲突之时做出选择，扬此欲而贬彼欲。所扬之欲若在人格清粹，后人便颂之为无欲，而忽略了选择。其实，即使高僧，其欲亦在修炼得道，何谓无欲？注家也明此理，因此往往把无欲释成无“私欲”。可何谓私欲？林则徐没有家人共乐的“私欲”吗？没有继续为官的“私欲”吗？即使它们是“私欲”，它们又有什么错吗？况且，有“私欲”必有“公欲”。可“公欲”、“私欲”何以为分？孔夫子周游列国欲当官，却又不肯屈就而为官，其中“公欲”、“私欲”如何区分？毛泽东执政到死的欲望是“公欲”还是“私欲”？是“公欲”就“好”、“私欲”就“不好”吗？

在我看来，“公欲”、“私欲”之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由于各个人良知有别，甚至许多欲望的“好”与“不好”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在人格方面，我们面临的不可

是一个有欲无欲的问题，而是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二是决定实现欲望的方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匿名的朋友列举了发表文章、当官、经济好处、情欲、性欲等欲望。如果不考虑比如当官就要当到死一类的不好与吸烟一类近于不好的欲望，我们还可以跟着匿名朋友举出许多好的欲望，例如健康、名誉、美食等。人生的问题是这些欲望很难同时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必须决定什么欲望最重要，什么其次，什么再次。这样的选择在平时往往无意识，但在关键时候、在所谓的一次性博弈时候，人们常常不得不做出痛苦甚至残酷的抉择。不食嗟来之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选择：尊严在这里是最重要的欲望。反之，屈就而食，则把生存作为第一选择。假如侮辱非常严重，维护尊严的牺牲非常大，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就能够做出勇敢刚正的行为。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大体满足简朴的衣食住行欲望，因此可以把爱、健康、舒适、富裕、兴趣爱好、为他人贡献、权力等欲望放在更重要位置上。不过，无论怎样决定欲望的次序，拥有和保持良知、尊严的欲望，应当统领所有其他欲望。这一点，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也显现不出来。然而，如果不幸而遇到波澜，保持良知和尊严的欲望，就是变得特别重要。可惜，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在情感、健康、兴趣爱好、财富、权力等方面难免波澜和危机，因此，良知、尊严的重要性是不可忘却的。

第二个欲望实现方式的问题也许比第一个欲望次序问题更重要。第一个问题有关内省，第二个问题才有关实践，而一个人良知强弱、尊严高低，最终通过他的实践表现出来。一个人的欲望再好，如果追求和实现的方式不正当，这个人的良知也是弱的、人格也是低的。富裕的欲望是好的，但如果用腐败、抢劫的方式去追求，追求者一定良知弱、人格低。发表文章的欲望是好的，可如果文章不能提供新知识，作者只是为了升职称或塞责而写，他的良知不会很强、人格不会很高。性的欲望是正常的，可如果缺少爱，放弃性生活反倒是自尊和尊人的一种正当方式。

从实践的意义说，实现欲望的方式，比欲望本身更加重要。如果像口水理论那样，为了独吃一盘好菜，而在餐桌上吐口水到那盘菜里。那么，这个人的美食欲望再好再重要，也实属无耻小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问题主要不是欲望，而是实现欲望的方式。一个正常的人应当选择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特别重视良知和人格的人，应当特别选择正当并且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欲望。

欲望实现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民族历来过于重视欲望的内省方面。早期儒家便强调“尽心知性”，后来又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并进而有了“无欲”之说。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往往用“好心”做标准，似乎只要心好，就不必承担责任或者便能够“减刑两年”。然而，一个人越是好心，欲望越是伟大纯洁，这个人就越容易做坏事，因为正是那种“凭良心”的自恃，才使人无所敬畏，超越一切宗教的、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做出比那些自觉良心有虚的人更坏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还是红卫兵，都以自己的良心自豪，但其所作所为，却真正摧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感，造就了今日弥漫于中国的不信神、不信鬼，“别人抢得我就抢不得？”的只管目的、不管手段的强盗心理。所以，越是自以为自己欲望好的人，越必须重视实现欲望的方式，必须常常反省自己的追求方式是不是正当，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如果实现方式不正当，那么，欲望的好是没有意义的。

匿名朋友在留言中同时列举了一些人为自己丧失尊严找出的借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借口都不是用来掩饰欲望的有无或好坏，而是用来掩饰他们实现欲望的不正当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一些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借口，几乎都试图把不正

当方式说成正当方式，把不高雅方式说成高雅方式。这种现象正好突出了欲望实现方式的重要性：它迫使用不正当方式实现欲望的人为自己寻找借口。其实，良知再强、欲望再好的人，在实现欲望方式上都可能犯错误。所以，除了反思与讨论自己行为外，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是维护一个人尊严的最好方式。然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但需要良知，而且需要勇敢。小说《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和其丈夫，就是这样既有良知也勇敢的人。他们毅然搬入了阁楼，干起了粗工，无怨无悔。需要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呢？不需要。理由和借口仅仅是怯懦的表现。而在犬儒主义弥漫的当代中国，勇敢变得特别可贵。因此，至少从字面上说，不是无欲，而是一个人在重要时候，不惜舍弃其他欲望，并勇敢地采取正当和高雅方式维护个人良知和尊严，才使其刚正不阿。

2006年1月20日

附：匿名的留言

<无主题> (2006-1-16 7:30:39)

胡教授,读了你翻译的 我相信,我认为内容很好。你自己也写过无欲则刚的文章。我也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名誉。而有好名誉的人在现代社会是很难保的。因为人很容易受引诱,这种引诱是多方面的,包括出版文章的引诱,当官的引诱,经济好处的引诱,情欲的引诱,性欲的引诱等等。有人抵挡不了这些引诱,就坏了自己的名誉,是很可惜的。而这些使人破坏名誉的引诱往往还带有很好的外衣,例如,出版文章是为了做学问,当官是为了利用权力做的事情,经济的好处是为了做事情增加经济实力,情欲是为了爱,性欲是为了照顾穷人(给美女收入的机会,陆德明如是说)。最后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这一点我相信。而且我也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例如台北的马英九。

参见<http://www.hujiangbei.net/bbs> 相应页码

15. 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

许多天来，我的朋友、同事生活在由骚扰和威胁造成的恐怖中，甚至一天得不到我的消息就担心出事。一种恐怖主义，一种善良的人们以为是另外一个世界才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竟然就笼罩了我们自己。

指向我本人的骚扰和威胁理由，开始的说法是我与许多女性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那些男士要报仇。可由于这种诽谤太不可信，它很快烟消云散。接着的说法是我宣传私有化，下岗工人要报仇。说我宣传私有化，倒不是诽谤。但以下岗工人名义威胁我，则不可信。我的亲戚是下岗工人，从来没有手机，更不用说买许多手机或手机号码了。

男女关系和私有化分别属于私德和公德范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重视私德也重视公德，并且把私德的纯洁视为一个人参与社会事务、学术研究的心理基础。儒家的修齐治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儒家看来，不修身又何能齐家，更况治国、平天下？孔子明确认为学者应当先修身而后学。我的朋友曾把修身达致的人格总结为高贵/平实/深刻/纯洁/正直五点给我。而在人世中，男性的人格首先表现在他对女性的高贵和尊重风度、平实和爱护态度上。男性与女性关系可以分成爱情、亲情、友情、同情、色情、事情许多种。在爱情上，我是完美主义者。在事情上，我不是功利主义者。一

个男性获得爱情的前提是其自身的高贵和平实。我追求爱情，珍视亲情、友情，给女性更多同情，但蔑视没有爱情的色情，摒弃滥交友情的事情。男女两性之间的这些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区分的，而我恰恰清楚地分开了它们，所以，我可以郑重地宣布：我和我所接触的每一位女性的关系都是明晰的，不存在任何暧昧关系。

正是因为对个人私德的信心，我才参与了公共事务，有了公德问题。在公德上，我主张私有化。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国有企业只有在汪洋大海般的私有企业中间才能够学会游泳。而后者靠自身从小溪小河来长成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应当转变为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确实造成了一些人的失业。学者无疑应当重视私有化中的失业和公正问题。而我恰恰又是中国特别重视公正私有化的少数学者之一。所以，我同样可以郑重地宣布：我的观点既非错误，我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观点去获得任何不正当的个人利益。

在公德上，我主张自由尤其学术自由。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强烈的学术专制回潮。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刘国光等人公开提出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独尊马学”。一时间专制主义竟然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被刘国光当作对立面代表的林毅夫需要三次请求，并解释和刘国光没有原则分歧，才得到刘国光接见。学术专制和学术自由两者泾渭分明，如何可能“没有原则分歧”？其实，即使林毅夫下跪，一旦专制再起、“反右”/文革重来，他同样逃不脱牢狱之灾、“冤屈”之哀。福建集美中学那么多纯真学生放弃海外生活，投身祖国建设，可在文革中有几人没有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所以，下跪是没有用的。在学术专制面前，一个人只有站起来，他才能在维护原则的同时真正地保护自己。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者、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只有和学术自由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2005年我站起来了。尽管我的明确反对学术专制的立场得罪了许多，可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宣布：为了学术自由，我将永远站着。

有人以为骚扰和威胁或者更严重的不正当行为会迫使我屈服和下跪。但是，如果他们了解我当农民时裤脚一卷便下粪池干活的情形，如果了解我毫无怨言地接受扫马路工作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即使不能复来，亦当散尽千金”的情形，如果了解我“生既有爱，死亦何妨”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呼吁公开私有化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在家洗衣服拖地板的情形，那么，他们应当明白恐怖行为对我是没有用处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贫贱我经历了，不淫、不移我做到了；个人恐怖主义式的威武我正在经历，我同样将做到不屈。

人类在二十世纪取得的最大进步是对个人自由的认识。它为我们强调女性尊严、呼吁社会公正、要求学术独立打下了坚实的道义基础。人类也在二十世纪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包括骚扰威胁在内的一切恐怖行为的目的是把别人置于恐惧之中，一切专制的要义也是把臣民置于恐惧之中。所谓“伴君如伴虎”指的正是这类恐惧。我的朋友、同事和我自己都有权利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而我本人作为骚扰威胁的所指，更有责任为朋友、同事消除因我所起、为我所虑的恐惧。一方面，我深深地同情骚扰者威胁者，衷心希望他们自重。另一方面，我强烈谴责事实上的个人恐怖主义，强烈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和威胁。同时，作为一个学者，我明白只有消除专制，消除国家专制、单位专制、家庭专制，只有建立法治国家和养成法治心理，包括我自己以及肇事者在内的每一个人才能消除恐惧，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所以，为了爱，为了自由的信念，为了朋友和同事，即使面对骚扰、威胁和专制，我也不会在私德和公德上降低自己的人格，我也将微笑向前。

2006年4月24日

16. 送孙经纬

寒假中就知道孙经纬离开上海财经大学、离开上海了。可回到上海才感到他真的离开了：既不能和他在一起喝咖啡，也不能拿起电话就聊天了。

我和孙经纬认识的时间不算长。最初相识好像是八、九年前一次下四国军棋。相知就更迟了，而且缘起于高级经济学教学。我们那时都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最早提议在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引入高级经济学的似乎是当时在那里负责硕士生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朱保华教授。孙经纬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学校研究生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提议，参加者甚众，反对者甚多。我那时没有承担硕士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任务，也不担任任何职务，甚至学校也很少去。可也被召参加会议。在那个会上，我积极支持朱保华、孙经纬，支持使用原版的西方高级经济学教科书，指出负责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林珏教授拿出来的梁小民编著的《高级西方经济学》与西方国家的《高级经济学》教材相距很远。那次会议后，孙经纬也许就把我视为他的相知了。但那次会议后，上海财大碰到的最大问题是谁来讲授高级西方经济学。原先讲授硕士生西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等专业的老师退出了；西方经济学专业的三、四个教师不可能承担全校那么多课程。这时，孙经纬、王根蓓、伍山林、胡永刚老师勇敢地站出来开设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没有他们，上海财经大学当年根本不可能在硕士生教育中引入高级西方经济学。这里，我必须说，他们上课非常辛苦。他们不是海归，甚至没有在国内的西方经济学专业学习过，缺乏严格的经济学或数学训练，但他们凭着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对学生负责的感觉承担这些课程。他们边自学边上课，边上课边自学。他们成功了，可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是惊人的。同时，他们的努力从来没有得到过相应的报酬。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期间，准备给硕士生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增加工作量报酬，却受阻于从事硕士生政治经济学教学教师的攀比和学校统一课酬规定。因此，我始终感到有愧于他们。我到过这几位教师的家，知道他们的物质条件明显低于许多其它老师。今天，在上海财大对海归实行特殊收入政策、海归也承担起高级经济学教学任务的时候，我作为一名老海归，一方面为最近回国工作的海归可以取得优越物质条件表示高兴，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够了解，除了物质条件外，他们还需要或者更需要展示出自己的精神风貌。

孙经纬本来在上海财大财经研究所工作，后来转到工商管理学院，先担任院长助理，后担任副院长。作为一名只有讲师职务的年轻人，他能够在教授、博导众多的工商学院中脱颖而出，担任那里的领导工作，靠的是他对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方向的准确把握，他开设课程的高层次，他艰苦的自学努力，他的公正和自我牺牲。他很清楚当今管理学和经济学融合趋势，指出管理学的问题抽象到理论层次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工商教育要办好，非把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不可。我曾经说过，上海财大 2003 年之所以不再任命政治经济学教师、而任命我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是因为校内各个管理学科强烈要求强化西方经济学教学，我指的便是陈信元、孙海鸣、戴国强诸教授领导下的会计、工商、金融等学院的要求。在当时，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要求走得比程恩富领导下的经济学院远得多。

我不知道孙经纬何时认识西方经济学的。但让我敬佩的不是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而是他一旦认识后，就开始了艰苦的自学。他曾到复旦大学数学系听课，他自学了大量西方经济学、管理学高级教科书，有的书读了好几遍。做过教师的人都知道读书和上课是两回事。读书可以不求甚解，但上课就必须向学生讲解清楚；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讲解清楚。教师的水平也正表现在对难点的清楚讲解上。可高级经济学、

管理学教科书，我自己就有许多难点没有搞清楚过，只是没有开课和讨论才掩盖着而已。孙经纬开过高级微观经济学 I、II、III 课程，用 Tirole 的《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开过产业组织课程。博客上有种说法“上海财大有三多：食堂多、美女多，听孙经纬课的人多”。我已经离开了上海财大，无法证实这三多，但我知道孙经纬对课程难点是下了功夫的。这里我想提及的另一一点，是孙经纬坚持用国外教材。当时希望我们编教材的人很多。上海财大那么多学生上西方经济学课程，加上考博、考硕的外校同学，需求量肯定是大的。但孙经纬明确反对，他认为我们自己编的不会比原版教材好，既然如此，为什么强迫学生用更差的教材呢？而奉命行事或为钱行事，在他看来，都不应当是大学教师的所为。

孙经纬对国内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改革的许多独到想法强烈影响了我。我在经济学院院长任上的许多做法和他商量过，有些甚至就出自于他。他对田国强教授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态度非常积极。在田国强上任初期的困难阶段，他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田国强最初一些改革措施，例如硕博连读，没有他参与决策的工商学院的支持是很难成功的。在我印象中，田国强任职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两人几乎每天要通一两个小时电话。当时有一种说法，上海财大只有两个人毫无保留地支持田国强，一个是他，一个是我。可我那时已经不能算上海财大的人了。为什么孙经纬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我的体会是孙经纬把田国强的改革视为实现自己对上海财大、对中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的梦想，因此，无论改革对他个人的影响好坏与否，他都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应当说，在田国强主导的财大改革初期，孙经纬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今天，当财大改革似乎已经走上不归路、当田国强得到一片赞誉、而我本人也沾到光彩的时候，孙经纬却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我相信，未来能够给孙经纬最大安慰的，就是田国强、谭国富诸位院长和上海财大各位领导能够把上海财大建设成一流大学。

我对孙经纬的知，是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以后。那时我到办公室的时间多了，他本来便整天待在办公室，因此我们交谈频繁起来，我惊异地发现他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发现自己和他在许多学术、社会、人生问题上“所见略同”。他向我提出过许多建议，给过我许多鼓励，也对我发出过许多质疑。例如对我去年那篇短文“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把私事、公事搅在一起。我很快体会到他的质疑是从他对我个人的要求出发的：他不愿意看到我做错事情，不愿意听到我的各种理由。在他面前，错就是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一个人有他这样直率的朋友是很难脱离正轨的。

孙经纬离开上海是因为母亲不愿离开家乡又需要他养老。尽孝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退职的主要理由。李密的《陈情表》感动过一代又一代士人。然百年以降，因尽孝而退出官场、职场之人之事几不再见，因此很少有人相信孙经纬的理由。我没有问过他离开上海是否还有更深层原因。也许，每个人心底深处都有一些痛处需要保护，我们不必追问。无论如何，我确信他是抱着对上海财大的期望而离开他为之付出了自己最好时光的财大的。他曾经针对某个爱情事件评论说：“同情她的处境，尊重她的选择，自己要无怨无悔。”他的评论给我深刻印象。今天，我体会到，这个评论也许反映了他对学生、对上海财大、对世界的态度。一方面，尊重别人，一方面，自己无怨无悔地付出。当然，他还没有结婚，甚至可能没有恋爱过，他对爱情的评论似乎更带理想色彩，而欠缺肤之感。不过，独身也许是他能够专心自学并且领导好上海财大工商学院的特殊条件之一。我在德国见到一些独身者，他们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收入全投入社会公益活动。我孩子在那里参加的足球俱乐部、象棋俱乐部都是这样的独身者办的。然而，孙经纬独身，不是因为他孤僻：他是一个开放和活泼的人；自然也不是因为缺乏愿意与他交好的女性，而是他（还）没有遇到让他倾心的女性。他和我谈过我的短

文“一般均衡和爱情”，我知道他在爱情上和人格上持理想主义。不过，理想主义者遇到喜剧是偶然，落到悲剧是常态。所以，理想主义者必须有悲剧的心理准备，才能够坦然地对待人生。孙经纬是有这样准备的。可即使如此，我仍然衷心地希望孙经纬能够在千万人群中，寻觅到自己的另一半，在爱世界的同时又能够特别的爱上某一个人。这是因为我相信，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生命的真谛就在于追求，追求美好，追求至善，而这同时意味着追求爱情。

我没有到车站或机场为孙经纬送行，就以这篇短文送他，已经在千里之外的他。

2007年3月20日

17. 为邹恒甫扼腕

邹恒甫和张维迎都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在国内办学，普及与提高国内的经济教育水平，其功当有公论。张维迎在国内企业改革问题上观点鲜明，国企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无论成功与否、评价如何，就理论解释与政策建言而论，张维迎自有其地位。邹恒甫与张维迎又都供职于北京大学光华学院，那里的经济学、管理学教学改革曾得力于两人。我与邹恒甫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有所不同，与张维迎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式的想法差异很大，但我尊重这两位国内难以多得的学者。我也曾耳闻他们的矛盾。尤其邹恒甫口无遮挡，常评论国内经济学界名人包括张维迎，贬远多于褒。按国内惯例这是对被评者的大不敬，但由于他一扫国内官话评人必褒的庸俗风气，却也令大众耳目一新。

然而，邹恒甫近日公开发表的致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信，走得过远，不仅无助于驱逐庸俗风气，反会助长庸俗风气。邹恒甫信的起因，是作为光华学院院长的张维迎解除了邹在光华学院的职位。作为局外人，我不知道光华学院的教授聘任和解聘制度，不明了光华学院解聘邹恒甫是否合乎程序，不清楚邹恒甫是否在光华学院甚而北大内部提出了申诉。邹恒甫给周济部长的公开信，本来应当告诉部长从而也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并特别说明自己的解职如何地不符合程序或者——如果符合现有程序的话——现有程序是如何地不合理不合法，以及自己的申辩请求在光华学院与北大如何地受到冷遇，以至于只好向教育部申诉。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里没有读到这样的内容！

假如邹恒甫真的在光华学院受到了不符合程序或者符合程序但程序规则是“恶法”的冤屈，邹恒甫做的应当是申诉程序或申诉正义，通过自己的冤屈揭示出光华学院无程序或“恶法”的荒唐，从而要求建立程序与正当规则并依法治院，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平反自己的冤屈。在全世界，程序和正当规则的建立，最初几乎都是因为个人的冤屈清楚地暴露了原有状态的黑暗面，才使新程序与规则的建立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中国重返规则的改变就是因为孙志刚因之而死，让公众无法继续忍受原有规则。当然，在从上到下层层专制的中国更多出现的是被冤屈者躲到一边默默地舔去自己伤口的血。可邹恒甫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现在依然在美国有职位，因此第一他应当明白民主是怎么一回事，明白美国大学内部权力制衡与民主决策的机制；第二他应当有底气反抗他遭受的单位专制（如果光华学院也是单位专制的话）；第三他应当清楚他反抗的方向是彻底消除单位专制，在光华学院建立新的管理制度，而不是仅

仅为自己伸冤。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里也没有读到这样的字句！

相反，我在邹恒甫信中读到的是张维迎人格的道义批评。我不了解张维迎的人格。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平反“冤屈”，邹恒甫需要的不是道义诉求，而是民主与法治；是消除单位专制，而不是换一个好人来专制。张维迎是不是好人并不重要。比如，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希望自己担任院长，都有权力为自己的当选拉票。在中国，敢于表示自己要当院长、校长、省长、总理并为此拉票的人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了。现在，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开始了差额选举，差额必然导致拉票。所以，我们实在不必把拉票视为坏人做的坏事。同样，我们也不应当注重某个“长”是否好人，我们应当注重的是某个“长”是否依法办事以及法律规则的质量。以好人自居的人，被大众认为是好人的好人，所干的坏事常常超过坏人干的坏事。世界上最严重的坏事差不多都是在好人专制下干的，因为好人更容易丧失敬畏之感，公众也更认为无需用法治约束好人。邹恒甫在民主国家待了二十几年，明白中国和美国大学教授管理制度的“天壤之别”（邹恒甫信中用词），他也应当理解这种天壤之别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彻底抛弃了中国儒家的“好人专制”观念，应当明白制度建设是保护每一个人同时也是保护他本人的最有效方式。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中亦没有读到这样的意思！

将近两年前，我就邹恒甫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的变故写过一篇短文《邹恒甫应当说话》（www.hujiangbei.net/shuangzhouiyehua/Yehua2005No06.doc）。在那里，我曾经说：“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IAS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可邹恒甫近日给周济部长的公开信，却令我现在便扼腕长叹，并为他写下这第二篇短文。

2007年6月13日

18. 追忆陈岱孙先生

十年前的八月份，我在回国的飞机上，读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纪念陈岱孙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岱老已驾鹤西去。本来准备回国后拜访他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了。当时便欲写点文字，可光阴荏苒，十年一梦，看到纪念岱老逝世十周年的文章，才似梦醒，坐下来完成宿愿。

第一次拜访岱老是二十五年前。1982年2月份，我到北京大学读西方经济学。当时中国还没设立西方经济学专业，而是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研究方向。岱老是该专业领衔导师。一天晚饭后我随斯栋、善利诸兄拜访了岱老。第一次的印象不深，只觉得岱老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是我从未见过的。后来我与岱老接触多了一些。一是由于当时刚成立的研究生会委托我与王玮兄（王兄竟英年早逝，惜乎！）、步克兄等编辑《北大研究生论文集（文科版）》。我们在文科各系聘请一些教授做顾问，经济系聘的是岱老。为此，我多次去过岱老家。自己投到该文集的拙稿《略论服务业资本》也由岱老审阅。记得好几次在岱老的小平房里向他请教。有一次请教马歇尔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又一次他提出我的文章中用的煤矿工人洗浴的例子不妥。二是由于岱老不顾八十多岁高龄，坚持为我们开课。他讲课内容就是

他当时出版不久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我听课一贯不认真。有次斯栋兄发现该书中一个小错，岱老在课堂表扬了他，我很敬佩，可难改积习。岱老每次提前到教室，上课时依旧腰板挺直，温文尔雅，一字一句，思路极其清楚，当时的我，好像上课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感受岱老的风范。我读过书上描写的高贵典雅，见到岱老，我才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它。据说岱老年轻时就是翩翩君子，我生而晚也，未能睹其风采。可岱老过了八十高龄依旧神情怡然，坐如弓、立如松，矜持而典雅，温和而高贵。在北大我曾有幸接触若干名教授如尚健在的季羨林先生等，若论及贵族风范、名士气度，岱老当夺头筹。几个月前我在写《追求高贵》时，脑海里自然而然就映现出岱老的形象。也许，只有出身书香世家、家教严格、青少年时期没有受过折磨同时又终生保持追求的人，才能到达他的境界。

不过，与十年前不同，今天提笔追忆岱老，我的头脑总是缠着一个问题：“岱老相信马克思主义吗？”在抵制刘国光的“独尊马学”观点时，有网友把岱老 1985 年那篇主张“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章发到我的个人主页。岱老的文章为中国在大学里引入现代经济学课程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后者是刘国光们当时就反对的。可岱老的文章又为“独尊马学”留下了余地。那么，那篇文章是岱老的真实观点，还是岱老为引入现代经济学的“曲笔”？我的感觉是前者：他的气质决定了他不会做曲笔之事。在岱老那一代学者里面，1949 年后相信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在少数。冯友兰、朱光潜等人都相信了马克思主义。邹恒甫曾感叹共产党竟然把岱老这位哈佛博士改造成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即使哈佛教授，也有非常同情甚至可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岱老是如何转变而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呢？他自己简短的回忆录对此只字未提。岱老一生时间，1949 年前后各为一半。可他写于 1982 年的《往事偶记》，记得却全是 1949 年前的事情。难道 1949 年以后的事情，岱老就没有可记可书的？如果岱老的回忆录写于 1955 年（其时他已经经过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或者 1975 年，他会不会反过来用大部分篇幅记录自己的转变或者自己 1949 年后的经历呢？这些问题对后人来说只能是迷了。可岱老不记，却又是他矜持高贵的表现：把自己的痛藏在自己心里，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说长道短。

岱老生于 1900 年，卒于 1997 年，他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沉浮。今天我们刚刚离开二十世纪，我们的心灵留下了二十世纪的深刻烙印，所以，我们很难平静地对待二十世纪。可是，要了解岱老的转变，我们又不能离开二十世纪中国的沉浮，因为中国命运始终是岱老心之所系。18 岁时，深受儒家教育但不谙世事的他因亲眼看到“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公园告示而受到刻骨铭心的冲击。救国从此成了他的生命动力。如今人们在考证上海黄浦公园前究竟是否有过那块侮辱国人的告示。但真相或虚构在这里没有作用，有作用的是一个人、一个群体对它的心理感受。例如，至少在他 27 岁回国之后，这张即使原先存在过的告示也被撤下了；可在他的感觉里，它依旧存在，直到 1949 年才消失，因为在他的感觉里，1949 年之前中国始终积贫积弱，外不能防止侵略，内不能消弭混乱。而 1949 年之后中国外无入侵之敌，内有大好形势。尤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打败了美帝“侵略”阴谋，全国人民一条心建设美好祖国。这样一种形势，不能不让岱老那一代以救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激动，不能不让他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更加重要的是，只许服从、不许争论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还不许参加者沉默。经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人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你不表态，别人便天天上门动员你，就像还没有节育的家庭在十多年前天天有人上门动员那样。而岱老的气质决定了他无法说假话。本来，岱老可能成为一位非常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同时又不需要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明确到不是相信就是反对的地步。在生活中，在学问上，我们几乎对任何事情都不需要采取不

相信就反对的二者择一态度。我自己讲授“西方经济学”，是因为我认为它比其他经济学说更有说服力，而不因为我相信只有它是真理、更不因为我反对其他经济学说。可是，在 1949 年以后的三十年里，一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或相信或反对的立场。这种“明确”是极其残酷的。多少人在这里第一次说了假话！心灵高贵的岱老不会说假话，因此，在被迫明确自己看法的情形下，他明确地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想象他在那场运动中说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因此更应当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等虽然并不违心、但也只有在思想钳制下才可以理解的话语。可是，对于一位痛感国家（即政府）积弱而又深受儒家熏陶的知识分子，也许一个强大到不许人批评的政府亦是接受的。

1949 年后为新政府所鼓舞的中国人想不到反右，想不到文化大革命，更想不到几千万贫苦农民死于非命。三十多年后，右派分子几乎都平反了，死人事情公开了（岱老也许始终不知道），市场经济复活了。更重要的是，代表中国未来的他的学生、后辈再也不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了。岱老面临了新的冲击。可岱老值得我敬佩的是，他不但呼吁为了中国而引入和利用西方经济学，同时他让我们发表意见：他的贵族气质和名士风范决定了他的宽容态度和自由主义情怀。也许，他的“不记 1949 年以后”正表明了他的追求和他留给我们的空间。因此，他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与“独尊马学”的专制主义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在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的问题上，知识分子个人会犯错误、知识分子整体也会犯错误，然而，不是他们可能的错误，而是他们的高贵气质，他们说真话的传统道德，他们对真、善、美的终生追求，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也决定了他们个人在后来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岱老逝世十周年之际，作为他的学生，我想自己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继续学做他那样的知识分子。

2007 年 8 月 27 日

19. 从一本近百年未被读过的书想起

每当我翻阅西方出版的二十世纪思想史的书，总会产生一丝苍凉的感觉。在那些德文、英文的思想史书籍里，比如我自己的专业经济学的思想史书籍中，找不到中国人的名字。二十世纪的 100 年中，中国人口最多时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现在也超过了六分之一，可是中国人对人类学术的进步却碌碌无为。中国学术为什么落后？我过去一直认为外因限制了中国学术进步：二十世纪中国的战乱和动乱；1911 年以前的“独尊儒学”和 1949 年以后的“独尊马学”；从儿童开始的专制与功利教育；全体民众对“冒犯言论”的恐惧等等。同时，现代学术作为源自西欧国家的一种思维模式，中国学者不但需要时间（100 年够短的了！）去把握，而且部分学者常常会把它视为民族文化的灾星或者阶级敌人的工具而予以全盘否定，无疑也是中国学术落后的原因之一。然而，最近看到一本名著竟然近 100 年都没有人读过，在百感交集之时，我不得不说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不努力、不认真，才是中国学术落后的真正原因。

今年秋季学期，我开设了“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为此我到处寻找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名著。朋友为我从上海图书馆借到了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都未找到的英国学者杰文斯（Stanley Jevon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英文版。这是 1871 年初版、1911 年出第四版一本书。书内找到的唯一与出版或印刷时间有关的文字是“1911”年，也就是说，我找到的这本书是接近 100 年前出现于世界的。书里还有一个记号“上海旧书店？定價 5.00”，不知道何年何人何单位卖给上海旧书店的。幸亏上海图书馆慧眼识珠，把它收购以供学者阅读。上海图书馆功莫大焉。

然而，拿到它后我才发现，书中至少有二十处，两页或多页纸还没有裁开：也就是说，这本书可能根本就没人读过。杰文斯这本书是经济学的名著之一。如果要举出经济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二十本书，那是少不了杰文斯这本书的。如果说经济学历史上的边际革命，那正是这本书在经济学的大本营英国发动了革命。如果说在今天的大学经济学教科书里，我们根本找不到李嘉图、马克思的踪影，但我们绕不过杰文斯：边际效用递减的曲线是他在英语世界里第一个画出来的； $du_1/dx=du_2/dy$ ($x + y$ 表示一物品总量，常数； u_1 、 u_2 表示该物品的两种用途) 这样的资源最优配置公式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像 du (边际效用) 这样的经济学须臾不可缺少的符号是他第一次使用的。所以，看到杰文斯的著作在 100 年内可能还没人读过，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不能不感到内疚，不能不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杰文斯，对不起为经济学发展做出贡献的杰文斯们，对不起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希望寄托在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经济学者身上的同胞们。

当然，有人会说这本书早在 1936 年就有了中文版，在北京图书馆或者北大图书馆甚至私人藏书也有英文版可阅；有人会说经济学的发展史应当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史，而马克思生前就对杰文斯著作不置一评，现在的我们当然不必要再看他的书；还有人会说中国学者房子还买不起、科研指标尚完不成，怎么能对他们提出读名著的要求？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名著与原著也确实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读的。但是，至少从事专业工作、主讲专门课程的人应当读一读原著吧？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者，我也希望国人在期待我们为经济学发展努力的同时，考虑到中国学者的这种困难那种困难。可是，看到一本名著在中国差不多 100 年内没有人读过，我明白自己作为学者之一，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自己和为学者群体辩护，没有任何理由为二十世纪经济学发展史上没有中国人的名字开脱的，因为除了不认真、不努力、不深入以外，我不知道还能如何解释这件事。

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司马迁、曹雪芹几乎完全靠他们个人努力那样，杰文斯的成就也完全靠他个人的努力。他们的时代也有战乱或动乱，他们的时代也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即使在杰文斯的英国，虽然谈不上迫害，但新思想的酝酿与提出却使他长期受到冷落。而杰文斯 19 岁就因家贫而从大学退学，并到澳大利亚务工：一个比今天无奈地(不是政府许诺了前景的)从上海到中国西部工作的决定更没有希望的选择，应当说他更需要房子，更需要完成科研指标，更需要社会地位。但学者最需要的是认真和深刻，是努力。从生物学的规律说，中国应当不缺少天才；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也不缺少手抄本的地下流传。可是，在任何外部条件下，从天才到学术成就都需要高强度的努力与思考的认真深刻，否则的话，外部条件再好，思想火花再炫，天才也成为庸才。在没有拿到杰文斯这本书之前，我还把中国经济学的落后首先归因于外界环境，可在这本近 100 年从没读过的名著面前，我必须说，首先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本身的责任造成了中国学术研究的落后，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一份责任，所以，我不能不说：对不起，我没有尽力。

2007 年 10 月 24 日

20. 悼念我的中学班主任储兆瑞老师

储兆瑞老师走了，而他才 65 岁，才在他发热发光的最高点。

据说参加他追悼会的人很多，会场内外的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南京的报纸还有专文悼念他的去世。

我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不过，即使我参加了，我也应当写点文字送他，这不但因为他是我的班主任老师，而且也是因为最近我两次有愧于他。第一次是 2003 年和他同在南京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主办方执意要我主持会议，我推让再三后只好从命，但心底明白自己对老师没有尽到学生之礼。第二次是我在 2006 年写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储老师，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世界上还有其他想法。当然，我控诉的是那个时代，那个七亿中国人只知道一种想法的时代。但无论如何，我用储老师为例，是应当向他道歉的。

储老师是我在南京九中读书时的班主任，也是我在中学唯一的班主任。中学是塑造人的最重要阶段。我自己就是在中学成型的。在那里，除了比我年长的中学同学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储老师了。

我是和储老师同年成为九中人的：他在大学毕业并参加了一年社教（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于 1965 年被分配到九中工作，而我在那一年从小学升入九中并分到学习俄语的初一（2）班。作为年轻教师，他在执教俄语课的时候同时担任初一（2）班的班主任。就像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到中学任教那样，他仅仅比我们大 10 岁。可和现在非常不同的是，那个年头大学生是不许恋爱的；即使毕业工作了，23 岁也太“年轻”而不应当恋爱；他又住在学校宿舍里；所以他有的是时间和我们在一起。除了上课，像打球、唱歌这样的活动他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那时候是孩子，而他就是个大孩子。唱歌总是他领唱、打拍子；打球他和我们一样调皮。他的最大特点是热情，对生活的热情，对世界的热情。当时他又是那样的年轻和朝气蓬勃，加上他的高个头、宽脸庞、壮身材，和每时每刻充满阳光的笑脸、使他具备了对学生的强大感染力。我的小学老师和班主任不是中老年就是女性甚至老年女性，因此到中学突然接触到充满活力的年轻男性班主任，立即受到他的影响。我想，我对生活的热情，对世界的热爱，和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储老师的热情决定了他的一生。他的热情造成的第一桩事件是九中文革史中的大事。那是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人民日报》6 月 1 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九中也开始揪斗教师中的牛鬼蛇神，教我们班语文的郁瘦梅老师就于一夜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我们每个学生都努力回忆他在课堂上讲过的话，找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蛛丝马迹，写作文批判他的反动言论。我那时担任班级的地理课代表，执教这门课的刘默然老师平时寡言少语，却也一下子成了牛鬼蛇神（刘老师不堪折磨而在文革中自杀了）。接着，《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三家村，就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以及吴晗、廖沫沙三个人。据说他们常常写文章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地讽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于是九中也推出了九中的三家村，由程元三、冯亦同、徐婉芬（徐老师亦不堪折磨而自杀了）三位年轻老师组成，说他们如党中央揪出的三家村那样，也经常嘲讽社会主义。一时间，学校二号楼面向大操场的外墙上，批判九中三家村的大字报覆盖了批判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九中是南京的重点中学，学生、教师平时都彬彬有礼。可那个时候，大字报对三位老师的谩骂语言之恶毒，远远超过了我们如今在网络上看到的程度。就在这个阶段，储老师一鸣惊人，和孙中一老师写出一张大字报《致九中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九中三家村”一说提出异议，希望九中共产党员紧跟毛泽东伟大部署，把“走资派”作为斗争对象。这是继黄述林等学生对“九中三家村”

提出异议后，九中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教师和学生不同，在单位专制的学校里，他们的地位远远低于学生。当时的单位专制不亚于今天，所以不可能容忍教师的独立声音，校领导立即组织反击并把矛头对准了储兆瑞。有一天，我一进学校就发现校园贴满了批判“九中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九中的赫鲁晓夫”储兆瑞的大字报（那年5月毛泽东刚刚提出要提防隐藏在中央的赫鲁晓夫似的人物）；学校开大会小会斗争储兆瑞，可储兆瑞竟不肯低头。我们初一（2）班无疑是受储兆瑞“毒害”最严重的班级。不过，那时初一、初二的同学因为年龄小不需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放假回家了，所以没有被组织起来回忆与批判储兆瑞的反动言论，否则我今天还应当为此向储老师道歉（但我想在这里向郁瘦梅老师道歉）。然而，毕竟小学生也应当保卫毛泽东，况且班主任就是九中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加上学校也才有可玩的地方，因此我们班有少数同学继续天天“上学”，后来并以韩顺兴、仲陶宝为主成立了名为“0912”的战斗队。不过，无论如何，储老师在我们的感觉中是阳光灿烂的人，我们很难把他与大坏蛋赫鲁晓夫联系起来，所以0912是倾向储兆瑞的。

可“君心难测”。好像只有一个月左右吧，风向变了，竟然当真要斗争当权派了，教育局突然把九中校长李广琦定为九中的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要求教师和学生批判斗争李广琦。当时学校的官还不多，九中能算上共产党内当权者的仅仅是党支部书记严文藩、校长李广琦和副校长许光。他们年龄大，言论多，找出他们几句“疑似”（或者用当时的标准词汇“含沙射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太容易了。因此不但李广琦，而且其他两位当权者的“反动言论”也很快被揭发出来了。十几岁雪一样洁白的学生和二十几岁同样洁白的青年教师一起，以誓死保卫毛泽东的革命热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批判这些当权派的斗争。记得在一次集会上，一位高中同学在揭发严文藩、李广琦反动言论之后，激动的无法抑制，喊出了“打倒九中的走资派严文藩、李广琦和许光”的口号，当时真是群情激昂，每个人都充满了对走资派的深仇大恨，都恨不得立即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当时《人民日报》的标准用语）

这样，储兆瑞一下子从“赫鲁晓夫似的野心家、阴谋家”、“妄图动摇党领导的现行反革命”变成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学生的每次集会，总少不了请他讲话，而他也总是慷慨激昂，就像革命的一团火发挥出巨大的感染力。不过，接着而来的是革命大串连，同学们都奔向北京朝圣毛泽东，学校反而冷清了。我在北京串连时得了冻疮，回到南京后溃疡益发严重，等我到1967年天暖后再去九中，九中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已经完全变了样：更激进更慷慨激昂的学生领袖取代教师主导了学校的运动，后期的领袖又取代了早期的领袖；学校的领导权已经被造反的学生从走资派那里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了，但革命学生却分裂成两派，开始了所谓内战。这场内战一直延续到他们1968年离开学校，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许多人今天最好的中学同学依然是当年一条战壕内的造反派战友（这不但是当年的标准用语，而且与事实也相差不远：当时的二号楼就被“红卫兵八一八兵团”如战壕一样装备起来，而另一派红卫兵“新红联”确实曾经攻打过这座楼）。那时的储兆瑞好像退居了二线，学生已经不请他讲话了，他组织的战斗队也取了一个缺少战斗色彩的名称“毛泽东思想学会”，他的班级学生组成的0912战斗队亦无影无踪了。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1967年初，他是最有资格代表无产阶级把九中大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可他没有去夺权。是不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今天我想，大概他真的缺乏权力意识，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一点也许既造成了他后来十几年受迫害的悲剧，也把他一生与权力隔绝开来。不过，也正是这一点，促成他后来走上自己的道路，并且吸引了那么多人自发地参加他的追悼会。

1968年，革命学生离开了学校，其中绝大部分去了农村。九中本身也因为“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灾区而迁去农村并改了校名。从那时到现在的近40年里，我和储老师只是偶然见过几次面。不过，由于他的“九中赫鲁晓夫”名气，同学相聚时仍然会谈到他。听说他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据说毛泽东讲过五一六集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危险），听说他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折磨，听说他后来调到了与南京交通比较方便的某个不知名的郊区学校。邓小平掌权后，大学恢复了招生，听说他考取了研究生，后来又听说他在江苏省社科院工作，接着又听说他在江苏省的电视台主讲恋爱、婚姻和性的深夜节目，再后来就是在2003年那次答辩会上见到久违的他。

2003年的他已经61岁了。可是，他同当年做我的班主任时候一样，热情洋溢，充满阳光，侃侃而谈并毫无疲倦之色。他的热情也许让他逃脱了文化大革命的一死。他的热情又让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凭借自己的外语优势挣脱了梦魇般的中学工作。最后，他的热情还让他找到了性心理学领域。他的特点是热情。热情的人总是终生地追求。而人一生追求的事情不外乎两件：第一是相配的配偶，第二是乐在其中的工作。他到五十多岁终于找到了自己乐在其中的工作，就是性心理咨询。那天他得意地对我说，他是江苏省第一个获得心理咨询师执照的人。在这个领域，他写了很多文字；可最重要的是，他把因失恋而痛不欲生的人救回人世，他向粗识文字的士兵与民众深入浅出地说明性的道理，他向吸毒者讲解人应当具有的正常心理。他不是深入思考的人，他也不是安分守己的人：他的外向的热情阻止他朝这个方向发展；他比我多受的十年专制教育亦限制了他思考的深度。然而，当今中国社会更需要的也许不是深入思考的人，而是乐于从现成的理论中选择出自己喜欢的理论并积极普及的人。储老师就属于今日中国最需要的这种人。他热情主动，他喜欢交际，他能言善辩，他亲和耐心，他知识广泛，最后，他身材标致。因此，他做大众性咨询、宣传工作是再适当不过的了。可他的热情和不安分守己，使他无法把自己的热情倾注到听众不敢提问的政治宣传上，也无法循规蹈矩地做一个中学教师或者做一个其实谈不上研究的“研究员”。如果非让他遵命办事，如果非得用单位专制束缚他，他会和失恋者一样痛不欲生。对失恋者人们还能安慰，对他，人们只能劝之低头。他追求，他碰壁，他受迫害受打击，他也发誓低头做人，可过后他依然在追求，就像那些幻想爱情的失恋者无论多么痛苦，依然会一次次追求爱情那样，因为人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

储老师是幸运的。他最后找到了让自己倾注热情的工作，不需要权力却又能发挥自己的工作。如果说他在当我的班主任的时候，还不敢想象世界上除了毛泽东思想以外竟然还可能还有其他思想，因此也只能向我施加专制的教育，那么，他后来的心理学知识普及工作，就向许许多多听众展示了他们完全不习惯的许多新思想，吸引他自己也因为他而为许多人所知的新思想。大众欢迎他的工作，专制权力容忍他的工作，同时，中华民族要造就独立品格的个人也需要他的工作。可惜他太投入了，没有顾虑到自己的身体，在最有热情干事的时候却倒下了。但我想，他宁愿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过劳而去，也不愿意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低声下气。1978年以前的十几年里，储老师只能呆在先给他戴上“野心家阴谋家”帽子、后定他为反革命的同一所中学里（虽然校名改过），连跳槽也是不敢想的白日梦。毛泽东绝对专制的结束终于让像他这样有热情的人获得了多少舒展一下手脚的空间：农民能到城里打工了，城市人能跳槽了，一个人能够在单位之外做些自己想做的事了（因此也才有了我们这些网民）。今天，一个人只要有热情，只要追求，他就可能摆脱最让他窝囊的那个单位专制了。储老师曾经两次试图冲破单位专制。但在毛泽东时期，他的第一次努力虽然暂时成功了，可接着就受到国家专制（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与单位专制（把他选出来做“五一六分子”，就像把李广琦选出来做走资派那样）双管齐下的更残酷的迫害。第二次他

终于成功了，他直接面向社会并且获得了广泛反响，大众给了他回报，他的人生有了不依权力而转移的自我价值。我相信，储兆瑞老师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骄傲的。作为他早年的学生，我想他成功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他被罩在其中的国家专制已经削弱，是他及时抓住了考研的机会更抓住了直接诉诸大众的机会，是他对性心理的通俗讲解受到了大众的欢迎，是他对人生对世界的热情。

谨以此文同时纪念九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的刘默然老师、徐婉芬老师和其他老师，其中刘老师和徐老师都和我谈过话。

2007年10月31日

三、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1. 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今年暑假在波士顿，有次偶然从一个地铁车站走上街区，发现眼前正是有名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图书馆别具风格的建筑，方便并且免费的借阅，都吸引了我。但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信念，这就是铭刻在图书馆屋檐下的一排大字：“The Commonwealth requires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safeguard of the order and liberty”。这句话直译过来大约是“马萨诸塞州把人民的教育作为秩序和自由的保障来要求”，其意思大体是人民的教育是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为此州议会、州政府要求人民接受教育。

教育无疑有多种功能。除了直接的传道解惑外，教育还有其社会功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亦有各自的目的。而所谓的传道解惑，也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参与者的目的有关，因为传什么道，有什么惑，用什么解惑，是由后者决定的。仅就学校教育来说，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发大财，娶美女（就男士而言）。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就像我们在一些学校看到的标语那样。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多懂一点事情，多完善一点自己。更有人受教育是因为类似自己的人也在受教育，因为父母之命，所以尽管日后可能生活平平，普通工资收入和过得去的配偶，但也得学习。所有这些目的都不错。而出于不同的目的，受教育者的疑惑便不同，对教育者所传之道的要求也就不同。教育虽然具有引导受教育者建立更人道的人生目的的功能，但它的更重要功能，可能是让受教育者明白和信服，达到他们每个人目的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根本方法是秩序和自由。我想，所谓秩序，就是规则；所谓自由就是让自己同时也让他人自由地发挥。就发财而言，一个人可以通过炒股或注彩发财，通过经商办企业发财，通过发明专利发财，通过畅销小说发财。但一个人不能利用内部信息炒股发财，不能制造假冒产品发财，不能虚报专利发财，也不能剽窃别人稿件发财。发财的道路有千万条，教育在让为发财而受教育的人懂得这些道路的主要性质和技巧的同时，也应当让他们信服并从而自觉地走正道，按照规则去争取财富。教育在教给一个人本领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教给他们对别人的尊重，比如男士对美女的尊重。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更应当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人民对秩序与自由的理解方面的作用。今天，我们接受的学校教育比二十年、五十年前多得多，我们对技术的掌握比过去强得多，但是，我们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可能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社会里破坏秩序以发大财、践踏自由而娶美女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的入学和未入学的少年、儿童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似乎不如他们受到的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熏陶强烈。这种状况最终将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育信念，尤其是主导教育的政府的教育信念，可能是必须向“保障秩序和自由的教育”改变了。

2002年10月22日

2.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纵看古今，横观中外，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是学术机构的企业化。这是中国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展开政府机构企业化以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重大改革举措。从此，中国的学术机构进入了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经济目标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利益。学术机构不但在

核算货币成本和收益,而且在用预期货币净收益指导自己的活动。由于这一变化是“有计划”的改革产物,由于它和现行制度、现行社会风气相吻合,由于中国学术机构本来就很少自己的独立传统,因此政府一改革,各方都照办,甚至竞争性地你追我赶,不赶上对方自己就失败,于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席卷(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企业化浪潮。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好像没有一所高校不把创收放在首位、好像没有一位手握创收权的校长、院长、系主任不在紧张地考虑创收。学校即企业的现象在古代有,在当今的外国也有,但都不成气候。古代,孔夫子办私学、朱夫子办书院、朝廷办京师大学堂,都没有办成企业。外国,德国政府办大学、美国私人办大学,也都没有办成企业。当然,德国禁止把大学办成企业;美国允许把大学办成企业,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私立大学都不是企业。美国几百所研究型大学没有一所是企业化大学。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美国有关的法律已经禁止它们走入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所以,说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的企业化是当今中国的特色,是有一定根据的。

古代和国外的学术机构不是企业,又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呢?它们是中国的学术机构在名义上的注册性质“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盈利性机构,前者是非盈利性机构。事业单位的特点是它的非经济性目标,而可观察的关键指标则是事业单位职工尤其负责人的个人收入和该单位的经济效益脱钩。用更正式的语言说,事业单位是非盈利机构。如果它有盈利,这些盈利只能用于非盈利的用途,而不能他用,更不能够分红;即使分红,分红量也很小。因此,事业单位的个人收入都是公开的。在这里,谁是事业单位所有者的问题无关紧要。一个事业单位可以由政府办、团体办或个人办。但在中国,大学名义上“还”是事业单位,享受着事业单位的优惠,而不承担企业的责任和受到社会与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可是,中国大学创收的目的,首先是分红。在大学内部,则是如何分红的问题。于是出一份考卷多少价格、一场监考多少价格、一篇论文多少价格、一节课多少价格,都成了改革措施。学术工作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学者成了普通劳动力。国有学校的利润既然不需要像国有企业利润那样上缴国家,也就成了学校经营者的红利,以及了解这些红利的办事人员的额外报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今中国学术机构创收的积极性。只要政府给政策,或者只要政府容忍、或者只要和政府可谈判,学术机构就可以自己经营,自己营销。产品是市场急需的,卖得出高价的,也就是科研项目审批中的那一条“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高校往往比学者本人更热衷于比如博士点、博导等名誉,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在学术界向上升的第一条途径列为“借东风”:你不上、学校还要推你上。因为你上了以后,学校才好营销:学校要借你铺出一条新的财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机构“还”想维持自己的学术形象,学术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2002年4月9日

3. 取消学校录取新生的保留比例

一年一度的高中录取高潮已经尾声,大学录取高潮正在到来。录取新生的标准是分数,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既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意识,也是政府反复保证实行的原则。目前,虽然比如上海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在市内各区、县还没有统一,全国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在各省间还没有统一,但至少,对特定的地区来说,考生在学校

宣布的分数线面前人人平等，应当是没有异议的。所以，前几个月我们的报纸才讥笑了牛津大学竟然出现某教师收钱录取学生的丑闻。然而，那些记者或评论员也许不知道，在中国每个学校录取新生时都有一定的保留比率。保留比率有多大，没有公开，但据说在上海是2%。一个大学一年若招生3000人，那就意味着它有60个机动名额。注意，这60个名额可不是为了少数民族、奥赛冠军保留的，因为这些“特殊性”各有加分标准，加分后已经纳入到正常招生中了。那么，保留的这60个名额不必参照分数标准分配给考生，学校又有什么标准可以参照呢？按照学生或其代理人给学校的特殊贡献，比如给学校的捐款？似乎没有哪个学校订立了这项标准。邵逸夫先生给国内许多高校捐过款，好像没有任何学校给了他几个新生名额。按照学校员工的投票吗？也没有听说过。按照分数分配给本来低分的本校员工子女吗？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中国传统。即使是私有制的学校，也不敢提出私有者本人子女低分仍可录取的规则。当然，各学校都是高智商的知识分子成群，他们肯定能够订出若干标准来录取这2%的名额。问题只是这些标准是什么，这些标准是是否符合一般规则。

就我推论，这里的标准就是完全违反一般规则的权和钱，而且权第一，钱第二。当然，各个学校可以公布近年来录取2%新生的实例反驳我的推论。我愿意在事实前面承认我的推论错误并赔礼道歉。但在这之前，我将坚持认为，以权、钱为标准的2%保留录取比率，是一个极其腐败、极其令人厌恶的制度。如果说牛津大学会偶然出现收钱录取的事情，并且大家都知道那样做违法，那么，在中国，这样腐败的事情竟然被纳入了正式制度，从而不再违法，不再受到记者和评论家的讥笑，可见中国的正式制度本身是多么地必须改革。当然，这几年，据说招生制度有了很大改进。在这2%的招生中，纪律检查委员会、反贪污局以至检察院都加强了监督。但一个腐败的制度不会因为强化监督而改变其性质，反之，这些监督充其量也只是把腐败抑制在一定程度内，而其实际作用则是延长腐败制度。为新生录取规定的保留比率，这本身就没有任何理由。既然政府已经为比如少数民族青年、为智力特别优秀的青年，为华侨、烈士以及其它特殊人群的子女规定入学的优惠分数，那么，留给学校的保留比率便只能是给凭特权取得优惠、而又拿不到台面上的人群，而这样的优惠便只能是鬼鬼祟祟的“权利腐败”。在以代表最广大人民为口号的中国，在以育人为使命的学校内，竟然还存在着这种制度，不能不说是包括我自己和我所在学校在内的中国人、中国学校的极大讽刺。这样的制度没有任何“改进”的余地，只有彻底取消。

2002年7月30日

4. 我为什么赞成留学生留在外国

我曾经当过留学生，后来从国外回到国内。虽然我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过，但在和国外留学的朋友交谈中，我始终赞成他们留在国外工作。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孔夫子明确说过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在自己国家行不通，就到海外去。夫子是圣人，都做了这样的准备。后来夫子退而讲学，讲授他系统建立的君子之道。幸亏那时教育和科研自由，至今也没有哪一位学者考证出某个公子王孙干预了夫子的讲学，夫子还能招收到多达3000名的学生(在当时可真是了不起的数字)，他才没有出国并在那里永久居留下去。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受过夫子的影响。不管我们学习、工作的专业是什么，我们都有夫子开创的儒家所说的向善之心，都有学习和实践君子之道的愿望。于是，作为一位留学生，他在决定回国与否的时候，便需要考虑回国以后，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道可行与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可行，但非常难行。这种难，是不熟悉中国社会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的。许多人决定回国时，都希望回国认真地做一点事情。但到了国内，就发现很难不把自己混同于自己在国外时所蔑视的制度和做事方式；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向往。而在我看来，与其在国内被腐化成为小人，不如留在国外，保持自己的一点君子之心，保证自己免受不得不扭曲自己的那种心理煎熬。

其实，一个人在哪里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行为符合规范而又心情舒畅。而这恰恰在现时的中国十分困难。如果你有一份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你在德国、美国可能很容易做到行为规范并且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你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大学教师算上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了。你有了这份工作，当然还要努力，但你按照规范办就行了，而这些规范又基本符合你的君子之求，所以你很容易做到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例如你的职称与奖金和你发表文章的篇数与字数有关，而且这篇数、字数还不能你自报，还得有关人员去数。按照国际惯例，按照中国官方对外公开的说法，这显然都是不规范的。但中国就是这个制度。你如果为此去多发文章、拉长文章，在你麻木之前，你知道你在扭曲自己；你如果坚持规范，你在看到别人因为那毫无价值的文章而比你先评上职称、比你多拿几倍钱的时候，你的心情又不会舒畅。到机关吧，你发觉你不得不说假话；经商吧，你发现你不得不贿赂官员。你发觉只要屈辱自己，你就能得到制度的好处。现行制度的引诱力是如此之大，凭你的洋学位，只要你愿意顺从它，你就能得到许许多多在国外都得不到的好处。你的生活甚至会比在国外更轻松、更富有。但是，一旦屈辱自己，你就背离了回国的最初想法，放弃了君子之求。和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时代相比，今天君子之道甚至在教学和科研部门都行不通。孔夫子再生，可能也真得“乘桴桴于海”了。留学生的一点君子之求，在现行制度面前是太苍白了。因此，尽管我希望我的朋友们回国来共同改变不规范的现行制度，但我也完全赞成他们为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心情舒畅而留在国外。

2002年8月12日

5. 散步在北大

这几天在北京，晚上常常在北大散步。与国内大变面貌的其他大学相比，未名湖周围仿佛和我二十年前求学时一模一样，因此随意漫步，也不致迷路。北大给我的教诲太多太多。在北大，我才明白学者是怎样的人，知道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怎么一回事，理解以天下为己任是怎样一种情感。仅就亲身感受而言，陈岱孙先生的高贵、胡代光先生的宽厚、厉以宁先生的识见，至今让我景仰，促我上进。

二十年前，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北大校门的。我在外地大学毕业前，有两条路可走，一工作一考研。当时自己已近而立之年，也一时兴起，盯上了北大：不考则已，要考就考北大。考取的希望本来近乎于零，但竟然侥幸得中，于是住入了紧邻当年教授（那可都是让学子肃然起敬的教授，而非今日忙于打工或奏折的“教授、博导”）住宅区的29楼，准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想到求无事却有事。那时刚刚开始有规模地招收研究生，要从学生会中分立出研究生会（我至今仍然没有

理解分立的必要性，总担心是研究生要把自己区别于本科生的特权心理所致)，系里同学竟推我去参与组织第一届研究生会选举工作。同学几乎清一色来自北大本科，而我刚入北大，不谙校园之例，本不该参与此事，但大家推我，只好勉从。那时北大还没有设学院。各个系研究生推举候选人，然后投票。我们这些“选举委员会”成员收集选票后便计票。按照规则，得票最多的前若干名便当选为研究生会委员，公布后，选举委员会便解散。没有想到好事多磨，在确定研究生会委员时却出了问题。原来几个和物理学相关的系都没有人当选。一时间有人抗议，有人建议。提出的补救方法有好几种，但每一种似乎都有难处。例如增加委员，但怎么让同学信服我们改动委员数目的合理性呢？重新选举，即使可行，工作量是否也太大呢？我们都是同样的研究生，不能够像“领导人”那样方便地改变规则并要求别人顺从。况且自己的责任在读书，谁愿意在社会工作上花时间呢？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法：在场的我们把选票数改一下，让那些系中有一人当选就行了。这确实简便易行，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是“交易成本低”。但我的第一感觉是惊奇：在我崇敬的北大竟然会提出这样的方法。我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其他事情可商量，改选票则是我们绝对不应当做的事。那天晚上的最后决定是按照实际选举结果和事先确定的委员数公布当选的委员，第一届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也就成立了。而我自己北大，亦没能再卸掉做社会工作的担子。

今天，北大依然是我崇敬的学校。同时，北大的经历使我懂得，生活中有少数几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即使在和自己崇敬的机构、尊敬的人物发生联系时也不能忘记的。事实上，一个机构、一个人值得我们崇敬，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不在这些原则上搞机会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普通人容易忘记这些原则，他们将很难坚持原则。我想，北大之所以一直受到我们的崇敬，除了因为少数名家大家在维护这些原则之外，也是因为北大许多普通学者、普通学生在北大生活的各个侧面（还？）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因为许许多多其它地方工作、学习的人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并且把坚持这些原则的希望特别地寄托在北大。

2002年12月5日

6. 交流的语言和平等

人和人的交流要用语言。而人的语言又分成许多种。遇到一位外地人、外国人，用什么语言与之交流，往往触及到人的深层心理。如果牵涉到个人尤其是权势者个人的利益，问题就更复杂。比如，最近就听到一个看法，在与美国学校的交流中，既然美国教授来中国讲课用英语，我们去美国讲课就应当用中文，否则就是不平等交流，就应当停止交流。

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新鲜。大清皇帝早就要求面觐的夷人用中文，也许是有据可查的最早要求语言平等的例子。100年前的1903年，中国政府要废学堂兴学校。洋人不对等地废学校兴学堂，为什么我们要废自己的学堂兴他人的学校呢？当时也很有些慷慨之士起来反对。在学校里堂而皇之的教授外语，更是令人长叹。但尽管如此，100多年来，英语仍然不可阻挡地成了世界交流的通用语言。要对抗这一潮流，唯一的方法当然是停止国际交流，就向当年中国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那样。

然而，停止交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结果自然是权势者地位的暂时巩固，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某个单位的长官，都知道巩固权势的方法是禁

止臣民和外界交流；第二个结果显然是公民精神和社会及某个单位的长期停滞。这也是中国 100 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和中国许多单位现在还保持的状态。

所以，停止交流不可行。但是，要交流就有语言的问题。交流使用的主要语言基本上由交流的方便决定。上海各大学的课堂语言是以中国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农贸市场的交易语言往往是上海话，家里用的又多是家乡话。据说新疆有人不断对那里的学校教授汉语提出批评。我的新疆学生必须听汉语授课。为什么“不让”他们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呢？为什么上海的学校不教维吾尔语呢？是不是他们不能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他们就不应当和我们交流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我们和美国人的交流语言。也许我们可以说两民族交流所用的主要语言是较强（用现在的时髦词汇，“代表先进文化”的）民族的语言。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较弱民族因此而拒绝交流，较弱民族只会落于专制和停滞；从人类进步的角度说，较弱民族因此而拖慢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其实，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真在追求平等，主要不应当看他是否在更强的人、更强的民族前要求平等，而应当看他是否平等对待更弱的人、更弱的民族。我想，真正抱着平等心态的人，将会以平常心与他人交流，不会因为在日常社会中听到比如维吾尔人、越南人“被迫”讲汉语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自己必须讲英语、德语而牢骚满腹。就此而言，“语言平等”是个政治家的伪问题。我想，无论汉语未来是世界通用语言还是地区性语言，其实都和汉民族与他民族、汉人与他人的平等无关，就像中国的公文用纸最近改成 A4（汉语拼音发音还是英文字母发音？）标准，也无关于民族和个人之间平等一样。

2003 年 4 月 8 日

7. 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今天，学校任命我为经济学院院长。在接受任命的时候，我非常感谢学校对我的信任，感谢经济学院各位教师对我的信任。

同时，我明白，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我校其他院系对加强现代经济学的要求，才有我担任院长的可能性。在院长的任上，我愿意为各位老师服务，为学校和学校其他院系服务。

三年前，在经济学院成立会议上，我讲了三个问题：

- A、教师进修
- B、学术气氛
- C、公开化

这三个问题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尤其是第三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制度建设。我接任之后，将首先了解现有制度，适当的将保留，不适当的将修改，没有的将建立。我希望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在学院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

但今天，我想提出新的任务，这就是经济学院的转轨，是经济学院的教学体系全面转移到现代经济学基础上。

全面转轨到现代经济学上意味着

1. 1. 设计新的教学体系
2. 2. 各门课程都讲授国际上的主流思想和新的发展

3. 3. 各门课程增加分析的成份，研究生课程增加研究的成份。

转轨牵涉到经济学院的所有专业，从思想史、经济史到关于中国、外国现实问题的所有课程，都需要转移到现代经济学上来。当然，经济学院还有一部分带有政治课性质的教学任务，但只要不是或者不完全是政治课，都应当改革，包括对马克思的研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需要转轨。通过转轨提高教学水平。而教学水平提高了，科研水平才可能提高。

转轨是个渐进的过程，计划三年左右完成。经济学院将采取措施，帮助教师转轨。这就是教师进修的问题。经济学院今后的工作，将以教师进修为重点，采取国内外进修、聘请学者讲学、教学研讨等方式，帮助教师提高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在转轨过程中，教师会有调整，但我将保证现有教师第一，进入第二。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教师来说，关键是自学。各位教师只要愿意学习，便有希望通过转轨，达到高一级的理论水准。

转轨也需要制度，做到有序转轨。制度要保证学院重大事务和财务公开化。同时，要提高制度执行的强度。制度是约束人，首先是约束领导者的。我作为院长将自觉受制度的约束。如果各位教师对我有意见，可以用各种形式随时提出。不过，领导者有规则地卸任，是群众能够大胆提出批评意见的前提，也是制度能够有效执行的前提。这里，我谨表示在三年任期结束时，我不谋求连任。

我相信在学校领导下，在各位老师的支持下，经济学院的转轨任务将顺利实现。

2003年5月13日

8. 父母亲和孩子

从偏僻乡村过年回来的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谈到他母亲虽然希望他多留在家几天，但还是以“早点走，车不挤”为由来安慰他按自己确定的行程回城。这个理由虽是事实，但却使他感到愧疚不安。他说母亲无需也无力关心他学习或工作上的事情，但他感觉到母亲对他一直很有信心，相信他能够自己处理好一切。而正是母亲这样的信任使他增强了自信。

他的信引起了我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到学校集合出发去农村插队，父亲在外地，母亲送我离开家。十五岁的我，并不明白麦子也是草的一种，更不了解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因此既无悲伤的感觉，亦不理解母亲送我的感受，所以我把手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要自己走。母亲走得不及我快，渐渐落在了我的后面，且站住了。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看着我，看到我拐出那条长长的巷子。是的，她不知道我离开家之后具体会干什么，怎么干。母亲没有上过学，所以小时候在她身边上学时，她没有指点我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她没有要求过我什么，现在上学成绩要多高、长大后职业要多好、房子要多大，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她没有指望我给她带去名誉或者金钱，但会接受我可能给她造成的屈辱或者困窘。然而，在她放我走的时候，她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理和善良的感觉。

我不知道那位年轻朋友今后如何发展，他感受到母亲对他好好做人的期望和信心，没有感觉到对他选择特定专业、职业、生活地点、收入、成就、房子、车子的要求和压力，从这点来说，他有很大的空间发挥自己。就我接触的情况看，这位年轻朋友是幸运的。许多父母对孩子有太多的希望，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太高的要求，对孩

子的专业、职业、单位、薪金有太多的指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对小动物有兴趣，长大想做动物医生，但我的朋友不同意，理由之一是上海没有这个专业，而孩子又只应当读上海的大学。还有一个朋友，父母亲坚持拒绝和他的妻子——结婚前是农村人——见面。而这些父母，都有各种各样的学位，不像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我的母亲那样近乎文盲。有了学位似乎就有了指点孩子的资格。孩子应当重视这门课而不是那门课，应当对这样东西感兴趣而不是对那样东西，应当在这个城市工作而不是在别的城市或乡村，选择的配偶应当这样而不应当那样。为什么要如此指点孩子呢？因为据说社会风气太坏、竞争太激烈，如果孩子不这样而是那样，将来恐怕在社会上没有立锥之地。我知道这些父母亲非常爱孩子，完全无私地爱，因为他们早已不把光宗耀祖视为培养孩子的目的。但我总怀疑这样的爱太狭隘。如果社会是残酷竞争的原始森林的话，那么，孩子未来面临的竞争恰恰不允许父母亲用自己的眼光和常见的程式来培养孩子。孩子特殊兴趣和情感的出现更非父母亲能够计划的。人生是生动活泼的，事先的人生计划只能使生活枯燥，使孩子失去兴趣。孩子需要本领，需要学习和工作的成绩，但这首先不是为了击败对手或应付生存竞争，而是孩子健全心理和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孩子今后或现在进入的，也不是只有父母才可信赖的原始森林，而是会有许多朋友、同心或同气朋友的人类社会，因此，人性的培育对孩子的未来更为重要。而在培养人的方面，有学历的城市父母不一定强于文盲的乡村父母。其实，教给孩子做人的基本素质，然后任孩子去飞，可能是古今中外许多孩子能够成功能够快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很敬佩我的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她完全可以要求孩子找个高收入的工作，帮助全家脱离乡村的贫穷，但她没有提，她不愿意增加孩子的负担或约束。我也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不管干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都会像她母亲希望的那样做的。

2004年2月3日

9. 要公平、不要照顾

要公平不要照顾，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是做人的要求，是我们在任何时代处理社会事务的基本原则。在一个特权横行、后门泛滥的社会里，要公平，不要照顾，尤其应当是每一位远离特权、没有后门的大学生对社会的呼吁和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如果要照顾，也不会照顾到他们。能够获得“照顾”的人几乎百分之百是有特权的人，是能够打开后门的人。这一点，看一下2003年在网上被揭露的上海交通大学“照顾”入学的人的名单和背景，或者对善良的人来说，看一下（也许要等20年后？）解密后的各学校的文件，就会明白的。第二，即使他们中的个别人能够受到照顾，这样的以牺牲更优秀的他人为代价的照顾也是不应当的；第三，特权制度本身必须废除，而不是你或者他中间那一个享受特权、获得照顾的问题。

然而，也许因为我现在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缘故吧，在进入一年一度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阶段的时候，我收到了若干给我个人的要求照顾的信件。这是一些分数还不低、但担心不被录取的考生的请求信。他们都来自农村或者城市底层家庭。他们希望我多多考虑他们的情况，录取他们。对此，我要说的是：你们找错了方向；你们给我的信应当要求公平，反对照顾：只有公平，在你们符合录取条件的情况你们才会真的被录取；如果谈照顾，那因“照顾”而受到委屈的恰恰是你们。

当然，在任何特权社会里，我们都看到本来受到不公正的歧视、但得到了领导照顾的少数几个人的感激涕零。像谈家桢、姚雪垠受到重视的例子，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而知识分子的全体受压制、学术和文化的全面受钳制的不公平状况却被淡忘了。这样的例子容易使年轻人希望成为大大小小的谈家桢、姚雪垠。年轻人会以为，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照顾，是因为他们的姓名还没有为领导所知。于是，在本来需要公平、需要他们维护公平的时候，他们却觉得最需要的是领导对他们的个别照顾。想到这里，我不禁有心痛的感觉。

有一位考生寄来了她的三好学生证书复印件。我不怀疑证书的真实性。但一个大学毕业生不要求公平而希望照顾，他无论如何够不上好学生的标准，甚至够不上大学生的标准。公平而非照顾是基本的行为理念。一个没有特权的大学生应当具有这样的理念。这不但因为他几乎不可能得到照顾，而且更因为他应当懂得，现有的特权是不应当保持、也不应当用新特权去推翻的。而一旦他获得了照顾，他就加入了现有的特权制度，便可能永久地失去了呼吁公平反对照顾的心理能力。

要公平不要照顾，同时也应当是每一位靠关系而可能打开后门的大学生的理念。因为，社会的最终改善不但取决于没有特权的大学生的呼吁，而且更多地取决于有特权的大学生的自律。这里，仅仅就给我来信的考生同学而言，你们不但要呼吁公平，反对照顾，而且应当思考设想如何才能实行公平。就我可做的事情而言，我想推动的是，在网络上公开达到一定分数、比如教育部或者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名单和分数。我想，对公平来说，重要的不是让考生知道个人的绝对分数，而是要让公众知道所有考生、至少是有录取可能的考生的相对分数。如果原先来信请求照顾的同学现在能够对我的想法提出意见和进一步的建议，我们追求的公平将会有更大的希望。

2004年3月16日

10. 欢迎田国强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今天，田国强先生就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我辞去了院长。我感谢学校接受我的辞职申请，并衷心祝贺田先生的就任。

田国强先生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是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田先生能够在美国工作的同时，就任经济学院院长，为国内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为国内大学教育和大学理念的改革贡献力量，我非常敬佩。如果清华大学特邀讲学的二十几位华人经济学者能够担任国内二十几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的院长、主任，国内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肯定会有一个大的进步。上海财经大学跨出了第一步，我衷心地希望上海财经大学成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功、田国强先生成功。

过去的二十年内，以“西方经济学”为名称的经济学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我的前任院长时期，“西方经济学”便变成了经济学院最重要的课程，成了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唯一的经济学考核内容。我在任上所做的，只是公开提出了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全面转轨或者用今天田先生的话说转型，也就是把原先秘而不宣的做法公开化了。田先生今天在职演说中提出的课程体系改革、学科建设、引进人才、教师培训等措施，将把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并可

能最终完成转型工作。

确实，就像来自西方的化学在 100 年前取代了中国炼金术一样，今天，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取代中国原有的经济宣传和教育，也是一个即使反对也只能顺之而动的大趋势，所以我们看到比如不认可“西方经济学”的教师也要“西方经济学”博导头衔的例子。大趋势中出现反复，是正常现象。在学科建设、学术发展、高校教育上避免重大反复的主要方法，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的要义，是让大家说话；而让大家说话的前提，是用公开化的制度来减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学科建设和高校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学术自由和学术公正。但在一个不让大家说话的学院内是谈不上学术自由的，在一个信息不大量公开的学院内是谈不上学术公正的。田先生在学术比较自由、比较公正的环境下从事学术工作有二十年之久，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在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发展和制度建设一定会呈现全新的面貌，并达到一流的目标。

谢谢大家。

2004 年 7 月 12 日

（注：2004 年 7 月 12 日的发言没有包括第四段）

11.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新学期伊始，我正式离开上海财经大学，转到同济大学工作。

20 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孩子摸爬滚到了上海，而在上海的要人单位内，只有上海财大一所学校。我在农村长大，农业非均衡的生产节奏使我缺乏马克思说的大生产强制训练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农村的“广阔天地”又养成我自由飞翔的思维习惯，不愿意接受固定模式和命题作文，再加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心愿，所以我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

如果说我当初到上海进财大工作更多地出于偶然的原因，那么我现在离开它则只能归之于理性的考虑。从感情上说，我完全体会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条件的价值：那里有自由交流的小环境、有在经济学上努力探索的同事、有协力工作的朋友、有一心求学的学生、有上海高校最高的非计件工资收入。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口碑尚好，由于学生到处都在有意无意地议论教师，所以我从校办到比如医院的学校各个部门都受到令我感激的尊重。同时，我的大部分专业工作是在上海财大做的，出国是上海财大派遣的，上海财大甚至让我担任了经济学院院长。因此，我感谢上海财大。而我离开它，无论在地位和名誉上，在收入和待遇上，在接触经济学专业同事和学生上，在日常生活上，都有严重的损失。虽然离开上海财大后，我有更多机会读书，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学术上的投入能够取得成果；而我担任院长一年，已经在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转变经济学院学术方向以至于提高学院经济收入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果我把院长任期做完，我和我的同事们应当可以做出重要工作成绩的。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同事、学生对我留在财大工作的希望，而我自己亦有入世的冲动。因此，当我决定辞职并离开上海财大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种歉疚和沉重。

使我做出离开上海财大选择的，是终究超过了感情倾向的理性逻辑：因为同样的事情我拒绝了上海交通大学，也就不得不拒绝上海财大。一个人的行为需要一贯性

(consistency)，也就是孔夫子提出的“一以贯之”。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没有一贯性便谈不到理性、自然也谈不到诚信。尽管两个学校向我提出的改变后的条件仍然比我现在转入的学校优越很多，但问题不在条件的高低，而在于诚信的理念，在于保持自己的一贯性。为此，我不得不抵制一些单位几乎是“不经意”地随便改变诺言的现象，抵制用一次博弈的最优来消弭行为一贯性准则的办事方式。我理解在这类办事方式面前被迫做绥靖主义让步的一些人。考虑到家庭尤其孩子，考虑到就业的困难，考虑到提升、晋级，尤其考虑到事业和前途，一个人在身受工作单位的不诚信之害时，往往只好退而采取绥靖主义。对此，我满怀同情。只是和他们相比，我的个人条件好得多，没有类似压力、困难和追求，只是因为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金钱、事业、感情来掩饰自己人格的软弱，所以在我的考虑中，理性的逻辑最后超过了感情的倾向。如果可以套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想说的是，我爱上海财经大学，无论在我离开前还是离开后，但我更爱洁身自好。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作为研究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的国内最重要的大学之一，上海财经大学自身的制度不会再让人在它和洁身自好之间去做痛苦的选择。

2004年9月14日

12. 我为上海财经大学鼓掌

两年前，我因为某些原因向上海财经大学领导提出辞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职务并离开财大的请求。长期在美国德州任教的田国强先生早就有为国内经济学教育一显身手的情怀。上海财大校领导更愿意为学校管理学、应用经济学增强经济学基础，更希望学校有一个走在全国前面的经济学，于是在接受我辞职的同时，欣然聘请田国强先生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在那个时候，我曾为上海财大鼓掌、为田国强先生鼓掌。

今天，在上海财大的公共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换届的时候，上海财大决定和准备继续聘请在海外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担任这些院长职务。对此，我再一次为上海财大鼓掌，为刚刚担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张欣先生鼓掌、为准备担任工商管理学院和金融学院院长的先生们鼓掌。

2003年上半年我受聘为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据说那是国内第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系或经济学院的领导由“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人担任。如果此说属实的话，经济学教育从说教式的宣传、心得式的“研究”向可争辩的阐述、可证伪的研究转变的大趋势，终于开始表现在人事变动上。我在任时期，经济学院开始全面而非局部、公开而非私下地向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转型。田国强不但熟悉现代经济学，做过杰出的研究，了解众多北美的资源，而且过去便已经在国内建立起威望和网络。他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可以说是上海财大校领导慧眼所识。一年多来，田国强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和大手笔的举措，把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带上了全新的台阶，现代经济学开始在经济学院扎根：经济学教育走上正轨，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开始学术化；严肃的研究气氛形成，高层次的研究平台开始建立。

我的辞职也许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借助这个偶然契机，上海财大开创了一条倚重在海外取得学术成就并且熟悉现代教育制度的华人回到祖国领导和重建经济学教育的道路。田国强一年多来的成功表明这条道路是能够走通的。林毅夫、邹恒甫都在这个方向上努力过。但只有上海财大才开始倚重海外华人直接领导和改造体系内的经

济学院，只有田国强才开始直接管理和塑造体系内的经济学教育。今天，上海财大决定把这条道路拓宽到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育，聘任海外华人学者直接领导这些学科的建设，我作为校友表示衷心的支持。

环顾国内，在四十到五十五岁年龄层次上，我们虽然能够发现一些足有成就的学者，但他们大多集中在北京而难以像田国强那样把主要精力放在外地高校（即使是像上海这样的外地）。这个年龄段的其它学者，大部分不但是在政治教育式的政治经济学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了解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状况以后，也没有依靠自身的修养训练出严谨的科学态度。上海财大肯定希望在国内聘请到能够带领学校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诸学科与现代教育和科研制度接轨的学者。上海财大令我敬佩的地方，是它在无法实现这一希望的时候没有屈就，为了学生、为了历史（上海财大主要领导都有文史底蕴），它勇敢地开辟了一条新路，一条对全国经济学、管理学甚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高等教育都将发挥强大示范效应的道路。

当然，上海财大的道路不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即使上海财大内部也有学院在国内学者的领导下走上了现代教育和科研道路。以引入海外学者为特色的上海财大道路虽然走出了坚实的步伐，但前面的路还很长。田国强在经济学院成功的同时，既有改善的需要也有前行的任务。众多海外学者担任院长以后，他们和校领导的沟通、和教师的沟通、他们自己之间的沟通，都需要他们投入超乎寻常的精力。中国的教育和研究现代化是项艰巨的事业，走在前面的上海财大和它的各个专业学院尤其艰巨。在这里，与实现现代化教育和研究相比，现代化校园的建设只是一项简单的工艺。在高校重建具有学者良知和风范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才是高校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它不但是对高校领导的挑战，是对高校现有教师的个人挑战，而且是对从国外引入的每个学者的个人挑战，因为对后者来说，溶入高校的小市民教授圈子，是太容易了。但是，我坚定地相信，尽管海外学者的领导作风会有不逮、工作方法常可商榷，但上海财大的道路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在中国目前状况下也是更优的。我为这条道路鼓掌，我为上海财大鼓掌。

2006年3月29日

13. 建议实行大学教授转校聘任制度

最近网上和网下议论纷纷的热点，是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治与张鸣两教授因为萧延中的教授职称评定问题而引发的争论。按照张鸣的激愤之词，现今的中国大学不但衙门化，而且简直黑社会化了。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偏激，但中国许多大学里评职称时拉帮结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凭年头升职称，亦是中国大学的耻辱，后人论及此，真不知如何叹息才好。中国现行的大学教授评任制度，至少有两大欠缺，一是各个大学内部缺乏公平严格的评价体系，二是各个学校之间缺乏流动，或者说缺乏大学教授的统一市场。这两大欠缺相辅相成。没有流动或市场，拉帮结派、找关系靠年头评任教授才有可能；没有公平严格的评价体系，市场又形成不了，因为就像商品一样，没有质量监管体系、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情况严重的商品，是形不成统一市场的。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教授对保持、发扬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负有特殊作用。现行大学教授评任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我不擅长于政策

建议。只是由于我在 2001 年的一篇文章中针对“户籍制度不宜改”的观点提出了“户籍制度五年内即宜改”，而近年来的事实又支持了我那时的预期，因此现在大胆提出大学教授转校聘任的改革建议。我建议从现在开始着手，经过三年准备期，到 2010 年，中国开始实行新的教授评定制度。我所建议的新制度的核心，是大学教授实行转校聘任，即一个人要想获得教授职称，他不能够在他当时工作的学校内申请和评定，而必须向招聘教授的其他学校申请并在其他学校聘任。具体地说，转校聘任制度的改革包括以下内容：

1. 各个大学不得在本校教师内招聘教授职称的教师，不得授予本校教师教授职称。

2. 各个大学需要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必须在除了本校外的全世界公开招聘。当然，初期可以限定在全国公开招聘，但至少必须在全国公开招聘，而不应当在更狭隘的地区或省市内招聘。

3. 每个希望获得教授职称的人，必须到独立于他现在工作的单位或者学校的其他学校应聘。由于中国大学将实行四级教授制度，现任教授要提升到更高一级教授，也必须到其他学校应聘。

4. 实行教授应聘的最高年龄限制。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建议应聘最低级别教授者的年龄不得超过 45 岁，应聘最高级别教授者的年龄不得超过 55 岁。

5. 决定一个人是否达到教授职称资格的唯一标准是他的学术水平，具体标志是这个人独立发表的文字作品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准。因此，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完全可能因为其一篇文章的学术水平而被聘定为教授，相反，一个写有几百篇一般论文和著作的人一生都应与教授无缘。

6. 招聘教授的学校必须把应聘者的姓名和代表其最高学术水平的作品在网络上和相关报刊上公布，以接受社会的监督。教授聘任委员会的投票结果和每个成员的投票情况应当公开。

7. 如果一个学校聘任的教授，其学术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应聘者或者（在无其他应聘者的情况下）明显低于教授应当具有的学术水平，这个学校的教授聘任委员会的相应成员应当受到严厉处罚，至少终生丧失成为教授聘任委员会成员资格，甚至取消其教授资格。

8. 国家成立教授职称仲裁委员会，对有关争议做出公开讨论和最终决定。该委员会每个成员的投票也应当公开。

9. 取消非学术性教学工作的教授职称。

至少就我了解的政治经济学学科而言，应当取消政治经济学本来就不具有的学术外表，还其宣传教育的本色。如果这样的宣传教育还需要维持的话，应当为它们建立另一套头衔和待遇，而与学术分开。

不这样分开的话，学术和宣教就会混为一谈，评定教授按照学术水平就会成为空话，学术独立也会成为空话。当然，这样做需要执政党为民族负责的情怀和勇气。我相信中国现在或者最近将来的领导人一定有这样的情怀和勇气，会把政治经济学一类宣教工作排除出学术评定范围。

10. 全国公立大学实行基本统一的大学教授薪金制度，并完全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私立大学的大学教授的薪金制度，应当类似于公立大学。

取消教授从科研资金提成个人收入的“潜规则”制度。这样的做法按照国际惯例是贪污。中国必须尽快改变这一制度，才有可能排除商人教授的趋势，重建大学学术氛围、重建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同时取消按成果、教学工作量、带研究生、参加答辩、

学术报告甚至出卷、阅卷、参加普通会议等的报酬。对在应聘时索取和接受特殊待遇的教授按收受贿赂罪惩处。

11. 对教授实行全国统一的户口、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以保证教授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

基本统一大学教授的薪金和户口、社会保障制度，是大学教授流动的制度保证。既然中国能够对干部实行这样的制度，对比干部数量少得多的教授，实行这一制度应当更无困难。

12. 所有教授在各学校间的调动采取招聘、应聘和聘用方式。废除现有的教授调动制度本身从而废除教授调动的黑箱做法和一对一的特殊待遇私下谈判做法。

13. 在从 2010 年起对全国所有新任教授采取上述制度的同时，对旧制度下获得教授职称的位置，分五年或十年逐步转为公开招聘。

在新旧制度并存时期，未通过新制度而获得教授职称的教授，待遇应当低于新制度下产生的教授。

1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相应地建立大学教授的专门法规，并对新旧制度并存时期的长度和过渡方式做出专门规定。

当然，建立教授职称转校聘任的制度，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和规范。本文提出的具体建议本身也需要讨论、修改甚至放弃（如果有更好建议的话）。另一方面，教授职称转校聘任，其实又是许多国家久已行之的有效做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转校聘任制度本身，就用外部评价方式，大大降低了非学术因素尤其人情因素在教授聘任中的作用。和国外的通行做法相比，本文建议所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公开性，公开应聘者借以证明自己学术水准的作品，公开评委的投票和对掉以轻心甚至营私舞弊的评委的惩罚。

公开应聘者的作品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中国大学现在的评价体系不公平不严格。其实，现在各大学教授职称委员会的评委都很明白申请者中哪一位或哪几位学术水平更高。但是，他们常常顾及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因此不能严格地把学术水平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年轻的佼佼者往往成为他们照顾关系的牺牲者。在国外，35 岁以前当教授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中国教授实行公开招聘、公开评定，35 岁或更年轻的人担任教授的现象也会很多，因为许多年轻人的学术水平已经超过了 50 多岁的教授候选人或现任教授。通过公开应聘者姓名和其标志作品，局外人和应聘者自己能够对所有应聘者的学术水平做出上下高低的评价，评委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然会大大减少对其他非学术因素和关系的考虑，学术水平高的应聘者便容易被聘上。就中国人民大学争论的例子来说。假如它招聘国际政治方面的教授时公开应聘者的资料。萧延中若应聘，自然有局外人比较他与其他应聘者的水平，其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局外人，在这样的社会监督面前，评委自我约束程度会明显提高，拒绝照顾关系的决心会大大增强（我相信，至少绝大部分现任评委内心里并不愿意照顾关系），投票结果有利于水平最高的应聘者的可能性会显著上升。诚然，即使公开投票也会有差错或者舞弊，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萧延中没有被聘上并且认为评委没有履行好职责，他还有申诉的渠道，而张鸣、李景治就萧延中是否达到教授水平的争论亦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展开，中国人民大学这所校名听上去就让人严肃和尊重的学校，也就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心理上得到某种特殊的安慰。

公开评委的投票和公开处罚，在中国当前学术评价不公正不严格的状况下，对于保证教授评定的学术标准也是必不可少的。公开评委的投票，意味着每个评委必须在公众面前承担自己投票的个人责任。这样，一个学术水平明显高于竞争者的人如果

没有被聘上，相关的评委便不能用集体决定来搪塞，不能用投票状况的保密来掩饰个人品行的软弱甚至良知的湮灭。公开投票和公开处罚能够大大提高评委掉以轻心和营私舞弊的风险。这两项措施还能够减少教授评定的成本，因为各个学校成员众多的评价委员会以及繁琐的评价程序，其实都来源于逃避个人责任。我在德国读博士，论文只需要指导教授和学院（系）指定的另一位教授认可就行。所以，如果论文质量低却被通过，这两位教授的个人过错清清楚楚，因此他们也就不得不郑重地负起责任。中国的一篇博士论文，至少要指导教授（有时还有副指导教授）、预答辩委员会五位教授、外聘盲审的三或五位教授、答辩委员会五位教授、还有学校学位分委员会和委员会的诸位教授的认可，才能最终通过。结果呢，论文质量依然没有保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教授（包括指导教授）承担个人过错，都是集体的过错（所谓“制度”原因）。公开投票、公开处罚，让评委承担个人的人格责任和知识水平责任，我们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评委、那么多评审程序。最后，国家仲裁的目的是防止某个学校或地区的评委集体作弊。在中国许多学校还是单位专制的情况下，评委集体作弊的现象必须事先加以预防。

中国大学制度的改革目标应当是教授主导、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这一新制度的根本基础在于教授素质的提高。提高和保证教授素质的条件有很多。教授转校聘任是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当然，仅仅教授转校聘任的单一措施，尚不能实现改革、建立新制度。所以，仅仅教授转校聘任是不够的，但缺少教授转校聘任又是万万不可的。同时，和高校改革的其他措施相比，教授转校聘任比较容易实行，因为它牵涉的人数毕竟不是非常多。受到这一措施负面影响最大的是熬年头盼着升教授的副教授和其他大学人员，以及刚刚或者将要调入学校工作的部分官员们，因为他们都希望戴着教授头衔退休。不过，他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只是因为中央还没有改变旧制度，他们才存着这样的希望。如果中国坚决地改变现行教授内部评定制度，建立新的学术至上的教授制度和公开公正的聘任制度，他们不但理解，而且会支持的。

2007年4月4日

14. 用年休假制度取代高校寒暑假休假制度

随着国务院公布职工带薪年休假规定草案征求社会意见，带薪年休假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就高等学校来说，年休假制度的实行是个契机，正好把高校教职员工的寒暑假制度并轨到年休假制度内，也就是说，高校应当取消教职员工的寒暑假，而实行全国职工统一的年休假制度。

高校教师和其他职工的寒暑假是我国内地的做法，也可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做法。我国的台湾省和香港地区没有这样的制度，我所了解的德国、美国高校也没有这样的制度。我是八十年代末到德国读书才发现这一区别的。在德文中，寒暑假的正式名称是“无课程时间”，学生不上课，教师也不开课，但也就仅此而已，其它一切都和“有课程时间”一样，教职员工尤其办公室人员正常上班，学校各机构正常运行，既没有放假之说也没有值班之说。教职员工仅仅获得国家统一规定的年休假。除了法定的休假天数（目前是一年24天）外，他们都须到学校上班。据我所知，美国高校职工尤其是不担任教学和研究任务的办公室人员，除了年休假外，寒暑假也都正常上

班。

高校职工寒暑假不休假的原因，是它与中小学不同，在教学之外还承担研究工作。教师是研究的主体，高校其他人员的工作是配合教师，尽可能把研究人员的杂务接过去。“无课程时间”让教师可以集中精力从事研究。教师在“无课程时间”从事研究，高校其他人员都得配合教师，自然谈不上休假。我在德国的时候，要借书要复印，写个条子放在指定地方就有人去借去复印；要填表，办公室人员会把表格基本填好，有时甚至只要我签个名就行了。对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在“无课程时间”他们同样需要读书。一门课的内容常常在“有课程时间”讲不完，学生就得在“无课程时间”自学并在这段时间内或在下学期初考试。

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已经认识到寒暑假休假制度的弊病并已经或者准备自行改革。刚刚庆祝了建校 90 周年的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院便取消了教职工寒暑假全休假做法。然而，个别学校或院系的改革困难很大。就世界各国或地区来说，劳动法与高等教育法规对工作和休假时间的规定在一国或一地区都是统一的。我国对高校取消职工寒暑假休假而代之以年休假制度，也应当通过年休假法规做出统一的改革。

2007 年 11 月 11 日

(本文同时发表在上海《新民晚报》2007 年 11 月 11 日)

四、浅谈经济学直觉

1. 浅谈经济学直觉

最近，我就经济学与数学关系和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写了两篇夜话。在那里，我强调了数学尤其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在这篇夜话里，我想强调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数学不能代替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也不能代替经济学直觉。纳什（Nash）、格兰杰（Granger）这样的大家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更多地是数学家（如果把统计学也归入数学的话），他们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形式结构的数学，而不是这一结构的特定内容。可作为经验科学，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需要探讨的恰恰是内容。

那么，什么是经济学直觉呢？在我看来，经济学直觉是提出经济学问题的能力。经济学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一旦从这点出发，我们就得遵循逻辑，严格地引出思路，一步一步地得出结论。而在出发点的确定上，我们缺乏明确的逻辑，所以需要直觉。就此而言，直觉先于逻辑，提出经济学问题先于经济学的数学建模和逻辑推导。爱因斯坦说得好：“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方向看旧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物理学的进化》）。爱因斯坦在这里说的科学是物理学，但他的观点对经济学同样适用。

我们举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例子说明爱因斯坦的观点。一般均衡理论通常又称为市场经济理论或者价格理论，它是经济学的核心。斯密（Smith）最早提出了自由和平等交易的市场活动将引导自利的个人达致社会的福祉。斯密的说法更像一个假想或者一种信念，他仅仅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证明。瓦尔拉（Walras）为斯密的问题建立了最初的数学结构，把价格理论转变为学术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从而正式拉开解决斯密问题的序幕。瓦尔德（Wald）首先指出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得以成立的数学条件。德布鲁（Debreu）在斯密提出问题的近 200 年以后解决了它。德布鲁为此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们四人中，瓦尔德和德布鲁贡献的更多地属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这样的技巧在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它们本质上是数学的而非经济学的。相反，斯密和瓦尔拉的贡献是经济学的。斯密提出经济学问题，瓦尔拉在近 100 年后把斯密问题引向新的方向（而它成为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主导方向）。尽管他们两人没有解决问题，但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眼中，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瓦尔拉是一般均衡理论创始人。如果科学进步可以有重要性不等之分的话，那么，斯密和瓦尔拉所实现的经济学进步，比瓦尔德和德布鲁的贡献重要得多。

对经济学的学生和学者来说，数学是重要的，但经济学更为重要。这同时还是因为，经济学还没有达到物理学 100 年前的水准。在现在和今后一段很长时间内，许多经济学问题还不能甚至还不必要以数学方式提出。此外，很多问题提出后，其解决也需要经过大量的经济学思索，才能进一步发展出它们的数学结构。所以，除了经济学知识外，提出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直觉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经济学直觉并不就等于对现实经济状况的了解。我们每天都面对着经济问题，每天都和市场、货币打交道。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经济世界中（当然不仅仅是经济世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许许多多事情都和经济有关。生活会让我们生发出经济的感觉。比如购物时，我们有意识甚至无意识地就会选择价廉物美的物品。我们也会提出问题，比如为什么某种商品今天的价格提高了。这些是我们的市场直觉或者经济直觉，以及我们的经济问题。

但是，它们还是一种来自现实的感觉，还谈不上经济学直觉。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还算不上经济学问题。例如，企业界、政府界人士常常到大学做报告。这些报告引人入胜的地方是报告者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他们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者又不必然具有经济学的直觉，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不是经济学问题。

童年时，我们在课堂上学过牛顿问“苹果为什么落到地面”的故事，并且自己也问过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这是一类物理或者自然现象问题，但它远远不是物理学问题。要成为物理学问题，它还得一般化。牛顿的贡献正是在于他把苹果落地问题转变成“物体为什么会落到地面”问题。虽然他的引力概念还具有神秘的色彩，但他利用这个概念不但能够解释苹果落地、月亮不落地的问题，而且能够展开物体相互作用的数学结构。物理学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爱因斯坦说的一个站在铁路旁的观察者提出的问题：在行进中的火车上行走的乘客走的有多快？这个问题虽然比苹果为什么落地复杂，但也还是个物理问题；而当爱因斯坦由此普遍化为速度相加的一般问题时，它就成了物理学问题。这些物理学的著名例子表明，针对特殊现象提出的问题更像常识问题，只有把这类问题一般化，我们才能够提出科学问题，提出物理学问题、经济学问题或者其它科学问题，从而找到逻辑得以展开的理论出发点。

经济学中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斯密如果仅仅提出制针的分工如何提高制针企业甚至行业的生产率问题，他还只是为普通经济学家；可当他把分工概念一般化从而把分工和市场以及价格机制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成了经济学的大家。科斯(Coase)如果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甲企业和乙企业为什么合并”的问题上，他提出的还只是经济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当他把问题变为“一个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时，他提出了经济学问题，我们也就经常读到别人对他的经济学直觉的赞誉。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和刘易斯(Lewis)是同时代人。前者曾经列举了经济落后的几十种表现，但后者仅仅抓住一种表现即劳动严重过剩，把它提升为劳动无限供给，便创立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

我自己经历的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是增长经济学。六十多年前，哈罗德(Harrod)、多马(Domar)从凯恩斯理论(Keynes)出发，研究投资和储蓄的跨期或长期均衡，并提出最早的增长模型，以至于有接踵而来的卡尔多(Kaldor)等人的新剑桥模型、索罗(Solow)等人的新古典模型等。但后来卡尔多提出资本生产率不变是经济长期增长特征的大胆假想。这个假想彻底改变了增长经济学的方向，把它从凯恩斯经济学的延伸转变为独立的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门学科，而其解释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生产率为什么不变。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资料都表明资本生产率不断变化。从这些资料中得出长期资本生产率不变的假想，需要的不是对经济现象的进一步了解，而是深入的思考和思维的跳跃，是一种经济学直觉。就增长经济学而言，卡尔多的经济学直觉，可以和伽利略提出如果无摩擦、物体会如何运动时的物理学直觉媲美。卡尔多假想的意义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经济学说史上，李嘉图(Ricardo)最早清楚地提出了资本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的想法，改称为中国学生人人皆知的“利润率递减规律”。凯恩斯再次确认了这个趋势。同时，在新古典理论中，边际生产率递减又是经济学基本规律之一。边际生产率递减，平均生产率自然早迟也得递减。因此，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递减成了卡尔多之前经济学家和知识界公认的常识。这一常识又成为知识分子不信任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源。因为，只要资本多了，利润率便会趋向于零，市场经济便将结束。卡尔多的假想彻底扭转了这一思维方向，而增长经济学也随之转向，把解释重点转为长期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为什么稳定。在这个方向上，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几无痕迹，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剑桥模型黯然失色；适合于这个方向的索罗模型脱颖而出，成为增长经济学的出发点。人力

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全球化等等因素，过去更多地被对市场经济没有信心的学者用来说明利润率为什么还没有降到零，现在反过来被融入说明利润率不会下降的增长经济学内。当我亲眼看到新增长经济学二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时，我常常感叹经济学直觉的威力。从同类经济现象中提出的经济学问题常有不同，思维跳跃的方向或有区别，但提出经济学问题所需要的直觉是一样的。在高低不定、受到无数力量影响的利润率数据面前，无论一个人指出利润率长期趋势是下降还是稳定，他都离不开经济学直觉，他都能够造就经济学的真正进步。

因此，经济学直觉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了解，特别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罗列。对经济现象一无所知的人当然不可能具有经济学直觉，但是，对经济现象的广泛深入了解却也不是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条件。况且，一个人了解的经济现象总是特殊的有限的。从特殊到一般、从有限到无限（或极限）需要跃迁。所谓经济学直觉，在我看来，就是从特殊经济现象引申出一般经济学问题的能力，是一种思维跃迁的能力。对于经济学来说，这一直觉能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依靠这一直觉，我们才能提出经济学问题，才能在经济学中实现爱因斯坦所说的“真正进步”。

如果一个人不是天生地具有经济学直觉的话，那么，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途径，我想除了读书、讨论以外，可能还有这样几条：

1. 具有全宇宙全人类的胸怀。具有这样的胸怀，容易把身边的现象一般化，容易跳出特殊现象的约束，思维容易从特殊的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的经济学疑问。

就我们中国人来说，困难的是跳出中国圈子想问题。我们没有普世宗教的传统。我们习惯把对中国有利的东西看成好事情。我们喜欢用能否直接解释中国问题来判断一种理论的有效性。这样，当我们需要创造理论时，我们很难从中国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经济学问题。因此，经济学者尤其年轻的经济学者，自觉地克服中国标准感，培养世界眼光，是非常重要的。

2. 学术自由的胸怀。学术自由的胸怀指的是学者内心的自由，脱离政治判断和世俗观念的心绪自由，思考问题时的不受现有理论拘束的自由。在这里，外来的约束并不重要。这是因为，任何法规、任何暴力或者任何外在措施，都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天地，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具体内容。相反，我们对学术自由环境的要求，是以我们自己在学术思考上的内在自由为前提的。有了学术自由的胸怀，思维的跃迁、从特殊现象达致一般问题的直觉，就比较容易地出现。

3. 强化一般化思维能力的训练。我曾经读过关于“苹果落地问题”的教学材料。教师启发学生继续提出的问题几乎全是“苹果为什么是红的”等等，而没有启发学生提出“还有什么东西落地、又有什么东西不落到地面”的问题。在思维的实践中，归纳是比较容易的，但从有限的归纳跳到一般的命题，往往需要自觉的训练。打个比方，任何概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般性。试试对所熟悉的概念，比如人、书、高兴这些概念做出自己的定义，一个人将发现，他必须超越个别特殊现象，他才能够达到一般化的定义。

4. 思考。读书重要，讨论重要，思考更重要。高强度的思考是一切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没有高强度的思考，再多的读书、讨论都无济于事。所谓学者要孤寂，说的便是孤寂有利于思考，因为孤寂免去了繁杂的干扰。如果不思考，孤寂也毫无意义。所以，创造一个适合思考的小环境，保持一种安宁的心绪，让自己集中精力反复咀嚼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将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自己的经济学直觉。

2006年9月6日

2. 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我在 2002 年初建立个人主页的时候，把自己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挂上，希望能够引起讨论。当时我表示每年 2 月和 8 月将回复发来的讨论文章。如今，两个 2 月和两个 8 月过去了，我收到过批评，也有过讨论，但根据作者的意愿，它们没有在网上公开。另一方面，我又没有收到严格的学术批评意见。诚然，一年多的时间不算长，目前的状况也许很正常。可是，中国有那么多人研究《资本论》，学术积累应当很深厚，但学术批评没有展开，似乎并不正常。

近日在网上读到《中国青年报》今年 3 月 21 日的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谈民工读《资本论》，才恍然大悟，悟出了《资本论》研究和研究者对贫困态度的关联。曹林从一位民工在书摊上买《资本论》读并想借此了解包工头怎样剥削他们谈起，说如果看脱衣舞暴露了民工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无聊，看《资本论》则“恰恰暴露了民工这个阶层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真空和精神危机，”因为“看《资本论》就是一种不满的表达形式”，所以他反对民工读《资本论》。这使我很惊奇。因为按照《中国青年报》的一贯说法，如果真的有了精神危机，也得靠学习马列、尤其学习他们的经典原著才能够消除，所以应当鼓励民工读《资本论》，如何却把读《资本论》和看脱衣舞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诉诸于无产阶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自然包括民工）。如果他的在天之灵有知，他对自己去世一百多年后，中国还有民工不是因为政治学习的强制、而是自己想弄清问题来读他的《资本论》所感到的欣慰程度，一定会比知道中国每年培养出几十个（上百个？）“《资本论》专业”博士所感到的欣慰强烈得多。由此想起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不正常，正是在于号称坚持马克思的学者里，没有精神生活的人太多，在于太多人为衣食甚至衣锦而研究马克思。马克思（和夫人）本来出身于富裕家庭，却宁愿忍受衣食无着的穷苦生活，而潜心于后来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一年只有十来位博士毕业的时代，马克思要想获得小资乃至更富裕的生活不是难事，但他为了理论宁可受穷。所以，马克思理论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因为学术问题更多地与逻辑有关，但重大理论的选题则与一个人的精神素质有关。但马克思即使因此而贫困，他也绝无反顾。三十年前，我在农村的身份类似如今的民工，听从毛泽东的号召开始读马克思书。也许由于我自己和我生活的乡村的贫穷，我很快意识到他的书是穷人的书。后来我对各种经济学说有所了解，更感觉到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当然穷人的立场只是许多立场中的一种，而且不是每一件事情上都正确的立场。可自称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则必须持有穷人的立场。这一点早成国际惯例。在世界绝大部分不把马克思理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度里，研究马克思的人几乎都是从穷人角度考虑社会问题的人，更无须说坚持马克思的人了。当然，穷人的立场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或坚持者本人是穷人，但它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贫穷有着“同情的理解”，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敢于像马克思那样过贫困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情贫穷、敢于贫穷，是马克思研究者尤其坚持者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

把马克思理论当成小资生活后的纯学术研究对象，固然不能算错，因为就像《红楼梦》一样，《资本论》也有其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但这种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已经无甚关联。而在我们的社会内，如果有人对贫困生活怀有深深的恐惧，对贫困者怀有深深的蔑视，而把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当成谋生的职业甚至让个人先富起来的

手段，写文章首先想的是发表和由发表带来的职称和报酬，关心的首先是房子和股票，那么，这些人对马克思的“研究”与“坚持”实际上成了对马克思精神的亵渎。由于研究马克思在中国成了有钱有势的好事，号称研究马克思的人自然数量大，论文多。我想，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的作品也许占全世界该类作品总量四分之三以上，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人也许占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能够算上学术创新的至多几十篇，而即使承受贫困也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可能还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马克思研究自然没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批评，更没有马克思的精神。

不时想想民工、想想我们社会的贫困者，想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那种低下的地位，想想如何改变他们的地位（即使是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寻求长期的改变），我们也许才能在研究马克思时体会到马克思的初衷，才能谈得上坚持马克思理论。读一读下面这首诗吧。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不需要无保留地赞同它，但他如果做不到基本赞同，那他坚持的肯定不是马克思理论。

2003年9月3日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
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
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不存在，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弟兄们，我们还存在。

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
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
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

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暧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很多行业？
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胸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
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

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
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
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原诗作者：余世存，2002)

3. 一般均衡和爱情

一般均衡 (general equilibrium) 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 它和爱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经济学离不开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那些看似无法用成本、收益衡量的事情,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与其等价的货币价值, 就可以用经济学来分析。这也就是经济学分析工具能够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大显身手的原因所在。例如一个人是否上大学的等价货币量可以用这个人在上大学和无偿获得从零开始不断增多的货币价值之间的选择来决定。货币多到一定程度, 这个人就可能开始倾向于选择货币而不选择上大学。但爱情不同。爱情是一种奉献或利她/他主义, 所以没有货币等价, 或者说爱情的货币等价无限大。此时, 经济学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例如以江山之财富来换取对方接受自己的爱而不得, 便是因为那财富总是个有限值, 而爱的价值无限大。

不过, 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和爱情至少有二个共同之处, 第一它们都是理想 (或者贬义地说是幻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我们从来没有过均衡。无论设计多么周详的计划经济, 还是自发运行的市场经济, 都没有实现过一般均衡。我们看到的哪一个市场是均衡的, 哪一个经济是均衡的? 现实经济中根本没有均衡。且不说气候变化这样的外部冲击, 就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动, 也会阻止一般均衡的实现。更有甚者, 一般均衡从原理上说便不是现实。它是经济体系在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下, 例如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下可能出现的一种理想的资源配置状态。既然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不可能, 一般均衡自然无法成为现实。爱情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举出一千个例子说明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爱情, 却难以举出一个完美爱情的例子。无论是精心呵护的爱情, 还是突然生发的爱情, 我们知道的任何真实的爱情都不完美。虽然爱情不像经济均衡, 不需要许多条件, 它也许只需要双方全心全意的相爱。可是, 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事情, 一个人不可能不分心去兼顾, 所以, 完美的爱情只能停留在现实之外。

但是, 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仍然那么重视一般均衡, 许多年轻人年长人仍然那么重视爱情? 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些就是理想, 是经济学或者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正是它们的不可最终实现, 才吸引人类永远地去追求。所以, 尽管人们有无数的例子说明现实的不完美, 但在这些经济学家、这些年轻人年长人看来, 所有这些例子加起来都不足以证明人们就不应当追求完美, 不足以泯灭他们的完美之愿。因此, 不管饱经世故的过来人如何苦口婆心劝人现实, 每个时代照样有自己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同样, 每个时代都有经济学家醉心于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即使像马克思那样对其所经历的经济制度抱着强烈批判态度的学者, 也都要想象出一种类似实验室的理想状态来分析它。

一般均衡和爱情的第二个共同之处, 就是都把参与者的自由平等当成自己的前提条件。两位自由平等的异性之间才能谈得上相爱, 这个道理无需赘言。所有人互相之间的自由平等才能够实现一般均衡, 亦是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一个人如果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应用自己的资源, 他自然试图改变: 而这便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系尚未均衡。一般均衡和爱情的真谛也许都在这里: 它不但不要求, 而且拒绝为了集体、为了公众或者为了其他名义而放弃个体的自由与平等。遵从父母之命、按照组织要求可以结成婚姻, 但无法产生爱情。同样, 根据集体需要、考虑大局利益可以达成稳定, 可不能实现均衡。爱情不可能因他人的命令而产生, 个人配置资源的愿望也不会因他人命令而消失。从另一个角度说, 这样的自由和平等, 又保证了一般均衡和爱情的无害性: 它们不强制人们接受自己, 也就不会导致对别人对公众的

危害。追求一般均衡的人和追求爱情的人一样必须具有尊重他人的品质，必须摒弃强制手段。一个强制推行的经济计划会造成灾难，但它本身就不是均衡，因此不应当归罪到均衡上。一个强制的婚姻会导致家庭悲剧，但它本身便不是爱情，因此也不应当归罪到爱情上。

经济学和文学一样，靠着一批理想主义者的推动。文学永远离不开作家理想的爱情，经济学也永远离不开经济学家理想的一般均衡。人类所经历的任何现实状态都不完美，所以人类在自己生活、思考的各个领域都需要指引方向的明灯。在今天的思维水平上，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就是人类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明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均衡理论不是技术，而是理念，是我们每一个学习经济学的人都应当了解的那些理想主义经济学家的社会理念和人生理念在经济学中的反映。

（注：曾经在课堂讲解了一般均衡理论后，把它和爱情做了些比较。当时是即兴而发。有朋友听说此论，觉得有趣。这里虽然整理了想法，但自觉不如当时尽兴。是谓史不可追也。）

2004年3月31日

4. 文献引用规范谈

从我开始评阅论文起，我便采取了先看文献、后看内容的方式。若干年前我被分发到两篇参加上海市优秀论文评选的文章。这当然都是各高校已经精选出来的论文。但我一翻文末，没有列出参考文献，立即便否定了。自然，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被分发到这类潜在的优秀论文来评审。记得三、四年前，评阅一份西方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一看列举的参考文献全是中文文献，于是立即退回，并附上增添至少10份外文文献的要求。过了几天，论文初稿又送来了。果然后面的参考文献页重新贴过，加上了似乎不止10份外文文献。但仍然被我立即退回，理由是只有在正文中引用过的文献才能够列在书末的参考文献内，请作者把所列的文献相应地引用到正文中。自然，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读到那篇论文初稿，据说是另请高明评阅而且通过了。

不过，说到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我自己也有愧。20多年前，当我写那篇“论服务业资本”文章时，我也是简单地把文献列在文末，而没有在正文中注出。不管今天可以举出多少原因来辩解，但欠缺总是欠缺，错误总是错误，是只能请求谅解，而不能指望世人不知不晓不笑的。因此，现在写作各类学位论文的人，为了避免未来出现有愧的心情，现在就避免类似欠缺或者错误才好。而我作为评阅者的责任之一，也就是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是否还有斯大林，一时记不清了）的话，要用黑体字印出来。而其他语录、资料的引用，好像是不特别标出的。我注意到学术作品引用文献的规则，是在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时候，于是想模仿，才在那篇“论服务业资本”后加了参考文献（那时写论文是无需参考文献的）。以后转学西方经济学，慢慢摸索出了写学术文章的规范，也以为在学外国好的东西。后来和孩子一起读中国古典文学，读到《镜花缘》内多九公和南洋某国一女子就《易经》争强斗胜。多九公知道99种《易经》的注，而那小女子竟然晓得130多种。当时便感觉这文献引用，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后来再读旧版“唐诗三百首”，读其他中国早期作品，才知晓“无征不信”、“无一字无出处”的古训，体会到以往中国学者对

文献注解和引用的重视。我不敢肯定西方学者后来对参考文献的规范是不是从中国学得的。但我基本上能够确定，我们今天往往愤愤然地接受的这一“国际惯例”，至少100年前还是中国学者不言自明的做法。100年绕了一个弯。要不是西方人把中国这个传统继承下来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传统坚持下来，我们为和国际接轨而不得不再进口，中国学者重视文献的传统，乾嘉学派的传统，恐怕一去不返了。

不管是愤愤然还是心悦诚服，我所读到的论文，大部分在文献引用上已经很规范了。但前两天评阅一篇博士论文，却又发现了不少列出的文献没引用、引用的文献没列出、语录、数据没有出处现象，于是有感而发。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要证明自己，所需要的可能不是他提出的新观点和了解的新知识，而是他知道了做学问的规范和思考问题的学术方法。这就和舞蹈学院毕业生举手投足便显出受过专业培训一样。否则的话，博士学习就失去了意义。有一位退休经济学教授对我说，原来他们写文章从来不加文献出处的，所以他们的学生这方面有所不足，也许可以原谅。这位教授对学生的心情值得理解。但从我们今天做学问的角度说，有鉴于此，反倒更不能原谅自己，在文献上更加注意才对。

2004年5月26日

5. 还是说一说好

——对“不说也罢”朋友留言的一些回应

不说也罢：

朋友，“不说也罢”有时很必要，但有时又必须说。你说出你的感觉（即使不算观点或者成型的理性思考吧），就能够逼使别人把他的想法明确起来，因为一个人的想法使别人感觉不好，这个人就得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出你的感觉，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读了崔之元评论朗咸平的文章，你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你到底相信谁？在你还无法相信自己的时候，你确实有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你能够相信自己了，你才能够对纷纭的众说做出判断。这就是古人说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要的是思考，而不仅仅是阅读。最重要的是思考。我在和学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这一点。在相似的年龄段，我读的书比我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少得多，业余时间也少得多，但我做了一些思考。所以，朋友，思考吧，不管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不管“舆论一律”的要求是不是限制你发表和交流你的思考结果。要明白，只有思考后才能够知道你有没有值得发表和交流的思考结果。

联系到你的问题，我想说一说的是：

1. 都是国外的理论？

问题是，我们有中国的理论吗？如果有，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我们需要中国的理论吗？如果需要，那么印度、越南、坦桑尼亚是不是都需要他们各自国家的理论呢？

自然，这牵涉到对理论本身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呼吁中国理论、中国经济学，本身便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占世界的人口比重，考虑到中国的重要性，如果一种理论不能够在其框架内解释中国的基本事实，这种理论可能从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理论。就此而言，在欧美出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理论，就

有了一个应用到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等主要民族、主要国家的问题。如果它们在其中任何一个主要民族中失败，我们就有必要突破它们的框架去设想新的理论，或者得承认一种过去赞誉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存在。但这里的问题是：

a. 我们了解在欧美出现的那些理论吗？

b. 我们会应用那些理论吗？

c. 我们即使了解/会应用，但结果肯定是五光十色的。于是：我们的结果丰富了还是突破了西方的理论？

这里不需要民族主义。如果一种理论在中国最早出现，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应用于全世界；同时，别人也是这样的愿望。这都无可指责。某一个确实正确的理论总是由某个人创立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个理论只能由中国人创立，就像欧美人、阿拉伯人也没有理由要求某个理论只能由他们民族中的某个人创立一样。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里，欧美人形成了自己的所有权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管理的理论。无论从晚清算起，还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算起，中国人努力了很长时期，还是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理论？在二十世纪后，人们必须熟悉世界上的现有理论，然后才能够讨论建立自己的理论。这就给中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熟悉世界。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创立理论时只要熟悉自己的历史就够了。当然，一个中国人熟悉了国外理论后，可能就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中国人特定的思考方式，也就不可能提出中国人的理论了。不过，我还是相信天才的存在。会有青年人把所有其他东西都抛在脑后，在基本熟悉了现有国外理论后，能够一下子击其要害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建立起同时能够解释中国和国外的理论，如果国外的理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想到，那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理论，我们中国人不应当用它谋取狭隘的民族利益。

2. 前经济学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太多地关注经济学入门后的问题，而太少关注前经济学的问题。其实，经济问题仅仅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就像对个人来说经济问题仅仅是人生问题的一部分那样。所以，经济学是以公认的社会准则、人生准则为前提的。正是在其基础上，经济学展开自己，并从而使在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问题的解决符合社会或人生的目的。

崔之元先生的文章批评的现行改制方式，就是抓住了工人和经理、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不平等，由于其地位不平等，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自由契约。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地位不平等呢？崔之元就不愿意多说了。比如从工人角度说，在中国是否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让工人有独立工会并且发挥作用，才能够算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崔之元的标准，美国的这个要求无疑是正确的。没有独立工会，工人和经理之间就不可能平等，他们之间的契约就不是自由契约。市场经济是以参与者的平等为前提的，没有工会，市场经济的前提也就不存在。

因此，崔之元的问题在于他不能够把他的平等权利观点贯彻下去。如果贯彻下去，那么，就要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够有独立工会，尤其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人的文化水平比起比如 150 年前的英国高得多。我们支持那时候的英国工人结社，为什么禁止现在的中国工人结社？崔之元说中国“中央政府还没有完全被利益集团所操控”，那么，有多大部分已经被利益集团操控呢？是不是中国不准工人结社就是因为中央政府被利益集团操控的结果呢？

其实，崔之元所说的美国的情况，说到底，是那里大体实现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前提，或者是经济学的前提，也就是这里讲的前经济学。无论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

系，他们能够规范经济的前提，是社会有一个使市场经济得以在公认社会原则和人生原则基础上运转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就是人的平等、自由和在良知前的自律，而这些东西又通过特别同情弱势团体的大众媒介的自由、通过公众的政治自由得到保证。因此，谈论国有企业在外国照样搞得好的时候，谈论国外也实行社会分红的时候，崔之元和我们大家不应当忘记那里大体存在着前经济学的条件：平等、自由和自律。如果崔之元在这些条件基本上不存在的情况下来坚持国有企业和社会分红，他得到的将是苦果。当然，这一点也表明，把国有企业问题、社会分红问题仅仅看成经济学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说到底，它们首先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我本来想不说也罢，可是仍然和你一样，还是说了一些。一个以自由/平等/自律为基础的经济需要大家说话。很可惜，“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是要珍视自由的人付出代价来争取和保护的，而“说一说”的代价实在不能算大。因此，朋友，还是说一说吧。

2004年12月9日初稿

2004年12月10日修改

附：[“不提也罢”先生留言](#)

主题：重提朗顾之争 (2004-11-29 22:56:16)

1. 经济学家们把我们都搞糊涂了，都是国外的理论，都是国外的资料，我们相信谁？2. 许多人都是在国外留学或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拿回一些资料，翻译出版，换回自己所要的职称、声誉等，他又凭借这些声誉去到处讲演、在课堂上指导学生，过着滋润的生活，但这些东西有可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们到底相信吗？<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403> 这是看了崔之元的演讲后的感觉。当然，对于能跟踪国外研究进行时的各位不在之列。

参见<http://www.hujia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6. 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

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开始于农村。

那是三十多年前，我在江苏省农村插队，田间劳动之余喜欢找几本书看看。那时的舞台上只有样板戏，书店里几乎也只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像《三国演义》、《啼笑因缘》等等都是“毒草”，禁止阅读。虽然我在农村偷偷地读过一些这样的书，但地下流传的这类书毕竟太少，满足不了阅读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我自然而然地响应起毛泽东“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读起马列毛的著作，并且非常认真地读。在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按照父母地位被分成三类：一类人不可再教了，一类人名为“可以教育好的”青年，第三类人没有专用名词，但显然是“根红苗正”、无需教育的青年接班人。我当时被划入“可以教育好”一类，心里很感动，毕竟不算不可救药的青年，于是读起马列毛著作特别虔诚。在农村期间，我从《毛泽东选集》，读到列宁著作，再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和《资本论》。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许多章节。正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阅读，我知道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且产生了兴趣。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经

济学，经济学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在禁止之列。而我当时既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经济学说存在，更以为像《三国演义》、《啼笑因缘》这样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被禁止阅读是最适当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很自然地接受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直到今天，尽管各种外国经济学说又一次传入了中国，我们仍然看到一些人持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经济学的看法。

由于我在没有教师、没有同伴、没有辅导书的情形下长期自学马克思经济学，所以我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因此，当我作为大龄青年于 1978 年走入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开始听教师讲授《资本论》的时候，我无法接受教师的正统理解：他们把《资本论》课程变成了一门寻章摘句的玄学和一字不易的神学！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看来，关键原因可能不是制度，而是那些教师不再是社会的贫穷者并且害怕成为贫穷者。我是在做着社会最苦最脏的体力劳动之余读《资本论》的，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资本论》是为穷人写的，因为《资本论》把社会问题归结为富有者统治的制度而不是穷人的不觉悟、不努力、不自救。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皆出身于富裕家庭，马克思凭着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即使今天在德国仍然是凤毛麟角的博士学位。他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富裕家庭。但是，马克思走了另一条路。在他写作《资本论》的时候，他是全英国（甚至全欧洲）最穷途潦倒的博士。据说，他的家里没有一个凳子或者椅子的四条腿全是稳的。不过，到他家的人只要和他讨论起来，就会忘记凳子的不稳。幸亏大英图书馆对读者完全免费并且把为读者服务视为图书馆的宗旨，否则马克思的抱负亦成泡影。当然，一个博士任凭家里极端贫困，不但不去找工作，反而天天泡在图书馆里，这样的人，无论在夫权制的中国，还是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都是难以想象的。马克思自然不愿意贫穷，但为了自己的抱负，在不得不贫穷的时候，他不惧怕贫穷。这就是马克思作为学者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孔夫子以来的若干学者所具有的素质。而今天讲授马克思经济学的教师，心里想着的往往是手中的饭碗和房子，最担心的就是陷入贫穷，自然无法理解马克思。

在大学里，我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现在是不是仍然能够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照说，我们现在知道的事情比马克思更多，资本主义在马克思身后的发展应当更加明确地显示它的本质特征，我们今天也比马克思有更多的经济条件：我们可以一边当教师一边研究；尽管还不富裕，但毕竟比马克思这样的社会闲杂人员或无业流民好得多；最后，研究马克思也许还会得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政府的大力支持。不过，唯物主义在这里大概不适用。例如唐诗宋词，后人条件再好也写不出可以与李白、杜甫一比的诗篇；所以，我们现在条件再好，可能也写不出《资本论》来。但经济学很像自然科学：没有牛顿、爱因斯坦，别人也会建立类似的物理学理论。不过，无论如何，一旦这个问题提出，我就被吸引住了。我需要认真领会马克思为什么那样地提出他的问题，为什么那样地重视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我那时的结论是，从学理的角度说，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验证他的历史哲学，让他的历史哲学落到某个实处。而历史又是人的历史。人演绎自己的历史既不是以一个一个的个体身份、也不是以全体人的身份，而是以人组成的不同团体出现的。这是因为，如果以全体的身份出现，历史便是人和不同于人的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如果以个体身份出现，两个不同人之间会出现许多种类的关系；在它们之中，哪一种关系可能对人类历史演化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本身就成为了非常困难的问题。避免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便是把人组成的团体视为历史演化的基本单位，把这些团体之间的互相作用视为历史演化的推动力。而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在所有团体中，抓住了两个团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是除了整体“一”之外的最

小整数，因此是最抽象的结构；比两个更多的团体则可能模糊历史演化的真实。但哪两个团体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最重要呢？马克思认为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他看来，社会一旦有了少量剩余产品，就需要少数人管理它们，人就分成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因为对剩余产品的管理本质上不是针对自然界，比如防止剩余产品被自然界损坏，而是针对可能对这些产品提出过分要求的人，所以，那些不充当剩余产品管理者的人，自然就成了被管理者，即管理者通过管理物而管理着作为被管理者的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透过人与物的关系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没有剩余产品，管理者无物可管，人与人的关系不通过物的中介，推动历史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剩余产品非常多，人人都有时间管，人人都成了管理者，这就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到那时，推动历史演化的又重新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他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关系。恰恰在人类既有了剩余产品、可剩余产品又不多的时期，人类需要分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通过这两个团体的关系，马克思便能够用一个统一的框架，解释人类脱离原始状态以来到今天的几千年历史。而《资本论》的目的，就是在这个框架内，解释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或者说通过解释他面前或者他被卷入其中的历史，来证明这个框架的可行性。

我在大学后期，中国经济学界正在争论服务业产值是不是应当计入中国的国民收入统计中。这本来是个实际问题，与马克思研究并不直接相关。但在那个年头，凡写文章就必须引用马列毛的话来支持自己，因此争论各方打的是语录战。这自然是官员作风在学界的扩张，因为官员必须遵循长官的言论。我无官之念，不受所累，虽然关心这场争论，但我更关心如何把服务业这个马克思没有专门考虑的经济活动纳入到他的《资本论》尤其是他的历史哲学框架内：如果我是马克思，我继续往下写《资本论》，我应当如何写关于服务业的一章。后来，我写了“略论服务业资本”的学士论文。在这篇论文开首，我写下了一句“作者的话”：“本文追求的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体系的一致。对可能得出的结论，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这是迄今为止自己写得最满意的一篇文章。我后来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并且特别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细化我在这篇论文内无意写下的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化，使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供应日趋减少，从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要环节”。这里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农业劳动力，而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些劳动力如何转移到资本主义的现代部门，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如何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内。当然，我的这篇论文有许多可以批评和争辩之处，而且又是在别人（即使是马克思这样被公认的大师）的理论框架内写成的，自己的创新实在很有限。

大学期间，我开始接触别种经济学，并且为了发展马克思理论而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因为我那时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各种知识的最高综合。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西方经济学为自己的研究生专业，以后我便在这个领域工作。不过，我对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兴趣从未降低。当然，又经过二十多年的读书，今天的我已经不再盲目崇拜马克思理论。在我看来，马克思理论是历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之一种。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和未来。但它又不是唯一的一种。它留下的空间足以建立起好几种历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就马克思理论本身来说，也有许多基本问题需要思索。比如，为什么一有了剩余产品，过分要求尤其是管理者的过分要求就出现了呢？剩余产品多到什么可以具体想象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度，一个人相对于他人的过分要求才会消失呢？如果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作为兽的动物特征就可以说明他的过分要求的话，那么，人要具有什么样的人的特征，才能够在剩余产品很多的时候失去

他的过分要求呢？马克思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经济发展程度或者剩余产品多寡。但近几千年来，人类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加，可人的不同于兽之特征的演变似乎在循环之中，以至于今天我们很难说人为人的特征就比 1000 年前高许多。再比如一个人会不会提出过分要求应当和他的道德水准有关。未来的不需要把人区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新社会应当具备的基础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这样的道德水准在新社会建立之前就应当基本实现，就像马克思本人强调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应当在新社会出现之前实现一样。可如果这样的话，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方式要为未来社会准备的，将不仅仅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而且也同时是很高的道德水准。但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全部道德看法就得改变。不过，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又比如，马克思把历史演化的主体更多地放在贫穷者或者被管理者团体上。可被管理者之所以被管理，除了社会原因外，也有个人的原因。我本人如果二十岁的时候在农村不读书，我今天更可能属于后来返回城市接着又下岗的知识青年之列（为什么称为“知识青年”？我们当时其实并无知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把自由散漫的农民训练为具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工人阶级。但要成为管理者，组织性纪律性是远远不够的：管理者最重要的特征是主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为被管理者考虑，尤其把被管理者的被动性完全归结为社会原因的理论是不够的。马克思自己能够从富裕家庭走出，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动性而甘愿落入贫穷；但人类新社会的希望可能更多地在于贫穷出身的人不但主动争取个人富裕，而且具有更广阔的社会主动性或胸怀。而马克思对缺乏主动性的被管理者的过分重视，也许造成了后来在他名义下建立的社会制度，都试图用压抑个人主动性的方式来确保缺乏主动性的一批人的利益，其结果则是这些制度无一例外地变成了一潭死水。因此，马克思虽然抓住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但他对这两大人群的基本看法却值得讨论。总之，马克思理论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理论，它启发我去深刻思索人类的基本问题。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重新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并且能够形成一些系统的想法，以回应马克思和像他那样的杰出学者对我的引导和启发。

2005 年 5 月 10 日

7. 人的经济发展

——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致词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了。

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简称，英文简称：IED）首先是个形式，它是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企业管理系经济学教研室的另一个名称。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没有这类形式和名称，学术照样发展，学者照常工作；有了它们，学术、学者反易受累。因此，我们一定牢记，研究所的形式和名称只是从外部警醒我们，我们的工作研究，是创造新知识；我们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发展，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应当落实在经济发展研究上。

广义地说，有人类就有经济活动，有经济活动就可以说经济发展。不过，通常所讲的经济发展的指的仅仅是一个社会从物质贫困到富裕的过渡。无论从世界整体来看，还是从中国来看，人类当前所处的阶段，在经济上还是狭义的经济发展阶段。今天，尽管极少数人享有奢华、部分人已经富裕，但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有很大一部分人依

然生活在贫穷中。世界的富裕，中国的富裕，并不体现在大城市繁华和海滨别墅，而体现在农民富足和乡村风格上。后者还远远没有实现。人类从工业革命开始已经为经济发展努力了 300 年。许多大思想家、大历史学家都曾经以为这个阶段即将完成。但在公元纪年第三个千年的起点上，在经历了无数欢乐和悲伤、激情和颓废之后，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眺望，既清楚地看到了人类新阶段的曙光，也清楚地明白为了太阳的喷薄而出，我们仍然需要在熹微的晨光下再努力 300 年，仍然需要经历与挺住新的悲伤和颓废。

然而，经济发展也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方面。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人类整体来说，经济活动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却也只是人许多活动中的一种活动。猪“巧妙”地利用人而实现了食住无忧的富裕生活，在地球上（甚至很快会在月球上）繁荣了自己的种群。人类如果只是追求猪般的经济富裕，造物主就白白地创造了人。人是能说话、会写字，能思考、会喜悲的特殊生物。如果没有人为希腊神话或哲学感叹，没有人因中国唐诗和宋词动情，没有人继续说出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美丽幻想，那么，即使人类富裕了，人类实现的也只是猪的欲望。所以，人的物质富裕只有和人在政治、文化、科学、情感、操行诸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也才能够实现不是猪而是人的经济发展。正是由于此，我们在重点研究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但注意其它经济学领域，而且注意人类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注意哲学、历史学、自然科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法学、环境学等诸方面的发展。

虽然经济发展本身不能导致人超越动物；但是，没有经济发展，人又不可能超越动物。人走出森林后（世界上至今仍有一些民族没有走出森林！）再走出维持生存状态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经济发展。在社会分工中，我们幸运地获得了把自己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研究的机会；而尚未成熟的经济发展理论，又给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的广阔天地。例如，人类还没有公认的经济发展的基准模型。医生应用健康人的理论模型来观察现实的人，我们观察具体经济发展过程时却缺少类似的基准。当欧美国家处在经济发展阶段时，经济学本身还不发展，一般均衡和经济增长理论尚在襁褓；当经济学走向成熟时，欧美学者却又很难体会到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因此，置身于经济发展阶段中的我们，有着更多的机遇。在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我们发挥自己能说话、会写字，能思考、会喜悲的人的正常功能，就能够在认识到经济发展意义和局限性的前提下，为经济发展理论、为人类脱离贫困做出刻有个人印记的工作。

2006 年 5 月 10 日

8. 《农民经济学》译者后记

弗兰克·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是我在德国时读到的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教科书。这本书的特点首先是简明、清晰，其次它不用复杂的数学推导，而主要依靠文字阐述，并辅之以图形和简单数学公式，因此它不但适合于经济学尤其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学生，而且适合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以及关心农民状况的一般读者。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不但介绍了利用新古典价值观念和理论工具建立的各种农民模型，而且大量介绍了从马克思的价值观念与理论工具出发的农民研究以及对这两

个理论的批评。这和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经济学教科书仅仅介绍马克思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或者新古典观点不同。因此，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不但会给读者更加广阔的眼界，而且会给读者理论相对性的感觉。后一种感觉也许对我们中国读者更加重要，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某一种理论“绝对”正确的气氛中，习惯了对某种理论的“独尊”。其实，一种理论再正确也有其相对性即局限性。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即使我们还不能确切指出一种理论的相对性所在，即使我们衷心拥护那种理论，我们也能够抱着开放的心情看待对那种理论的批评和对其他理论的支持。

农民问题无疑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观察农民的生活、生产、他们对外界的态度、对自身未来的预期的时候，在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论工具。这就像我们观察自己的心跳、观察太阳的升落需要理论工具一样。西方学者为我们理解农民问题提供了新古典、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学派的理论工具。也许这些工具已经足够，也许这些工具还不够。可无论足够还是不够，我们应当做的是熟悉这些工具，熟悉农民生活的环境，然后才能谈得上用前者解释后者，或者发展新的理论工具来解释后者。

关于本书的翻译，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本书以《Peasant Economics（农民经济学）》冠名，以 peasant 为研究对象。英语词汇 peasant 一般翻译为农民，但它也有某种农奴的含义。虽然 peasant 是种田人，可这个种田人有一种被迫种田、被别人管束着种田的感觉，因此社会身份低下。这就使它在英语语言中成为贬义词。英语词汇 farmer 有更多的农业工作者或者类似制造业工人的种田人含义。不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语言里的农民也是贬义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里，农民事实上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名义上甚至事实上不再是农奴。

但 peasant 中文翻译的主要问题在于中文存在农民和小农两个概念。中文为什么产生了两个对应于 peasant 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什么联系的问题值得写一篇博士论文。就我们的语言习惯来说，“小农”似乎更像马克思主义的专用词汇，而“农民”则广泛用于其他场合。比如我们说小农经济、小农生产方式，但很少说农民经济、农民生产方式；我们说农民收入、农民决策、农民家庭，可很少说小农收入、小农决策、小农家庭。在中文里，“小农”比“农民”的贬义性更强。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小农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占领所有社会生产部门而消亡。所以，peasant 不但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身份，而且代表了已经过去的历史。小农的历史已经终结，尽管小农还存在着。这种态度促使 20 世纪上半叶受马克思理论强烈影响的中国学者把 peasant 翻译成小农而非农民。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小农经济（peasant economy）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罪为每日每时产生市场经济的肥沃土壤，又在改革开放时期被视为市场经济难以发展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农民”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即使有贬义也十分淡薄，“小农”则不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最近五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种田人”的理性，即使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他们也是理性人。考虑到本书同时大量介绍了新古典农民模型和农民研究，把 peasant 翻译成“农民”对本书而言似乎更合适一些。

对我的翻译来说，小农和农民两个概念并存是中文中的一个事实，我必须面对它。一方面，翻译《Peasant Economics》需要为 peasant 这样的核心词汇选择一个统一的中文对应词汇，另一方面，中文中又存在着两个对应词汇而无法统一。对这个矛盾，我最后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尽可能把 peasant 译成“农民”，而在明确利用马克思框架讨论 peasant 时把它译成“小农”。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引起一些混乱。对此，在向读者表示歉意的同时，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始终记住农民和小农在本书英文版中只是一个词。

本文的翻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匿名审稿人仔细审阅了译文初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使现在面世的本书避免了很多错误和缺点。对此我十分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任俊萍编辑为本书的版权、翻译和出版付出了大量努力，并对我的拖延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值得我衷心感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翻译了本书第六章。虽然我后来重新翻译了该章，但他的译稿给了我许多启发，毫无疑问地节省了我不少精力。宋开生先生不但为译文编制了图形、目录和文献，而且指出了译文中许多不当之处。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都出身于农家，我接触的许多学生、同事也出身于农家，我自己则在年轻时脚踏实地做过近十年农民，因此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常常在一起讨论农民问题。这些讨论不但促使我翻译《农民经济学》，而且也让我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感受到中国农民的背景。我希望这本书的翻译有助于提升我们讨论农民问题的层次。译文肯定还有许多错误和欠妥之处。它们是我不够尽心或学识不足所致。我诚恳欢迎读者的批评和指正。这些批评和指正可以直接发到我的主页 www.hujingbei.net 或者寄给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5月28日于上海

9. 经济学教育和数学

在2006年7月3日晚上举行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圆桌会议（上海）上，经济学学习和数学学习的关系是听众席中的学生们最关心的事情。一位不知名的女同学向前排就座的老师们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一个数学系毕业生和一个经济学系毕业生报考你的硕士研究生，你选择谁？各位老师的简短回答不同，但占上风的意见是选择数学系毕业生。我本人的回答也很简单：我问经济学系毕业生三分钟问题，例如什么人 是农民，如果她/他的回答逻辑很清楚，我便录取他，否则便录取数学系毕业生。

我的理由也很简单，经过数学系教育的学生大多概念明晰、逻辑清楚、推理严密，往往不必专门考察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经济学教育常常不能够训练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对经济学系的学生，需要个别鉴定。

那么，正像另一位同学的问题那样，我们学习经济学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我首先要了解的是，你学习了经济学吗？可能你没有学习到经济学，尽管你在经济学系待了三年（参加会议的许多学生刚刚结束了本科三年级的学习）。几年前，我就要求我的研究生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在本科阶段学到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尽管在名称上他们也许学了经济学，但在实际上，他们进入的更像是“宣传教育系”。我自己在25年前就有这样的经历。在经济学系本科阶段，我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因为我没有学习到概念定义的本领，没有学习到逻辑推理的能力。我学习到的仅仅是我必须说它正确或者错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仅仅是牵强附会的概念诠释，仅仅是不允许批评谴责的温室里的观点。今天，还有一些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处境类似于我25年前的经历。同时，许多大学经济学系尽管引入了西方经济学课程，并且不再边讲授边批判，但它们的整个课程体系仍然建立在传统思维模式上，在其它系科作为政治课讲授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系里仍然被列为“经济学”课，各种必修课、选修课仍然强烈地带有政治课的色彩，被强调为经济学系特色的经济史、经济学说史课程仍然保持着过去的面貌。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一位经济学系的学生以课程学习作为训练自己的内容，那么，他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原因是他误以为自己学习了经济学，而其实没有或很少学习。

其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掌握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你还不习惯从实践中提炼出含义明确的问题，也许你对社会现实或者历史还感到难以把握，也许你对许多经济问题还理不清思路。这都不要紧，对一个本科生来说，这些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你不具备逻辑思维能力，那就要紧了。例如，如果你从农村来，你知道在田头干活的人算农民，或者从农业获得主要收入的人算农民，但村干部算不算、不定期做小工的算不算，也许你不清楚，你在贯彻你的逻辑时犹豫着，这都不要紧，只要你的思考有逻辑就行了。如果你一下子跳到农村人都算农民，你用九亿农民的统计数字来回答，那就要紧了：你不会逻辑地思考，你不会分析。

再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具备批判和反批判的科学精神。这里的意思是，你已经明白，除了逻辑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护你的或者其它人的思想和观点。有人也许会说历史事实可以保护你。然而，历史事实可以用各种理论来解释，今天被当成证明某种理论的不可辩驳的史实依据，明天却会被认定为人类的一时糊涂，反而证明了其它理论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论。如果你读读斯大林的著作，你不难发现这些。所以，不要相信任何政治权力、任何个人暴力、任何世俗风尚、以及在你眼前显现出来的现象，它们都不能保护你的思想。因此，你必须学会严厉地批判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的“经济学”教育给你的专制教育，也才不会把心得体会当成研究，并能够和数学系学生走到同一起跑线上。

所有人都知道，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思想和观点也不一定非得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许多经济学著作、论文是非数学性的，许多经济学名师很少用数学。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情况下，学习用数学语言表达比学习用文字表达更容易。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即使用文字，一个人也得具备科学素质，也得讲求逻辑。没有逻辑，你的“观点”最多只能算思想的火花，你只能够发议论，写心得，但你不能够形成观点。中国从事传统“经济学”教学的教授很多，他们议论更多，那么多书籍、杂志上都是他们的议论，但是他们有什么观点吗？没有！为什么？就是他们的思维缺乏逻辑，所以他们也才需要其它东西来保护自己。因此，经济学系的学生如果不通过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学习来训练自己的逻辑能力，他们必须通过其它方式来训练自己。可是，在现有教学体系的约束下，在缺乏敞开讨论的个人习惯和社会氛围的情形中，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和作为其前提的数学学习倒是更可行的训练方式。

如果一个本科生准备继续深造的话，数学学习是少不了的。数学是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主要语言之一，其重要性在许多场合甚至超过了文字。就算一个本科生毕业后立即走上社会，在工作中很少用到数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数学学习也不可少。这里的原因首先是数学和经济学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一个人要做好任何高级工作都必须具备这一能力。其次，学习了数学，你容易体会到经济学的美，体会到科学的含义。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至少是比较接近科学的学科，但是，不懂得数学，你不会体会到经济学的科学性，你很难获得科学素养。而这一素养，是现代人的必备条件之一。

当然，即使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贯彻了“教学自由”的理念、即使把中国经济学系的课程体系转变到分析和可证伪的科学基础上，我们也不能期望每个经济学系的学生都懂得逻辑和分析，可我们会看到一个基本面的改观。到那个时候，特别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会相对降低，强调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会提高。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再一次面对那位不知名女同学的同样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将分别问数学系和经济学系的毕业生三分钟问题，然后决定录取哪一位。

2006年7月11日

10. 提高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的若干体会

libby1120:

你好！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挑战。这件事，说起来容易，提出其重要性容易，但如何做，很难。我想说一下自己的一点体会吧。

1. 严肃的学术态度。不要想过得去行了，不要想别人还不如自己，不要想自己已经够努力了。一定要想到，自己拿出来东西应当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能够经得起一些锤打。

2. 读名篇名著。质量平平的文章读多了，只会让自己堕落，因为自己有意识无意识地会把它们当参照系。所以，读名著、名篇。读多了，有意识无意识就会受到熏陶，会把它们当参照系，对自己的要求包括逻辑思维的要求自然也高了。

3. 理出名篇名著的逻辑体系。比如，它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从什么角度着手解决，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这里，它们提出问题和从什么角度着手解决问题，可能和逻辑关系不太大，但它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得出结论的过程，就是一个逻辑的过程。由于它们是名篇、名著，即使它们同样存在某些根本的问题，但它们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它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上，它们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是强的、顺的，其中的逻辑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辨别出来的。通过整理出名著、名篇逻辑体系的方式，熟悉经济学大家的思路，也就等于熟悉了逻辑，训练了自己的逻辑能力。

如果整理不出那些名著（包括名篇）的逻辑思路，那么首先找自己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形下，自己还没有理解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提醒自己思考缜密。一是为了理解那些大家，二是也可能发现大家的逻辑问题。

4. 从名著出发继续推论。把名著逻辑理清后，顺其逻辑继续推理。重要的理论，创建者都是提出了“内核”。我们可以假设内核成立，即这个理论的基本命题成立，然后从它出发，进行推理，从而得出新的结论。当然这大都属于“外围”的结论。可是，它也非常有意义。它不但是我们应当做的工作，同时也是训练我们思维逻辑的工作。我自己年轻时研究马克思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直接从马克思出发向外推论，把注意力放在推论的逻辑上，而很大程度上避免研究工作首先遇到的出发点或研究角度的问题。

5. 思考要彻底。思考一彻底，你就有了坚固的基础。从那里出发，你就容易展开逻辑思路，逻辑过程就会清晰。如果不彻底，下面的逻辑就无法顺清。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名不正，言不顺”吧。这一点，也是要提醒自己的，一直到自己无意识地就能够彻底地思考问题为止（就像足球先生无意识一抬脚就能够射出漂亮进球那样）。

6. 培养做人要彻底的人生态度。要达到思考的彻底，首先是自己做人要彻底。男子汉大丈夫（指的是一种做人风范，而非男女之别），敢说敢当，敢吃苦敢投入。思考是件辛苦的事情。即使一个人有思考的乐趣，他常常也必须承担思考的辛苦。其次，思考能否出成果，是无法预知的，因此，思考的投入风险非常大：往往根本得不到明确的产出。再次，在中国目前学术尚不自由的环境下，思考即使出了成果，也有无法发表的问题。有位研究生对我说过，有些问题即使思考出来也不能够发表，那么思考有什么用呢？这里就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我自己研究马克思的文章，一直到差不多二十年后我决定公开发表时，给《中国社会科学》，当时他们迟迟难以决定，让我等。我提出不为难他们，撤回。其实，如果中国不改革，我的文章在中国永远发不出来，因为仅仅那句“作者的话”，就通不过“审查”。但我没有畏惧这些，自己把

理论搞清楚、自己对自己满意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年轻人，比如你吧，比我同年龄时不知多读了多少书。我的感觉，一些同学的问题是思考不彻底，而这种不彻底既和他们没有把学术当成生命，当成人生来看，也和他们对自己人生本身看法便不彻底有关。

7. 思考问题的纯粹状态，如果单纯就学术问题谈，那么，思考的彻底就是思考到问题的纯粹状态。用经济学的语言，思考到均衡状态。首先设想某种均衡状态，研究该状态下的情形，得出均衡状态下的结论，由此出发，逻辑就容易展开，思路容易理顺。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设想出均衡状态。均衡状态搞清楚了，不均衡的情形分析起来就有了逻辑。

8. 训练想象力。均衡不是实践，均衡是想象的产物。就像在中学学物理学，小球在平滑平面上直线运动的试验永远得不出均衡状态，因为实验室永远不可能做到无摩擦。所以，物体在理想状态下运动是种想象。对一个问题，训练自己想象它的理想状态，然后从理想到现实，你就会有逻辑。如果不能够想象理想状态，逻辑就永远顺不起来。就我对马克思的研究来说，生产和消费如何区分，分不出来，逻辑就顺不下去。当我后来想象出一种干脆利落的简单状态“生产是人的劳动物化，消费是劳动产品人化”后，我知道自己思路通了。其实，均衡或者理想状态是简单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敢把世界或者生活想象得那么简单，总是担心自己漏了什么。在中国经济研究上这一点特别明显，所以我们很难把中国问题一般化。在训练想象力方面上，自然科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教训，你不妨读读自然科学史和那些大科学家的回忆录。

9. 保持对自己的批判态度。我们应当把自己置于始终的学习过程，把自己的工作始终当成某种练习，从而保持对自己的批判态度。这里的批判态度，在实践上也就是详细检查自己思维是否逻辑严密的态度。

10. 写出通顺、流畅的文字。一些同学的文章，往往从一句话、一段文字突然跳到没有直接关联的另一句话、另一段文字。粗看上去是文字不通顺、不流畅，实际上很多是缺乏逻辑、思路不顺造成的。经济学仍然大量需要文字语言。如果你注意文字的通顺、流畅，在大部分情形下，你就同时注意到了文章的逻辑。

11. 参加辩论和讨论。我的《经济学教育和数学》短文强调了数学对增强逻辑思维能力的作用。现在许多院校经济学专业开了大量数学课。不过，经济学专业的同学和朋友如果不自觉地把数学的严格思维渗透到经济学思维中，而仅仅把数学当成经济学的工具或者语言，那么，数学学习的作用也不会很大。至于把数学当成一种必须完成的负担的同学，那更是等而下之，不必提及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所谓逻辑能力决不仅仅是经济学方程、模型运算推导的严密。严格地说，那不是经济学学者的工作，而是数学学者的事情。经济学所需要的逻辑，是对经济学概念的严格定义，是对经济关系的严格和有序把握，以及在必要时把这样的把握用数学形式表述出来。对此，主要限于推导、解题的数学训练的作用又是有限的。经济学家圈子里所说的“tell a story”（讲故事），就是为数学推论找出经验背景。而对经验背景的把握需要我们具有清晰的思路和梳理经济关系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但要重视自己的数理逻辑能力，而且特别应当重视自己的一般思辨能力。提高思辨能力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参加辩论和讨论，畅所欲言的辩论和讨论。不要顾忌讨论环境的好坏。关键是自己的坦然，一切为了搞清问题、理清思路，自己的问题和别人的问题，自己的思路和别人的思路。任何辩论和讨论的意义都在于批评。没有批评，辩论、讨论便没有价值。在讨论中，承认对方的并希望对方也承认自己的出发点、思考角度有合理性，以便把讨论集中在逻辑有无破绽上。

一下子说了这么多，我自己也没有做好，只是和你共勉，并且希望你和其他网友多提意见。

2006年8月10日

附：

libby1120 的信 (2006-8-6 16:19:01) 请教：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胡老师，您好！

看了您的《经济学教育和数学》一文，很有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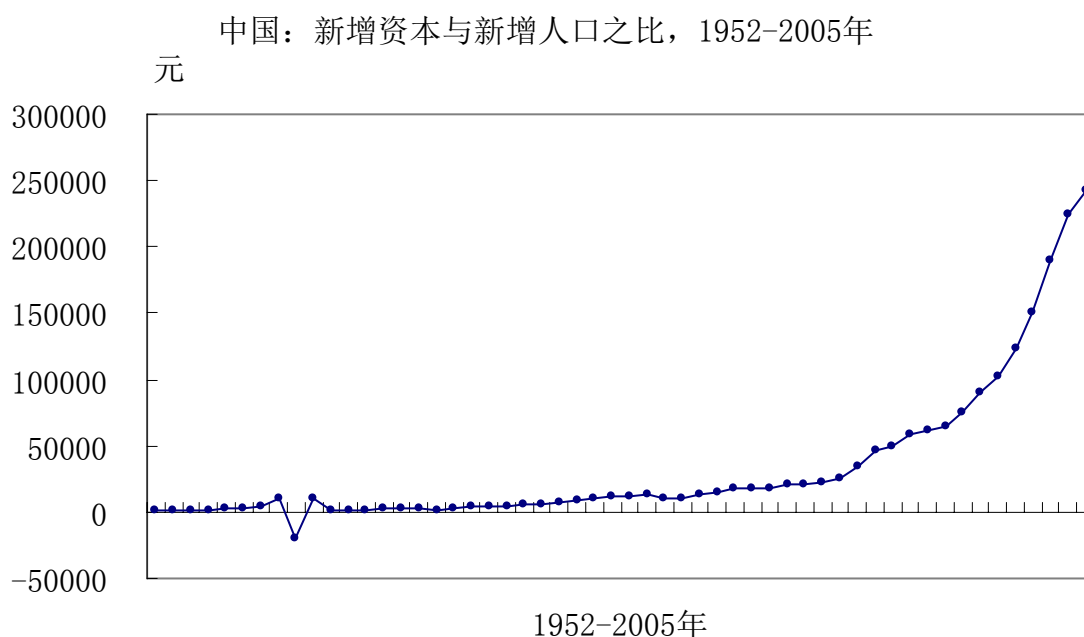
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我虽一路经济学专业学过来，可一直未受逻辑思维这方面训练。现在刚读到博士，感觉自己是经济学思想上贫瘠（不及学思想史和哲学的同学思想深刻），且数学工具掌握得平平（远不如学过数学分析和数理专业的同学逻辑性强）。

我很想努力提高，可也有些迷茫！请您指点！谢谢！

参见<http://www.hujia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11. 中国经济起飞：认知和感悟

经过多日努力，我的朋友和我计算出了 1952 年到 2005 年中国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的比值，并绘出了它的坐标图：



看着这张图，我不仅激动，我甚至感到了惊心动魄：首先，1952 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每个中国人拥有的资本几乎没有变化，中国经济竟然延续了几千年来的停滞特征！关于 1952 年以后中国计划经济的一切美好词汇，在这条简单线段面前都变得令人惊撼地苍白无力。其次，经过多少年的苦难、波折、彷徨和挣扎，我的祖国的经济，终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起飞了。我们还没有 1952 年以前的系统数据，因此这张图还只能从 1952 年开始。可是，如果我们打开眼界，中国早在 150 年前就开始了现代化的努力。中国工业从 1860 年就起步了。1860 年后三十年洋务运动的工业创业，1910 年后近 30 年“民族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工业建设，1958 年“超英赶美”大跃进的

尝试，1978年“四个现代化”建设，都试图造就中国经济的起飞。我们中国人的努力不可谓不勤，可努力的效果却又不可谓不低。我们的图形显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就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国为每一个新来到世上的中国人所生产的财富，还没有明显超过遥远的祖先。事实上，就在今天大部分活着的中国人亲身经历过的1981和1982年，那么少的财富竟然还绝对减少过！幸运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彷徨挣扎的中国经济终于像飞机摆脱了地心阻力那样，坚决地离开了地面，起飞了！

我们知道，资本是人生产出来但没有立即消费的产品。资本可以用到新的生产中，提高人的生产率。同时，资本也是人类的财富。一个人收入高低和财产多寡是两回事。一个人把收入省下来才有了财产。同样，一个国家的总产量和总财富也是两回事。一个国家把产量省下来将形成国家财富（注意不一定是政府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也许会很高，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可能花光收入，而没有留下财富。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出现过许多次。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初期，人均收入提高很快，可都没有积累起财富，因此都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如果不考虑政府滥用的话，那么，人类也许有一种生物学本能，会利用更多的收入扩大自己的种群。因此，经济起飞的条件在于，如果收入增长不能远远超越人口增长的话，人类就必须淡化自己的繁殖本能，而把更多收入用于增加现有人口财富。后一个条件十几年前在中国出现了（尽管以悲剧形式出现，但中国150年的经济发展本身何尝不是悲剧多于喜剧呢？），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一起，在新的生产方式下，造就了中国经济最终的起飞。

我们计算的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之比，不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和富裕的最好指标。总资本和总人口之比更加恰当。可是，我们缺乏总资本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之比能够让我们合理地想象全体中国人平均富裕或贫困程度。如果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比很少变化，那么，我们很难想象每个中国人平均拥有的财富会提高；如果前者像十几年前开始的那样强劲升高，后者也必定随之升高。就此而言，我们的图形不但揭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也揭示了中国向着大众富裕方向的起飞，义无反顾的起飞。

事实上，我们自己就见证着中国财富的猛烈扩张。早在1848年，我们当时的先辈在中国刚刚看到但顽强拒绝资本主义文明的时候，马克思便惊叹，不到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比以往一切时代人类（包括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总和还多。今天，同样的奇迹展现在我们眼前。仅仅二十年前，有谁想到遍布中国大地的高速公路、有谁想到普通人的飞机旅行，又有谁想到农民因为劳动力太贵而购买收割机？中国人在最近二十年创造的财富，令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瞠目结舌。以平等、自由为基石的市场经济，在古老的中国再一次像魔法师一样变出了人们在过去无法想象的巨大财富。

今天，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他的年代已经走到头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用人均财富和富裕民族相比，中国还很穷；我们也知道，即使今天最富裕的民族也富裕得不够。中国经济发展走过了150年。在这期间，我们曾经狂热地赞颂过大清王朝的中兴、计划经济的成就。可我们的图形显示，那一切不过是我们在旧框架中试图起飞的无望挣扎，今日的中国才真正摆脱了千年的停滞。在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巨大转折同时，我们又应当认识到中国经济离开富裕还很远。用飞机升空来比拟，如果飞机在10000米的高空才能够平稳飞行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虽然起飞了，它的飞行高度也许还没有到达2000米。尽管它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地面，但是，它还有很长的升空路程要飞，它的飞行员和乘客还在骚动之中，它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对待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庞大财富。升空中的飞机比停留在地面上危险得多。因此，为了完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作为飞行员和乘客的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需要的都不是颂歌，而是

平等、自由和自律，是基于它们的理性讨论与决策。

(注：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比的数据以 1978 年为基期。具体计算方式为(新增资本/新增人口) = (投资/新增人口) = [(投资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增长率×人口)] = [(投资率/人口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人口)] = (投资率/人口增长率)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投资率和人口增长率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没有扣除投资中包括的补偿折旧部分；没有考虑外汇储备。)

2006 年 11 月 29 日

12. 谈谈读经济学原著

2007 年 11 月 23 日《经济学消息报》刊载的王建林、杨茵写的文章《数学：令经济学迷失的信号？》(以下简称“王建林文章”)，对数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个关系上，各位学者的看法不同是正常现象。我基本上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我尊重他们的看法。这里，我想对该文提到的少数事实做点澄清：

1. 王建林文章谈到“考纳德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也谈到数学功底很好的“新古典理论家古诺”，并且认定古诺是早于瓦尔拉斯在世的人。事实是：如果文中的“古诺”指的是《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的作者 Antoine Augustin Cournot，那么，“考纳德”和“古诺”是一个人(该书中文版把作者姓翻译为“古诺”)；如果“古诺”不是该书的作者，那么，在早于瓦尔拉斯在世的大名为“古诺”的许多人中间，经济学说史专家至今没有发现有谁写过重要的经济学作品。再次，早于瓦尔拉斯的时期，还不存在“新古典理论”，也不存在新古典理论家。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的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之区分，并不在于是否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

2. 王建林文章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视为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论著之一。事实是：刘易斯在二元经济模型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著作《经济增长理论》都没有使用数学方法。

3. 王建林文章说到“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索洛和罗曼的经济增长模型”。事实是：索洛模型在 20 世纪 50 年代便已经提出并在 20 世纪 50 与 60 年代已经得到热烈讨论。

4. 王建林文章在谈到瓦尔拉斯时说“对于魁奈和古诺提到的经济学想法，瓦尔拉斯再重复一遍没有任何意义，他要想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有靠他的应用数学的技巧，事实证明在这方面他要比古诺优秀”。事实是：a. 就经济学说史上常提到的“古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其人而言，古诺在数学技巧上比瓦尔拉斯优秀很多很多：前者是理学博士和数学教授，后者顶多是个业余的数学应用者(而且在其思考和写作流传至今的思想时，还是一个生活艰辛、家庭负担沉重的经济学和数学的业余爱好者)。b. 瓦尔拉斯的经济学想法是魁奈与古诺没有意识到的：把“物以稀为贵”的常识转变为经济学的交换价值理论——交换价值的原因是物品的稀少性。他从两种商品的交换讨论到多种商品的交换，解释交换中出现的交换比率如何最终地决定于一个人对能够直接满足自己欲望的各种商品所感觉到的稀少性的差别。这样的想法，魁奈没有、古诺没有，在 1870 年前后仍然坚持当时的价值理论已经完美到不

可能进一步发展的约翰·穆勒也没有。因此，瓦尔拉斯是经济学想法的创造者而非重复者，是一位经济学家而非数学家。c. 瓦尔拉斯提出的一般均衡，只是他对自己的价值决定想法的论证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在他那个年代（以及在我们自己的年代），许多人论证自己的或别人的价值理论时，举出两种商品交换的例子就算了。例如瓦尔拉斯同时代的杰文斯和门格尔。但两种商品的举例显然不够。瓦尔拉斯向前走了一步，解释了在多种商品的情况下，交换比率的决定如何取决于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稀少性的感觉。这样，他的价值理论在他自己（和在我们）看来才完整。但在讨论多种商品的时候，如果仅仅用文字，他是说不清楚的，因此他采用了数学语言（他对数学的兴趣自然也是原因之一，不过，在他之前与之后的许多学者，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不管对数学有没有兴趣，似乎除了武断的声称外，并没有人去尝试用文字说清楚多种商品情形下的价值决定问题）。

上面列举的四个事实认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王建林文章的两位作者没有读过有关著作。其实，古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1954年的论文，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魁奈的《经济表》、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都有中文翻译，翻译的质量都不错。如果两位作者读过这些作品，那么，无论他们对这些作品以及这些作品之间的关联持有什么看法，他们的文章都不大可能出现上述事实认定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许多人不可能读大量原著。对于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和博士生以及希望在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字的人来说，如果没有读原著而又不得不讨论或者不得不提及这些原著的话，为了至少避免事实认定上的严重错误和模糊，我的建议是：

1) 读《新帕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的相关词条。

该辞典的作者大多是对相关词条有专攻的学者，所写的内容是可靠的。当然，有些词条的中文翻译有问题；有时作者的观点甚至很偏颇。但总的来说，翻译的质量是好的，相关词条中关于事实的认定和描述是可靠的。另外，该辞典新版本的部分词条已经可以在网络上免费阅读。

2) 读可靠的经济学说史著作。

前面提到的著作，若从发表时间看，魁奈的最早、索洛最迟，但大部分甚至全部都属于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对象了。“可靠的经济学说史著作”指的是，我们可以理性地假设作者读过原著并且根据原著来介绍。然而，很多经济学说史著作无法让我们假设这两点，甚至一些国外出版的经济学说史著作的作者也很难让我们做出这两个假设，比如机械工业出版社翻译的布鲁（S. Brue）写的《经济思想史》就很难使我相信作者读过瓦尔拉斯，或者他就没有按照原著介绍瓦尔拉斯。但我们却不能不相信熊彼特、布劳格在撰写他们的学说史著作时读过瓦尔拉斯的书。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有中文版，翻译质量很好。其他的学说史著作，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写的，可读，但往往不能持以为据。因此，如果需要讨论甚至提及原著时，最好再参照一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2007年12月4日

qY_I 分别是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函数，它们表示，如果资本、土地、价格等各种条件不变，产值怎样随劳动力的增加而增长。横轴从左边看是从零开始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从右边看是从零开始的工业劳动力数量。工农业劳动力加起来是社会的总劳动力 L 。

如果工业劳动力是 M_1 、农业劳动力是 L_1 ，图中的垂直虚线和两个生产函数线的交点在纵轴上就表示工农业的产值，它们加起来便是社会的总产值或者总收入。一部分总收入要用来购买农产品消费。它们形成了图中的农产品需求曲线。显然，在A点上，对农产品的需求，正好等于 L_1 数量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数量，因此农产品供求平衡，农产品价格 p 和工业品价格 q 稳定。另一方面，左原点和A之间的直线在横轴的夹角 a 表示农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或者工资。右上方的夹角 b 表示工业部门内， M_1 数量的劳动力中最后增加的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产值，它相当于工业工资。这两个角同样大小，工业工资和农业工资便相等，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供求平衡，整个经济在稳定发展。

但是，如果由于什么原因，比如大规模的猪瘟导致猪肉产量下降但需求未变，或者收入增加导致对农产品需求提高可产量未变，农产品市场便出现供不应求状况，农产品价格 p 上涨。假如像图中箭头表示的那样， p 上涨到 p_2 ，农业产值提高并和新的农产品需求相等。可此时，农产品市场并不能平衡，因为农产品产量没有提高，仅仅价格上涨了。人们用原有的收入只能买到更少的猪肉，不满情绪自然滋生。更重要的是工业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同时代表农业工资的夹角 a 变大了，农业工资现在高于工业工资。两者都要求工业部门提高工资，否则的话，一部分农民工就打算离开工业重归农业，因此劳动力市场变得供不应求。而如果劳动力一变化，原有的产量便会变化，农产品市场在价格上涨后形成的供求相等又被打破。因此A2点不是一个均衡点。

当然，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回归农业，经过一段时间后，农产品产量会提高，价格会有所下降，产品市场会重新实现供求平衡。同时，工业劳动力少了，工业生产函数上的切线更陡了，工业工资提高了， a 和 b 两个角重新相等，劳动力市场也会实现供求平衡。可即使如此，经济仍然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波动，波动的结果，虽然经济重归平衡，但价格和工资都提高了。

可是，中国农民工集中的许多企业往往按订单生产；企业常常也有自己的生产计划，因此不能简单地让农民工离开。可如果不让他们离开，企业资方就得提高他们的工资，一要保证工资购买猪肉的购买力，二要适应农业收入的提高。虽然资方尽可能不把工资提高到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但工资提高后，生产成本总是增加了，因此，企业会上涨工业品价格，造成新一轮通货膨胀；同时资方也不得不减少利润并削减生产计划，因此，经济波动更加严重。

针对这样的经济波动，政府有一些有效的经济政策可实施。从长远看，政府最需要做的是促进农业投资。在工资—物价变化图中，农业生产函数的形状主要决定于农业投入的资本。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个大趋势，但农业劳动力转出农业需要更多资本转入农业来补偿，农业产量才能够跟上对其需求的增长。它们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程度的均衡。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核心就在这里。我希望，我绘出的这张图，能够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点。

2008年1月31日

14. 理解农民转移的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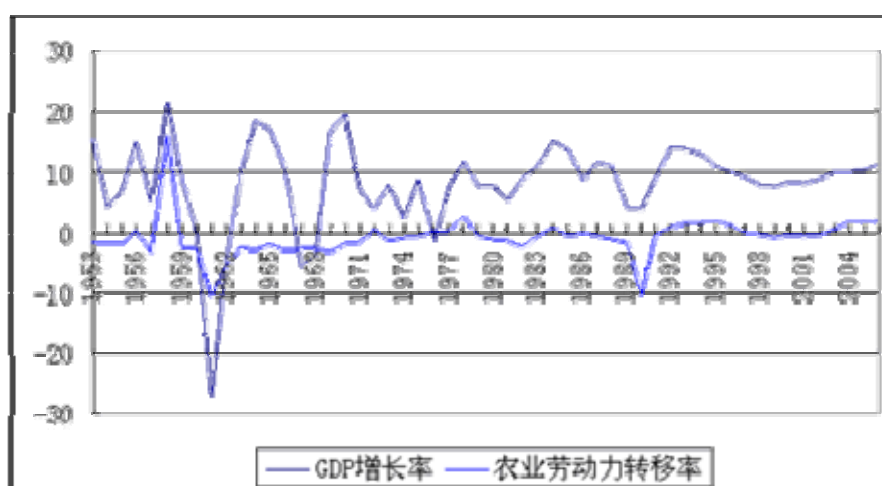
一年多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农民转移：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www.hujingbei.net/双周夜话/2007），指出千百万农民向城市、向非农部门转移对中国经济的伟大意义。但是，如何理解农民转移，如何把农民转移的现象提炼为经济学问题并且用科学界公认的研究方法加以分析，却是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尤其我们中国经济学者面临的严重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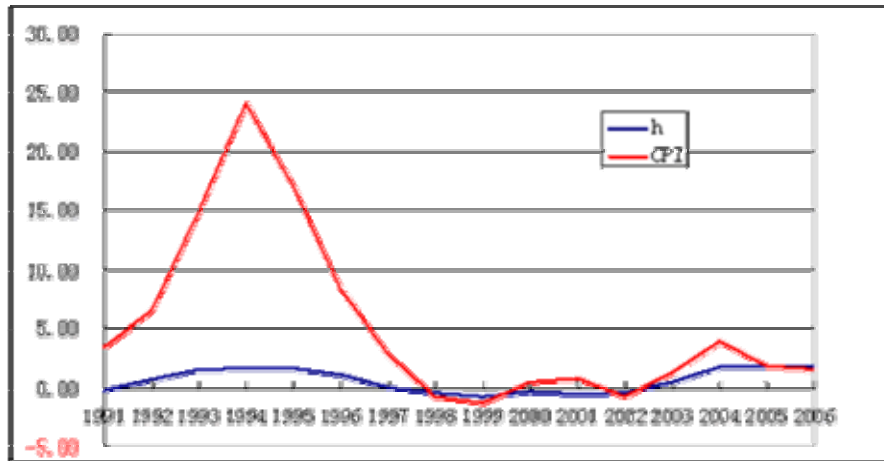
今天，本网站（www.hujingbei.net）发表了我的文章“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波动”。它以中国经济为对象，研究农民转移和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为了准确地说明它们的关系，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劳动力转移率”，用h表示。它的定义是农业劳动力和上年相比的净减少量与社会总劳动力之比，公式是

$$h = -(\text{本年农业劳动力} - \text{上年农业劳动力}) / \text{本年社会总劳动力}$$

括号前面的负号表示如果本年农业劳动力多于上年，农业劳动力在增加，h便是负数；若本年农业劳动力少于上年，农业劳动力在减少，h将是正数。利用官方统计数据很容易把h计算出来。当然，统计有偏差，是我们要注意的。

下面两个图揭示了h和两个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联系。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劳动力转移率h三者分别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所以，它们在这两张简单散点图中显示出来的关联足以让我惊奇。第一个图是1953年以来中国GDP增长率与h的关系。该图告诉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的大饥荒和1958年农民太多地离开农业有关。1978年中国走上市场化道路后，h的变化动态和GDP增长动态几乎一致。农民转出农业的比率高，GDP增长就快；反之则慢。但第二个图显示的中国通货膨胀率和h的关系又表明，农民转出农业的比率高，通货膨胀率就高，反之则低。因此，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h必然有一个均衡值，就是说在任何一年中，农民转出农业不能太少，以免GDP增长率过低；农民转出农业又不能太多，以免通货膨胀率过高。





隐藏在均衡农民转移概念后面的经济学逻辑是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差距。一个农民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他的生产率将大大提高。大量农民转移，GDP增长就很快，农民和非农民的收入增加也很快。收入增加了，对商品包括对农产品的需求提高。可是，大量农民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农业增产也许受到人力资源的约束而赶不上需求的提高。这样，大量农民转移，农产品就可能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的相应上升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农业的人力资源约束又会演变成整个经济的劳动力短缺。如此，经济增长不能不放缓，农民转移不能不放慢甚至转回农业。另一方面，如果农民很少转移，GDP增长不会很快，农民和非农民的收入增加更慢，对商品包括农产品需求不会有大的提高；而众多农民留在农业，农产量上升，农产品也许会供过于求并造成价格下降，后者又将缓和甚至消除通货膨胀。但农产品价格下降后，农民为获得较多收入而更希望转到非农产业，整个经济因此呈现出农产品过剩和劳动力过剩状态，非农部门便不能不扩展，GDP增长不能不加快，农民转移率也就更高，经济发展又进入新一轮循环。我今年初的短文“用一张图解释中国的通货膨胀”（www.hujiangbei.net/双周夜话/2008）便尝试着用农民转移的均衡概念和均衡机制来解释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

如果说农民转移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农民转移的经济学可能便是理解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然而，只有理解了农民转移的“均衡”，我们才可能建立农民转移的经济学。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并无不同。当然，我提出的仅仅是一种理解。面对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民大转移潮流，中国需要多种理解，需要不同理解之间的竞争，中国人才有希望真正地理解中国农民的转移。

2008年8月21日

15. 中国经济危机已成事实

今年九月美国次贷危机转变为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许多朋友关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担心中国经济是不是会被拖入经济下行道甚至经

济危机。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没有美国和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已经走入下行道，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走入危机阶段。只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国经济危机才第一次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来看经济危机的特征：

1. 银根突然收紧，银行倒闭。

前者在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并还在持续。这一点不但体现在国务院和央行一年前的收紧银根和提高利率的行动上，而且体现在民营企业转向高利贷的行为上。高利贷的年利率至少是 100%。虽然国务院现在开始大幅度放松银根，但时机已误。提高利率，收紧银根，企业必然周转困难，银行就收不回到期贷款本息。中国的银行当然不会破产。可是，如果按照美国的商业银行标准和法律制度，中国不多几个银行中应当已经倒了一、两个。

2. 企业减产和倒闭

由于银根突然收紧，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企业被迫减产，民营企业甚至破产。我没有确切的数字来说明近几个月来中国多少企业减产，多少企业倒闭。但我相信，如果中国各地方的镇政府、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不伸出援助之手的话，中国倒闭企业的数量会很大，减产企业更可能占到一半以上。而无论各地方政府怎样援助，保证企业不倒闭，企业减产，开工不足却是政府也无能无力的事情。

3. 价格、工资、利率全面下跌

企业倒闭或者减产，企业对原材料需求下降，原材料价格下跌；企业急于卖出库存换取周转资金，商品价格下跌；企业周转不灵，工资下跌；政府要松银根救市，利率下跌。原材料价格已经一泻千里。利率也已经减低。前一阶段用高价原材料生产的商品正走上赔本降价之路。工资更是从升势一转而为降势。小企业农民工工资下降，大企业白领工资下降，就连保姆、钟点工的工资也从多年升势变成了降势。

4. 失业陡增

企业减产就意味着开工不足，就要减少工人，企业倒闭更得把工人扔向街头。当然，在中国，失业陡增说的是农民工突然发现没有活干了。于是，“民工荒”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工慌”，劳动力短缺一下子就变成了劳动力多余。企业提高工资、福利找农民工的故事好像一下子成了难以追忆的历史。现在是农民工到处寻找就业，找不到就业就得回乡，或者在城镇漂泊。

虽然我既没有个案的调查数据，也没有全国的可靠统计资料（很遗憾!!），但凭我的理论分析 [参见我的“理解农民转移的经济学”（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34&cid=59）和“价格波动与劳动力转移波动：以中国背景的分析”（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33&cid=18）] 和我对中国经济的感觉，我认为中国经济危机已经是一个事实。根据我的理论，农业劳动力的过度转移造成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上涨造成通货膨胀，银根便必须收紧。银根一收紧，再加上通货膨胀时企业本来就需要更多资金，两头夹击，企业周转困难，还不起本息。此时，即使银行不倒闭，企业也得不破产便减产，农民工就失业，价格包括农产品价格、工资、利率就得全面下跌，经济跌入危机，投资全面萎缩。正如我在上面列举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大量农民转移，农产品就可能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的相应上升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农业的人力资源约束又会演变成整个经济的劳动力短缺。如此，经济增长不能不放缓，农民转移不能不放慢甚至转回农业。”但农民转回农业就等于非农产业衰退，否则，非农产业何以能让农民工离开？

今天，讨论中国会不会因为世界金融危机拖累而衰退，讨论中国实体经济受到虚拟经济危机的影响有多大等等问题已经没有意义。在我看来，中国实体经济已经落入

危机。经济危机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事实，而非未来可能不可能发生的问题。现在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面对这个事实应当如何做的问题。中国经济落入危机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尤其那些失业农民工，他们是承受危机苦难最重的群体。不过，经济危机并不可怕。最近三十年中，中国经济至少经历了两次通货膨胀后农民工被迫回乡的经济危机。可今天的中国经济依然比三十年前强得多，农民生活依然比三十年前好得多，能够在城市坚持下来的农民依然比三十年前多得多。50年前的1958年，中国虽然由于农民过度转移导致了农产品大减产和经济危机，但只是因为毛泽东政府的绝对专制，才造成了农民被迫困守农村而饿殍遍野的悲剧。经济危机永远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次经济危机也是短暂并且有底限的。同时，它可能带来的社会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避免的根本方式就是政治清明和公民自由，包括信息的公开。

2008年11月6日

16. 农民转移的宏观经济学原因和宏观波动

1978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乡城流动。这是中国的城市化。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是11%，现在已经达到45%。城市化比率在1949到1978的29年间从11%提高到18%，提高了7个百分点，其中1949年到52年还应该中国经济恢复的时期，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时期。而1978年到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从18%提高到45%，提高了27个百分点，比前一个29年多提高了20个百分点。在最近十二年里，从1996年到2007年，中国平均每年增加两千多万城镇人口，总共增加了两亿四千多万人口，比美国2007年总人口的六分之五还多。2007年中国城镇总人口不到6亿，其中40%以上是1996年以来新增的。

从1996年开始，中国城镇新增人口每年都超过了中国新增总人口，中国增加的所有人口加起来还不够补充城镇增加的人口。所以，中国必须从其他地方，也就是从乡村获得新增的城镇人口。中国新增城镇人口到1995年还是低于新增总人口，从1996年开始就高了。1996年新增城镇人口比新增总人口高出1.7倍，以后越来越高，到2003年达到了2.8倍，也就是说新增城镇人口是新增总人口的近三倍；截止到2007年依然是两倍多。一般而言，城镇人口中去掉新增总人口，就是从乡村到城镇的转移人口。1996年到2007年中国新增城镇人口两亿四千多万，新增总人口一亿一千万，所以中国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有一亿三千多万。

但上面计算人口转移的方法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新增人口不但发生在城镇，也发生在乡村，甚至乡村每年新产生人口比城镇还多，所以，新增总人口中必然有一部分应当算到乡村到城镇的转移人口中。我们看一个公式，新增城镇人口=新增总人口+乡村人口净减少=城镇净出生+乡村净出生+乡村人口净减少。前面仅仅根据第一个等号后的公式计算人口转移，忽略了乡村净出生人口的进城同样属于人口转移。所以，中国乡城人口转移总量应当加上新增人口中的农村人口或者农村净出生人口。

可是，中国没有公布乡、城出生率数据，我们也没有人口转移的正式统计数字，所以我们只好估算人口转移规模。假定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同时适用于乡村和城镇，城镇人口增长率和乡村人口增长率相同，也和总人口增长率相同，这样推算的每年城镇人口就会比实际人口少得多，其中的差额便是每年的转移人口。从1996到2007年，

中国乡城转移人口从一亿三千万一下子增加到两亿多，增加了一半以上。乡城转移人口占城镇新增总人口比重也从原先的 55% 提高到 84%。就常理看，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应当高于城镇，所以假设乡、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同应当不会高估、而可能依然会低估中国乡城转移的规模。根据上述假设，中国最近 12 年内城镇新增人口中六分之五以上来自农村，城镇人口自身的增加仅占六分之一。也就是说，在这 12 年间，中国有至少两亿人从农村迁入城镇。两亿人的概念是什么呢？它们是 1995 年中国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是中国同期新增总人口的一倍。如果用国际数据比较，2 亿人是 2005 年墨西哥总人口的一倍，是波兰总人口的五倍多。换句话说，中国最近 12 年的乡城移民总数相当于 2005 年墨西哥全部人口在六年时间内转移到美国，或者相当于波兰全部人口在两年多时间内转移到西欧。这样集中和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转移，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人口转移和劳动力密切相关。中国城镇劳动力比重从 1978 年的 24% 上升到 2007 年的 38%。中国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同期从 30% 上升到 60%。2000 年前后，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徘徊在 50% 左右，之后它就稳定地低于总量的一半。但从中国统计数字看，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重大差距。1978 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8%，而城镇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 24%，城镇劳动力比重高于城镇人口比重。到现在则完全变了。2007 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 45%，而城镇劳动力比重只达到 38%，后者反而远远低于前者。可见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乡城转移不同步，劳动力转移远远慢于人口转移。

中国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在城乡之间是于 1990 年前后发生逆转的。1990 年以前，城镇劳动力占城镇人口的比重很高，就是说城里劳动力多、非劳动力少；乡村劳动力少、非劳动力多。1990 年以后完全改变过来了，在农村劳动力多，小孩、老人少；在城镇劳动力少，小孩、老人多。农村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的人口。2007 年，中国城镇人口劳动力还达不到一半，可中国乡村人口中三分之二都是劳动力。这些统计资料的可靠性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中国统计资料同时表明，越是乡村人口比重高的省份，少年儿童占人口的比重越高，因此乡村人口中非劳动力也许应当更多。

对中国劳动力乡村转移的实际状况也需要估计，因为我们缺少直接的转移数据和乡城、农业非农业的劳动增长率数据。中国乡村劳动力本身也在增加，比如 10 岁、13 岁的孩子过几年就会变成劳动力，所以必须加上这一部分人。我在这里列出了估计值。如果假设乡村劳动力增长率是总劳动力增长率的 1.2 倍，则从 1996 年到 2006 年，中国从乡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是 7800 万左右，从农业到非农业转移大概 8000 万左右。但这些估计值依然可能大大低估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实际规模。中国官方和学者的一般估计是中国劳动力乡城转移在 1.3 亿左右，农业非农业之间转移数量更大。不过，这些估计没有被中国劳动力的长期统计资料所采纳。无论如何，与人口转移一样，十几年来，中国劳动力也经历了大规模的乡城转移和农业非农业转移。

人口转移的基础是劳动力转移。所以我们关心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为什么中国出现了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我在这里仅仅说明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机制。从农业或者农村看，劳动力减少，仍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的收入会增加，包括进城劳动力在内的家庭总收入也会增加。例如，农民家庭里第一个劳动力离开了农村，第二个劳动力想继续离开农村，他对城市工作工资的要求会超过第一个离开农村的劳动力。从城镇或者非农产业看，雇工农村劳动力固然便宜，但雇佣的多了，农民工的工资便必须提高。而农民工工资提高的条件是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后者的前提又是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资本劳动比是资本和劳动的比率，或者平均每个工人在生产中使用的资本数量。为了提高资本劳动比，第一需要劳动力增加得慢，第二需要资本增加得

快。

中国总劳动力增加速度。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每年增长 1%左右,而现在在 0.7%、0.8%左右,并且还会继续下降,所以中国总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是很慢的。另一方面,即使仅仅看中国国内资金投资也是很多的。中国投资占 GDP 比重一直是上升的趋势,最近几年保持在 40%以上。一方面是大量的投资,一方面劳动力增长很慢,所以中国资本劳动比提高的很快。我们看中国新增资本和新增劳动的比率。这个比率一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都几乎是不变的,它就像中国陷于贫穷陷阱似的长期不变。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新增资本和新增劳动比率长期不变的话。中国总资本和总劳动比率也应当不变。但是,近十几年来,中国每一个新增加的劳动力所提供的新资本快速增加。按照 1978 年价格计算,1991 年中国平均为每个新增劳动力而新增加的资本仅仅为五万元,1998 年达到了十万元,2003 年便超过了二十万元,2006 年则达到了三十六万元,15 年内增加了七倍。所以,中国有足够的新增资本支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支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更具体地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宏观原因是第一,新增资本主要投向城镇,第二,城镇劳动力增长得比乡村更慢,在这种情况下,城镇企业就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巨大的需求。

在 1997 年以来所有年份,中国投资在城镇的增长率总是快于在农村地区的增长率。因此,本来就偏向于城镇的中国投资,现在的城镇偏向便更加严重。1996 年的时候,中国总投资里面四分之三在城镇,到 2006 年则超过了七分之六,所以,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地集中在城镇。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分布则完全相反,绝大多数分布在乡村。同时,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又很慢。2006 年各个省以人均 GDP 为标准进行排列,城镇人口越多的省少年儿童越少,意味着劳动力增加得越慢。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城镇发达的地方、越是 GDP 增长快的地方,本身能够新增的劳动力越少。一方面,中国投资严重偏向城镇,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分布严重偏向农村,同时中国城镇劳动力自身增长速度又很低,所以,城镇产业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巨大需求,而限制农民进城制度的放松,使农民有可能向城镇提供劳动力。

在中国劳动力持续地大规模地从乡村向城镇转移的同时,中国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又表现出显著的周期波动。中国农民向城镇、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周期性。从 1953 年到 2007 年,中国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是个大趋势,但这个大趋势又充满了波动。比如,1958 年中国劳动力中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从农业转到非农业。这样大规模的集中转移是中国随后发生的社会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随后几年绝大部分农民又转移回去。1978 年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波动。1978、1984、1995、2006 诸年及它们前后的年份,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但在这些年份之间,总有若干年农业劳动力绝对增加。用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的数量和总劳动力数量对比,把它们比值当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我们发现该转移率呈现十年左右的波动周期,并且和 GDP 增长率的波动有明显关联。中国官方的失业率指的是城镇失业率,失业人数大约占总就业的 1%。中国失业率数据从 1978 年开始,30 年来失业率没有波动特征,和 GDP 的波动谈不上什么关联。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中国农民大规模地转移,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转移又是波动的、具有周期性的。所以,中国农民转移本身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对中国来说,农民转移比城镇失业对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减少贫困更加重要。所以,农民转移的均衡,也许比失业就业的均衡更加重要。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观察,中国农民转移既是一个不断从乡村向城镇、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长期过程,也是一个有时转移多、有时转移少甚至转回乡村和农业的短期波

动过程。中国经济政策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促进农民转移的同时又缩小农民转移的波动。

（本文是笔者在美国加图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召开的“通往和谐之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年11月17日。这次发表前作了修改。）

2008年11月20日

17.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意义

一个月前，美国金融巨头雷曼公司倒闭、美林公司被收购、美国国际集团申请政府紧急救助，美国金融危机正式浮上台面，并迅速波及到全世界。一夜之间经济问题变成美国总统大选的主题，也变成全世界关心的主题。在这个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重大经济灾难以及可能衍生出来的社会灾难面前，每个人都有也应当有自己的理解。我的理解很简单：这一次美国和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反映，而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全世界劳动力短缺，使得世界的生产活动再也不能按照原先的利润率来安排，一部分生产能力包括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业生产能力必须被消灭（中国常用的语言“关停并转”），而经济危机就是消灭生产能力、使经济活动重新适应劳动力供给的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简单地设想一下危机的逻辑：由于新市场、新技术或者新资源的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1989年世界专制体系和与此相联系的计划经济消亡后，俄国、东欧国家以及早先的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印度、埃及等几乎全部第三世界国家放弃第三条道路，它们积极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对原先的资本主义体系来说相当于新市场、新资源的发现。而这里最重要的是新资源，因为新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给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不会比后者向前者提供的市场更大。同时，新发现的资源最重要的不是新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矿产和土地，而是人力，是廉价的人力。一部分人力向老资本主义国家移民，绝大部分人力留在自己的国家而资本从老资本主义国家移来，利用这些人力把商品生产出来再卖到老资本主义国家。发现这样廉价的人力，就像发现一个巨型露天富铁矿或者易于开采的巨型油田，一下子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成本降低下来。此时，即使商品出售价格也会降低，资本利润率依然会显著提高。所以，资本投资活跃起来，资本变得供不应求，各种融资工具发展起来，货币也迅速增加，但由于成本的降低和投资的兴旺，价格不会明显上升。整个世界经济奔上高速公路，世界GDP年增长率达到了5%。经济增长出现在世界所有地区，包括南美、中东、非洲、南亚、东亚、东欧。全世界到处都出现了过去难以设想的高速发展。当中国人对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经济奇迹时，阿拉伯人注视的是迪拜接连竖起的世界第一高楼，而不是电视上天天报道的伊拉克战争或者伊朗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闭塞村庄里的农民走入了城市，近二十年来的世界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世界人口非农化的过程，因为近二十年来资本主义体系发现的廉价人力就是这些原先生活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农民。同时，如果说当资本主义最初在欧洲出现、其优越性尚未呈现的时候，农民还不愿意融入这个体系，那么，到了二十世纪末期，这样的心理阻力不再存在。农民欢迎资本主义，原先反对资本主义的各国政府一旦改变态度，老资本主义国

家的资本就和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联合起来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也就出现了。老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廉价商品，新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生产能力，农民获得了非农就业。虽然可靠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就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来说，仅仅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就从50%降到了45%（实际情况应当远远超过中国官方统计），越南从65%降到了58%（2004年），孟加拉国从62%降到了52%，巴基斯坦从48%降到43%，泰国从49%降到43%，保加利亚从26%降到9%，罗马尼亚从43%降到32%，土耳其从36%降到30%（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8》）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和劳动力大规模转出农业。只要这一大规模转移还能够延续，只要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制度还能够源源不断地向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廉价劳动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过程就能够持续下去。

然而，世界本来就有的劳动力不是无限的，世界增加劳动力的速度不但不会超过2%，而且正变的越来越慢。因此，近二十年来尤其近十年来的世界高速增长周期总要到达极限。决定增长极限的条件不是自然资源不足。只要有人，只要有资本，就短期而言，澳洲有的是铁，中东有的是油。就像中国出现的情况那样，只要对奴工不闻不问，或者只要农民还多的是，煤就有的是。环保主义者所说的资源长期耗竭和两年前世界遇到的资源供不应求完全是两回事。决定增长极限的条件也不是资本不足，只要利润率高，资本总是有的。决定增长极限的亦不是凯恩斯说的需求不足，资源的快速涨价就表明对用这些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有需求。就这一次世界经济增长周期来说，决定增长极限的是人：世界还有多少农民可以廉价地被资本主义体系吸收！！

经济增长的特点总是在繁荣的时候加工工业和建筑业增长更快，农业和采矿业增长更慢。这一次也是如此，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农业劳动力和采矿业劳动力开始绝对减少，减少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两三年前，由于高速增长和劳动力投入不足，矿产品开始大幅度涨价。但自然资源的涨价还可以通过加工工业生产率的提高来消化。到了后来，连农产品也涨价了：世界干脆就缺少农民种田。有人说把进城农民动员回农村就行了。可是动员农民工回农村，城市产业怎么办？城市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农民工来保证低成本的生产发展，农村需要农民来保证粮食实物产量增长和收入增长维持着一定比例。可全世界既没有更多的农民保证低成本的非农业生产，也没有更多的农民保证粮食生产。而由于农民更愿意离开农业，所以劳动力短缺最后表现出来的就是粮食供不应求。世界市场粮食价格在2007年一下子达到了历史高峰。粮食价格的猛烈上涨意味着增长极限来临，而它的背景是劳动力短缺。

本来，在世界加工工业最集中的地区，随着劳动力富余程度的下降，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上涨。粮食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动工资上涨，进一步迫使需要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资本主义非农产业提高工资来吸引他们。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利润率必须下降。资本主义生产包括资本主义的金融再也不能够按照原有的利润率来发展。生产必须收缩，一部分投资必须放弃，一部分生产能力包括金融业生产能力必须封存或者消灭。另一方面，粮食价格的提高又引发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最关心的消费品价格通货膨胀。政府为顺应公民的要求必须抑制通货膨胀，而其手段就是提高利息率和减少货币流通，收紧银根。这两个措施不但明显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因为企业才是借款的大户），而且许多企业根本借不到款。原先出现的仅仅是劳动市场紧张，劳动力短缺和劳动成本上涨，现在资本市场一下子也紧张起来，资本短缺和资本成本上涨。因此，生产和市场再也无法在原有规模上维持下去。世界经济从哪一个点开始破产仅仅是一个偶然性的问题，因为在经济繁荣时期，世界上出现了太多的低效生产能力。只要某个点开始破产，多米诺骨牌就会一个一个地倒下。

今天，我们知道最早破产的是美国低收入购房者。在食品价格上涨和房贷成本上

涨的双重压力下，这些人开始破产，并导致了房产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又引发了现在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机。许多人说美国鼓励低收入者购房是政府错误，所以政府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但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低收入者突然还不起房贷，而在美国这个强调个人信用的社会，一个还不起贷款的人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受窘，我们很难设想个人收入正常而不去还贷的状况。有人把罪过算在金融衍生产品和房贷证券化之上。可包括中国学者、研究生写的成千上万篇金融创新论文都表明只要最终用于实体经济包括住房的借款能够按计划归还，金融创新和房贷证券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有人说美国联储或者中国央行有罪，因为它们先是发行过多货币、后又过分抽紧银根。可是它们在过多发行货币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它们国家的通货膨胀，而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它们又不能不抽紧银根，因为它们的任务就是把通货膨胀保持在低水平。还有人说指责华尔街商人道德败坏。美国国会对雷曼公司的审查确实发现了雷曼公司高管的高分红，但到现在为止 FBI 还没有发现雷曼公司做假账之类的违法行为。况且，在这里，如果真有商业道德败坏，它的作用也是推迟危机而不能避免危机。再说，如果雷曼公司赚的钱够多，它也不必用败坏商业道德的方式避免破产。是什么因素让雷曼这样一大批金融业巨头陷入困境？这里的原因只能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遇到危机。我们所要做的是解释资本主义体系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危机，而不仅仅是为什么一部分购房者还不起房贷、为什么大部分金融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

确实，大众心理最关心的是最早破产的那个点，所以美国和房产次贷自然成为舆论谴责的靶子。历史学家也许会弄清楚、也许永远弄不清楚世界经济最早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破产的。温家宝总理在 2008 年 1 月所说的“2008 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将作为一个神秘的谶语永远迷惑着中国和全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者：他为什么那样说？他知道了什么？中国经济是世界发现的新资源即廉价劳动的最大所在。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言，中国经济的困难只能意味着这一新资源的枯竭。中国经济缺少任何其他东西：资本、技术、市场、高级人才、自然资源、经济和社会制度，世界都可以帮助，都不会让中国陷入困难；惟独普通人力资源，如果中国一缺，全世界不但一时间无能为力，而且全世界还得眼睁睁地跟着陷入最困难的时候。全世界公民是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落入金融危机的。全世界政府是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必须改弦更张，从收紧银根转为放松银根的。全世界的人目瞪口呆地听着布什解释为什么要采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救市措施，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实体经济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在这里，真正理解和应对危机的政府与公众需要知道的关键问题是原先发现的“无限劳动供给”已经“有限”到了什么程度。

将近三十年前，当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我在自己发表于《北大研究生学报》创刊号上的论文里曾经无意识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化，使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供应日趋减少，从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要环节；全国人口的大部分被抛入雇佣劳动者的行列，雇佣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他们的联合斗争，可能迫使资本家和他们达成正常出卖劳动力的契约：这样，劳动力价值规律，工人本身的再生产，便可能逐渐地取得它在整个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的正常地位。”（www.hujingbei.net/upload/2007_07/07071014268269.pdf）作为生活在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心之一的中国人，我幸运地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前资本主义社会渗透的过程，目睹了中国各种经济活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尤其目睹了中国农民通过迁移而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企业原先还只管农民工的使用、而把农民工的生老病死（即劳动力的再生产）丢给非资本主义体系承担，所以资本主义体系能够大大降低

生产的人力成本的话，那么，随着全世界人口尤其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来自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资本主义体系就越来越必须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纳入体系内部。而这就意味着劳动成本的提高、雇佣劳动者地位的上升和他们向中产阶级的转变，意味着社会最终从等级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当然也意味着社会最终转变为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

当然，这一转变过程充满着繁荣和萧条、进步和退步。纯粹就经济发展来说，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波动中增长。每一次波动都有其具体原因，也都有其繁荣的上限和萧条的下限。但是，即使人类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最公正、最勇敢、最谨慎地对待社会和经济问题，人类仍然不能避免经济波动。这就和生病一样。每一次生病都有具体原因，但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一个人仍然不可能不生病。所以，未生病时不要得意忘形，生病时不要悲观失望，也是我们对待资本主义经济波动或严重经济危机应当持有的态度。当然，一个人可能因病而死亡，资本主义可能也会死亡。但是，看看 2008 年的世界上依然有那么多生活在前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农民，我们就会知道资本主义还处在年轻时代；看看资本主义经济迄今为止发生的大小危机，我们又会明白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常见病而无致命危险。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通往大众富裕和公民平等的路都还很长，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还有着广阔前景。而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击碎了“劳动无限供给”的幻想，把劳动力短缺现象清楚地揭示在世人眼前，在长期中将有助于劳动收入提高和劳动者地位上升，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把自己的增长建立在新的劳资关系和新的更高劳动成本的基础上，也就是说，通过这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将把十几到二十几亿（远远超过老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人口!!）人口和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纳入自己的循环周转之中，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经济增长。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意义。

2008 年 10 月 23 日

五 让穷人有希望，让富人有保障

1. 让穷人有希望，让富人有保障

在今天的中国，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的中国，贫富不均现象是难免的。今后，不穷不富的中产阶级可能会多一些。但中产人士仍然希望富裕，而穷人当然更愿意富起来。一个具有现实性的好的经济制度是什么呢？我想，简单地说，它应当是一个让穷人有希望、让富人有保障的制度。

让穷人有希望，就是使他们相信，只要肯吃苦、肯努力，他们是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农民的情形就是如此。当年我在江苏农村劳作时，政府规定每个农民每年口粮最高额是 600 斤原粮（相当于 400 斤米吧）。在没有肉、没有其它副食品的时候，这笔口粮是填不饱肚子的。但年成再好，收获再多，“多余产品”也只能交给政府。同时，除了务农，政府不准农民做这做那的挣钱。因此，农民就是肯吃苦、肯努力，他也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让自己富裕起来。个人没有富裕的希望，国家当然就更没有富裕的希望。好在这种状况仅仅持续了 20 年。现在，农民收获，是交了国家的，剩下自己的：田种的好，就能富裕。如果他还从事其它行业，还能千里流动，寻求机会，他的致富可能性将更大。而在中国，一旦农民有了致富希望，中国的富裕就是早迟的问题了。

让富人有保障，就是使他们放心，他们的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个人、任何政府都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不能限制他们应用自己的财产。孟子早就指出有恒产者有恒心。产之恒者，就是永久性，至少在可以想象的未来时间内不会变化，这样，富人才能有恒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

让穷人有希望和让富人有保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富人没有保障，穷人就不敢存富裕希望，小康足矣；穷人没有希望，富人便保障不了。在我看来，尽管我亲身经历过的穷人没有致富希望的那 20 年给我们的教训是那么地刻骨铭心，但在中国历史上，让穷人有希望这个问题解决得是比较好的。就像范进那穷途潦倒的生活、市侩庸俗的环境，一朝考得高分，金榜题名，立即就有了房子、银子，摇身一变就进了富人阶层，这在其它国家绝对不可想象。可是中国没有解决好让富人有保障的问题。别说皇帝一句话，财产马上充公；只是那每隔几十年，顶多一、两百年，就有一场杀戮富人的起义，也是其它国家不曾出现过的。即使在今天，中国的最大问题，也是富人有无保障的问题，而非穷人有无希望的问题。中国要想长久富裕，最终避免历史上的兴乱循环，让富人有保障，使他们有恒产有恒心是绝对必要的。

不过，让富人有保障的途径，不是压制穷人，而是鼓励富人有道生财。努力致富的人是社会上很有能力的一批人。一个限制他们致富的制度肯定不是一个好制度，但一个鼓励他们致富的制度不一定就是好制度。一个好制度应当仅仅鼓励他们依照合理的规则致富。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制度才不但能够让穷人有希望，让人们富裕，而且能够在道义上、法律上和实践上永久性地保障富人。如果一种制度太多地让人去发不义之财，那么，富人包括有道致富的富人是没有保障的。因此，为中国的长久考虑，为穷人和富人考虑，中国需要的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制度，而是让和仅仅让每个人合法富裕的制度。

2002 年 9 月 10 日

2. 股民特权小议

最近读到两篇新闻，一篇说四川有一炒股者因股市低迷写信威胁中国证监会，并扬言要使用炭疽菌。另一篇说政府决定停止国有股减持，股市立即有了起色。

我相信这两件新闻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股民对证监会的不满需要理解。依我看，不满的根源是股民特权前一段时间得不到体现。当代中国有两个特别的特权群体。这就是城市人口群体和股民群体。城市人口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基础是把公民划成两类身份的户口政策。股民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时代，其基础是让少数内部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说这两个特权群体“特别”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靠政策形成，不像传统的特权阶层或是靠其成员的人力资本，或是靠继承制度。这样，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原有政策的维持至关重要。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既包括了传统特权阶层成员如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了平民，所以，知识分子和官员能够以平民的名义来维护特权。例如废止户口制度会恶化城市就业形势，而在股市中浮沉的也有许多下岗工人。城市人口特权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中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户口制度的废止已是大势所趋，口头上谁也不便反对，目前拖延的主要理由是时机不成熟。但股民特权似乎不多为人所知。股民特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为了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市场；为了改革国有企业，需要股份化。因此证券市场是改革成果，上市公司是改革的排头兵。哪个企业能当排头兵，是政府的决策。上市之时，内部人就先富了起来；上市之后，还得保证股民富起来，以昭彰改革成果。这里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保持股价的上升趋势。如果不能上市，做假帐也得上，毕竟改革国有企业、发展证券市场比假帐重要。上市之后，若股价升不上去，也得做假帐，因为保护改革成果更重要。上市公司的假帐其实不能冤枉会计师：他们多是为了证券市场大局在忍辱负重。如果假帐还不够支持股市，政府就得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以保障利好。这样的做法持续三、五年，股民习惯了，政府保证股民赚钱的意识定型了，股民特权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股民特权又反过来给政府造成强大压力。在股民看来，政府的责任就是抬高股价，使用什么方法是无所谓。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监管政策只要对股市有影响，就得考虑股民们的利益，得让股民赚钱，否则便将遭到股民以及舆论工具的强烈反对。至于这些政策对农民、对其他人、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用如何，当然都不在股民的考虑之列，就像农民的贫困不在户口制度拥护者的考虑之列一样。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可用来促进利好的政策不多，反倒是压抑股价的坏消息不少，股民对证监会对政府的不满自然可以理解。依我看，消除股民此种不满的根本之途，就是政府公开宣布不从股市、而从国民经济出发制订政策；公开宣布政府不再担保股民赚钱。这样，股民特权就将取消，股民的不满也才能指向上市公司、而不再指向证监会或政府；也惟有如此，上市公司才能感受到压力，证券市场才可能规范。

2002年7月5日

3.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最近一个多星期，洞庭湖洪水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事件。现在，洞庭湖水位终于坚定地回落了，我们的心放下了。湖南省五十年未遇之特大洪水终于被“抗”

住，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据说，长江干堤的大部分地段应当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如果洞庭湖、鄱阳湖等重要湖泊的堤坝也能够抵御百年一遇洪水。那么，沿江、沿湖的公民便不必隔几年就受一次惊怕，他们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长期的规划。

上海人是幸运的，因为黄浦江堤岸能够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上海人也因此可以更从容地规划自己的长期发展。我在外滩散步，每每感到江水的软弱和江堤的坚实。是的，我相信，即使遇到千年一次的大水，外滩也不会松软。比洪水更厉害的是地震。但上海离太平洋海沟还很有一段距离，所以威胁算不上严重。大城市如东京、旧金山，地震威胁更大，不也成为国际化都市了吗？上海不会比它们更差。值得上海担心的，不是这些容易成为头号新闻的自然灾害；威胁上海的，首先也不是洪水地震。不谈千年，就百年而言，造成上海物质和文明损失的，主要是像日本人进攻上海的侵略战争和多次发生的国内战争，是像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跃进”。上海人难以规划自己的未来，不是因为日后的洪水，而是因为当时的制度；不是担心百年或千年一次的自然灾害，而是担心十年一变的社会规则。上海人无论是把财富转移到外国、还是把身份改变成移民，背后都有着对制度对规则多变的担心。100年前、60年前、30年前、20年前、10年前，以至于今天，中国都面临制度不稳定的基本问题。但在每一次改革前或改革时，往什么方向改、什么时间改、新的制度规则又是什么，那些规则又能够维持多久，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史上至少十年一遇的问题，却都比预测千年、百年一遇的洪水还困难。而没有稳定的规则或者至少对稳定规则的预期，人们却又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

防范洪灾的规则是用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大湖。这一点，我们的祖先四千多年前就理解并且开始实行了。今天的我们虽然还不断遇到洪涝灾害，但已经有了一套防范的体系，大部分人包括洞庭湖边的居民已经不担心洪水对自己未来的长期影响，可是，四千多年来，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灾害，我们依然缺乏基本的防范体系，大部分人都担心这类灾害对自己未来的影响。古人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一说，正是社会缺乏规则的表现。如果说过去毕竟还有君王一家享有制订规则之利，并确定太子，制订王朝长期计划，那么，百年以降，君主制在中国不复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受到了缺乏规则之害。因此，我想，就像防范洪水的普遍规则因为无人不受洪灾之害而被普遍接受一样，防范社会灾害的普遍规则也会因此而被普遍接受，那时，我们就不但不用担心千年或百年一遇的洪水，我们还将最终摆脱规则十年一变的恐惧，我们将能在预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长期的规划。

2002年8月28日

4. 人权、人的动物权利

人权这个概念，如今已不新鲜。亲戚的孩子是中学生。有次见到亲戚问正在写信的孩子信写给谁，孩子一扭头，要保密，这是人权。其实，不满18岁的孩子，既不能够承担自己行为的完全责任，也还不能够行使人的完全权利。但知道了人权这个概念，总是一桩好事，要明白，10年前的1993年，人权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

人权有很多内容，例如与人的动物性质直接关联的权利，与日常人际关系直接联系的权利，像通信保密权，有社区生活的权利，当然还有政治上的个人权利。但从人

权概念传入中国起，中国人似乎就把它理解成人的动物权利。因此，近二十年来，中国人作为动物的个体权利的恢复速度，恐怕在全世界能够名列第一。首先，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作为一个动物，中国人能够吃饱饭、穿暖衣了。二十多年前还不行，那时，即使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够吃，他也得先交给国家；国家留一些给他，让他充饥。所以，动物的觅到足够食物就能够吃饱的权利，人还没有。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饥荒仅仅出现在专制社会的命题，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二十年前，我在北京读书，口袋里的钞票没有几张，但粮票有好几种：米票，在食堂买米饭用的；面票，买馒头用；杂粮票，买窝窝头用。现在这些票证都成了历史。其次，中国人在性关系上的动物权利也恢复了，而且一下子几乎恢复到几千年之前。二十年前，我在大学时，大学生还不允许结交异性朋友，婚前性行为更是“流氓行径”。如今，中国人不但挣脱了婚姻对性关系的规范，而且超越了情感对之的约束。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看，动物遇到异性便能够交配的权利，在中国的媒体上已经得到认可。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对婚姻登记还有个户口登记天数的限制，德国对离婚申请还有两年不处理的等待期，号称在传统上最重视家庭的中国，如今则是报了户口第二天就能办婚姻手续，提出离婚两个星期就能拿到离婚证。第三，中国人的动物行为权利也恢复了。动物通行的规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今天这个规则在中国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强者一会把一所中学变成民办，一会把一笔资产转到外国；弱者或投机附炎，或钻小空子，以求生存或求从强者处得些许余羹。

动物求的是生存权。人的要求当然不止这些，否则“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不会流传至今。中国人现在跨过了温饱阶段，正要建设小康。小康不是动物的概念，它仅仅属于人。看来，中国人“人”权的恢复已经有望。但就像驯化动物那样，中国“人”权的恢复可能首先要求每个人尤其强人对其动物权的节制。

2003年3月25日

5. 神舟五号：中国与世界

报载神舟五号即将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次发射载人飞船。我衷心祝愿这一次发射成功。

这次发射将产生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或第一个宇航员集体。在太空中，这位宇航员将向翘首仰望他们的我们以及全世界人说句什么话呢？为此新浪网在征集网民的意见。

人类第一位（前苏联）宇航员向我们说过什么，好像已经被（至少是不生活在前苏联的）我们遗忘了。不过，1969年7月21日，第一位踏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向着全球亿万通过电视和广播关注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人们说的一句话：“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对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却流传下来了。

1969年的我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可惜的是，那个历史性时刻对我和所有普通的中国人是一个禁忌：也许因为那是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所以这个消息没有出现在中国任何新闻媒体上，尽管阿姆斯特朗虽然没有提到中国，可也没有提到美国。

国内媒体过了多少年才开始提到人类、而不仅仅美国人的第一次登月，暂时还无暇查证。但今天，我们都开始跳出了“中国”的圈子，开始心平气和地谈论比如微积

分的建立、学校的出现、计算机的发明等不是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成就。然而，中国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毕竟是一件大事，作为中国人很难不激动，因此，网民们所建议的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万千大众的话，多数也是祖国伟大、民族复兴等。

确实，中国人为自己的宇航事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仅仅这一次神舟五号就耗资 24 亿美元，而神舟五号上天本身就足以表明中国的强大。每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但是，没有神舟五号，我们的祖国仍然伟大。我们民族的复兴可能更重要地表现在贫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者的个人尊严被尊重上，否则的话，四十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就表示了中国民族的复兴，而用不着今天的神舟五号来承担这个民族使命了。另一方面，神舟五号上天不仅仅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强大的，甚至不是为了显示中国强大的，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力从来就比不上中国；少数国家强于中国，但没有他们对神舟五号项目提供的部分关键技术，没有那些国家的许多人是为了人类而非他们的国家才建立的现代科学，没有那一些人的探险和失败，也不会有现在的神舟五号上天。太空活动尤其具有人类共同体的性质，所以，在神舟五号顺利升空的激动时候，如果我们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而不仅仅是中国人，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上的所有人说的话，也许才不会很快地被世界大多数人遗忘；中国融入世界，也才更像是为了对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因此，如果中国宇航员真的要对我们说什么的话，我支持他（们）使用网民提议的“世界和平才有这一刻”或类似言语。

2003 年 10 月 14 日

6. 实践民主

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是我第一次当上和行政级别挂钩的官。在我为民主时，我发现中国的封建“残余”不仅存在于宏观的社会总体上，而且更严重地存在于微观的个体单位内。每个单位的头头都有着皇帝般的特权：只能自己说话，不让别人说话，更不让别人参与；自己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执行规则、改变规则；自己决定哪些信息可以向员工公布，哪些不可以公布；自己确定自己的收入是多少，待遇有多大，对职工是分给你多少你拿多少。因此，在我没有当官之前，我不但希望社会民主，而且希望单位民主。我想，如果我当官，我将实践民主。

在我担任院长一年多后的今天，在有关 2003—2004 学年的最后一次院领导班子重要会议结束后，我想，我们每个班子成员都可能感受到自己在实践民主。

民主的要义是让别人知情、让别人说话，让别人平等参与决策。因此民主的第一步是公开化，公开信息，公开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上任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制度，公开信息，根本打破在这之前只有第一把手知情和决策的专制状态。在学院领导班子内部，我们打破了不讨论、不争吵的局面。在必须决策而又争论不下的时候，我们使用了表决方式。在有时间可以商讨的情况下，我们多次商讨。民主决策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是它的代价；然而，民主决策既提高了每个领导班子成员的兴趣和能力，同时避免了第一把手个人犯重大错误，所以，尽管多用了时间，但民主制度获得了每个成员的赞同。

不过，民主是由民、而不仅仅是领导班子成员做主。我上任以后，员工的知情和

参与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的员工几乎全部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绝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担心民主的主要理由是民众的文化水平不高。可我们学院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平均文化水平。所以，我们不再要求员工在面对外来的检查、评比时和领导班子口径一致；我们公开了主要财务状况；员工选举的审计组已经开始工作；我们的员工也已经开始实践民主。当然，方向虽然根本变了，但我们朝新方向才刚刚迈出第一步。它的继续需要建立更多的保证制度，需要员工更多地讲话。

在一个关键信息不公开的社会内、在总的单位专制的大环境下、在员工还不习惯于说真话的内部条件下，考验一个单位领导是否真心希望民主的，便是他能不能先在自己可支配的范围内，创造一个民主的小世界，和大家一起实践民主。今天，我很高兴，我自信在院长任上经受住了考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一年来开始的民主实践也许会继续、也许会中断，但我相信，说真话是人的一种本性，除非我们重建大、小皇帝的神圣光环，否则说真话的本性迟早总要导向民主，因此，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大概可以视为民主溪流中的一朵微小但毕竟昂起了的浪花吧。

2004年6月15日

7. 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

近来一些中国网站开始大规模地争论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次讨论的缘起是香港的金融学教授、公司财务学研究的国际一流学者郎咸平对中国包括海尔、TCL这样著名公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公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批评。据说他就此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我在网络上还没有找到他的报告。但直觉告诉我，他抓住了中国目前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是中国私有化的规范问题。同时，他抓住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具体案例从微观层面上揭示中国公有（以下简称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流失的严重性。这种方式比起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仅仅从宏观层面上强调现行私有化方式的错误和危险，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这场争论中，我的观点很明确：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中国公有经济必须私有化，而私有化必须公开和规范。

近十年来，中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是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不争事实。尽管网上和网下的媒体全都忌讳私有化这个词，而使用似乎只是改变经营权的“民营化”字眼来指代私有化的事实，但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企业经理抑或经济学家，都明白中国从事的国有资产“改制”是改变所有制，是把它改成私有制，是实实在在的私有化。为什么要私有化？原因很多，我只想提及一条：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不愿意为别人打工，而希望为自己打工。他们的愿望自然是合理的，因此，为了提高企业效益，必须满足他们的愿望，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让这些人不但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剩余（即收益分配的）控制权，而且掌握企业的资产所有权。既然政府没有能力识别出至少也愿意打工的经理，既然政府没有能力管理和节制不愿意打工的国有企业经理们，既然经理们在私有化之前已经用各种方式转移国有资产，那么早一天私有化确实比迟一天私有化好，因为迟一天私有化，国有资产就多流失一个亿甚至十个亿。就此而言，私有化是中国经济的必然之路。我读的郎咸平言论不多，但似乎感觉到他可能反对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比私有企业差，国有企业也能够做大做强。但他这样论证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政府既没有任命国有企业经理的法律程序，也没有建立对他们的公开奖惩机制，更没有任何监督和约束企业经理的有效方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或者驻企业特派员，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维持的。如果不私有化，它的结局就是被西装笔挺的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偷走一部分、浪费一部分并最后破产。

但是，另一方面，我完全同意郎咸平先生规范私有化的观点。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就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私有化与否，而是私有化规范的与否。私有化本身正确并不同时意味着私有化可以不加规范地采取任何方式。“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使中国富裕起来的）的猫就是好猫”的口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之所以正确，是因为邓小平所用的猫恰巧是市场经济。如果他在这个口号下用勃列日涅夫强化计划的猫，这个口号就是错的，尽管邓小平也能够用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的经济成绩证明其暂时的正确。在今天，“不管白猫黑猫，使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猫就是好猫”的口号之所以不正确，就是因为中国用的猫，恰巧是不公开不规范的私有化方法，是官员和经理的腐败和偷盗起着重大作用的私有化方法。腐败和偷盗确实能够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向四人帮 1976 年上台的话也会振兴中国经济一样，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都不会稳定。而应用目前的私有化方式，中国很难建立稳定的私有制。我的理由很简单，一个不保护国有资产的国家不可能稳定地保护私有资产，就像一个不保护私有资产的国家也不可能稳定地保护国有资产一样。这是中国的一个制度怪圈。中国只有从这个怪圈中走出来才有希望。然而，由于大规模公有资产的建立总是伴随着历史的非理性甚至暴力，所以，中国走出怪圈的希望仅仅是在建立私有资产的关头，仅仅在于公开地规范地建立私有制。用欺骗的腐败的方式私有化的结果，将可能是为下一次公有化准备条件。当然，这一点已经超越了一事一议的经济学理性范围。

在当前制度下，中国本来可以把私有化做的公开得多、规范得多。比如，由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决定上市的私有化公司可以送给或者低价卖给经理和职工的股份比例范围、送给或者低价卖给政府官员的股份数量范围；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和公布私有化的主要程序和日程；聘请社会贤达或者处在公开化言论监督下的港澳台专家观察若干私有化案例；对已经私有化的公司的私有化过程作出评估；对国有资产因私有化而出现的变动发出公告；对私有化的收入做专项管理等等。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务院作为国有资产管理人，不具备出售尤其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的资格。由人民代表大会对私有化作出基本规范，这是私有化取得合法性的第一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下一步的私有化（或者媒体用词“民营化”）应当能够公开地规范地实行。

2004 年 8 月 31 日

8. 国企出售的公开化是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对社会热点问题变得不甚关心了。有一段时间家里没有电视机；有了电视机后也很少看新闻，而电视新闻往往也不播送热点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出售或者私有化的问题，我直到 2002 年夏天才意识到——当时一位刚得到企业很多股权、但对自己的一日暴富又觉得不妥的朋友找到我的门上。那时我才意识到中国的私有化已经走了多远、国企的私有化又是多么黑暗。一旦我意识到它，我就意识到解

决问题的症结所在：私有化的规范化。尽管我开始查找文献，了解私有化的理论和实践，但是从我意识到它开始，我就强烈地感觉到私有化必须公开（public and open）：公开信息（let information public to all），公开竞价（let pricing negotiations open to all）。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无论对于赞成还是反对私有化的人，无论以什么样的理论为依据，无论国情、厂情多么特殊，只要一个国企搞私有化，公开化就是第一位的。

确实，我们在中国看到许多理论，分别从公平、从效率、从可行、从政治过程、从法律框架、从经济人、从不完全信息、从自发行为、从企业家定义、从治理结构等许多角度出发，支持或者反驳私下私有化的必要性。但所有这些理论都不如日常生活中的一句话有力：大家的東西大家管。而大家管的前提就是对大家公开，public and open to all。

不妨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有好些理论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不应当偷窃：（1）偷窃收益小于偷窃成本；（2）偷窃收益小于被发现的概率与处罚额之积；（3）司法机构查证偷窃的成本小于法院确证后处罚偷窃的收益，等等。我不否认这些理论的意义，然而，我们同时又必须明白所有这些理论的意义加起来也不如幼儿教育的一句话：不偷窃。

因此，在我们发展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我们作为一个人、尤其作为我们自己孩子的榜样所应当具备的某些基本品质。只有在这些基本品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谈理论，谈特例，而不是用后者来抹杀、否定或者大范围地限制它们。比如对于不偷窃，我们不能够用公平（别人都偷）、用效率（偷更容易得到）、用可行（偷很难被发现）或者其他理论来支持，不管这些理论看上去多么科学、模型多么精致、逻辑多么严密。

同样，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式的问题上，公开化是第一位的。只要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还具有不偷窃的品质，还不用公平、效率等各式各样的理由来为偷窃辩护，那么，在国企私有化方式上，他就会要求公开化。这里，我们既不需要公平、效率、可行等各式各样的理由，也不需要不同理论的共识。这是因为，就像不偷窃一样，国企私有化的公开化，从本质上说是不需要证明也无法证明的。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这里牵涉到的不是科学，不是理论，而是为人处事的准则，是社会行为的准则。在这里，一个人感受到的不是科学的逻辑或理论的精巧，而是类似天主教上帝的救赎召唤或儒家先哲的求仁欲求。它们不属于任何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社会科学，但它们是比所有社会科学更重要的人的行为准则，它们构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前提，就像欧几里德的五个公理构成了欧氏几何学的前提一样。就国有企业私有化来说，只有在公开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讨论如何私有化，讨论为达到私有化的不同目标并在一定条件约束下最好地实现其中某个目标或者某些目标集合的私有化方式，讨论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展开学术的论争，并对实践发挥不同的作用。没有了公开化，全部私有化理论也就不复存在。这也就是我们不能够用私有化理论证明私有化需要公开化的原因，也是我所知道的全世界现存的所有私有化理论、私有化模型都把私有化的公开作为前提（并且是不言而喻的前提）的原因。因此，我们实在不必要把私有化是否应当公开化当成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应当回到它的本来性质：一个人或一个政府行为处事的准则。

2004年9月28日

9. “2050 年以后” 的中国经济制度

一位年轻朋友最近写信给我，希望和我交流关于马克思理论与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他说：“我所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基本上都是以 2050 年为一个里程碑。在 2050 年以前，可以积极发展非公制经济。到 2050 年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并认为那时中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马克思所要求的实现社会主义转变条件。对于 2050 年以后是怎么样，我好像没有看到国家在这方面的任何政策，我自己认为到 2050 年会不会又重新回到 1953 至 1956 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改造的形式肯定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到那时非公有制经济可能要被消灭。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是生产社会化是本质要求。不知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问题？”

他的真诚讨论态度让我感动。任何想法，包括我自己的想法都是有问题的。否则思想就无从争鸣、理论就无从前进。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想法。我不同意这位年轻朋友的想法。可是，在支持他转变想法的同时，我同样支持他坚持和扩展他的想法。思想是平等的。不管这位年轻朋友的想法是否与官方观点一致，是否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致，是否与我或者其它任何人的观点一致，他都和官方、和马克思以及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任何组织拥有同等的权利表达和发展自己的观点。

毫无疑问，“2050 年以后”的问题是目前中国最忌讳的问题。然而，经历过最近五十多年尤其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成年人，有几个人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呢？可又有几个人有勇气把它说出来？敢于面对未来的是年轻人。未来属于年轻人。写信给我的年轻人到 2050 年时应当是 60 来岁，正是担任中国和世界领导人的年龄。因此，年轻人必须而且应当考虑和讨论中国与世界未来的走向。这样，中国才有方向，中国在思想、文化上才可能步入先进国家行列。

我不同意这位年轻人的想法。首先，他对 2050 年中国经济制度的考虑建立在马克思的著名断言“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我不能肯定是不是每一位参加过高考的年轻人都背熟了那个断言，从而形成了对公有制的“自然”好感。在我看来，马克思这一断言至少在逻辑上还不成立。希望它成立的朋友们在这方面还有艰苦的思维工作要做。我认为，生产的社会化是一回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另一回事。前者到后者是否存在逻辑必然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马克思这个观点还是一种断言，而非逻辑论证。几百年来，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在提高，问题是，第一，假如承认马克思的观点，那么，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多高，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成为必然？第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是否有个小于 100% 的上限，因为总有一部分生产是为了生产者个体或生产者组织本身或者为了当地使用而生产的？如果有上限，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必然所要求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是否高于这个极限。第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即使能够达到 100%，它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逻辑链条如何建立？第四，如何排除高度社会大生产也能够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逻辑可能性？比如，微软公司为全世界生产视窗软件，它是否就必须（不仅仅是应当）由全世界人民所有呢？或者，我们也许能够设想一种经济状态，全世界每个企业都是私有的，都为了自己的利润目的而生产，却又都把全世界人民作为顾客而生产。这是一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存的状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证明这种状态的不可能性。可是，我没有看到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人做出过类似证明。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说法，这种状态会发生经济危机。可是，一种全世界的公有制，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吗？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读到类似的论证。因此，在我看来，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

仅仅是一种信念。信念可以启发思路，个人实践它是个人的自由，但用它从事牵涉许多人的实践则是危险的。此时，我们需要逻辑。我可以举一个类似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的年轻朋友的专业和化学有关。我想，我们都会同意一个化学家有权利坚信某种化合物存在的必然性，但他必须通过逻辑设想出生成这种化合物的可能过程，他才可以从事牵涉许多人的化学实验。

其次，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的社会化是全世界的，而非一个国家的。因此，马克思“本质上”否定了个国家实现生产社会化从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可能性。提出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是斯大林。他的理由是他的苏联已经在一国内实现了公有制。当时的苏联没有人敢反驳斯大林，他的论证自然成立了。马克思理论当然不一定正确，但我的年轻朋友谈的是马克思，我们的讨论先假定马克思是正确的。如果假定斯大林是正确的，我们则需要从另一个出发点开始讨论。

再次，根据马克思理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同时是个人自由的社会，马克思本人甚至用了“个人所有制”这个词描述那种社会。确实，没有个人自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只能成为生产资料的政治权势者所有制的美丽面纱。后者在马克思那里比生产资料私有制还令人厌恶。我们知道，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的制度。一个人首先必须在心理上达到内在自由，他才有资格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一个从内心就对权势者或者生产资料的管理者满怀恐惧的人，不具备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格。即使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一个看着权势者眼色生产的人，也在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所以，即使生产的社会化可能（注意，不一定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没有人的自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也肯定不会出现。其实，根据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概念，每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权利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如何使用生产资料的决定，可以要求改换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担心任何迫害，否则的话，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无从谈起。可是，在这里，个人自由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相容，也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因此，根据我对马克思的理解，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2050年以后”的看法是：第一，2050年中国可能实现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远远不足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2050年以后的一段长时期里，中国的生产社会化即使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中国社会也建立不了公有制，因为普通中国人要改变“伴官如伴虎”的恐惧心理，需要的时间更长得多；第三，如果中国在2050年或者以后一段时期内建立了公有制，那一定是政治权势者的所有制。

2006年11月15日

10. 三十年农村变迁

今年五一长假，我走访了年轻时生活了八年多的村庄。离开那里已经三十年了。

那是1977年，也是五月份，农活开始紧张起来。农民每天一早下地，到太阳下山才能收工。因此，离开村庄，离开急需劳动力的生产队，心里多少有些不安。所以，我理解交白卷的张铁生在白卷上写下了感言：他无法在乡亲们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地复习备考。在当时情况下，我也许会像张铁生那样做出参加体力劳动而非复习的选择。另一方面，那样的选择在不同时代都可能出现。三个月前，我参观了杰克·伦敦（Jack

London) 纪念馆, 知道他曾因成绩差而被三年制学院开除, 他发奋读书并考取了四年制大学, 可为了帮助父母维持生计, 他没有读完一年便退学了: 他同样无法在父母亲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读书。

问题是, 为什么三十年前农民必须那么辛苦, 农业必需那么多劳动力, 以至于我们不参加劳动就于心不安?

三十年后的现在, 当我和年轻时的朋友坐在一起“忆苦思甜”时, 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农民现在舒服多了, 农业劳动轻松多了。我们也才发现, 农活本来不需要那么辛苦, 农业本来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

三十年前, 我所在的生产队, 120 亩地, 50 个劳动力, 无论按照今天的标准还是按照七十年前中国学者思考中国工业化时的标准, 劳动力都是太多, 都应当转移出农业。可是, 三十年前, 中国大陆有谁觉悟到农民太多呢? 我们缺少农民, 缺少人, 每一个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必须下地干活。学校在农忙时专门放假(“忙假”), 让学生回生产队干活。几个外出务工的农民必须回队劳动, 否则家里就分不到粮食。一年 365 天, 我们也就在春节休息三、五天, 甚至在“过革命化的春节”号召下, 正月初二就干活了。农田有数不尽的活儿要干。春季的麦田拔草、施肥、清猪圈、捞塘泥, 割草, 做草塘泥、夏季的收麦、插秧、交公粮、稻田拔稗、施化肥农药、收早稻种晚稻, 秋季的收稻、交粮、挖墒、种麦, 冬季的清墒、植树、水利。平时每天太阳出山就干活, 太阳下山才收工。农忙时, 天蒙蒙亮便开始挑肥料、整地、拔秧; 天黑后还要挑把子、脱粒, 早班、晚班甚至夜班连轴干。那时候, 田里种什么作物是由政府规定的。我所在村庄位于江苏省南部, 历史上实行的是两作制: 秋末种麦、夏初种稻。我在农村期间, 政府又安排改三作制、种双季稻, 即冬初种麦、夏初早稻、秋初晚稻。农民也就更忙更累。作为农民, 当时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缺, 就是缺人, 缺劳动力。我们太辛苦了; 甚至那么辛苦, 也满足不了政府加大农业劳动投入的要求。我们生产队不但欢迎政府派下的知青落户劳动, 当时有位自称中专毕业的男性青年, 不知何故经过我队而又没有确定去处, 队里竟也高兴地收留了这个劳动力。

今年重返生产队(已改名为“村民小组”), 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民劳动少了, 劳动强度低了。许多农活根本消失了。割草挑粪、积肥拔稗、挖墒清墒之类的劳动, 现在没有人再干了。三作制、双季稻二十年前就废除了, 理由是人太苦。如今农民干脆连两作制亦放弃了: 麦子不种了, 一年仅种一茬稻子。在他们看来, 一茬稻子收成够吃了; 粮食价格便宜, 种麦收麦又苦又累, 所以不种了。即使稻子一茬, 农民也无须特别劳累: 田平整好直接洒稻种, 既不要在水还冷得彻骨时下田育秧, 也无需脸朝黄土背朝天插秧了; 到收获时还雇收割机来帮忙。所以, 现在不但学校不必放假支农, 外出做工的农民无需回家帮忙, 就是留在村庄的农民也没有早班、晚班、夜班可干了。一年 365 天, 种田无需 100 天。三十年前的五月初, 正是积肥的关键时期, 我们在每块田的角落堆一个高高的肥料堆, 以便麦子收割后就近挑肥料压田, 因此田野上到处可以看到挑担子的农民。如今田野上没有人影。农民不是外出打工, 就是休闲在家: 农民倒真是多了, 因为没有农活可干了。我到了各户人家, 除了个别人在菜地干活外, 大多数人都在休闲。因此, 假设今天还有像张铁生那样对农活不能置之不理的青年, 他们也有许多时间安心学习了。

三十年不算长。农民多甚至过剩也不是百年可以形成的现象。可是, 为什么三十年前中国那么地缺少农民以至于需要他们那么地辛苦劳作呢? 学者们也许会提出各种解释。作为三十年前农民的我和始终是农民的我的朋友, 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政府现在不强迫了。政府不再强迫农民交公粮(可城市人却也没有缺粮!), 也不管农民如何种田, 甚至还扔掉了“为革命种田”的神圣光环。三十年前, 不说种麦交公粮的大

事，就是“人积百担肥”、“墒挖半尺深”的号召，就让农民疲于奔命、苦于劳作。三十年后，农民管自己的田地、自己的吃饭和收入，粮食既不见少，劳作也大为轻松。据说近几年的民意调查发现农民的幸福感最强。我原先不相信。这次重返农村，在惊奇于麦地里竟然有牛散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以为的麦地，长着的原来是一片野草，也才领悟古时文人感叹的“农家乐也”，也许正回到现代中国的农家。

2007年5月5日

11. 农民转移：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如果有人问我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现象是什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农民向工人、乡下人向城市人的转移。中国经济第二重要的现象至少可以列出五到十种。但我认为，第一重要的现象只有一种：农民的转移。1978年，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二、劳动力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农民。200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五十七与百分之四十五，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各下降了二十五个百分点。再过三十年，我们将看到中国大多数人、大多数劳动力不再是农民。想到这一点，任何一位了解历史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彻底转变中国经济格局和社会格局的时代，一个我们甚至不敢想像其后果的时代，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思索，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几乎所有展望，都把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今天，我们终于发现这一前提即将失效，农民在中国即将成为少数人！

即使在狭隘的经济学领域，农民转移问题也具有根本意义。中国的“世界工厂”与巨额出口顺差、内需不振、收入分配、房地产等问题，离开农民转移都无法理解。没有上亿农民向工商业的转移，我们不可能生产出全世界到处可见的中国产品，不可能拥有万亿外汇储备，更不必讨论内需问题。没有上亿农民的进城，中国不会出现城市贫困，中国收入分配不会形成如今的格局。即使看起来面向高收入者的房地产问题，没有农民进城和他们对住房的需求，房地产市场也不会红火到如此地步。

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固然可以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增加资本与劳动力和通过提高技术来实现。但中国有几亿农民要转变为工人，这却是其他国家没有的特点。而只要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显著，农民到工人这一转变本身，就会提高产值，带来经济增长。所以，不理解农民转移，我们便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举个浅显的算术例子：一个农民一年生产的收入为5千元，一个工人的生产率则是5万元。工人生产率是农民的十倍。因此，即使中国不增加一个劳动力、一元资本，也不提高技术，但只要中国让一个农民转移到工业，中国国内总产值就会增加4万5千元。如果中国让1万个农民转移到工业，国内总产值将增加4亿5千万元；一亿个农民转移则增加总产值4万亿5千亿元。而中国2005年国内总产值也才达到18万亿元。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是改革制度、增加资本、提高技术，以保证农民能够自由地择业、工业能够自由地择工，保证农业有能力释放几亿人口，保证工业有能力接收几亿人口。

农民转移不仅仅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中国收入分配和中国人口的福利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78年以前的中国计划经济虽然造成了一定的经

经济增长，但它和农民没有关系，农民的福利没有提高。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复兴与中兴时期，农民生活都有好转，但没有农民到工人的转移，农民就只能处于长期贫困之中，经济增长的福利只能归于少数人。我们可以说，没有农民转移，大多数中国人就不得不置身于经济增长之外，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不会扩散到他们身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状况的真实写照。而有了农民转移，农民便直接参与了经济增长，直接获得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中国才有了大部分人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中国才可能彻底摆脱贫困。大部分农民通过转移，在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把自己转变为城市人，并且创造了条件，使小部分仍然留在农业的农民能够转变为农业工人（农业劳动者），这样，中国也才能够最终告别经济增长仅仅有惠于少数人的历史。

在中国，虽然我们 1982 年就有了第一篇把农民转移当成理论问题讨论的文章，1994 年有了第一个以中国农民转移特点为背景的理论模型，但与二十多年来农民转移的规模相比，经济学对农民转移的研究是太苍白了。当然，我们有理由原谅自己。仅仅四十年前，中国政府还动员几千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务农；仅仅三十年前，我们的报纸还宣传人力支农；仅仅二十年前，《经济研究》上的学术文章还用“盲流”称呼农民工；仅仅十年前，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才意识到农民转移对经济增长尤其地方富裕的作用，而直到现在，比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选题中，也还没有农民转移的题目。去年开始的新农村运动，甚至还带上了让农民留在农村的希望。而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在中国才刚刚成型。不过，即使我们有理由原谅自己的过去，我们也应当抓住现在，抓住这个中国经济甚至中国社会当今最重要的农民转移现象，做出自己的研究工作。

2007 年 5 月 26 日

12. 年休假制度应当首先考虑农民工

十天前，我就目前国务院酝酿的职工年休假制度提出建议，把高校职工寒暑假休假制度并轨到职工年休假制度中。这个建议引起了许多反对意见。我能够理解这些反对意见，因为我自己便是高校职工之一，深知取消高校寒暑假休假给自己带来的损害。但事有公理。世间常说知识分子以公理为先；知识分子自己也常自诩如此。高校是知识分子集中之处，即使普通职员也多有学位，若对公理或公理的贯彻有不同看法，也应当讨论之，实在不必一触及自身利害，便置公理与耐心于不顾。

不过，实在的说，年休假制度涉及的问题，首先还不是学校，而是成千上万农民工。虽然他们的身份是农民，但他们是职工。年休假制度必须包括他们。而正是在这里，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年休假制度的草案是模糊的。国务院法制办能够征求公众意见并许诺修改草案，是政府工作的一大进步。我认为，草案应当做的最重要修改，是明确承认农民工和其他职工同等的年休假权利。

目前的年休假制度草案，把年休假制度限定为职工。谁是职工，谁不是职工，本来是一清二楚的，在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单位从事工资性工作（即领取工资报酬的工作）的职员和工人，都是职工。这一点，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原先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了工商企业后，也是一样的。可从毛泽东执政开始，中国在废除了奴隶制的二千多年后，又正式地建立了

一种身份等级制度：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或农民身份与城市人身份。从此，无论通婚、迁徙、职业选择、上学当兵、最低生活保障，中国人都分成了两类，农民都成了不需要打引号的二等公民。正是因为这一二等公民的正式制度，饿死在毛泽东执政时期的中国人才全是农民。而这种等级户口制度的一个明显表现，是所谓的“职工”认定：非农业户口的工资劳动者才是职工；农民身份的人，在企业或者机关工作并领取工资的时间再长，也是农民。

所以，在中国还迟迟没有取消户口制度的时候，在有关职工的任何权利和利益的规定上，我们都应当要求这些规定明确写清包括或者不包括农民工。在年休假问题上，实际从事工资性工作的人，无论其身份如何（甚至比如外国人），都是职工，更不用说农民了，因此，年休假制度应当明确地包括农民工。

毫无疑问，承认农民工和其他职工同样的休假权，会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据说中国许多企业尤其出口企业，利润率很低，几乎全得靠农民工的低工资和少假期来支撑；否则的话，中国经济就不能维持。如果我同意这些说法的话，我还需要问的是：政府机关干部带薪休假、企业的城市户口职工带薪休假，就不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吗？他们同样甚至更多地降低了企业效益，因为他们每天的工资更高，他们每天工作的效益也应当更高的。所以，如果说带薪休假降低了企业效益，首先不应当带薪休假的是那些高工资高生产率的城市户口职工，是靠纳税人生活的机关职工。如果他们的带薪休假能够实行而中国经济还能够维持，那么，承认农民工同样的休假权利，中国经济就更能够维持了。

其实，从最简单的为人和为国之道来说，一个有良知的社会、一个有良知的人，不应当容忍在大批大批农民工没有带薪休假的同时增加城市户口职工的带薪休假。城市户口职工的福利，不应当建立在农民工低工资、少假期甚至无假期的基础上。因此，在建立年休假制度之前，国务院法制办首先应当研究如何保证农民工每天八小时、每星期四十小时劳动制度的贯彻实行，应当先采取措施，保证农民具有和其他职工同等的正常休假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再研究不分户口身份的所有职工的年休假制度。否则的话，年休假制度将造成新的特权和不平等，并且在中国的收入性贫富差距已经拉大的情况下，再一次拉大包括休假制度在内的非收入性贫富差距。

2007年11月27日

附录

带薪年假制度当然包括农民工

胡景北

（新民晚报 2007年12月11日）

近日，国务院原则通过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草案）在法定节假日之外，为职工提供了根据个人与企事业单位具体情况而灵活确定节假日的可能性，是我国职工休假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有读者投书媒体询问：该条例（草案）是否适用农民工？我认为它当然适用于农民工。条例（草案）把带薪年假制度的享受者限定为职工。谁是职工呢？职工就是在盈利性或非盈利性单位工作，并领取工资报酬的职员和工人。因此，按照条例（草案），无论农民、市民或者其他身份的人（例如外国人），只要和企事业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在这些单位工作了一年或一年以上，自然就应当获得带薪年假。那些读者的疑惑可能来自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对职工身份的某种认定。在那个时期，只有城市人身份的工资劳动者才是职工；农民身份的人，即使在企事业单位工作并领

取工资的时间再长，也是农民，不是职工。今天，我国早已放弃了计划经济，但是一些习惯做法还在延续，户籍制度还没有完全废除，因此，有人生发出带薪年假制度适用于农民工与否的疑惑，是不奇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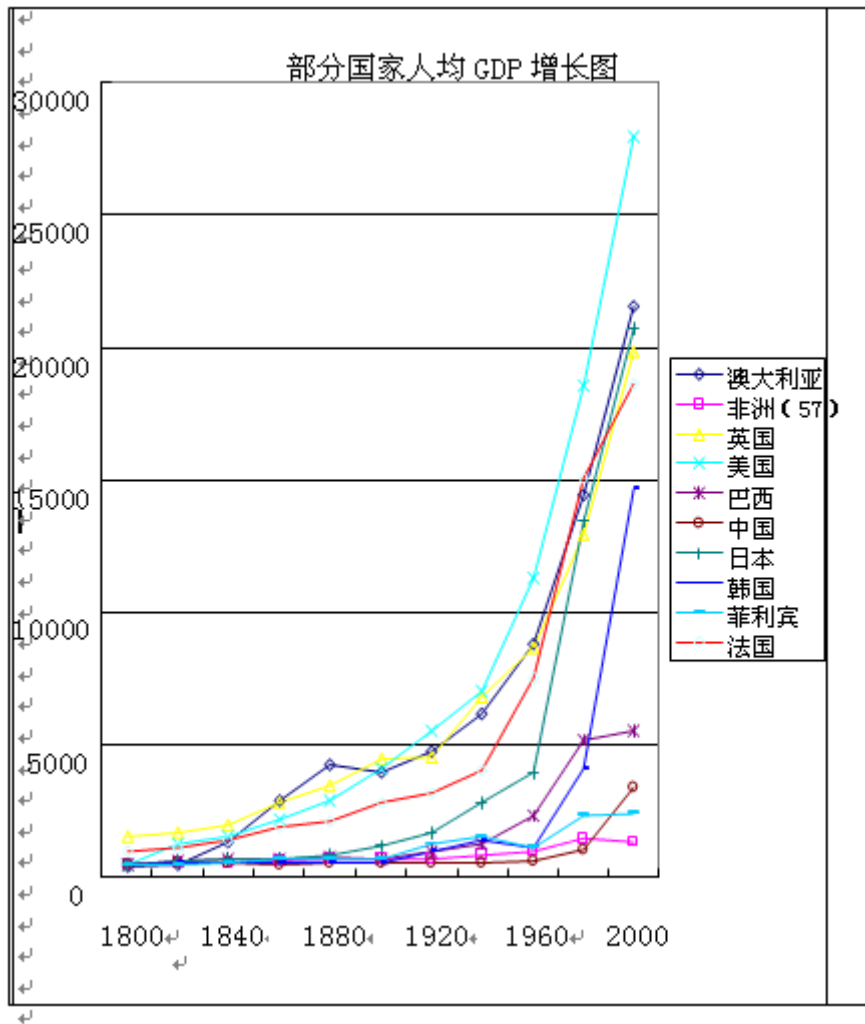
有些企业认为，承认农民工和其他职工同样的休假权会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据说一些企业利润率很低，全靠农民工的低工资和无假期或少假期来支撑。然而，城市户口职工带薪年假，就不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吗？相反，他们的休假会更多地降低企业效益，因为他们每天的工资更高，他们每天工作的效益也应当更高的。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存在有些企业效益好有些企业效益差。效益差的企业如果不能承受带薪年假的话，那也应当是该企业所有职工的问题，而不应当仅仅要求农民工放弃休假。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无疑应当体现到城市户口职工的福利上，可是，它也同样应当体现到农村户口职工即农民工的福利上。城市职工的带薪年假，本来就没有必要建立在农民工休假就不拿钱的基础上。最后，从为国之道来说，我们也不应该在否定农民工带薪年假的同时增加城市户口职工的带薪年假，否则的话，年休假制度将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拉大包括休假制度在内的非收入性贫富差距。

13. 200 年的经济赛跑，我们中国失败了

了解中国和世界，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做的事情。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特别需要了解中国和世界的世界经济发展，也有特别的责任向我的同胞说明中国和世界的世界发展。下面这张图是我们研究所绘制的，它列出了 66 个国家（其中非洲 57 个国家作为一组）的人均收入（人均 GDP）从 1800 年到 2000 年两百年间的变化动态。

这张图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惊心动魄。虽然以前我就知道 200 年来中国的落后，但这张图把 200 年来各民族的赛跑、把我们中国的失败如此直观、如此明确地表现出来，却不能不让我震动。历史就在我的眼前，事实就在我的眼前，在这么直观、这么明确的历史事实面前，一切语言都变得苍白，一切辩解都变得多余。是的，任何理论，任何政府，任何民族，任何人，都必须面对这么直观、明确的历史事实。不能解释这一事实的理论，无论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的理论，都将失去意义；不能承认这一事实的政府领导者，无论他是人民的救星、还是伟大的领袖，都将成为凄苦的“笑料”；而不能从这一事实获取教训并走上正道的任何民族，无论它具有悠久文明还是刚刚走出丛林，都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而不能意识这一事实的人，无论他是政治家、企业家、学者还是一介匹夫，眼界都是狭隘的。

1800 年是什么年头？这是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先后宣布人的平等自由的年头，是宪政法治开始建立的年头，是瓦特蒸汽机开始运用的年头，也是马尔萨斯提出平民大众永远不可能脱离贫困的年头。在那个年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同样贫穷。只有英国稍许“富”一点。但英国的稍许富裕在全世界引起的更多是批评和愤怒，因为英国达到那一步靠的是农民向工业的转移，可农民转移才第一次暴露了农民的贫穷：“田园风光和自得其乐”的农村生活原来是那么不可思议地贫穷，而农民进城又把贫穷赤裸裸地展示在从来没有见识过贫穷的知识分子面前；封建特权的消弭更让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成为贫穷者。那个时候，对英国的批评是太多了，以至于连马克思都要为英国人说话：德国人批评英国，可英国的今天正是德国的明天。马克思说的对，德国当时比英国穷的多，只是因为穷人“隐藏”在乡村而不为人所知罢了。



德国学者不希望英国的今天是德国的明天。马克思更想到了后天：英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到处可见贫困不堪的无产阶级，于是暴力革命就来了，人人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建立了。从 1917 年十月革命开始，二十世纪充满了暴力革命尤其是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暴力革命。一直到我上大学的 1980 年，中国的“经济学家”还在争论欧美国家无产阶级贫困到了什么程度。那个时候，我受到的教育是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三分之一人口因为生活在社会主义下是幸福和富裕的。

我们的 200 年人均收入增长图表明，马尔萨斯、马克思都是错误的。200 年来，全世界人均收入增长了近 10 倍。但是，许多国家几乎没有增长。增长最快的是以自由、民主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大众贫困、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不再存在，甚至无产阶级本身也仅仅限于少数人（而马克思认为大多数人会落为无产者）。资本主义不但在马克思时代创造了过去不可想象的财富，而且在马克思以后创造了更多得多的财富。相反，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富裕起来。

我们的 200 年人均收入增长图同时表明，在 1800 年以来的 200 年赛跑中，我们中国是失败者。1800 年时根本不在中国人眼中的韩国与日本，到 2000 年人均收入增长了 30 倍与 40 倍，我们中国才增长了 7 倍。1858 年，马克思曾经嘲笑当时中国的清王朝，说它“只能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继续自欺欺人”。100 年后，中国的毛泽东政府又一次“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继续自欺欺人”。当然，说 1858 年咸丰皇帝自欺欺

人有点过分，因为他委实不明白经济富裕是怎么回事。但 1958 年的毛泽东只能是自欺欺人了，所以他才需要封锁信息，需要强迫我们相信他是中国的救星。

失败并不可怕。我们要做的，首先是知道我们自己在全世界各民族的赛跑中跑到的位置。再次，我们需要总结 200 年来失败的教训。200 年来，我们中国有过 1900 到 1937 年的经济增长，有过 1952 到 1957 年的恢复性增长，有了 1978 年以来的高速增长。可造成我们失败的，是清政府 100 年的停滞不前，是毛泽东政府 30 年的倒退（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6 年》，1978 年中国人均收入在全世界 188 个国家中列第 175 位。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公开宣布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总结教训的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中国现在的增长方式能够持续 100 年或 200 年吗？到 2100 年、2200 年，我们中国的人均收入能够进入世界前列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在刚刚过去的 200 年的赛跑中始终跑在前列的那些民族善跑的原因，需要了解后来跑入前列的那些民族变得善跑的原因，同时，我们更需要了解我们自己停滞不前甚至还自以为跑在前列的原因。1800 年之前，我们中国刚刚经历了“康乾盛世”，可盛世之后却是人民极端贫穷的长期停滞。所以，在这张各民族经济赛跑的图面前，想到 100 年、200 年后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我们需要的不但是一、两个执政者的盛世，更需要的是保证中国长期增长、人民富裕的基本制度。

2007 年 12 月 26 日

（“部分国家人均 GDP 增长图”所用数据来自于麦迪森《世界经济两百年回顾》与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数据单位为 1990 年国际元。该图在 1800-2000 年中每二十年取一样本点）

14. 三、四月份之交的断想

2008 年 3 月一瞬间就过去了，今天已经是 4 月 1 号。

三月是一个从冬天到春天的月份。尽管三月还发生过几次寒流，但温暖的步伐更为坚实、更为有力，并最终代替了寒冷。

三月，是生命勃发的月份。软弱的麦苗，突然站直了腰杆；低矮的油菜，猛地窜高了身材；说不出名字的各色树木，一下子都显出了绿色：绿色的胞芽、绿色的细叶。雪白的樱花、粉红的桃花、鲜红的山茶花率先展现出自己的风采，争芳斗艳，吸引着饱受灰色冬天折磨的人。

在我年轻时务农的地区，油菜花一定绽放了。金黄的菜花和碧绿的麦苗交相辉映，在那蔚蓝的天空和灿烂的阳光下……

如果说三月份是自然界大放异彩的月份，那么，四月份就是人类勤劳耕耘的月份了。

三月份，人还猫在家里，把上年留存的种子拿出来，挑检出形状端正、色泽鲜明的种子仔细地放在一边；把上年用过的农具拿出来，镰刀、锄头、箩筐、扁担一一整理齐全。

四月份，人就忙在地头了。俗话说“清明前后，种瓜种豆”。瓜有南瓜、黄瓜、菜瓜、丝瓜、冬瓜，豆有毛豆、四季豆、豇豆。由于小孩子会摘黄瓜吃，人一般不种黄瓜。菜瓜也能生吃，但菜瓜粗，小孩子不喜欢吃；结的又多，还能腌制到冬天没有

菜的时候吃，所以菜瓜种的很多。除了瓜、豆外，人还种各种蔬菜。种的最多的算辣椒和茄子。种子下地后就得浇水施肥。这时候就希望下雨。四月份的雨细而不烈，正好湿润土地。如果不下雨，人就得从池塘挑水浇地。忙的时候，池塘边常常穿梭不绝。挑水的多是女人，因为女人负责家里的菜蔬种植。四月艳阳、挑水用力，女人们都一改冬天的棉衣，换上过年时用花布缝制的单衣，活泼轻松、年轻美丽，让男人突然发现身边的女人竟然如此青春阳光。

在我年轻的时候，四月份最恼人的事情是没有干饭吃。不但没有干饭，连稀饭也越发稀了，端着饭碗常常能够看见自己的鼻梁。上年分得的粮食已经要吃完了。地里的麦子尚未灌浆，根本没有吃的可能。秋天种的青菜、菠菜，这时候茎秆挺立，即使无需留种，也是既少又难吃。刚刚种下的瓜、豆只是希望，离能吃的未来还很远。四月份要干活。不干活以后没有吃的；可干活就要吃，没有吃就没有劲干活。事情就是这么难，人就遇着这样的窘境。也许是上天安排吧。四月恰巧是青春的日子，尽管忍饥挨饿，可温暖的太阳、清新的空气让人的四肢解脱了束缚，获得了力气，瓜、豆、菜种下了，稻子、山芋育秧了，到处生机勃勃。接着，豌豆头和豌豆成了最早可吃的过冬作物。在我务农的地区，豌豆是作为绿肥种植的，政府只考核它的种植面积，不考核产量的，因此农民可以随便到地里摘豌豆头和后来的豌豆吃。那时候，农民常常捧着一大碗煮熟的豌豆荚在村里边吃边串门，吃完了随便在哪家再盛一碗。豌豆是过年后第一次让人吃饱肚子的东西，人的嘴唇往往都吃绿了。现在煮豌豆成了城市饭店的一道菜，小碟子上十几个豆荚，吃的人都很矜持，不会想到豌豆贫贱的时候。农民也把豌豆当零食吃了。如今政府不再强征“公”粮，过年后农民家里总有些存粮可以接到麦收。也许，青黄不接的四月永远过去了：春天开始平等地对待农民和城市人，农民再也不必忍饥挨饿地种植希望、等待未来了。

2008年4月1日

六、自由主义

1. 穷人需要的不是仁君，而是自由主义

最近一位网友给我留言，在反对自由主义的同时，谈了很多中国传统统治方式，赞扬仁君，把毛泽东视为仁君并希望这样的仁君重现（见 www.hujingbei.net 的留言板）。我的看法不同。中国传统的统治术即宽严之道，所谓宽猛相济，政是以和，而王朝兴衰多与宽猛当或不当有关。古往今来的学者对此总结很多。可无论宽猛，儒法，中国传统统治术都坚守一条底线即“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然而，世事变迁，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再从统治者的角度谈宽猛之术了。下愚者也要发言，也要参与决定政治，决定谁上台谁下台，而且用和平的手段决定之。

那位网友认为许多君主不但口头讲仁而且本来就是仁君。我承认有这样的可能性。但一个君主仁不表示他的儿子、孙子一辈辈都是仁的。所以，靠一个君主的仁可以有一段时间的稳定和谐，但不会长久。中国很多王朝延续了三百年之久。可是，比如英国王朝延续的时间也有 300 多年了。再比如美国建国已经 230 年了，其内部发生暴乱推翻体制的可能性，大概在未来 70 年或者 170 年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延续三百年应当不成问题。那里好像没有仁君。可见仁君不是王朝稳定的必要条件。

其次，如果不再是家族王位继承，那么，即使第一个君主是仁君，谁来继承他呢？毛泽东、斯大林没有选好接班人。毛泽东最后信任的就是家人。金日成干脆用家人来继承。排除家人继承，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君主如何“选”好呢？清宫剧演了许多皇位继承的故事，即使排除其中虚构部分，我们民族也不应当有那样的阴谋故事！！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权君主的继承照样是阴谋故事，为什么？就是因为不公开，不让老百姓来决定。而如果王位继承靠阴谋，君主就不会是仁者。

再次，这个世界有了许多国家，有的国家竟然也让老百姓来决定君主了。除非封锁信息，除非迅速把这个国家消灭，否则这样的消息是太吸引皇权国家的老百姓了。观念改变世界的力量就在这里。人一旦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人就会争取。而这正好是中国历史上没有遇到的情况。

给我留言的网友认为仁君会抑制强势阶层，稳定社会。这有一定理由。他说的对，现在是小资在喊房价高。穷人、普通工人农民根本想也不敢想买房子。可是，为什么穷人没有喊呢（穷人无疑不会认为自己就应当买不起房子）？是穷人自己不喊，还是有人不许穷人喊？记得列宁说过，资本主义给工人自由有什么用？工人没有钱来自由，比如没有钱来租会场集会。于是工人拥护列宁。他们希望在列宁领导下又有自由又有钱。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列宁一上台，不但不给工人钱，干脆连自由都不给工人了。在列宁朝代，工人就是有钱，租得起会场，也不准集会。资本主义下，马克思没有钱，却仍然可以筹出钱来出版他的剥削理论书，因为他首先有出版自由。可在列宁和毛泽东时期，不管有钱无钱，要出版说穷人真苦、穷人不应当那么苦的书，那是没门。两相对比，仁君制度还是这些仁君反对的制度对穷人更有利，就很清楚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每个人有一票可以选举的话，穷人那么多，那么，更多反映穷人希望的候选人（比如主张对拥有二套或更多住房的家庭征收高额住房税或者主张严厉处罚把经济适用房卖给富人的官员的候选人）更可能当选。即使没有当选上，穷人的希望也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表述，穷人也喊出了声音，而不单单是小资在喊了。那位网友的想法，如果有位仁君就好了，他会压抑炒房的强势阶层。但正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即使如此，谁能担保这位仁君的大公子继承王位后也压抑强势阶层？而穷人手中的选票，能够以更大的可能性长期担保穷人自己的利益。

即使不谈仁君的继承人问题，君王本身是否仁也大有疑问。那位网友认为毛泽东

是位仁君。我认为不是，尽管三十年前我还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君子和人民救星。我认为毛泽东不是仁君的理由很简单。在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饿死人的数量，就数毛泽东执政时最多了。中国历代开国皇帝都有了了不起的地方，秦始皇、刘邦、朱元璋，毛泽东，但在开国皇帝执政的和平时期就饿死那么多人，毛泽东是第一次（因为开国君主执政时期都是复兴时间，旧强势阶层瓦解了，新的还没成形；人们厌倦了战争，希望安居乐业，也有了安居乐业的条件，生活走向好转，饿死人的事情应当很少发生的）。中华民族历史上饿死人的情况不少，但大规模地系统饿死人的时期不多，毛泽东时期就是其中之一，并且是其中最为严重的。中国历史有许多朝代。我们现在看比如 1900 年以前二千年的改朝换代，已经不会为某个朝代的建立感到特别兴奋。再过 100 年，那时的中国人看历史，对 1949 年毛泽东建立新王朝也不会特别兴奋。那时候人们更重视的是它和别的新王朝的不同。我敢说，发生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惨重的饿死人事件，将会被历史学家认定为毛泽东王朝与别的新王朝最大的区别。

这样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而且饿死的都是穷人，不是强势阶层的人？我认为，这样悲剧出现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穷人恰恰在毛泽东时期最没有发言权，最被禁止说话。就此而言，毛泽东最强烈压抑

的不是强势阶层，而是弱势阶层，是穷人，是农民。

今天，中国依然有很多穷人。那位网友说的很对，与小资相比，他们说话太少。可至少在网络上，他们毕竟能够说话了。此外，像那位网友、像我这样能够说话的人，也应当从穷人的角度说话，否则我们无法提出为什么穷人说话太少的问题。可穷人说话的前提是大家有空间有自由说话。我认为，对穷人最有利的的方式，不是祈求仁君出现以禁止小资们说话。因为如果禁止小资说话，就必然会同时禁止穷人说话。也许有人会像列宁那样说穷人反正没有钱说话。可是，说个话需要多少钱呢？孔夫子学生再穷也把“苛政猛于虎”记了下来，马克思再穷亦出版了《资本论》，许多下岗工人没有钱照样在网络上写了不少批评社会不公的文章。如果工人有权利说话的话，即使他们没有钱，他们也能够阻止许多国有企业的贱卖。事实上，由于仁君不准大家说话而蒙受最大苦难的，不是小资，而是穷人。不要仁君，要说话自由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穷人，因为只要让穷人说话，穷人就不但可以避免饿殍之灾，而且可以迫使执政者（不管执政者是不是仁者）压抑强势阶层，缩小社会不公，也就是建成那位网友说的强大国家。不过它不是那位网友设想的仁君专制国家，而是自由主义的强大国家。所以，我坚定地认为，穷人需要的不是仁君，而是自由主义。

2007 年 9 月 20 日

2. 君主乎？人民乎？

寒假在德国期间，一些国家正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60 周年。德国电视台也更多播放了不少当年的照片。当年美国飞机轰炸德国的一些照片，在德国还是第一次播放。显然，许多轰炸是多余的，造成了无辜居民的死伤。不过，即使是最反战的德国左翼知识分子，也没有否认美国轰炸的必要性，这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轰炸，德国人民的抵抗士气不会下降，对纳粹政权的信心不会动摇。

经过战后若干次讨论，现在的德国人民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在整个德国民族身上，在德国人民身上，而不是希特勒等一小撮民族败类的责任，

虽然后者应当付更多的个人责任。国际学术界也接受了这一认识。正是为了避免德国人民再次走上犯罪道路，战后的德国把西方世界的融合、把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从而德国这一国家本身的消亡作为自己的长期目标。

整个民族、整个人民也可能错误，可能犯罪。这种思想对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谈到日本的侵华战争，我们都习惯于谴责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而用日本人民是好的来安慰自己、安慰日本人。谈到现在的伊拉克危机，我们的报纸总用美国政府准备战争、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准备反抗的语言，来表明他们同情伊拉克人民的态度。这里隐含的前提是人民总归是正确的，永远正确，绝对正确。

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在幼年的时候或者软弱的时候，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依靠。但更多的时候，这一民族或者社会把某个外在的权威绝对化并作为依靠。在我们中国，古时候以为君主绝对正确。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教条很少有人相信，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却成了大义，渗透了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甚至成了臣子良心的一部分。对朝政啧有怨言的人，批评的都是奸臣宦官弄权，而从不怀疑君主的绝对性。即使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还是靠新的真命天子来支持着君主的绝对性。辛亥革命后，君主不复存在，开始有了国民、人民的称呼，于是权威的绝对性也就从君主向人民转移。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几十万造反群众的簇拥下，领袖高呼着人民万岁，群众高呼着领袖万岁。当时的我，也为领袖能够喊出人民万岁而激动。文革既过，领袖的绝对性不复存在，人民取得了绝对的权威。人民支持的，自然就是对的；人民反对的，自然便是错的。当然，说这些话的都还是人民的代表，也许他们会错，可人民本身是不会错的。因此，即使伊拉克人民百分之百地投票选举侯赛因执政、即使伊拉克人民默认和帮助侯赛因藏匿着联合国禁止其持有的武器，伊拉克人民也是正确的。

其实，人民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任何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由这些个人组成的群体的智慧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既有限，就难免犯错误；如果太不自谦，甚至还会犯罪。所以，绝对正确的人民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当一个个的个人还不习惯于自由思考、社会内部还不能自由讨论、这个社会还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时候，组成这个社会的人民在整体上是非常可能犯错误的。所以，我们在放弃君主和领袖权威的时候，不应当再把人民当成绝对权威。在观察目前的伊拉克问题时，德国人民当年的错误以至罪行可以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伊拉克人民一定是正确的。

2003年2月25日

3. 布痕瓦尔德的耻辱

我到过德国多次，但没有访问过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其简称“纳粹”或“纳粹党”、“国社党”倒更为人知）于上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为迫害反对者而建立的集中营遗址，心中颇觉不安。这次到德国来，正好一位德国朋友也没有访问过类似遗址，也为此常有不安之感，于是一拍即合，两个人今天去了德国本土最大的集中营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

布痕瓦尔德位于德国文化历史名城魏玛市。纳粹党是以重振德国雄风为口号起家的，因此特别得到了以德国文化为骄傲的魏玛人民的拥护。这也是国社党把集中营放在魏玛附近的原因之一。德国最灿烂和最恶劣的文化竟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拥有最

灿烂文化传统的人群竟然会拥护最恶劣的文化！即使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旁，国社党员也设了一个小动物园，他们对动物那种关爱细心，连集中营展厅中的说明亦提及了。

但反对纳粹党的人不能算正常人，他们也就不及动物：因为动物还能够唤起怜悯，那些被纳粹党视为“反人民反国家”的人却只能引起仇恨。纳粹党执政伊始，便取消了新闻、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否认了个人财产所有权，并开始建立集中营镇压反对者。接着纳粹党又在“纯洁德国民族”的口号下把犹太人当成民族之敌，大批善良无辜的犹太和其他少数民族人被抓入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积极和部分消极的反战者、苏军和盟军战俘又被投入集中营。从1937年到1945年，仅仅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前后便关押了大约二十五万人。在这里，囚徒必须服苦役。纳粹党把他们当作战时经济中的奴隶、牛马不如的奴隶。仅仅为附近导弹试验工厂挖掘一个坑道，囚徒就死去2900多人。1939年11月8日暗杀希特勒未遂的事件发生后，为了报复，纳粹党第二天就在这里杀害了21名犹太人，并停止全体犹太人食物三天。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记录在案的死亡者就有34000多人。那些被直接投入焚尸炉的、被当作射击演练靶子的、在路上死亡的人都没有记录，估计加起来有56000人。而最终获救的囚徒终生都受着集中营造成的残疾和噩梦的折磨。

站在一排一排的囚房遗迹前面，对着用德文、英文、俄文、波兰文、保加利亚文镌刻的悼念碑文，我的同伴喃喃地说自己真为是一个德国人而羞耻。我说的是，但不仅仅德国人，我们任何一个人人都应当感到羞耻。人类在二十世纪中留下的耻辱，文明人用理性方式犯下的罪行，使人类自诩的技术成就失色。远处的苍茫群山，近处的罪恶废墟，山风猛烈地刮着，令人几乎无法喘气。也许，风在为无辜的死难者招魂，把他们终于被承认为人的魂魄送到远山、送过远山，警示着全世界每个民族每个人，警示着我们刚刚跨入的二十一世纪。

2004年2月7日

附录：

在金山词霸2003版收录的词典中，对“Buchenwald”的解释如下：

简明英汉词典：布痕瓦尔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南部一村庄]（1937至1945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残酷屠杀了数万名反法西斯战士）

美国传统辞典：布痕瓦尔德 德国中部，靠近魏玛的一村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集中营所在地

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布痕瓦尔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市镇，1934—45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残酷屠杀爱国者和战俘）

按：简明英汉词典和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的说明有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1990年起便加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不复存在；在布痕瓦尔德被害的许多人是并不反对法西斯的平民，且纳粹党也是爱国的。

4. 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从伊拉克大选说起

昨天（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举行了1953年（我出生的年份）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尽管各种报道说法不一，但我可以肯定的两个事实是：一半以上的伊拉克选民投下了选票，选举过程没有特别重大的舞弊贿选现象。就此而言，伊拉克选举成功了。

毫无疑问，这一次伊拉克选举是外来力量促成的。没有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推翻前伊拉克专制政权，没有多国部队对各种反对武装的强大镇压，这一次自由选举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竟然有那么多伊拉克民众勇敢地走到了投票站，投下了一生以来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签注的选票，仅仅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表明，刚刚在三年前举行的只有一个候选人、并得到了 99.99%选票的伊拉克选举是多么地令人恶心，而两年前还以“伊拉克人民”名义所做的专制主义宣传又是多么地令人可笑。

是的，伊拉克民主是外来力量强加给他们的。但这么多选民自愿地冒着生命危险投票，却向世界证明了他们需要民主。由于各种各样原因，他们自己争取不到或者很长时间争取不到民主，不得不忍受本民族的专制。外来民主力量利用某个契机推翻了他们的民族专制，为他们创造了民主的前提，甚至“强迫”他们接受民主制度，为他们打开了通向历史的大门。这里，契机的定义是重要的，打开历史大门是重要的，为此而付出的牺牲也是重要的。外来民主力量必须在这三个问题上做出恰当的决定。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外来民主力量向其他民族推行甚至强加民主制度的历史。俄国、中国在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尽管层次不同）是接受外来民主观念的例子，德国、日本、印度在二十世纪中的民主化则是接受外来民主强制的例子。伊拉克事件只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延续而已。自由、平等的民主制度便意味着每个人可以对这段历史持自己的评价。可是，如果我们想象德国、日本、印度现在还是专制国家，世界会是什么局面，我们就会明白，把民主制度强加给这些国家是多么地必要。就说我们的近邻日本吧。即使日本某个派别想发动战争，向选民解释战争理由和国内各种意见的公开争论，也会大大降低这个派别实现战争想法的可能性。就发动战争来说，一个民主国家需要道义理由，但一个专制国家只需要言论控制下的谎言。因此，如果日本现在是专制国家，中国面临的危险将严重得多。

德国许多学者承认德意志民族没有民主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德国民主制度是外来力量强加的结果。正是外来力量用扳道岔的方式强制改变了德国的政治道路，德国才有了如今的公民平等、自由和富庶。今天，能够自由表达意愿的德国人已经养成了平等、民主的基本习惯；他们感谢当年的外来力量。即使在同样没有民主传统、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责任的反省远远不如德国深刻的日本，民主制度也已经扎根。德意志民族、日本民族、伊拉克民族，还有许多其他民族，不是没有民主的历史传统，就是民主传统过于薄弱，不足以依靠自身力量在比如一、两百年的时期内建立起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民族需要外来民主力量，需要在强加的民主下形成自身的民主传统。就此而言，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即使当人类社会已经走入二十一世纪，即使在大多数人已经具备知识的“知识经济”时代。

2005年1月31日

5.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

四十年前即 1966 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这一年起，全中国的中学、大学不再招生。原定 1966 年秋天进入中学的全国几百万名六年级小学生，必须等到 1969 年才能升学。

我很幸运，1965年进了中学，因此，虽然我“没有赶上巴黎公社、没有赶上十月革命、没有赶上打蒋匪”，可是赶上了中学，“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赶上了打倒刘少奇”。千百万大学生、中学生和全中国人民一直革命到1968年。那一年，革命终于无以为续，而农村成了城市大、中学生唯一可能的归宿。

在我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就是1966到1968的三年，那暴风雨般的三年，那不上课、不工作、所有学生都成了职业革命家的三年。现在所说的文革十年，加上了1969到1976的七年。其实，那七年无论对红卫兵、对走资派、对中国历史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那只是强弩之末，只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勇气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而有名无实地延续着而已。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够清楚地回忆1966年10月18日，我卷在一百多万红卫兵的汹涌人潮中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巨大场面。同时，我的脑海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在沙皇检阅军队时的感觉：沙皇“只要说出一句话，这支庞大的军队（他自己虽是微不足道的一粒砂，但是他和这支军队息息相关）就要去赴汤蹈火，去犯罪，去拼死，或者去建立伟大而英勇的业绩，所以一知道这个人就要说出这句话，他不能不颤栗，不能不为之心悸。”是的，文化大革命的回忆也不能不让亲历者颤栗和心悸。托尔斯泰小说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被划为禁书。如果说，1966年时13岁的我还不明白巨大的群众运动既可能建立伟大而英勇的业绩，也可能犯下凶残和暴烈的罪行，那些读过托尔斯泰的大学生们、成年人们难道不明白吗？我的中学班主任是俄语老师，他肯定读过托尔斯泰，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说法不一定正确？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他这样说，他立即会被我们学生当成“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而受到批斗。可是，在形势走到极端之前，为什么他不对我们说说托尔斯泰呢？现在，我自己是成年人，读过托尔斯泰，又处在言论虽然受到限制、但毕竟比文化大革命时期宽松得多的社会环境，因此，面对虽然不可预知、却可能重演历史的未来，面对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包括无法理解我自己当年日记的青年人、少年人质询的眼光，我愿意说说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既是毛泽东维持个人专制采取的一个残酷手段，也是中国人建立理想社会进行的一次野蛮尝试。一方面，它把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实验推到极端从而彻底暴露了它的不可行性，另一方面，它把中国历史荡秋千似的轮回在二十世纪推到极端，因此给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添加了更多变数和更大风险。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是全民性的红色恐怖和人民的政治自由。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它和中国历史轮回的关系也围绕这两个特征展开。

（1）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裁专制的一页。在那个时期，中国人不但一切行动以毛泽东的话为准，而且一切思想也以毛泽东思想为准，任何有违于毛泽东的话和思想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的，都立即受到暴力惩罚。类似状态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但从来没有达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暴烈程度。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和以往历史上的专制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第一，它发生在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中国人都被组织在工厂、学校、生产队等单位里，连老人和幼儿也被居委会或者生产队管理着。通过无所不包的组织，毛泽东思想贯彻到社会每一个角落；通过每一个人对其余每一个人的监视，任何对毛泽东不敬的言行都会被发现，被公开处罚。而红卫兵作为从内心里崇拜毛泽东的青年群体，首当其冲地承担了发现和处罚

这类言行的责任；第二，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专制不但在思想上认同，而且上升到情感上的一致。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每天早晨听到的“东方红”乐曲，作为文化大革命一大特色的“毛主席语录歌”，到处展开的用个人经历讲述的“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用个人心理变化描述的“斗私批修”（斗私心杂念、批修正主义），政治对纯个人领域如上学、劳动、衣着、娱乐、甚至恋爱（无产阶级的爱情）的全面统治，在强烈抑制人的普通情感的同时，又把人对爱、对心灵抚慰的需要，转变为对毛泽东个人的情感。而正是第二点，让每一个人对其他每一个人的监视成了人民大众的自觉行为。也正是第二点，不但使得许多与毛泽东从未有过个人交往的人在毛泽东去世时痛哭流涕，而且使得在 1968 年以后吃尽苦头的当年红卫兵，就像大多数人难以忘记初恋那样，难以放弃自己对毛泽东的情感。

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程度可以用一个词表示：“红色恐怖”。它是红卫兵引以为骄傲的一个词汇，是保证革命理想实现的革命方式。它和红卫兵所说的中国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相对立。然而，那时的白色恐怖仍然容许鲁迅的生存、容许大学教授在书刊上公开宣称自己观点属于马克思主义，红色恐怖则认定非马克思主义言行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这样的言行不但不准公开，即使私下里对配偶、孩子、朋友说过，后者也必须把它们揭发出来，因为这样的言行必须受到惩罚。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惩罚首先是暴力的，而不仅仅停留在语言、文字和行政处理层次上。所以，红色恐怖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新高度。当然，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已经不允许出现在报刊和课堂上。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极端，除了毛泽东和林彪外，任何人的作品都被翻出来检查一遍，任何人的言行都被拿出来清理一通，以便发现他们反对毛泽东的可疑之处。而一经发现，被指责的人就不但在尊严上，并且在肉体上受到伤害。老舍、傅雷等一大批文化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批人的去世，绝不仅仅因为尊严扫地，而且也因为甚至首先是因为难以承受的肉体惩罚。我所在的南京市第九中学，好几位教师在文革中自杀，其直接原因都不是因为受到的大字报批判，而是因为受到的暴力或暴力威胁。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特别是恐怖性质，不但今天，就是一千年后也无须证明。翻开 1966 年到 1968 年期间的任何一份中国大陆报纸，读者的第一个感受将是恐怖，是毛泽东“句句是真理”的绝对权威，是红卫兵和普通中国人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是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的任意认定和惩罚，是没有人性、没有理性的恐怖。

（2）专制下的局部政治自由

在认清文化大革命恐怖性质的同时，我要指出它的自由一面。按照官方的正式用词，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动乱转个身是乱动，而乱动必然意味着自由。没有行动自由，谁能乱动？没有思想自由，谁想乱动？有了自由，才能够乱动；而几亿中国人的乱动，才形成动乱。然而，这里所说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又需要和上一节讲的专制与恐怖协调起来，否则的话，我们便很难理解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专制往往被视为抽象的国家专制或者皇权专制。这一点虽然正确，但它必须用具体的社会专制来补充。中国的每一个单位都是专制的，每一级政权对下都是专制的。一个中国人不但生活在抽象的国家专制中。他也生活在具体的单位专制、社区专制中。一个普通中国人日常体验到的专制决不是国家层面的，而是自己所在企业、村庄、机关、学校、社区领导的专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中国人不会把日常体验的专制和国家专制直接联系起来。中国人民喜欢包青天，古典小说喜欢描写“挡轿喊冤”，就是因为在普通中国人眼里，亲身体验的社会专制和京城皇帝的国家专制之间

有着很大的距离。

具体的社会专制虽然是国家专制的基础，但各级专制政权对下滥用权力的趋向严重到一定地步，却又危及人民对国家专制者的信任和国家专制本身，因此，皇帝总是采用各种手段抑制地方和单位专制的滥用。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所有这些手段都是自上而下的。只有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也表现在这一点上。回忆一下文化大革命。我所在的中学，最早被当成批斗对象的是当时的校长。这也许是市教育局的决定，是自上而下的。可后来学校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副校长、教导主任纷纷成为批斗对象，虽然可以说是毛泽东“伟大的战略部署”，但至少这一部署的实现方式，在我的中学里，是学生和教师自由地、没有恐惧地对学校官员“修正主义”言行的揭露和斗争。其实，市教育局作为地方政权的一部分那时已经瘫痪，局长和其它领导官员都已经被打成走资派，不可能再对中学文化大革命做出指示。另一方面，即使它还能够指示，学生也会用怀疑、批判的态度对待它甚至反对它，因为它毕竟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本人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单位、各级地方政府的情况都是如此。毛泽东可以指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走资派，但他不知道上海市教育局或者黄浦区谁是走资派。这就给红卫兵与民众很大的自由余地。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检查那些局长们、区长们的言行，发现他们有“修正主义迹象”就可以把他们拉下马。因此，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专制时，我们不应当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民众获得的局部政治自由。

乔治·W·布什曾经说过，人类几千年来取得的最大进步，是把自己的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让他们只能够从笼子里行使权力。当然，这个笼子要关的，不仅仅是作为总统的布什，而且包括了各级政府官员、企业经理、学校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居委会、工厂、学校、区县机关到省、市政府和国务院，中国的统治者都被关进了笼子。唯一幸免的只是毛泽东和林彪。可是，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这还不够吗？这样的“大民主”（文化大革命的标准用词）难道不是一种自由？中国历朝历代都反贪官污吏，但哪一次把大多数官员交由民众自由地揭发、批斗的呢？文化大革命是仅有的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格的服装、多吃多占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甚至夫妻在大街上携手也属于资本主义行为。修正主义只是比资本主义弱的一个用词。但是，在反对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同时，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却是批斗共产党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党政官员。文化大革命之前，官员的任人唯亲、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专横跋扈、争抢荣誉、造假欺骗等这些如今常见的现象还很少有。一个官员只要多强调物质利益（即使不是他本人的物质利益）、只要对工作有过怨言，只要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不力，他就会成为走资派，更不用说现在常见的任人唯亲、贪污腐化等行为了。然而，即使文化大革命前的官员没有现在这般“可恶”，如何监督他们仍然是中国的重大问题。我们知道，特权的滥用、社会的腐败、道德的堕落，首先表现在皇帝以下的各级政权官员的身上，而不表现在皇帝本人身上。因此，皇帝也需要监督他们。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视为一场整肃皇帝以下官员不良行为的大规模运动。它和以往各个专制朝代同类运动的一个区别在于用词不同：文化大革命用词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的用词是反贪官。

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在1949年后试过许多种方法，但是都失败了；文化大革命才是他找到的好方式。他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过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位中学朋友认为：“如果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当官就会成为畏途”。确实，假如今天的政府官员、企业经理、村长乡长、校长主任知道七、八年后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有多少

人敢不小心翼翼呢？七、八年这个周期，和法国总统五年选举一次的间隔相差不大，和美国、德国官员若连任两届共八年的时间几乎相同。每隔七、八年把官员关进笼子一次，让民众自由地没有恐惧地批斗他们，和西方国家每隔四、五年重新选举一次官员，多少有相同之处。就此而言，和西方人发明的自下而上的自由选举类似，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发明的自下而上自由批斗官员的方法。

（3）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

1976年以后，中国正式放弃文化大革命，从宪法中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权利。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维护最高国家专制，手段是践踏人格尊严的暴力和无限上纲的恐怖，因此，作为民众获得部分政治自由以约束官员的方式，它是野蛮的和丑恶的，是一种暴民政治，所以，它应该放弃。但是，中国没有发明新的约束官员方式，而重新采用以往整肃官员的自上而下方式，因此，在国家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国的单位专制、社会专制迅速恢复，并且比文化大革命前更加严重。民众又一次失去所有政治自由。今天的中国，甚至连历史上常见的“挡轿喊冤”都被规定为非法了。然而，只要民众一天不能够有效地约束官员，只要他们还生活在单位专制中，文化大革命就会是他们的一种记忆甚至憧憬，并且是官员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因此，要让人民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憧憬，官员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国必须找到把官员“关进笼子”的新方式。

自上而上整肃官员的方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针对个别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这种方式行之有效。可滥用权力的行为一旦蔓延，这种方式就无效了。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自下而上“清君侧”（清除皇帝身边的大臣）的事情，那是地方诸侯逼迫皇帝整肃某些官员，因此不但不具有制度性的意义，和人民大众起来整肃官员也完全是两回事。在中国历史上，人民一起来，就是造反，就是王朝颠覆或几近颠覆。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全新的方式，皇帝和大众联手整肃官员。人民起来了，但王朝仍然稳固。因此，它让无意推翻王朝的人民看到了一吐心中冤屈、挣脱社会专制的希望。今天，当文化大革命的大量亲历者还在人世，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还鲜活地存在于人民头脑中的时候，这种希望还无法生长。可随着时间的推延，人民对痛苦的记忆将越来越淡，对那时毫无恐惧地整肃官员的快感的记忆会越来越强，对文化大革命的希望和憧憬就可能生长起来。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未来社会变迁埋下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轮回在我眼前展现的一次极端状态。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清王朝颠覆后，经过几十年战乱已经疲倦的中国社会，将循着中国历史的传统轨迹，走入新的大治。如果没有外来因素，这次大治也许能够延续几百年。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历史轮回的轨迹，它在战乱之后，又用没有硝烟、可照样是人杀戮人、人仇恨人的动乱，把中国历史的乱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动乱过去，虽然王朝稳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的官员却对皇帝失去了信任；而他们比文化大革命前更严重的单位专制和权力滥用，又造成了社会的强烈不满。所以，中国还没有跨上长期大治的新一轮历史轮回。

另一方面，我们又应当认识到，外来因素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轮回的条件。没有西方文明的传播，清王朝不会在一百年前颠覆，我们今天还生活在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下。没有西方文明的传播，中国人不会有平等观念，官员滥用权力虽然会受到皇帝或暴民的约束，但皇帝一言九鼎的政治特权和三宫六院的生活特权却不会遭到质疑。西方人最早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只用仅仅一百来年的短时间，就在中国传播的如此彻底，完全打破了两千多年来支撑中国专制制度的君权观念。对比

一下佛教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程，我们便很难否认，“民有、民治、民享”的观念特别切合中国人的心理。这就像中国的造纸和印刷技术特别切合西方人亲眼阅读《圣经》的心理需要那样。在人与人平等的观念基础上，中国历史尽管还在轮回，但轮回的性质必须改变。中国历史将不能够再在专制和暴民政治的“治乱”之间轮回。它必须转变成以人与人平等为前提的不同社会思潮互占上风的新型轮回。后一种轮回在转换时不需要通过人类自相残杀的暴力方式。所以，中国要跨入的长期大治，不可能是以往历史上的专制新朝代，而只可能是既没有国家专制也没有单位专制的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也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最终消弭文化大革命或暴民政治的合理性。而如何和平地跨入这样的大治，是对每一位中国执政者和普通中国人胸怀与智慧的考验。

我祈福中国、祈福我的每一位同胞！

写作于 2006 年 10 月 18 日

定稿于 2006 年 10 月 29 日

6. 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

2006 年 10 月，我为自己的“夜话”写了一篇文章“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事后，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有关部门也向我“请教”这个问题。因此，我想在这里做些解释。

写作“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首先是一种冲动，一种为自己负责、为国家、民族负责的冲动。在那篇文章起首处，我问我那时的老师为什么不告诉我群众运动也可能犯下罪行。可我同样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历史，不但毛泽东有责任，刘少奇有责任（尽管他那么惨），周恩来有责任（尽管他那么苦），我们每个当事人也有责任，我自己也逃不脱责任。假设我当时更多点宽容，假设我多读点其他书籍，也许我不会那么极端地把专制主义视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如果说我还可以用年幼来减轻自己当年的责任，那么现在我早已不年轻，甚至还忝为知识分子，因此，当我回忆起四十年前我卷入其中的向毛泽东欢呼的一百多万青年人情景的时候，我明白如果我畏于言罪而不说点什么的话，我将有愧于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和我自己的良心。

其次，作为当事人，我对文化大革命有切身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许不一定正确，并且也许会使我思考文化大革命时不那么冷静，所以写出的文章不如比方 50 年后的人写更深刻更理性。即使如此，我相信有着切身感受的作者写出的文章也有其价值。我们知道，杨振宁近年的婚事引起那么多议论的原因之一，就是许多人因此而对年龄悬殊的婚姻有了切身的感受。其实，在那么多发表议论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在小说中没有读到过类似年龄差距的婚姻呢？可读书的感受是一回事，事情发生在熟悉的人甚至自己身上所造成的震撼型的感受是另一回事。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规模事件，我们既应当有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也应当有身临其境的感性体验。可未来历史学家的设身处地毕竟需要以当事人现在写出的亲身体验为基础，而不能异想天开。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在复述和以亲身感受分析文化大革命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没有从我们的民族消失。假如国家领导对某个

公民的申诉信大加褒奖并号召全体人民公开揭发各个单位各级政府头目的“不良”言行，国家领导既得人心，平民又能出口怨气，某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许等不到“让历史来评论”再需要的50年就会发生。我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正是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同胞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既不是国家领导维持权力的正当方式，也不是平民一吐怨气的恰当方式。国家领导要维持权力，自当以造福平民为本；平民欲减少怨气，则必以约束官员为要。而在这两方面，我们既有政府“民有、民治、民享”的现成观念可用，又有他国具体落实此种观念的方式方法可学，因此更不必借助文化大革命这种犯罪式的手段。我们也无须在黑暗中摸索寻找新的手段，就像我们不需要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摸索建立“无产阶级的微积分”。我相信，只要政府和民众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中国完全有可能和平地建立起“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政治制度并走上长期稳定的大治。

2007年1月16日

7. “丛林法则”不是自由主义

最近在网络上读到姚洋先生与《南风窗》的问答录，标题为“‘丛林自由主义’是糟糕的自由主义”。姚洋先生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学者，对自由主义和制度、伦理都有研究，文章平实，说理透彻，学界声望很高。惟因如此，我担心他的这篇面向大众的问答录标题会误导读者，所以撰写此文，向姚洋先生建议，最好不区分糟糕的和优秀的、好的和坏的自由主义，因为被指称为“糟糕的自由主义”的“丛林自由主义”或丛林法则本来就不属于自由主义范畴。

我想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我们不区分好的极权主义和坏的极权主义，也不区分好的社会主义和坏的社会主义（比如专制的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社会主义），好的共产主义和坏的共产主义，更不区分好的马克思主义和坏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好像也没有多少必要区别好的和坏的自由主义。

其次，如果自由主义真的有好与坏两类，区分它们就不但必要而且也是必须的。可自由主义有着公认的确切定义，其基本点是一个人在而且仅仅在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志而行动的权利，或者说每个人天然地具有并且也仅仅具有在习俗和律法范围下按照自己独立意志行动的权利。姚洋先生曾经在研究自由主义时定义自由“是一个人免于在其选择集受到外力限制时迫不得已地采取某种行动的状态”，而自由主义应当是对这样状态的追求。针对今天中国的现实，自由主义诉求的是每个公民言论行动的自由，是社会事务由自由的公民共同决定。如果我们暂时不在学理上详细探究自由主义的具体含义以及它的实用范围，而仅仅关注其基本定义与现实诉求，那么，人们可以说自由主义是好的（比如对我来说），或者是坏的（比如对国家专制者与单位专制者来说），然而，我们无法把自由主义本身分成好与坏两类。我曾经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今天我依然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我不必要说自己追求的是“好”自由主义而非坏自由主义。世界上所有支持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也没有必要声明自己支持或者反对的是“好”或者“坏”的自由主义。这里的原因，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定义以及它的每一现实状况下的具体诉求是明确的，是无法分出好与

坏两个部分的（当然自由主义内部存在各种派别和解释，可它们与这里的好、坏是两回事）。

再次，姚洋先生以及一些网友说的“坏”自由主义指的是“丛林自由主义”。可他们所说的丛林自由主义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强盗原则”。它和自由主义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知道，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损害他人自由的自身自由。但强盗的原则是只要我力大，我就可以欺负你。显然，强盗原则和自由主义完全不相干，所以，我们不必把它称为自由主义的一个支派或者坏的自由主义。强盗原则或者丛林法则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来就不属于自由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与自由主义无关（它和自由有关，谁有本领谁就可以不顾他人地自由行事。但它和作为一种理论与诉求的自由主义无关），也与姚洋先生说的以哈耶克与诺齐克为基础的“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无关，因为后者依然承认任何一个人在律法范围内和仅仅在律法范围内的行动自由。可强盗原则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承认强者的自由，包括强者不顾一切律法而损害弱者基本权利的自由，因此，强盗原则、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既不同于也许是强调过程的“右翼自由主义”，也不同于姚洋先生强调能力的“平等的自由主义”。把这样的强盗原则称为“自由主义”，即使说它是“糟糕的”或“坏的自由主义”，在大众中也可能只会引起对自由主义的误解，有害于姚洋先生与我共同欣赏的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

又次，今天的中国确实严重地存在着强盗原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姚洋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今天的中国，强盗的丛林法则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假如我们不考虑中国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那么，中国的社会问题与经济不平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低危险度发展到现在的高危险度的根本原因，是强盗原则大行其道。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大潮中最常听到的话“拿到了（抢到了）就是自己的”，便属于这种强盗原则。山西黑砖窑事件暴露的也是强盗原则，强迫弱势者为奴隶。至于强行拆迁、强行占地，以及教师在学生文章上签作者名，学校医院高收费，等等，无一不是强盗原则，因为强者在这里都是无所顾忌地损害他人的权利。

在强盗原则面前，人需要国家，自由主义需要国家。而且，自由主义不仅仅需要国家：它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至少必须强大到能够保证习俗与律法的执行，从而有效地抑制强盗原则。在自由主义内部有大国家与小国家的争论，但上述意义上的强国家是没有争论的。一个弱国家必然是无数强盗横行的国家。为了抑制这些强盗，人们往往拥护专制，因为专制者作为一个大强盗毕竟维持了丛林的秩序。自由主义需要的强国家，是一个既能有效地抑制无数小强盗横行霸道，又能够避免大强盗独断专行的强大国家。所以，自由主义既反对一个大强盗（所谓的利维坦）独霸森林的专制法则（类似国家专制），又反对无数小强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类似单位专制）。对此也许需要专门的阐述。这里我想请求姚洋先生重视的是，中国民众大多熟知自由主义对专制原则的反对，但许多人还不清楚自由主义对丛林法则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在大众媒体上分清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强盗原则的界限，对于我们共同欣赏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在中国的命运，对于中国的未来，也许是非常重要的。

2007年8月9日

8. 2008 年的中国，我希望

今天，以“8”这个幸运数结尾的 2008 年来到了。

在这个时候，我衷心地祝愿我的家人幸运，我的朋友幸运，我的祖国幸运。衷心地祝愿 2008 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幸运。

作为一个 40 年前到农村、当了将近十年农民的我，我特别祝愿我的农民朋友幸运，因为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中最贫穷、最没有权力和最受到歧视的人，他们又是我们国家最大多数的人。同时，他们又是从 50 年前那个同样带有“8”的年头开始，从制度上正式落到了二等公民的境地。

2008 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正式取消 1958 年建立的户口制度，取消把中国人分成两个等级、把“农民”身份的人变为二等公民的制度

2008 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取消户口制度的同时，正式地向在这一制度下受到歧视的中国公民尤其是被强加为“农民”身份的公民道歉。

2008 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发布公民平等宣言和法律，正式宣布所有中国公民在迁徙和确定居住地时的人人平等，所有中国公民在就业、入学、休假、劳动保障、社会保障上的人人平等，所有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2008 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取消农民工与其他迁徙者的生老病死由其“身份户口所在地”负责（或“出生地负责”）的做法，而建立农民工与其他迁徙者的生老病死由其“常住地负责”的制度

2008 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建立按照家庭而不是按照劳动者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让农民工和其他普通劳动者能够获得更多收入。

2008 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对 1958 年开始发生的大饥荒做出正式说明。这场在二十世纪甚至有记载的全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我的祖国在取消户口制度的同时，也需要对自己、对自己的子子孙孙做出说明了。同时，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首都北京为在那场大饥荒中饿殍的数千万同胞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们，警示我们自己、警示我们的子子孙孙。

2008 年，我希望我的祖国在取消 1958 年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以后，也正式取消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恢复农村土地的私有制。

2008 年，我希望我的祖国在恢复农村土地私有制的同时，承认农民拥有土地权益证书的权利，保证各个农民持有这样的法律证书。

2008 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取消政府对农民土地的强制低价征用制度，恢复农民土地市场交易制度。同时，我希望我在祖国能够建立孙中山先生 100 年就提出的土地增值收益归公的透明的税收制度。

2008 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上迈出一个值得子孙后代永远纪念的一步，这就是农民解放、公民平等。

祝愿 2008 年给我的祖国带来幸运。

2008 年 1 月 1 日

9. 我关注 1958 年开始的大饥荒的目的

一位“同济校友”最近给我留言，希望知道我为什么对 1958 年开始的饥荒“耿耿于怀”。我关注 1958 年开始的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我过去完全没有想到在毛泽东执政时期竟然会发生那么严重的饥荒。我年轻的时候，太多地接受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是全世界人民最伟大的导师，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之类的教育，报纸、广播（那时至少老百姓还没有电视）、学校老师天天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毛主席的话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为毛主席比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1969 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并环绕地球播放“东方红”，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欢欣鼓舞，因为全世界人民终于都能够听到毛泽东的颂歌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设想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的中国会有饿死人的饥荒发生？怎么可能设想在他的领导下，老百姓不是最最幸福的？实际上，只要一个人那样设想，你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除了相信毛主席以及党报传达的毛泽东的思想外，根本不可能有其它的想法。所以，我今天完全能够体谅我的许多朋友干脆否定大饥荒这回事，因为对他们确实不可能设想，在那样一位伟人的领导下会出现那样的灾难。而我，本来还没有重视这个灾难，可许多朋友的否认，却让我警醒，让我感到了某种义务，让大家知道灾难真实情况的义务。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应当知道毛泽东造成的大饥荒了。那时，我们从城市初到农村，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教育，就是回忆旧社会的苦，体会新社会的甜。当时人民公社领导请贫下中农来做忆苦思甜报告。我所在生产队的一个老农开口就说 1958 年如何苦。他的话立即被打断，领导告诉他不准说 1958 年苦，否则就是反革命。我当时就对那个老农非常气愤，这个贫下中农觉悟怎么这么低。彭德怀、刘少奇之流用三年自然灾害诋毁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贫下中农受刘少奇的毒害也太深了。

是的，我们可以说，尽管 1958 年开始的中国饥荒特别严重，但许多国家、许多时代都有饥荒。中国古代饥荒便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的饥荒也不少。比如那位“同济校友”说的 1942 年中国河南省旱灾，死了 3 百万人（我相信他写的“300 百万人”是个笔误）。我们假设那时候河南省的灾区全都在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可那时候，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毕竟没有自认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是否像中国古代许多皇帝那样，为那场严重饥荒下过“罪己诏”一类的自我批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一定程度上容许报纸对自己的批评，他承认有这样的大饥荒存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非洲诸国，毕竟没有出过“人民的大救星”、“句句话是真理”的伟大领袖，所以，那里有饥荒，领导者承认，大家也知道。

我不知道那位“同济校友”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是否已经成年。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谈论 1942 年的饥荒，那么，另一个人也应该能够自由地谈论 1958 年开始的饥荒。令人奇怪的是，这里竟然存在着天壤之别：1942 年的饥荒在当时和现在都能够自由谈论，1958 年的饥荒当时却禁止谈论，现在也仅仅在网络上才能够谈论。这样奇怪的天壤之别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执政的饥荒下饿死的人太悲惨了：当时就禁止谈论禁止纪念，现在依然禁止谈论禁止纪念。饥荒是我们民族的悲剧，禁止谈论禁止纪念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而且，我担心，只要它还禁止谈论禁止纪念，只要专制还活在部分同胞的心里，我们民族就不能避免再次发生类似 1958 年的饥荒和大量饿死人的危险，而那些在 1958 年以及随后几年饿死的人，是每日辛辛苦苦耕作、任劳任怨忍受的人，是对“伟大领袖”没有任何二心的人，是我们

民族最底层也是最根本的人!! 他们被饿死, 比起喷有烦言的知识分子在 1957 年被迫害, 更加揭示出我们民族的悲剧和专制的残酷。

因此, 毛泽东执政时期的饥荒需要有人追问, 有人盯着, 就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需要有人追问, 有人盯着那样。如果没有别人盯着, 那就让我盯着吧。那位“同济校友”希望知道我盯着这场饥荒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很清楚, 1、澄清大饥荒的事实; 2、纪念大饥荒的死难者, 3、追究大饥荒的执政者责任, 4、吸取教训, 并且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前面三点 (建议在中学教科书里就专门说明大饥荒及其教训), 以便永远地避免这样的饥荒在我们民族重演。

2008 年 1 月 17 日

附: “同济校友”给我的留言

作者: 同济校友

标题:

时间: 2008-1-10 23:30:27

胡老师, 你为什么对 58 年的饥荒如此耿耿于怀? 1942 年河南光旱灾就死 300 万人, 那个年代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你盯着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参见: www.hujingbei.net 的留言板相应页码。

10.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一位网友最近给我来信, 说“以前大家都是没日没夜的干活, 比现在的人勤劳多了, 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 都是任劳任怨, 干的热火朝天. 但到头来的结果却是大家都吃不饱肚子, 物质极度匮乏, 想买什么没什么。再看看现在, 现在的人哪有像以前那样拼命干活的人. 但是现在商店里的商店琳琅满目, 大家都能吃饱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用一个市场经济就可以解释的吗?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我非常想听听您的看法. ”

我也经历过那段热火朝天干活、饿着肚皮睡觉的日子, 因此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我的看法是, 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由。自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自由意味着一个农民、一个企业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 愿意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 自由意味着一个人生产得多, 自己得到的就多; 自由意味着一个消费者愿意购买什么就购买什么, 愿意购买多少就购买多少。自由意味着每个人有自己的人格和主见, 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正是这样的自由, 每一个中国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 最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让中国人摆脱了辛辛苦苦却忍饥挨饿的窘境, 让中国人丰衣足食。

回想三十年前, 我自己就是农民。那时候, 农民只能够在生产队干活。非农产业是还没有割完的“资本主义的尾巴”, 谁敢设想自己跑到外地去打工? 生产队 150 亩耕地应当种些什么, 收获后每个农民应当分得多少, 是由人民公社决定的。农民分配后剩下的粮食只能够卖给政府, 粮价是政府规定的。在整个过程中, 农民没有任何自由。如果生产队多分点给农民, 那叫“私分”; 如果农民忍饥挨饿挤出点粮食卖给别

人，那叫“投机倒把”。这些都是犯法的（至于法律当然都是领导尤其领袖的言论）。由于粮食少，政府就动员农民多劳动，“为革命出大力流大汗”。那时候的劳动真是辛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包括“革命化的春节”，都要干活。不干活就是“怕苦怕累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公社、大队领导监督得也真紧，种麦子时墒沟挖多深，插秧时秧插多密，都得接受检查。哪个生产队先进，哪个生产队落后，学习、总结，和如今学校里的各种检查、评比不相上下。我务农那十年，化肥、农药开始用了。每个生产队分配多少化肥、农药，都是政府计划。天气也好。照说什么条件都具备，可粮食产量就是提不高，大家肚子就是吃不饱，常常需要聆听毛泽东号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常常需要提醒自己已经生活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了，在别的国家，别的时代可连稀饭都吃不上。

是的，30年前，中国人有英明领袖，但没有个人，没有自由。我们以为自己根本不需要自由，因为自由了，每个人随心所欲，社会就动乱，经济就失衡，我们就会像别的国家民众那样连半饱都做不到。今天，尽管中国在许多方面还不自由，但中国毕竟远远离开了毛泽东的绝对专制。在经济领域，生产者、消费者毕竟有了广泛的自由。再也没有人来强制检查农民把麦地的沟挖得多深、稻田的秧插得多密。“私分”、“投机倒把”这类犯法行为随着粮食由农民自己决定留多少卖、和卖给什么人而成为不言自明的正当行为了。政府也不再规定城市人到哪个粮店买米，到哪个地方工作了。

三十年前，中国没有了英明领袖，中国人开始自由了。那时候，还是那么多土地、还是那么少资本，还是那些被领导监督着才干活的农民，在没有领导也就不再出大力流大汗以后，粮食却多了起来，中国人却开始天天吃干饭了。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看看农民我们就知道了。当一个农民有了自己，当一个农民可以为自己而决定生产多少粮食的时候，粮食就多了起来。这就是独立人格带来的经济结果，这就是自由的结果。三十年前，当英明领袖终于没有能够万寿无疆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多少中国人茫然失措，不知道自己幸福的半饱生活还能不能维持。今天，我清楚地认识到，正是没有了英明领袖，正是每个中国人成了独立的自己，正是自由，才让我们中国人摆脱了悲惨的半饱生活。

毫无疑问，资本投资、技术进步、教育普及、独生子女以及其他许多政策，都是最近三十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专制制度下，中国也有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和教育普及，中国也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和各种增产节约政策，中国甚至组织职工、学生无偿地帮助农民种植和收割粮食，更不用说还动员了几千万市民尤其毕业生移居农村，增加农业劳动力，可用尽千方百计，粮食还是生产不出来，民众还是吃不饱饭。相反，一旦把自由还给农民，在改革最初几年，中国没有增加农业投资，农民干脆连已有的脱粒机、脱粒机都不用了，靠古老的传统技术，粮食就多了起来，中国人就开始吃饱饭了，中国人从此离开了吃不饱的历史。

所以，自由，以及自由必然意味着的每个中国人的独立人格、每个中国人不再匍匐于君主、救星、政府、组织，才是最近三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人饿肚子生活的关键因素。

2008年3月1日

11. 自由主义者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

最近，许多人对农民工工资上升表示强烈的忧虑和批评。一些外国投资企业离开了中国，一些中国企业倒闭了，原因是农民工工资上升。物价提高了，原因也是农民工工资上升，国家统计局局长甚至提出“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www.gov.cn/jrzg/2008-03/22/content_926276.htm)。一时间，农民工工资上升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中国经济问题的原因。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经济学者，我的观点刚好相反：我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我相信他们工资的上升才揭示了中国经济的光明。

自由主义者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是因为中国最近几年来农民工工资的上升，是农民工和企业自由竞争的结果。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农民工工资上升是不是值得欢迎，首先看上升的原因。如果农民工工资上升的原因，是农民工用非法手段（例如暴力威胁）逼迫企业主或者管理层造成的，他们工资上升就不值得欢迎；如果是农民工集体罢工强迫企业主造成的，他们工资上升是否值得欢迎，先需要做番调查再说。可第一农民工没有应用非法手段（倒是不少企业应用非法手段减少他们的工资），第二他们也没有集体罢工：他们连组织罢工的工会也不许可成立。农民工工资上升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主和管理层“良心”发现。可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后者不会叫苦连天，农民工工资上升亦不会成为众矢之的。既然企业主不情愿给农民工加工资，既然农民工既不用非法手段也不能罢工，为什么他们的工资会上升呢？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市场自由竞争，是农民工用脚投票。你这个企业工资低，我农民工就走人。“三条腿的驴子难寻，两条腿的人好找”，你企业去找吧。企业能够找到人，工资就不必上升；企业找不到人，你就得升工资吸引我去。这就是竞争。在这里，千百万农民工的自发行动，几百万企业的自发行动，每个人、每个企业的自主决定，造就了这些年来中国农民工工资的上升。这样的结果，自由主义者完全认同，经济学者也应当完全认同，因为经济学者所服膺的经济学，正是以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为前提的。

自由主义者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也是因为农民工属于务工者中间的最低阶层，是社会最贫困的阶层。他们的工资上升了，他们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他们脱离了原先的经济地位，社会才可能富裕，封建专制才可能最终消除，人与人的自由平等才有保证。假如社会经济自由竞争带来的结果是低工资、高利润与高税收，自由主义者虽然能够认可，但不会欢迎它，更不会把它视为一个社会的长期正常现象。现在，自由竞争带来工资的上升，自由主义者就不但认可，而且欢迎。工资的上升同时彻底打破了专制主义者对自由主义、对建立在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市场经济的诬蔑。专制者最喜欢声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只对富人有好处。可是，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历史证明，让穷人有自由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即使在穷人还没有获得平等权利的时候，已经让穷人解脱了饥寒交迫的困境，让穷人收入上升了。如果中国奉行自由主义，人人权利平等，在每个人获得好处的同时，穷人将获得更大好处。

农民工工资上升，一些外资企业离开了，一些内资企业倒闭了。它们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他们不离开不倒闭，那就得搞计划经济，农民工得“做革命的螺丝钉”，不管工资高低，派你到哪个厂你就得到那个厂。如果不搞计划经济，那就得号召多生孩子，“孩子越多越革命”。这样，二十年后，离开的企业能回来，倒闭的企业能再建，因为“两条腿的人好找”了。等不及二十年，那就从非洲缅甸北朝鲜引进劳工。再等不及，就只好让企业组织抓人队，抓农民当奴工，劳动成本最低，外企不必离开，内

企无需倒闭。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奴工，反对计划经济，在这里没有任何讨论余地。引进劳工和多生孩子实际上也不能避免农民工工资上升。台湾引进那么多“菲佣”、美国引进那么多移民，没有哪个国家搞独生子女，它们那里粗工即非技术工人的工资还不照样上升？工资上升，一些企业离开了，一些企业倒闭了，他们的经济还不照样发展？而且，昨天那些企业不离开台湾、美国，今天中国不会有经济繁荣；同样，今天一些企业不离开中国，更穷的国家不会有明天的繁荣。世界有穷国，世界就不会安宁，自由主义就不会完全战胜专制主义。

至于把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归因于农民工工资上升，更是找错了原因。如果政府不超发货币，工资上升的结果是利润下降，价格不需要提高，通货膨胀不可能出现。工资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利润率相对于工资的下降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近三十年来中国资本增加的速度远远高于劳动力增加的速度。按1978年价格计算，中国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的比率，1978年是1万元左右，现在是30万元左右，提高了三十倍。资本增加的比劳动力快，人均资本越来越多，劳动力就越来越稀缺，工资就越来越上升。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价格稳定也好，通货膨胀也好，都不能逃脱这个规律。如果工资上升，企业主就提高价格，那么通货膨胀不过是企业主和超发货币的政府使工资上升徒有虚名的办法。可劳动力稀缺这个基本事实，让通货膨胀办法最终既不能避免工资上升，又危害了政府和作为整体的企业界。企业主在工资上升时继续增加利润的唯一方式，是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减少浪费包括减少管理层浪费。企业主和政府及早认识到人人平等和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真谛，他们就能顺应农民工工资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才容易实现。

所以，自由主义者欢迎中国农民工工资的上升，希望企业主和政府顺应农民工工资上升的大势。

2008年4月8日

12. 五四运动、民族主义、封建主义和今天

今天五月四日。五四运动89周年。今天也是北大校庆日，110周年。

我在北大散步一圈。与十年前相比，自己住过的29楼，窗户多了铁栅栏；图书馆前“创造性地”设立了一块临时留言板，留言变得次序井然了；而未名湖现在则堂而皇之地成了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在北大散步，就会想到五四；校庆日在北大散步，五四更是“触手可及”。五四运动提倡的是“民主、科学”，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九十年前的气氛也许和今天差不多，年轻人有一种受到外国欺负的感觉，政府给国人一种在外国面前懦弱的感觉。九十年前，北大学生站起来了；今天，据说合肥的大学生站出来了。但是，也就是据说……

九十年前，北大学生在帝国主义欺负下站起来了。五四运动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保护中国的主权的运动。五四运动即使反封建，也是次要的。民族是重要的，国家是重要的。五四运动在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展示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诉求，展示了中国人对国家平等地位的诉求。

民族的重要，在于民众的组织、文化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无论用武力还是用选票，在一个很大却又不太大的民族中建立一种共识与秩序，总比在

所有人中建立共识与秩序容易得多。而民族感情、民族意识直到民族主义对于建立和维持这样的共识与秩序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欧美国家在 19 世纪把资本主义推向全世界以后，世界各地的民族在二十世纪就开始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实现自己的发展，民族独立、民族自决、民族革命就成了二十世纪的主要潮流。全世界 180 个民族国家，一大半是二十世纪建立起来的。今天，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内，尽管全世界还面对着库尔德人问题、非洲民族争端问题，甚至还有我们自己的西藏问题、但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决的问题在全世界已经基本解决，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已经基本上成为本民族的问题。就拿最近三十年来说，韩国的增长与菲律宾的停滞、印度的变革和伊朗的复旧，主要原因显然只能在国内寻找；可在五十年或者八十年前，这些国家还没有独立、这些民族还不能自决。我们中国也是如此。1942 年的河南省饥荒，日本侵略无疑是基本原因之一。但无论像 1960 年饥荒、1966 年动乱一类的灾难，还是像 1978 年改革与 1989 年民主诉求这样的进展，基本原因都只能在我们民族内部寻找了。

在看到民族主义正面意义的同时，我们又必须认清民族主义是一把极其危险的双刃剑。之所以“极其危险”，是因为它极容易被谋求封建专制的强人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总是国人感觉受欺负、感觉政府在外国欺负面前太过软弱的时候。这时候，国人不再依靠政府，而是自发地挺身而出，抗议外国人的欺负。1919 年的北大学生如此，2008 年的合肥学生也如此。他们在抗议外国人的同时，也在抗议本国政府的懦弱，在呼唤一个强大的政府。而正是对强大政府的呼唤，正是这样的民族情绪，为封建专制提供了必不可少而又强大无比的心理基础。1919 年如此，2008 年也如此。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就这个意义来说，就中国在五四运动后的历史来说，尽管五四运动本身是民主的，五四运动反帝国主义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五四运动在另一个指向又是反民主和拥护封建主义的。

为什么说五四运动的另一个指向又是反民主和拥护封建主义的？因为五四运动所展示出来的民族情绪，使国人愿意为了政府的强大而放弃自己的民主诉求，使国人为了民族的强大而漠视普世的价值，而这样的意愿是封建主义的。我曾经在纪念陈岱孙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像陈先生那样发动五四与深受五四影响的两、三代人，宁愿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和自己对民主自由的呼吁，转而拥护帝王一言九鼎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因为他们在帝王那里看到了民族的强大。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却走向了封建主义。他们在弱政府下争取民主，在强政府下俯首听命（请原谅我用这样的不敬之词）。二十岁开始争取自由民主的刘文典，在蒋介石面前何地刚强独立，但 1949 年后，他的大学独立精神又到了何处？去年参观扬州何园时，看到介绍何世桢在国民大会上提出总统不能终身制的提案、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文字，我不禁自问，在不准人提出这样提案的 1949 年后，何世桢反对过独裁统治吗？今天，走在北大，我问自己，北大比起五四运动时是更封建了还是更民主了？今天，在面对站出来的合肥学生时，在面对又一次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政府软弱感觉，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如何避免一个正在远离帝王专制的中国，一个多少能让合肥学生走到街头的中国，如何向前发展，发展到五四时代北大学生就享有的民主自由，发展到中华民族每个人都享有民主自由的强政府，发展到我们民族的强大，而不是倒退，倒退到没有帝王圣旨学生就绝对不能走到街头的强政府，倒退到亿万中国人包括刚刚在“弱政府”下争取自由的（部分）合肥大学生都匍匐在地高呼万岁的“强政府”，倒退到我们民族表面强大但连饭都吃不饱、话都讲不全的那种虚弱的帝王时代。

是为记。

2008 年 5 月 4 日写，6 日修改

13. 汶川救灾说明了中华民族向自由主义的进步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政府迅速组织救援，全中国、全世界许多人伸出了救助的手。震后救灾让我们看到了人心，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在自由主义方向上的进步。

当然，有些网友的看法不同。比如网友“Cytherea”认为救灾中出现的军民团结一心不分昼夜、不分你我地拯救生命的事实不能够用自由主义来解释。它是我们集体力量的体现，而我们的政府在这次灾难面前得到了100分。（参见www.hujiangbei.net/lyb，相应页码）。

我不同意 Cytherea 的看法。

第一，在地震发生后军民不分昼夜、不分你我地拯救生命，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现象。比如近10多年来发生的台湾9.21地震、日本的阪神地震，也都是军民团结一致拯救生命，可那些地区或国家是服膺自由主义的。

第二，和1976年唐山地震的救灾比，我们的政府是大大进步了。最简单的三点：如果唐山地震后立即让外国救援队和医生进来，唐山地震少死亡5万人是可能的；如果唐山地震后立即告知全国全世界真相，全国人、全世界人都会伸出援助的手，多得多的伤员将会得到医治（而当时全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中央财政极其拮据，救灾急需的医药、帐篷和资金极为紧缺）；如果唐山地震时中国政府不是由年老体弱的人按终身制领导着，救灾的决策会迅即得多。汶川救灾时政府在上述三点上的进步，正是三十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复兴、传播和取得人心的结果。比较一下今年缅甸政府在热带风暴后和中国政府在地震后的救灾表现，我们就不难体会中国政府的进步、中华民族的进步，也不难体会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进展。

第三，汶川地震灾难景象和救灾状况的传播、网友对救灾措施的评论、公众通过非官方媒体发表的对政府的期望、意见、批评甚至牢骚，都对政府的救灾行为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压力。这和新闻自由对政府的监督压力有异曲同工之效。而我们的政府也开始即时公布死亡人数和救灾措施、救灾进展。这一切离开自由主义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今天我们依然不知道唐山地震的灾难和救灾状况，因为当时的中华民族只准许每个人说好话。可是，今天我们随时知道汶川地震的状况和救灾进展。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我们民族在2008年有一个或多个为中华民族福祉的和平的反对党专门监督执政党与政府的救灾行动，政府为汶川救灾肯定会做的更好。

第四，自由主义从来就承认集体、承认政府。从来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低估过集体的力量和政府的作用。自由主义不是仅仅承认个人作用的个人崇拜主义或强盗逻辑（事实上，专制者都鼓吹个人崇拜，崇尚有力就有理的强盗逻辑）。自由主义只是强调从平等、独立的个人出发来观察集体与政府。从300年卢梭的“契约论”，到30年前罗尔斯的“正义论”，自由主义者都明确指出集体行动和政府在社会中的绝对必要性。这种绝对必要性的来源之一，就是人类面临的自然灾害。自由主义认为，个体为了在遭遇谁都难以避免的自然灾害时获得其他个体的帮助，愿意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与自由而和其他同样做出权利放弃的个体组成共同体以至于政府。因此，一旦灾害发生，没有受灾的个人将按照共同体或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力投入救灾。专制政府在其臣民遭遇自然灾害时也可能全力投入救灾。但专制主义只是可能全力救灾，自由主义则必然能够做到全力救灾，因为每一个个人把部分权利让渡给共同体或政府，正是为了在自然灾害时能够有效地救援受灾的那部分个人。如果共同体管理机构或者政府不能做到这一点，个人就有权利收回让渡给政府的那部分权利和自由并组成新的有

效政府。相反，专制主义者不是把自己的权力说成天意，就是把自己封为集体的“最杰出代表”，而根本否认他的权力来自于每个个人的自愿让渡，否定他在救灾低效时让出权力的必要性，因此为了隐瞒低效也否定救灾信息的自由传播和救灾状况自由评论。

我们中华民族、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救灾上的进步是非常可贵的，因为这一进步不但让我们的民族减少了伤亡和苦难，而且也让我们民族和我们政府在自由主义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中华民族在未来仍然会遇到严重自然灾害，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由主义的方向，我们就能够避免三年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那种严重的社会灾难，我们也能够减轻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苦难，我们中国民族也才能够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

2008年5月27日

14. 自由、权利和责任——我看范美忠先逃事件

汶川地震已经基本过去，但地震中出现的“范美忠（网络上亦称范跑跑）”风波还没有过去。因为范美忠事件和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的事件一样，再一次迫使我们中国人直面自由、权利和责任的问题。

作为自由主义者，我特别珍惜个人的自由。作为自由主义者，我同样特别重视个人的责任。个人对自己、对他人、对职业、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任何人都不能够躲避这样的责任。在这里，责任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和我们与生俱来的个人责任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没有自由，我们就没有责任，因为我们如果被迫做某件事的，我们便不必承担这件事好坏的责任。同样，没有责任，我们也没有自由，因为一个不肯为他的自由行为负责的人不能拥有行为的自由。

其实，自由主义者从来就把自由和责任联系在一起。例如，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哈耶克就明确指出：“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蒙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和谴责。自由与责任实不可分。”因此，“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终亦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自由秩序原理》中文版第83—84页）。

范美忠和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事件，牵涉到一个人在职业中的自由、权利和责任。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泰坦尼克号遇险时，船员只能让乘客先撤。为什么？难道船员不比乘客更知道救生船在哪里和如何跳上去逃生？是的，船员有更强的能力逃生。但是，如果一个人选择了船员职业，他就承担了在紧急情况下后于乘客撤离的责任，无论这个紧急情况是灭顶之灾还是无险之惊。一个船员有不当船员的自由，有组织工会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但是，如果他还担任船员，他就必须放弃先于乘客逃生的权利，而承担起后于乘客逃生的责任。

范美忠的问题也在这里。他可以选择当教师，也可以选择不当教师。这是他的自由。但是，如果他选择当教师，他就放弃了在紧急情况下先于学生逃生的权利。我也是一名教师，而且是服膺自由主义的教师。尽管我面对的学生是成年的大学生而非范美忠面对的未成年人。但我同样明白，发生危险的时候，我的责任是让学生先逃。有人说范美忠在地震中“（先）跑是权利，不（先）跑是高尚”。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与说船员在船难时“先逃生是权利，后逃生是高尚”一样错误。一个人先于学生逃生的权利在他选择教师职业时就已经放弃了。因此，先于学生逃生不仅是道德上的耻辱，而且是法律上的犯罪。在我曾经读书的以自由主义立国的德国，范美忠这样的教师完全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并且肯定会被永远开除出教师、公务员以及包括私人企业管理者在内的职业。

范美忠曾经说他在地震中连自己的母亲也不救的。范美忠在紧急情况下是否先于母亲逃生，与船难时男乘客是否先于女乘客逃生一样，是个道德问题，而不是责任问题。在泰坦尼克号事件中，和女性有着同等逃生权利的男乘客让女性先逃，是男性乘客的高尚；但船员让乘客先逃，首先是船员的责任（我不否认船员也高尚，但对他们来说，第一位是责任）。据说泰坦尼克号灾难中，有一个男乘客混在女性中逃生了，后来他终生生活在耻辱之中。可如果一个船员先逃生，他遭遇的将不仅仅是耻辱，而且是法律的追究。汶川地震中的学生逃生也许会出现争先恐后现象。对那些学生来说，这些现象是正常的，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但是，范美忠先于学生逃生，就不仅仅是道德的耻辱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责任问题，一个他个人必须受到实质惩罚的逃避责任问题。

十四年前，在不慎的火灾中我们出现了“让领导先走”的现象；今天，汶川地震中我们又出现了范美忠现象。这两个现象的共同特点都是本来放弃了“先走”权利而承担起后走责任的人却在灾难临头时首先逃生。他们的道德水平低于船员，可他们的责任履行更低于船员。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正如哈耶克所说，这些人因为不履行责任而“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谴责”。可是，如果我们追究范美忠的责任，我们首先应当追究那些在克拉玛依火灾中先走的领导，因为那场火灾给我们民族留下的耻辱、给普通公民心里刻下的烙印太深了。当年那种“让领导先逃生”的现象如果立即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彻底批评、先走的领导立即得到应有的惩罚，民众心理上就不会留下如此阴影，十四年后的范美忠现象也许根本不会出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灾害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但“让领导先走”和范美忠现象是可以避免的，许多民族已经避免了后者。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如果还希望中华民族也能够避免后者，如果不愿意听任民族道德的下滑，就必须有所作为。在这里，自由主义者不但需要政府，而且需要一个在“让领导先走”和范美忠现象前一扫软弱无力形象的政府。

2008年6月16日

15. 谈谈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秩序问题

——再谈我对范美忠先逃事件的看法

差不多一个月之前，我就汶川地震中的范美忠事件写了一篇夜话，对教师在突发灾难的紧急情况下先于学生逃生提出了强烈批评。没想到这篇夜话竟引起许多网友的评论。网友们在我的个人网页上提出的问题主要有 1) 教师是否属于高危职业，2) 范美忠先逃的道德和法律关系，3) 范美忠先逃和他说真话、他追求自由公平的关系，4) 在一个腐败制度下，范美忠是否值得后逃。我阅读的其他网页不多。对网友告诉我的关于范美忠的几个网页也没来得及阅读。对此，我很抱歉。下面我就自己知道的部分知识，先就第一个问题“教师是否属于高危职业”引发出来的逃生秩序说明我的观点。

教师是否属于高危职业，回答自然是否定的。不过，高危职业指的是那些在职业工作中直接发生生命或者疾病危险的概率很高的职业。社会上大部分职业发生那些危险的概率不高，不属于高危职业；因此，这些职业的就业合同不会载明对就业者在高危情形下行为的规范和给予就业者的补偿。但是，社会所有职业又都存在发生生命和疾病危险的概率。就教师职业而言，我们知道粉尘引起呼吸器官疾病和连续说话引起发音器官疾病的概率不是非常低。除了每个职业都有疾病危险外，每个职业又都会遇到紧急情况。火灾的发生、地震的灾难、洪水的肆虐、停电的突然、暴徒的行凶以及战争中敌机的轰炸等等突发性紧急情况往往和职业无关，任何职业场所都可能发生这些紧急情况。在这里，与范美忠事件有关的问题，我想应当是这样的：在这些紧急情形下，在职业场所，一个工作人员面对未成年人、面对顾客以及学生、病人等自己的服务对象、接待对象，按照规则应当如何做？或者说，大家逃生的规则应当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后的几百万年进化中已经解决。我们可以想象传统社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个家族村庄里，私塾先生在发生比如学堂失火或地震学堂倒塌、但依然有短暂分秒可逃生的时候应当如何办？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对学生连一声都不喊便自己先逃，他在这个村庄从此只能低头做人，就像那位在泰坦尼克号中扮作女士而逃生的男士后来的遭遇那样。传统社会靠家族关系、靠长期固定而又范围狭隘的人际关系来“强制地”迫使人们在平日和在紧急情况下按照某种不成文但为大家认可的规则行事。在那里，保持社会秩序、保证生命安全、降低个人的恐惧感，确实不需要自由主义，当然也不需要专制压迫。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常常在远离家族、亲人的地方工作，他的人际关系不再狭隘，更不再长期固定。今天他在这个地区生活，明天可能到无亲无友无熟人的另一个地区生活。这样，家族关系、长期固定的人际关系对他的行为不再构成约束条件。就教师职业而言，私塾先生面对的学生常有亲属甚至自己的子女。他和他的学生之间存在亲情联系。进入现代社会，家族重要性下降。每个人可以选择不同地方居住、选择不同家族、地区、身份的异性联姻；教师与学生、工作人员和顾客之间不存在个人间的特殊关系：他们只是偶然地一次性地在工作人员的职业场所相遇。正是在这样的家族约束失效的情况下，人类需要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超越家族（当然也超越工作单位、地区、阶级、政党、国家）考虑的自由。然而，自由主义不但强调个人自由，而且强调与自由同时俱来的责任。或者说，自由主义把一个人履行责任的约束从狭隘的家族联系转变为这个人的自律自重，并且在个人自由、自律的基础上，把传统社会中限于家族内的敬业精神，转变为全社会的职业规范。把家族刑法转变为适用于全社会所有人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也正是因为此，自由主义才能在个人高度流动、社会经常变化的人类发展阶段，继续保持社会秩序、减少个人的恐惧感和提高个人的安全感。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重大区别，就是一个人或家庭、家族不再自给自足。一个人必须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比如到商店、学校、剧场、机关去，比如乘车乘船包括在公共道路上行走。社会给每个人提供的安全感，不但在于防止强权者尤其政府的欺凌，防止小偷和假货，而且在于减少紧急情况下个人的恐惧感。在这方面，每个人是平等的。每个人都从事某个职业并为他人提供服务，每个人又从其它职业获得服务。在紧急情形下，在职业场所，一个人也许碰巧是顾客也许碰巧是工作人员。如果自己碰巧是工作人员，如果不考虑可以理解的应激性慌张和软弱，那么，自己的责任就是喊顾客逃生，指点和打开逃生通道，维持逃生秩序，后于顾客逃生或者和顾客一起逃生。如果自己碰巧是顾客，那就按照秩序逃生和为后逃者提供方便。以范美忠为例。在私塾时期，范美忠的孩子和其亲属的孩子就在他执教的班级。地震来了，他让孩子

先逃。那么，今天的社会，范美忠的孩子几乎不可能在范美忠执教的班级读书。地震来了，范美忠孩子的教师应当让孩子们先逃，范美忠同样也应当让孩子们先逃。教师是平等的，孩子是平等的，孩子与教师的生命也是平等的，但紧急情况下人类仍然需要秩序。平等的人之间仍然需要秩序。现代社会当然不可能再用家族联系来建立秩序，要求教师或其它工作人员在职业场所出现紧急情形时后逃，因为亲人之间在同一职业场所履行服务和接受服务的概率太低了。所以，现代社会通过公共道德、职业规范和法律建立秩序，要求工作人员在职业场所出现紧急状态时后逃。

是的，绝大多数职业场所并非高危场所，可所有职业场所都可能出现灾难性的紧急情形。在紧急情形下，按照传统社会做法和现代社会职业规范，高危职业中的船员、非高危职业中的教师、商店营业员、宾馆服务员、机关官员都应当后于顾客或学生逃生。唯有如此，顾客才能够减少恐惧感，社会才能既减少紧急情形下的伤亡，又能够保持自由平等的秩序。

当然，在指出工作人员在职业场所后逃的责任同时，自由主义特别强调所有工作人员在职业场所的安全和逃生训练，强调每一个人的安全意识和逃生训练，强调互不相识的众人之间应有的秩序尤其是逃生秩序。生命是可贵的，在灾难发生时碰巧是工作人员的人的生命与碰巧是顾客的人的生命同样是可贵的，如同战争中士兵的生命也和平民同等可贵一样。但是，考虑到众多生命面临危险的灾难性紧急情形，为了减少生命损失而又不动摇个人自由原则，平等自由的个人之间需要某种事先的协议、规则或秩序，需要每个人遵守这种秩序并相应地放弃权利而承担责任。而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在道德、宗教、基本心理的层面上早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协议和秩序。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在遇到突发性灾难之前或者经历了突发性灾难之后，人们不会特别意识到或者特别强调逃生秩序问题而已。这一次汶川地震如果仅仅出现范美忠教师先逃事件，人们还是不会特别强调逃生秩序问题，因为某个教师先逃并非不可理解不可原谅。但范美忠作为教师不仅先逃并且还自以为是甚至还获得很多支持，这就把逃生秩序问题严峻地放到了我们每个中国人面前。逃生需要秩序，这在古代的中国，在古代和现代的大多数外国都不成问题。那么，逃生秩序应当是怎样的呢？对此，大家需要平心静气的讨论。我想，在学校，学生先逃，教师后逃；在其它职业场所，顾客先逃，工作人员后逃，应当是平等自由的人们应对紧急情形所需要的规则之一，因为它保证了每个人在可能的突发性灾难下得到别人救助而又救助别人的平等权利和责任，因为这一规则既符合人类道德心理，也符合传统社会做法，亦符合现代社会需要。在这里，我之所以强调自由主义，是因为自由主义本身是关于人类社会秩序的一套主张，而这一秩序包含了人类在偶然性灾难状态下的秩序。在自由平等的人共同形成的逃生秩序下，自由结社的人如果对自己组织的人提出比如共产党员后逃、佛教徒后逃、天主教徒后逃，或者一个人自愿后逃，那都是值得我们敬佩和感谢的。但是，那种认为比如只有某个组织领导、人类才能够形成紧急情形下逃生秩序的专制主义观点，则是自由主义所坚决反对的。而那种认为灾难临头无须秩序、每个人先顾自己逃跑即可的观点，却正是专制主义者求之不得的靶子，因为现代社会的专制主义正是利用建立秩序包括紧急情形下秩序的理由来建立一己独尊、一党独大秩序的。

2008年7月14日

16. 要法律，更要道德 ——三谈我对范美忠事件的看法

汶川地震中范美忠先于学生逃生并且自以为是的事件，引发了关于道德和法律关系讨论，许多网友也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这里，我想从这个角度再次说明我的观点。

对我来说，法律的目的首先是约束政府、约束君主。但对政府最重要的约束不是纸面的法律条文，而是坚持法律和道德的老百姓，是我们自己作为普通人对法律和道德的坚持。一个民族的老百姓不能在法律和道德面前自我约束，他们就不可能约束自己的政府。所以，自由主义者在呼吁约束政府的时候，也呼吁每个普通人自我约束，他自己并且首先自我约束。而现代社会中，个人已经脱离传统家族关系的束缚。对几乎没有任何亲情、家族、村社、友情、义气关系约束的个人来说，法律在道德之旁成为个人行为的重要约束。

广义地说，法律指明确的成文法规和其它各种成文规则与先前的法院判例。可我们知道，1) 人们永远无法用文字写尽所有需要规范或者处罚的行为。因此，法律都是不健全的，都有漏洞可钻；2) 人们无法事先想象出所有可能的行为以制定法律约束之，比如范美忠的先逃、克拉玛依的领导先走，再比如中国国企的贱买，有几个人能够事先想到呢？3) 即使事先想到或者事后知晓了某种行为，人们也不一定要用法律或规则去约束，社会更不必把法律写得多么详尽。比如教师是否可以先逃、领导是否可以先走等，都与很多具体情形有关，用法律统一绳之没有必要，反而在许多情形下会导致合法不合理、非法但合理的矛盾。

但是，法律无法写尽也不应当写尽所有可能或应当规范的行为，并不必然造成“无法可依”的局面，更不必然造成范美忠先逃只是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的争论。在世界两大法律体系中，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用公民陪审团的方式决定某种行为是否违法。陪审团成员从社区成年公民中随机选取，几乎都是普通老百姓，其法律知识远远低于律师水平，其道德更非高尚。但是，他们不但面对法院，而且面对自己的孩子、亲友、同事来对某一行为是否违法和违法程度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这样的公开而非“匿名评审”中，他们的良知本身就受到公众的监督。以德国为典型的成文法中，法官按照是否符合“良好习俗 (gute Sitten)”来对某种法律上没有明确规范的行为做出是否违法和违法程度的判决。显然，在这两大法系中，道德和法律没有明显分野；没有在法律中明确提及的行为，并不就自动成为“道德问题”。所以，在英美德等国家，民众从来没有“无法可依”的抱怨，法院从来没有“无法可依”的拒绝接案借口，违法嫌疑人从来没有“无法可依”的自恃。据说中国正式法律之多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如果加上中国政府、中国各个单位的被法院承认的各类规范性文件，中国的广义法律条文应当早就高据世界第一。可我们在范美忠先跑、领导先走的事件上依然“无法可依”、在国企贱卖、政府滥权上依然“无法可依”。这里的首要原因无疑是政治制度的不当。中国政治制度在这里必须有根本的改变。

另一方面，在批评政府的同时，我们每个人作为普通老百姓又需要反躬自问，需要约束自己。也许在现行政治制度下，在我们每个人慢慢地习惯于法院拒绝接案的“无法可依”借口时，我们自己也就逐渐地把道德和法律想象成泾渭分明的两回事，以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就不必受到公开处罚甚至不必受到公开谴责。其实，我们应当清楚地明白，法律只是社会意识到了需要用条文固定并且强制个人遵守的道德，道德只是没用或者还没有意识到需要条文固定并且期望个人遵守的法律。两者之间随时可以变动。而且，世界两大法律体系都允许事后变动以处罚那些虽不违法但严重违反

道德的行为。一片绿地上有少数人为便捷而行走，只要无碍绿草生长大势（草也不是那么脆弱的），就不必用法律来规范；况且，那在绿地上行走的张三或李四说不定真有急事。但是，如果一个人严重践踏绿地，即使没有相关法律条文，这个人在法治国家也会受到惩罚。反过来，如果许多人都在绿地上行走，社会就只好立法禁止；走的人变少了，法律又可以废除。类似地说，如果每个教师执教的班级中都有自己的孩子并且每个人都以自己孩子的生命为重（传统社会），或者，尽管教师执教的班级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们仍然以职业规范为重（现代社会），那么，范美忠先逃事件即使有、先逃的教师也不会自以为是。此时，社会不需要把道德写明为法律，亦不需要讨论甚至惩罚先逃的教师：大家同情地对待他们就行了，如同同情地对待少数在绿地上行走的人。反之用“没违法就是正当的”、“只要不违法，一个人就应当先顾自己”来为普通老百姓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辩护，那就和法官用“无法可依”来拒绝受理国企贱卖、劳工、权利受损以及像邹恒甫被开除之类的申诉，没有什么不同，而后者，正是范美忠和许多网友所强烈反对的。

当然，我们需要反对泛道德化。但是，我们不能同时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道德无关”。其实，道德较之法律更加重要。这里的道理很简单：一个社会的好坏并非建立在遵守法律条文上，否则，监狱将是最好的社会。因此，自由主义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强调道德。自由主义并不一般地否定传统道德。它只是摈弃了传统道德中的专制和臣服内容，而换成人人平等，并在这一基础上承接了传统道德。由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依靠家族或者君主来约束和调节，所以自由主义特别重视个人对道德的尊重与畏惧，强调个人责任感和自我约束。可以说，当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以为“只要不违法就只顾自己”，“只要不被发现就违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社会是难以实现自由主义的，这个社会往往就只能落入专制的悲剧之中。我相信，这不是范美忠和支持他的网友所希望看到的中国。

2008年7月24日

（因为在上传时被警告“页面中有违法关键字。”，所以在文中所提及的姓名上加了符号以便上传。这里谨致道歉。同时，我对上述警告表示强烈抗议，因为中国没有一条法律禁止本文中使用的任何关键字。 胡景北，2008年7月24日）

七、基本品行和社会制度

1. 基本品行和社会制度

将近一年前，我把莫泊桑小说《项链》的读后感发到网上。我的主要观点是《项链》所展示的主人公在人间的阴差阳错面前勇于负责的人生态度，使它成为一篇名作。但由于《项链》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小说中的阴差阳错又和主人公的虚荣心相关，所以，不少朋友还是习惯于把小说中的阴差阳错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只是在资本主义下，那样的阴差阳错才发生了，而主人公才需要吃那样的十年辛苦。但我认为人的基本品行和特定的社会制度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为某些不是很必须的用处而向他人借东西、以及借东西后不慎丢失的情形，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发生。我们自己就经常向同学、朋友、同事借一些不是非借不可的东西。考验我们生活态度和基本品行的，不是借东西与否，而是像《项链》所描述的不慎也不幸地丢失他人东西后，我们怎么办的的问题，是借者此时是否敢于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责任感，一种勇气和吃苦精神，而非社会制度问题。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任何一个社会内，都有人更敢承担责任，尤其是对自己过失的责任，也都有人更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人类的文明如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它是不是能够使敢于负责的人在人口中的比率越来越高？好像很难做出肯定的断言，就像很难说我们今天（不管它是什么社会制度）就比 1000 年前的宋朝人更敢于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错误负责一样。所以，在这样一个生态度或者品行的问题上，我们实在不必把社会制度拉进来，不必把小说中的借非必需物品或者虚荣心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否则的话，从逻辑上推理，我们也应当把小说主人公敢于为自己过失负责的品行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但这显然不是我们的中学教科书想说的。

人生的态度，一个人的品行，不一定与特定的社会制度有关。作为人，而非纯粹的动物，一个个体需要和他人共同生活在社会中，这就产生了基本的人生态度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会给人类个体提供不同的行为激励，因此会产生相应的人生态度与品行问题，但这一点不能够否定人的不随社会制度而转移的基本品行的重要性。孔夫子言论和圣经的精华给我们的正是这些基本品行的教育，所以它们才能历代流传。一个人借东西后原物归还、丢失后赔偿，尤其是承受严重代价后依然心平气和的赔偿，这个人在任何社会下都是值得尊重的。相反，在我们社会中发生的借东西不还、丢失东西后不愿意承受严重代价赔偿的行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应当避免的。莫泊桑的作品本来会使我们感受到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行，但我们的中学教育不去引导学生注重这些品行，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谓“资本主义下的虚荣心”和“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上，是有违于教育宗旨的。

2004 年 5 月 13 日

2.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2001 年值得中国人大大庆祝一番的大事之一，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多年来的愿望，是政府近几年的施政目标之一，如今实现，当然值得庆祝。然而，从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国内公司要新发行 A 股或增发 A 股，其财务状况不

但将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而且将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似乎却又与世贸组织精神有相左之处。

加入世贸组织，本来是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让中国市场按国际惯例行事。然而，一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行事方式，据我所知，不是国际惯例。一面加入世贸组织，一面又违反国际惯例，这是使人难以理解的第一点疑问。第二点疑问，本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是否有损于国家主权之虞？第三点疑问是，即使不谈主权问题，仅仅谈经济的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和外国的会计事务所也应当作为同等权利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为何外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不需要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而中国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与外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业务，要经过外国会计师的补充审计呢？中国会计事务所岂不成了二等公民？世贸组织倡导的市场竞争平等又从何说起？

那么，深受这一新规定之害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为什么不大声提出异议呢？要知道，这些会计师就收入和社会影响力来说，都属于中国的佼佼者之列。对此的解释之一是许多会计师做假帐。做假帐者如卖假货人，当然没有权利、至少没有同等权利参与市场竞争。但一定要冒既违反国际惯例又可能有损国格之风险来请外国会计师做补充审计，其前提必然是做假帐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占中国注册会计师总数的比重非常大，以至于不得不请外国人来把审计关。可是，中国的注册会计师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多数立过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言，加之人人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品行高尚的优秀公民。我无法想象我遇到的 10 位这样品貌双全的会计师内可能有 6 人或者更多人竟然在做假帐！！中国会计师的人格何在？？因此，我衷心希望这种解释是个错误，希望早日读到充分尊重中国会计师人格和中国国格的解释。

2002 年 1 月 15 日

3. 资本主义起源和良好道德规范

近来无意想到了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而没有起源于当时经济可能更加发达的中国？原因有很多种，技术创新（它也许比现有技术水准更重要）、探险精神、国家间的竞争、人文意识、宗教等等，都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想是良好的道德规范。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可分离。个人有独立行动、独立决策的自由，市场才可能有平等的竞争，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可能出现和发展。但平等竞争的前提，或为每个人能力同样，或强者自觉地按规则行事，而不恃强凌弱。由于每个个人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同的，因此资本主义起源便部分地依赖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有一个自觉按规则行事的强势人群存在。我们常常谈到企业家素质对市场经济的意义。如果我们把企业家视为努力追求并且知道如何追求个人利益的人，那么，任何社会都不缺乏企业家。只要有空间，他们就会在这个空间内争取自己的利益。假如一个社会给企业家足够的空间，每个企业家会如何追求个体利益呢？如果我们想象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择手段，像马克思说过的那样，为了 300% 的利润甚至不惜上绞刑架，那么市场经济秩序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出现，因为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无法纳入到整个社会制度中，因为失败了的企业家和不以经济利益为追求的社会积极分子（也可以算企业家吧）将有正当理由制止和消除这种

腐败堕落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企业家在其活动空间内自制，需要他们仅仅用正当的手段按规则追求自己的利益，用中国的古训叫“生财有道”。市场经济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特有的规则，因此“正当手段”便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尤其企业家具有良好的道德，自觉地按照人与人关系的一般行为规范行事；意味着企业家自觉地拒绝今天我们所说的寻租活动，自觉地拒绝自己的特权机会，更不用说拒绝欺诈和作假。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年的西欧正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笃信上帝。许多人写作不署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作品是上帝对他心灵的呼唤，作品应当属于上帝。许多人争取财富，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是为了向上帝表明自己的虔诚。他们争取财富增殖，不是个人或者子孙的享受，而是为上帝效劳，许多人最后把财富献给上帝或者上帝认为好的事情，例如教会、慈善组织等等。这些人在以上帝为终极目的时，把财富增殖视为中间目标。为了这样的中间目标，他们将自觉地仅仅使用正当手段，因为任何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财富不但不会受到上帝的赞扬，反而会受到他的惩罚。如果这些人在市场交易中失败了，他们会认为这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他们将接受教训，更加谨慎更加努力地从事市场交易。在以这样的人为核心的市场参与者中，渐渐地形成了市场交易所特有的规范，尤其是防止寻租和特权交易的规范。市场经济也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资本主义开始正常发展起来。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如何。就我的中国而言，历史上似乎没有自觉遵守“生财有道”古训的企业家人群。读一下“三言”“二拍”、“水浒”“红楼”，我到处发现企业家寻租现象。“人无横财不发”的贬抑之说，虽然被许多学者批评为中国过去发展市场经济的心理障碍，但亦非空穴来风，似乎多少也是中国企业家历史和现实的写照。由此看来，缺乏一群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企业家，可能是中国无法从内部产生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

2002年3月15日

4. 从农村村级财务公开问题想起

小时候在家，常听母亲说到“以心比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长大后，读到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体会到母亲的意思，大概就是孔夫子的站到别人角度设想的意思：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换到别人也不会愿意做，因此从道义上说，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应当说，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了。以这个要求为临界点，算它为零点吧。做不到这一点，那道德水平可能就是负数，就在损害社会；高于这一点，比如有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把自己也希望的好事送给别人，就像在公交车上把自己希望而且已经得到的座位让给抱有同样希望的别人，那是道德好的人，对社会将大有裨益。

这段感受来自于近来的阅报。在报上常见到谈论农村村级财务公开的文字。村级财务公开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老”是因为它早已不新鲜了；“大”是因为它关乎到几亿农民；问题既大又久而不决，自然就难了。以我自己在农村的经历，知道那里很有一些人，粗野、蛮横，当上了村干部。农民身份，即使辖下有数千人，要转为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还是比登天还难。既然无升迁希望，农民包产到户了，生产也不需要他们多管，手中权力，也就集中在财务上。好容易从农民手里收上来一点钱，要他们公

开收支，说清这钱有多少用在集体事业，有多少用于他们个人，扪心自问，确实不易。于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让这些作为村干部的农民明白，村级财务公开是他们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表现。

但是，谁来教育农民呢？当然是文明、高雅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然而，按照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准，这些人教育农民的资格不够，因为他们自己的财务就没有公开过，甚至没有想到要公开。比村干部高一级的是乡干部。乡财务公开了吗？没有。再高一级是县。县级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省级财务是公开了，但村干部最不愿意公开的与自己个人有关的部分，省级财政没有公开：省长工资几何，奖金多少，都在云里雾中。也许，官员有官员的难处。那么，知识分子的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哪一所中学的财务公开了？哪一所高等学校的财务公开了？好像没有听说过。就是大学的系一级的财务也没有公开。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可为什么他们自己单位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也许，知识分子也有难言之隐，不便公开自己的财务。诚如此，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标准，知识分子便应当考虑到农村干部的难言之隐，即使不撰写论证村级财务保密的文章，也不应当发表论证财务公开的作品。和官员们不同，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和学者，往往自诩为社会道德的楷模。那么，他们至少应该作到自己不愿意公开的事情，也不要求别人公开。自己由于各种难言之隐而无法说服自己公开财务的话，又怎么能够教育农村干部公开财务呢？如果硬要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给农村干部，按照我们的计量分析，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平便成了负数，学者也就难逃伪君子之疑。面对这样的教育者，受教育的农村干部不会动心，记者在报刊的呼吁不会真心，村级财务也就很难公开，老大难的问题将继续“老”下去，并且没有老而逝之的迹象。

2002年6月19日

5. 善良的局限性

在真、善、美三者中，我原先特别重视善良，以为善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而所谓的善良，便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为这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而真、美在我心目中是次要的。

但是，许多事情促使我渐渐地转变了看法。远的不谈，就说前些天的一次聊天，天南海北、突然谈到了出版。一位在省市自治区级别的机关工作的人推测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德国肯定是非法出版物吧？！”这使我吃了一惊。为什么？说话者是很熟悉的人，也很善良。照说他读过不少书，至少梅林的“马克思传”他读过，我知道。在省级机关，学校、开会、参观的机会也多，接触面、知识面不能说狭隘。但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推测呢？在当时的聊天场景下，这显然是好心人在推己及人：既然批评我们国家制度的书籍在我们国家是非法出版物，那么，批评美国德国制度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那些国家被当成非法出版物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那些国家也应当把《资本论》划为非法出版物。我们自己希望做的，当然也得允许别人做。况且人之同心，事之同理，我们这样做，别人也肯定这样做。

然而，他这一次的推测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第一版起就是德国美国的正式或者合法出版物。它从来没有非法出版过，马克思自己没有、后来形形色色的出版社也没有在出版它时应官方要求而做过删改。在希特勒统治德国的短暂年头里它被作为犹太人的作品和共产主义的作品，而从合法出版物变成禁书。希特勒一倒台，《资本论》又成了合法读物。所以，《资本论》有过被当成非法出版物的经历。但美国是战胜希特勒的主力，现在的德国又和希特勒明确了划清战线，因此不能把他们和希特勒混为一谈。同时，《资本论》在美国，在希特勒之前和之后的德国，都是在正规的书店可以买到、在正规的图书馆可以借出的书籍，这一点，有过美国、欧洲经历的人都可以证明。而且，他们还可以证明，那决不是为了让我们中国人参观或考察而特地摆到书店和图书馆展示的（否则又有朋友可能会合理推测）。

由此我体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善良，有着严重的局限性。这里的关键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的狭隘。一个善良的人根据自己在所熟悉环境下行为处事的方式来希望别人，诚然是不错的。但他往往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他不熟悉的环境，不知道如果越出他熟悉的环境，他的推己及人就会得出不真实的推测。如果他按照自己错误的推测去办事，他的善的心愿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弥补这一局限性的具体方法，是我们祖先教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解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和那些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弥补这一局限性的抽象方法，是西方人所说的追求真，追求适合于所有环境的普遍真理。不重视真的善，只能应用于日常生活；超出了日常生活范围，就可能变成不善。只有以真为基础的善，才是普遍的善。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已经成为大范围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的今天，日常生活的善转变为社会生活的不善，是非常可能的。因此，“真”已经成为“善”的必要条件，“真”的重要性一点不次于善。

2002年10月8日

6. “权”与“礼”

孔孟之道这个词，是我二十岁出头时碰上批林（彪）批孔运动，从有线广播中知道的。林彪要复资本主义，倡“藏富于民”，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孔孟要复周朝制度，称“男女大防”，不以革命友谊为先，都是令时人愤愤然的。林彪的说法不论，但作为孔孟罪证的“男女之防”一说，当时倒变成了年轻人之间常用的玩笑话，并且也被我和我的许多同辈接受了。后来读马列书、学经济学（不是经学），接触的几乎都是外国的理论；对孔孟之道，除了偶然见到若干语录外，没有读过原著。细想起来，有些愧为黄帝子民的感觉。于是近几年常把四书五经放在案头，间或读一读，才发现自己从当年那种摘语录做枪靶的背景下获得的孔孟印象太过狭隘。

比如，男女之礼，孟子是如此说的：“嫂溺不救，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也就是说，男女之接触，社会有规范。在正常情况下，去拉异型的手，是非礼；但若异型溺水，不伸手去拉，见难不援，见死不救，则又无异于豺狼。异性溺水，是特殊情况，伸手去拉，“权也”，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又是救人于水火之中的必要方式。但特殊情况毕竟少有发生，因此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变”，并不能够否定在一般情况下的礼。

于是乎想到白猫黑猫论。异性溺水，救人要紧。白猫黑猫，救起人就是好猫。于是拉住溺水异型的手，下水托起其身体等等，都行。但是，在正常情况下，白猫黑

猫论就不中了。假设溺水的是某位男士倾慕已久但无缘相识的女性，这位男士当然应当救人出水，拉手或拽衣，自如白猫黑猫一般，救起人就是好猫。但在普通场合，该男士必不能运用白猫黑猫论，随便去拉对方的手：他要想结识对方，便必须遵守社会规则，要“礼也”。规则之一是表现出自己的正当能力。读好书便属于这样的能力。古人也有用“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说来教导学生用心读书的，那些先生是知道“把书读好”的白猫才行，读不好书而用权术去抢、骗美女这样的黑猫是不行的。

然而不幸的是，白猫黑猫论一旦成名，其地位竟然从孟夫子所说的“权”变成了“礼”，有了调节社会和个人一般行为的功能。股票市场作为改革措施之推出，便有白猫黑猫，圈到钱就是好猫之嫌。白猫黑猫，能发财就是好猫，能稳定就是好猫，能得到提拔就是好猫，能够拿到好处就是好猫。至于用来发财、稳定、高升、获利的方法是否合“礼”，是否只有比如白猫才行，而黑猫绝不可用，则已经不在考虑之中了。这种只管目的、不问方法的哲学的泛化，和经济目的第一或唯一的气氛相配合，造成了整个中国民族的急功近利。从老百姓方面说，这几年的下岗过程中，许多人更改年龄、工龄、病历，以谋得下岗津贴或者退休金的好处，其状况固然值得同情，但方法却又令人可悲；考试舞弊、作文抄袭，用“黑猫”冒充“把书读好”的白猫，则令人可恨；至于有权的人一边唱高调，一边改分数、改票数、改产量、改政绩甚至随心所欲改规则，以达一己之私，更令人可鄙。此况不变，中华复兴无望。为改变从平民到高官不分白、黑的可悲可鄙心理，从官到民，以孔孟之道，辨明白猫黑猫，分清权、礼之别，“克己复礼”，重立社会规范，应是当务之急。

2002年11月24日

7. 地震和非典

昨天接到通知，作为有关方面防范非典的措施之一，如果我最近有离开上海的活动，应当事先去登记。接到这个通知，我一方面很感动，防范措施做到这么细致；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做得过分了。

记得1976年，中国的一个天崩地裂年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那年相继去世；邢台、云南、唐山相继地震。也许那一年属中国地震多发年，为防止唐山悲剧重演，各地有必要采取防震措施。因为地震常发于夜间，因此每家搭建防震棚，夜里住在棚内。其时我生活在农村，正值夏季，本来露天睡觉便无不可，而且常有几个年轻人拿张席子，到宽阔处聊天，然后昏昏睡去，“不知东方之既白”；但我还是喜欢睡在房里。那时，一到傍晚，若阴云遮空，便有地震之相；倘红霞西起，那一定是地震的预兆。我请假到家乡的城市看望母亲和妹妹。母亲不是强人，妹妹年幼，搭建防震棚的本来就勉为其难；城市不比农村，夜间地震，逃出房子和房子夹着的街道不是一件易事。不过，我还是主张住在室内，虽然没有“死了好汉一条，不死一条好汉”的胆气，但中国之大，也许不至于全国到处都会地震的，以此自我安慰，睡觉亦香，早晨醒来也知道活着不完全是侥幸。后来学了点数学，才明白不完全是侥幸的科学说法是全国各地同时地震的概率太小。

唐山地震已经过去27年了。如今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开始是谣传，拿到别人送给我消毒的白醋还以为人家受谣言之蛊惑。如今越传越真，政府也出面组织防治了。政府出面，谣言顿消。各地、各单位也许为本部职工健康，也许为紧跟政府，纷

纷采取措施。措施越严格，防范效果当然越好，况且对下可得子民之谢，对上可获领导之奖，因此乎各项措施竞出，互争峥嵘。据说清华大学为防非典，不准校外人入校。清华是何等高校，尚且如此小心，其他学校自然必须更加严格，方能够在防治非典的战场和欢庆胜利的会场上得一席之地。

防范非典，与防范地震自然不同，本应以增强身体素质、提高免疫力为要义。紧急关头采取特殊措施是必要的。况且中国学校有大门，人员有组织，比起别的国家，防范起来简单得多。不过，就像 1976 年不会到处发生地震一样，2003 年也不至于到处出现非典。大张旗鼓完全应当，适度措施更为必要，但谨小慎微恐怕不必。就我而言，自忖还是以平常心待之为妥，在这段时间内多点个人卫生，多点休息，多点安静，多读点书，便近乎足矣。

2003 年 4 月 23 日

8. 再谈财务公开问题

恰好一年前，我因为阅报有感，在去年的双周夜话 13 期上，对报上文章倡导的农村村级财务公开发了一些感慨。写文章的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自己的比如校、院、系级财务便没有公开，怎么能够“鼓足勇气”倡导别人公开财务呢？当时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为什么他们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如今我自己当上了大学里专业学院的院长，一年前向别人提出的问题，便一变而成了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好在我当院长，原本就是为老师服务几年。既然为老师服务，工作就要向老师汇报，财务自然要向老师公开。于是学院便制定了规则（见附件），公开财务状况，包括重大的单项收支、院长个人从经过学院获得的收入，并由教师代表组成审计小组加以审查。

学院财务公开，各个部门财务公开，包括企业在内的领导人的收入公开，这本身不是需要下笔千言去论证其必要性可能性的事情。在公开场合，有几个人不懂得它的必要性可能性？同时，这些事情实行起来亦没有多大困难。然而竟出现论证者把道理说的不由人不信，可是自己便不信、不实行事情，真是现代文明的一大奇特现象。我常常怀疑这样的论证者是不是患了精神分裂症而浑然不知，因此才能“理直气壮”地把自己不相信的道理说服别人相信。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是这个民族精神的代表。如果许多知识分子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却向别人论证如何应当而且能够去做，这个民族也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报纸上不断有人谈到目前中国的精神危机，指的大概就是我们今日经常看到的行愈丑而言愈美的现象吧。我想，克服这个危机的首要方法是知识分子的自律。自己愿意做的，才希望别人也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也不希望别人去做。而知识分子单位的财务公开便是验证他们是否自律的一块试金石。

2003 年 6 月 17 日

附件：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文件

关于本院财务公开的若干 决 定

根据学校关于加强二级管理的指示精神和院财务透明化的要求，谨作出如下决定：

1. 将每学期教师的工作量和在院内取得的相应报酬公开，并同时公布工作量和报酬计算规则。
2. 在公布教师工作量与院内报酬的同时公开本院非教学人员的工作量和院内报酬。
3. 院每学期末公布该学期的院财务状况，包括
 - 1) 收支平衡表
 - 2) 重大的单项收入或支出
 - 3) 院长个人从院获得或经过院获得的收入
4. 每学期末由三位不属于院级行政领导班子的本院职工组成院财务审计小组，审查该学期或自上一次审计以来的院经费收入和应用状况。

院财务审计小组的组织工作由院中共党总支和工会主席负责。
院行政领导班子和财务工作人员有义务向院财务审计小组提供后者所需要的所有信息。院工作人员有义务协助院财务审计小组工作。
5. 院财务审计小组的职权是
 - 1) 检查院内收支状况，包括查验原始单据。
 - 2) 检查内容包括
 - a) 如果学校、院订有规则，检查实际收支是否符合规则
 - b) 如果没有规则，检查实际收支是否符合学院整体利益，是否公平、合理。而学院整体利益、公平合理的含义由该小组自己解释。
 - 3) 要求有关人员对其不明确的地方作出解释，包括要求对全院职工公开作出解释。
 - 4) 对严重违反规则或严重不公平合理的支出，要求有关人员检讨甚至退赔。
 - 5) 直接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该小组认为应当报告的事项。
6. 院财务审计小组在审计结束后将公布审计结论。结论除了其他内容外，应当明确指出：
 - a) 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严重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或
 - b) 没有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严重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或
 - c) 没有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不符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
7. 如果本决定在公布后的一周内，
 - 1) 学校没有下发复议批示，
 - 2) 没有至少三位本院教师共同提出复议的书面申请，本决定即开始生效。

经济学院
2003年5月29日

9. “驶入黑暗”

几个星期前在德国，半夜和一个朋友驱车从外地回波恩（Bonn）。宽阔的高速公路上，视野内仅有我们一辆车。时近子夜，阴云笼罩，伸手不见五指。微弱的车灯，只能照见高速公路前面十来米处白色的车道线；遇到弯道，就只能看到车子前头几米远的一侧白线。我紧盯着车道线，脚上的油门几乎没有离开过140公里的速度。偶然间我望了一下远方，黑沉沉的天空、黑茫茫丘陵、黑黝黝的前方，我的头脑里突然显现出一句德语“Fahrt in die Dunkel”——“驶入黑暗”：我们在黑夜中行驶，我们的前方是一片黑暗，我们正在驶入这黑暗中。

是的，驶入黑暗，不但夜间行车如此，人类社会、个人生活也莫不如此。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特别强调人类展望未来时的恐惧心情。比如，我们不知道人类是否已经懂得了避免大规模自相残杀的道理，我们不知道中国是否逃脱了用暴力来改朝换代的“宿命”。我们不知道石油用完了怎么办，不知道人人有汽车、有房子的时候如何刺激消费。我们不知道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家庭、婚姻制度造成的后果，也不知道二十多年来的西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固然，有时候我们很有信心，眼前一片光明，就像文化大革命中我做为红卫兵的一员对毛主席的万寿无疆充满信心一样。在那个时代，“毛主席真能万寿吗？”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大家的脑海里。今天，即使我们也有信心，但我们毕竟明白了自己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车轮将驶向何方，不了解重大政策将有什么长远影响。对这类关乎未来的问题，我们毕竟处于黑暗中。我们在高速前进，但我们甚至连偶然间眺望一下那黑洞洞的远方都不敢。

个人对自己未来的无知程度不亚于人类全体。无论身体、家庭、学习、工作，任何东西都有风险，任何未来都深藏于黑暗之中。当我们用“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来安慰没能跨入大学的朋友时，我们是否同时在向大学生警告未来的黑暗呢？我们拿到就业位置、步入婚姻殿堂、获得权利职称的时候会欢欣鼓舞，会忘记我们正驶入黑暗，因为我们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需要自我慰藉。可实际上，我们向前方看到的也许仅仅是几步，充其量不过几年。所以，当我们接受或者拒绝一件事情，当我们用无作为的方式拖延决策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祸福，我们其实在走入黑暗，无论我们的步伐是坚定的还是蹒跚的。

是的，驶入黑暗，就像我们的汽车驶入无边夜色一样，我们的人生也在步入不可知的未来。汽车最终还会自动地迎来城市的灯光或者黎明的晨曦，人生花费了巨大努力，却不一定能够实现这点希望。不过，开车的经历同时告诉了我，即使一个人的未来黑漆漆的无法辨认，即使一个人正在走入黑暗的未来，但只要他把自己的步伐保持在人生道路上的两条白色车道线内，不逾越先哲确定的人生准则，他就不会出故障，更不会翻车。夜色下的驾驶员看到的虽然仅仅是车前很短一段车道线，但他知道在车道线内行驶就是安全的。同样，先哲们确定的人生准则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几条。我们只要遵循这几条，不受任何理由的动摇，“不逾矩”，我们就能坚定地前行，即使在黑暗中。

2004年6月2日

10. 三八妇女节有感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虽然现在离开今天的结束只剩十几分钟了，我还是想祝贺我的母亲和姐妹、祝贺我的女性朋友，祝贺我认识的所有女性，祝明天、后天、每一天都成为她们的节日。

我对女性的最初意识，应当起源于我在农村插队时期。15岁时，我响应毛泽东“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来到农村。不久，生产大队（即今天的行政村）发生了一桩女青年自杀事件。当时农村没有现代通讯手段，可这件事如风一样，附近人一下子全都知道了。原来是位20岁姑娘，因为父母不同意她和自己喜欢的男青年结婚而上吊了。我那时不知爱情、婚姻为何物，但毛泽东时代人人自主独立的宣传深刻在脑子里，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时代还有人为了自主而自杀，尤其是被我们男青年称为“丫头”的姑娘。女性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开始形成。我在农村号称十年。那时农药作为新鲜事物刚刚引入。而农药，特别“乐果”，酒瓶般包装，立即成了女性的有力武器。未婚和已婚女性在家庭专制面前，常常拿起“乐果”瓶，以死抗争，于是父母、男性不得不时有让步。我敢说，如果人类学家仔细研究一下，可能会发现七十年代的江苏省农村，“乐果”使用量、女性自杀数量和女性自主程度提高之间存在明显的数量关系。而恰恰前年，我熟悉的一位女性还为了抗争家庭不公而喝了农药。

是的，祝英台不仅仅是戏剧，不仅仅是中国的过去，她也是中国的现实。当我看到许多上海女性挣脱男性家庭专制而获得自由，我衷心地为她们高兴。可是，当我看到三峡悬崖上的零星人家，当我发现金沙江峡谷内的几缕炊烟，当我终于体会到生活中的实例，我又明白那荒山野岭里仍然住有现代的祝英台和梁山伯，我明白仍然有许多祝英台和梁山伯要逃到那里才有安全。中国社会的无情事实之一，是许许多多女性仍然生活在家庭专制之中，她们仍然被男性家长视为自己的物品，她们的反抗仍然将遭遇暴力的镇压。

中国现实中的家庭专制又和整个中国的单位专制、国家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欧洲人日常行为（例如使用手帕、用餐动作、卧室行为等）演化的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经举了一个欧洲十八世纪的例子说明男女平等的发展。一个人的妻子爱上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并没有因此而咒骂喊叫，也没有提到他作为丈夫的权力。公众的舆论是不会支持这些做法的；他克制着自己，对他的妻子说：我给你自由，但是我知道，这样一来却比任何戒律和规定都更能限制你。换一句话说，他期待妻子能够和他自己一样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这一典型的例子说明了随着男女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而出现的新情况。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自由并非是由某个丈夫给他妻子的，而是由社会结构所赋予的。”（《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第287页）。100多年来，中国就把男女平等作为自己的口号。禁止裹脚、女性入学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政府的重大事件。

《娜拉的出走》这部欧洲戏剧正好在100年前让中国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无论在家庭、在单位还是在社会都有着独立的尊严。但是，如果城市人和乡村人还因为户口制度不能够平等，如果上海人和江苏人还因为高考制度不能够平等，那么，城市男性和乡村女性或者城市女性和乡村男性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僵化的社会结构束缚了人性发展和人格独立，尤其束缚了女性的人格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压迫女性的家庭专制的消除，又和整个国家专制的消除，和社会对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外在承认和内在尊重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许多男性在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阿谀，远比女性在家庭专制下的畏缩更加可憎可叹。而女性争取平等的过程，也恰恰是男性向有教养的公民转变的过程。所以，在祝贺女性节日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中国社

会不但能够迅速地摆脱封建社会下国家专制的阴影，而且能够迅速地摆脱野蛮社会中家庭专制的遗迹，让女性被迫用喝农药方式争取自身人格的现象永远不再出现，让每一位女性得到充分的尊重，让每一位中国人得到充分的尊重。

初稿于 2006 年 3 月 8 日

修改于 2006 年 3 月 13 日

11. 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三个月前的今年 3 月 29 日，我在本网页(www.hujingbei.net)上，就针对我本人和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的一个骚扰电话提出抗议。这以后一段时间内，骚扰电话变得更多。但我的持续公开抗议，网友们对这种骚扰行径的抗议，以及同济大学保卫处的介入，终于迫使骚扰者停止了骚扰。今天，在从本网页首页取下抗议文本的时候，我和我的教研室同事，向网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同济大学保卫处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也向停止了骚扰的那些骚扰者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他们自重。

同济大学保卫处通知了我们部分调查情形。在上述四个电话号码中，有两个号码仅仅用来打电话给我本人和我们教研室，因此无法追查下去。其余两个电话号码是不是可以追查下去？可是，我认为，没有必要追查了。打骚扰电话的人，无论是自报下岗工人的还是不报来历的人，都是凡人、小人或者弱者，被逼或者被诱才做这种事情的。如果他们被查出，他们可能再次失去工作；他们会为周围人所不屑。他们的处境本来就很难，以后将更难，所以，我们应当为小人讳，为凡人讳，为弱者讳，不查也罢。

从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开始，中华民族形成了“为圣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习惯。今天我们需要消除这个习惯，而代之以“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的新习惯。圣者、贤者、尊者，道德文章、潇洒风度、豪放之客、侠义之士，都是君子。君子坦荡荡，本无所谓讳；即使有错，也不应讳，不须讳：虚心听之，用心正之，才是君子之道。一个人的言论行为如果需要“讳”，这个人就不是君子。如果一个人自称君子，却讳匿不正言行，这个人定是伪君子。时人后人应当揭其丑，以正君子之名，更无讳言之理。君子不会因为毁谤而丧失名誉，更不会因为自身错误缺点的公开而落入小人之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社会内的君子需要隐讳，这个社会实际上不存在君子，这个社会才需要找出几个凡人、弱者的类似错误来张扬。

当今中国，为官而有“长”之头衔，为学而有“师”之名号者，大概都能视为君子。只要看他们对下属、对学生宣讲章法、阐述道理时正义凛然的样子，就会发觉他们俨然以君子自居。这些当官为师的人是社会的典范和舆论的领袖，担负着管人教人的高级职务，掌握着立法执法的权力。社会风尚好坏、人心趋向善恶、百姓规矩方圆，首先取决于这些人言行一致的程度。他们管教下属、学生时满口仁义道德，如果言行一致，社会风气便正，人心便向善，百姓便有规矩。至于小人、凡人、弱者，无论他们如何犯错误，他们的影响是小的，动摇不了风气潮流、扭曲不了规矩方圆。所以，为他们讳或不讳，对大势无关紧要；从他们个人着想，则应当以讳为上。但如何保证起决定性作用的君子们言行一致呢？有效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不为君子讳”，就是把君子的言与行公开化，用舆论的压力强迫君子们言行一致。其它方法，例如党内

处理、单位内处理，中国历代王朝都用过，都没有解决一放就腐败、一紧就专制的问题。为了打破这个怪圈，我们必须改变为君子讳的旧习惯，把为官为师者的言行放到光天化日之下。

因此，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2006年6月29日

12. 不把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再施加给别人

学生：

你好！谢谢你的信。我理解你的愤怒，支持你公开表露愤怒，支持你公开说出感受。我担任过多年研究生考试出题工作。应当说，重复出题未尝不可，但时间间隔必须相当长，而且不应当出现在大题目上。小的不超过1、2分一题的题目如判断题、选择题，间隔若干年而个别地重复出现，是完全可能甚至不可避免的。但大题目在比如20年内完全不变地重复，肯定是一种错误，特别在考研这样重要的考试中。因此，今年考研英语翻译题和2005年的试题重复，教育部犯了错误。教育部应当向国人做出公开道歉。我相信，教育部内部对这点的认识和我、你一样清楚。他们不习惯的只是处理社会事务时的坦诚（即使他们属于中央政府）。在教育部内部，这次出题错误应当会得到某种处理。然而，这类错误毕竟和比如教育部盖的某个办公楼倒塌不同，因为后者没有社会意义，所以内部处理就够了。考研出题错误牵涉到公众，教育部应当向广大考生和准备考研的青年人公开道歉的。

你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会这样不了了之。我的回答是如果像你这样的人多了，这件事情就不会这样不了了之。否则的话，它完全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在这里不会起很大作用。没有民意的充分表达，任何监督都非常有限。

同时，我也要讲，即使教育部公开道歉，重新组织考试也很少可能，你和广大考生还是应当承认上次考试结果。在这里，君子风度是绝对需要的。记得英格兰球队在马纳多拉的手球被确定后的表现吧？我们都应当有那样的风度，承受委屈，心情开朗。

在这里，让我由衷欣慰的是你看到了这件事对考生心理的影响和你的担忧。是的，你和许多考生正确地感到了委屈和不公正。可你在愤怒的时候，却又考虑到了你们很容易从恶的一面接受教训、由此“学到作为一个成功官僚的好方法”的问题。对此，作为一名教师，我十分感谢你。

你的考虑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在乡下种田，得到许多好心的关照，也碰到许多明显的歧视。比如，我在当地“知识青年”中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但任何“知识青年”之间（农民青年不在此类）分配的名誉、补助、不参加大田劳动的安排等等，都和我无关。我明白自己不应当追求那些。因此，即使全公社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在种田，我也没有怨言。同时，我还没有傻到不知严重歧视的程度。和你现在一样，我那时也考虑到了未来：假如某一天我有“资格”瞧不起别人，我是不是也会像别人现在歧视我这样再歧视别人？我明白我不能那样做，不能把自己遭遇到的不公再由自己施加到新的年轻人身上去。所以，许多次我提醒自己，不能因为别人瞧不起自己而产生报复心理，不能因为别人有理由歧视自己、自己就有理由歧视比自己更“差”的人。不过，当时我接触的人和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上天眷顾，我后来竟然能

够入大学甚至当教授，真的有“资格”瞧不起别人了。幸亏年轻时对自己的提醒和警觉，我今天仍然能够平等待人，尊重而不歧视任何人。和衣着不整的农民工交往，我想起自己当年的心情，总是给他们友好的笑容和正视的目光。和坚持专制的学者论争，我会特别加上即使他们已经不属主流甚至丧失了学者本质即学术自由精神，他们也有权利说话的意思。所以，读了你的留言，我很欣慰，因为我相信，基于你對自己及同龄人错误接受教训的担忧，你即使今后为官，也不会把现在官员对你的不公，再加到未来的年轻人身上。

我们生活的社会还有着太多的不正不公。不公正遭遇可以激发一个人奋斗，改变个人地位的奋斗和改造社会制度奋斗。但是，如果一个人奋斗仅仅为了自己从人下人升到人上人，一旦自己成功了就利用权力实行大大小小的专制（也就是我在别处说过的社会专制），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的社会将永远沦于一部分人报复另一部分人的循环之中，我们每一个人则无法摆脱落为人下人的恐惧。无论就社会还是就个人而言，避免这一结局的唯一方式，是在每一个现行制度下遭遇不公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自己不应当把这种不公再施加给后来的人，不把这种不公再经由自己传递下去。你的留言让我看到了希望，谢谢你。

胡景北

2007年1月30日

附录：署名“学生”的留言姓名：学生

主题：请问胡老师 事情会不了了之吗？ (2007-1-28 1:30:19)

20 21号两天进行了研究生考试。其中英语考试，教育部考试中心出题出错。英语的翻译和05年的一模一样。很多同学都买了一本历年真题解析。我也买了。这本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证明了翻译出题的确出现重大失误。但是，教育部表示：经过认真查证，英语考试中没有出题失误……英语考试对于考生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明白。10分的翻译意味着很多之前看过05年真题的人能在5分钟之内得10，又会有更多的时间写作文。不公平！！

可惜！可恶！如果是大官贪污之类的事情，一般人不了解内情也就不说了。对于教育部这样的失误，全国千千万万的考生都看在眼里。很多参考书白纸黑字地表明了出题的错误。面对这样明显的问题，教育部竟敢说他们的出题很科学，没有出题问题!!! 纯粹的官僚主义!! 根本没有把学生放在眼里，事实上即使有一百万人清楚的知道教育部在撒谎也不能把教育部怎么样。大概也正因为缺乏监督吧，教育部才能如此大胆。

我们学生的确不能怎么样，最多在论坛上发帖子骂一骂。之后，不管怎么样愤怒，也只能无奈地接受。

教育部的行为违背的公平正义！教育部的官员都是胆小鬼，他们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他们又是勇敢者，面对着明显的错误竟然敢死不承认。其实，出错题并不要紧，关键是他们错了不承认才让人可气。毕竟是管教育的部门阿！管教育的人都不讲诚信了，那学生怎么办？今年目睹这一切的学生，当他们有一天当了官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起当年教育部的处理方式，他们会不会认为自己学到作为一个成功官僚的好方法。教育部的行为，影响深远，严重地破坏了学生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

胡老师，您的见识比我们要多得多，我想问您，您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会这样不了了之吗？难道就没人出来说句公道话？不是说民主党派的有监督的作用？？

(参见 <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13. 宽容：现代人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

今年的第一期夜话，我转载了张梅的文章“给我未来的孩子”。她希望她的孩子追求理想、踏实、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正直、勇敢、独立，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是转载给自己读的。在为她的文章感动的同时，我又感觉到除了她列举的品质外，一个优秀的人似乎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品质。积自己五十余年的经历，我相信宽容也是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优秀品质之一。

宽者，阔、舒也；容者，纳、包也。阔而能纳、舒之可包的宽容，最初表示房、仓宽大可居人或可储谷，后来引申到宽厚容人的品德。古人对宽容评价极高。孔夫子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尚书》称“有容德乃大”。不过，古人所指的宽容，含有宽宏大度、宽恕容忍的意思。《尚书》比较完整的句子是“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以忍为先。孔子说的宽猛相济、以宽服民，则把宽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当然，无论把宽容当作手段还是视为德行，宽宏大度、宽恕容忍的宽容都是一种明智做法或优秀品质。在日常生活中，谁都免不了错误；在个人行为上，谁都少不了缺点。一个人如果斤斤计较他人的错误或缺点，这个人就显得心胸狭隘，既不为大家喜爱，也难以为自己释怀。反过来，如果对他人缺点、错误采取宽厚谅解的态度，则既能服人，又可舒己。自然，宽宏大度不易做到。它需要“忍”，忍受、忍让，需要难得的“糊涂”。我们从小都读过廉颇、蔺相如的故事。这段故事之所以历代流传，是因为蔺相如的宽容大度让人感动。廉颇挑衅，他避让；廉颇认错，他宽抚，毫无自倨自得之感。蔺相如的大度宽容，应当是我们的楷模。

不过，我今天想说的现代人应有的宽容品质，和蔺相如式的宽容虽然又着密切联系，但根本点不同。现代品质的宽容，出发点不是他人的缺点错误，而是他人与自己同样正确；内涵不是宽恕、容忍，而是他人与自己的平等。对他人的错误、缺点的宽容，现在和过去一样都是必须的。现代品质的宽容绝不否定宽恕、容忍。它只是超越了宽恕、容忍的范畴，而提出了自己正确、别人也正确的问题。在生活中，一方正确、一方错误是常有的情形，例如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可在生活中，双方都正确亦是常见情形。关羽为与刘备相聚，挂印而去，有其正确一面；曹操知刘备是天下唯一能与自己争雄的人物，不容关、刘相聚，也有正确一面。若曹操只认自己一方之理，在关羽一意孤行时对其或杀或囚，史家当不会以曹操为错，毕竟事业至上。但曹操知关羽也有正确一面，因此不但不以怨、忍之心，反倒以敬佩之情送袍放行。自己对，关羽也对，这是曹操当时的心态。

现代意义的宽容，就是在坚持自己价值的同时也承认他人价值、要求自己空间的同时亦给予他人空间。宽的辞源是阔大，容的辞源是包纳。人世大小，在乎于心。世界是大家的，人世就大，就能容纳所有人；世界是自己的，人世就小，容不得他人。具体地说，世界可以是家庭、朋友、单位（比如工厂、学校、班级、生产组、社区等等）、地区、国家、地球、宇宙。宽容就是相信世界属于大家，自己有一份，别人也有一份。让别人在这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不是自己的宽宏大度，更不是自己的宽恕和容忍，而是别人本来就有权利占一席之地，别人的权利本来就不比自己权利低一点少一分。因此，现代人的宽容，不是“咬碎钢牙朝肚里咽”的忍受、不是不得已的退让、不是对别人错误的宽恕、不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不是“难得糊涂”的自寻安宁，不是出于善良而“不忍罚”的宽厚、不是发自宠爱的放任。现代人的宽容也许包括了这一切，但它的本质与传统的宽容截然不同。现代人宽容的核心含义是相信各个人的人格平等，相信每个人有权利追求他自己认为的幸福。简单地说，宽容就是自

己有理想，也让别人有不同的理想；自己独立、也让别人独立；自己勇敢、也让别人勇敢；自己正直，也让别人正直。

这里我们遇到了正直和宽容的矛盾。如果宽容不是出于恕和忍，难道还有不同的正直吗？是的，生活中有着不同的正直。自己正直，反对自己也完全可能正直。例如，提倡中国农村土地国有制的人可以是正直的，提倡私有制的人也同样可以是正直的；佛教徒正直，天主教徒同样正直。我们认为殉情的祝英台正直，她父母甚至祝英台本人都会认为逼婚才是正直的。因此，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正直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理想、幸福或者真理常常不是唯一的。在几何学中，一条线的每一点都可以引出一条垂直线。同样，生活的每一个角度都有它的正直。我们没有任何标准说一个人只有站在某一角度上，他才是正直的。因此，自己在某个角度上是正直的，别人在另一个角度上也可以是正直的。

既然各个人的理想、幸福、正直可能不同，他们之间的相处就需要以互相承认对方正确、正当的宽容为基础。宽恕、容忍是绝对不够的。宽容对应的英语词汇是 tolerance。和中文的宽容一样，tolerance 既有宽恕容忍之意，也有“承认并尊重他人的信仰或行为的能力或行动”（the capacity for or the practice of recognizing and respecting the beliefs or practices of others, 《金山词霸》“tolerance” 词条）的意义。在现代社会里，后一种意义变得特别重要。这种意义的宽容，在中国和各民族传统上很少受到重视。在中国历史上，“独尊儒学”或“独尊马学”的知识分子谈不上对别种观点的宽容。在西方和中东历史上，天主教、伊斯兰教谈不上对异教徒的尊重。因此，各民族历史上充满了强迫他人服从自己的战争和专制。不同理想都正确的宽容理念是和自由主义一道出现的。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自由主义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强调一个人有生俱来便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因此它同样强调了幸福的个人主义含义：每个人有自己的幸福观和价值观。这样，自由主义便强调了不同价值观的并存与相互尊重。由此，人与人之间除了对抗和服从外，又多了平等共处的宽容关系。因此，在专制气氛下，一些英汉字典虽然带有敌意地把互相尊重的 tolerance 解释成“一种自由主义观点”，却也正确地指出了宽容和自由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平等共处的宽容，市场经济如何可能？民主政治如何可能？男女平等如何可能？信仰自由如何可能？相互尊重的宽容才使我们不再需要在压制别人和服从别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今天，每个人都和几百年前一样，不喜欢别人的某些追求、想法、行为、性格、爱好甚至长相，不喜欢某些观点、主义、组织甚至国家。这是人的正常情感。可宽容的品质让我们超越这种情感，在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同时，自觉地尊重别人，让别人说话、行事、自得其乐。宽容渐成习惯，我们就能进入宽容的境界，大大方方地看待人世，在勇敢、独立地坚持自己人格、自己信奉的正直时，也让宽容给予自己愉快和开放的心绪与不同于自己的配偶、亲属、同事以及其他团体、阶级、民族的人平等相处。

2007年3月13日

八、生活的约束，有效吗？

1. 生活的约束，有效吗？

我开蒙很迟，25岁以后才接触到高等数学，知道世界上有“条件极值”问题，就是在若干约束条件的限制范围内，找到所能够实现的最大目标值。后来我到经济学专业工作，才知道这个数学问题原来是经济学的核心。人称数学是抽象科学、经济学是经验科学，大概也因为此吧。

人生也是一种经验，每日每时真实出现的经历形成了一生的经验。人生的追求是不是也可以抽象为“条件极值”问题呢？本质上可能不是。因此目标就难定义，惶论量化并找出“最大值”了。所以，自己尽管在经济学专业工作多年，天天和条件极值问题打交道，可从来没有设想过自己人生的“最大化”问题。

不过，即使不追求最大值，即使仅仅想平平常常地生活，一个人也得面对许许多多约束条件。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严格约束。作为教师，备课时间、内容、资料、自己水平，都是把课上好的约束条件。想写篇文章，思路、文献资料、数据、时间、发表、书报检查制度，等等，都是约束。即使不考虑为下一次职称升级、为按照字数发钱的奖金，或者为完成科研工作量而写，而仅仅打算写点自己想写的文字，文献、时间、检查制度等等，也同样起着约束作用。至于想通过一场考试、计划一次活动、甚至准备一餐美味，都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真个是人生无处无约束。而纵观人的一生，或者就像自己，回顾五十年的人生，似乎也都是在不断的、多方面的限制下展开的。说到底，一个人只能在历史的、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先天和后天约束条件下发挥自己。这些约束条件已经给我们每个人划出了无形的界限，我们只能够在这些界限内活动。

这个道理，是我在农村生活期间明白的。不过，那时我也开始明白，我们所感觉到的许多约束条件，事实上并没有对我们形成限制或者严格的限制。形象地说，如果生活给我们划出的界限是一个半径为10公尺的圆，那么，我们一生的活动，可能从没有超出距圆心5公尺的范围。是的，既然圆周就在前面，为什么还要向前呢？但这样一来，生活的约束便失去了作用：它实际上并没有限制我们，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限制在5公尺范围内。也许，我们应当反过来问：既然圆周还在前面，为什么不再向前呢？其实，只要我们向外再前进一步，我们的自由空间就大得多，我们就能够实现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我们所羡慕的人所做的，说到底是我们朝着生活的界限多走了几步，甚至他们都还没有触及到界限。所以，如同我们在求解数学上的条件极值问题时必须检查约束条件是否有效一样，我们在生活中也应当经常问：约束条件有效吗？我自己的体会是大部分约束条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有效。甚至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约束常常也是无效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对所有人相同的限制面前，各个人的生命表现是那样地不同。

2002年7月17日

2. 还是不做为好

还是不做为好，我想。我被要求参加一次考试，“公民道德纲要”的学习考试，标准答案也给了，尽管在答案下方写着供参考的字样。是的，需要的时间不多，五分钟就行，都是选择题，按照标准答案在试题纸上打勾就行了。不过，我想，还是不做

这样的考试为好。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公民道德纲要”的大字题目，但我没有读过。我不是专职从事宣传工作或道德研究工作的人；在我这样的年龄，生活本身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教育，已经不可能通过学习文件来增进自己的道德了：所以，我没有去读“纲要”。当然，即使我读了甚至认真读了纲要，我仍然不会做这样的考试，因为根据我自己对道德的理解，我以为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本身就可能不符合“公民道德纲要”上的要求（我说可能是因为没有读过纲要，只能猜测）。首先，这样的考试没有必要，也没有依据，而根据道德规范，最好不要向别人提出不必要的要求，最好不要做没有依据包括没有不成文的道德依据的事情。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我把答案往上抄，交上满分卷子，然后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被人们认为是学习“纲要”成绩优秀的一人或某一特定优秀人群中的一员，总觉得别扭，觉得在扭曲自己，而且在扭曲自己尚未被生活完全泯灭的对真、善、美的某些感觉。所以，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还是让自己的心灵坦然一些为好。想一下，这和学生考试舞弊有多大区别呢？而作为教师，我的直接责任之一，毕竟是禁止学生考场舞弊，同时也从道义上向他们说明舞弊的可耻。为了使自己在学生面前不心虚，我想，还是不做这样虚假的考试为好。

中国人常说为人师表，外国人更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孩子和青年。要教育孩子和青年，教师不但要理解生活、懂得世界，而且还需要保持和孩子、青年一样的心态，这样，师生之间才有沟通、才有真正的教育。辜鸿铭所总结的“赤子之心、成人之智”，大概就是对教师的描述吧。因此，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一个教育机构，要重视孩子、重视未来，它就不但要提高教师的工资，而且更要避免扭曲教师的心灵。如果说，提高教师待遇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避免教师心灵的扭曲，避免他们为了挣钱而去去做即使他们自己内心不安也有损于他们在学生心目中形象的事情；那么，直接要求教师扭曲心灵，去“圆滑”，去逢迎，去做假，就更不应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做了，而且是在意识到不应当做的情况下做了，心灵最初会感到扭曲，然后就会麻木，最后就由惯性而觉得自然。此时虽有成人之智，却失赤子之心，而受害最大的，不是教师本人，当然也不是坐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地要求教师做假的人（他们也许还会得利），而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是青年，也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好像“纲要”提出的道德要求第一条是爱国，教师本人努力做真事，政府机构不要求教师做假事，我们的孩子也才不会做假，我们所爱的国家才有希望。因此，我既为教师，虽被要求，但还是不做虚假的考试、虚假的事情为好。

2002年4月24日

3. 我所认识的生永

我第一次认识生永，是在去年暑假。那天我正在系里值班，他来了，个子不很高，穿着也还朴素。通过姓名之后，他点了一支烟，然后问我：

“听说你平时喜欢写写东西，是不是？”

“有时高兴，就动动笔，”我回答说。

“想不想发表呢，在报纸上，或者杂志上？”

“还没有想过。”

“不要紧，想发表的话，我可以帮忙。”他打开话闸，谈了一气报纸杂志发表文章的内幕后，郑重地告诉我：“没有熟人，你是别想在报纸上发表东西的。”

“是这样吧。”也许是看过了巴尔扎克的“幻灭”——那里对新闻界内幕有精彩的描写——我对他的话不大感兴趣，虽然他谈的东西也有些中国特点。

他似乎很会揣度，又聊了几句便走了。开学后我知道了他的一篇暑假调查，已经被报社打出了小样。

他在学校里很不引人注目，上课来一下，下课便回家。在他去年统计学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我听说他的外界交往时间太多。接着，他偷窃一千多元现金的案子发了，学校给了他一年留校察看的处分，他这才为大家所知道。

偷钱，其原因据说是为了还债，而这债，是他在交际和谈恋爱时欠下的——不过也仅仅是听说。但这些也都好理解。交际多，特别是像家庭舞会之类的交际，是他能够在报上发表文章的诀窍之一，而人，又都是想出名的。恋爱以至于同居，也许可算是七年知青生活的一个后果吧。迟来的感情，是更容易战胜理智的。偷钱无疑是错误的——虽然对方很有些钱——特别是偷的手段令人发指：用过量的安眠药使人家沉睡。

生活的目的。对于一部分大学生来说——我自己可能也是——只是舒适的工作、受尊敬的地位，和称心的爱人。这也不能算错，只是需要了解生活本身的限制，而生永，正是超过了道德的现实界限。

今年暑假，我仍然在学校值班，然而却听到了生永作为情场的失败者而死的消息。生活的目的仅仅是爱情，——生永对于爱情是认真专一的，生命之火当然是很难保持旺盛的。人们是应当热爱生活的，但生活，并不止于爱情——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生永死了，他留下的无形的痕迹很快也将被忘却之神抹去。但生活，却是永存的。

写作于1980年9月3日

（附记：日前去南京大学，忆及在那里的学生生活，想起大三时曾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回沪后竟然还找到了原稿。二十多年沧桑，所见所闻多已与时俱进，但似乎心得体会，还停留在原有水平上。今日再写类似主题，亦不会比那时更有进步：所以便拿它充作本期的“夜话”。 2002年6月4日）

4. 放弃

2002年过去了，甚至2003年也过去了2个多月。

回顾过去的一年多时间，最值得总结的，也许不是自己获得了什么，而是放弃了什么。放弃当然首先意味着自己能力有限，对一些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具体机会无能为力；放弃也意味着不愿意改变自己而任凭或者忍痛让那些机会过去；放弃亦意味着自己承担了某些成本或者机会成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收益。当然，如果说放弃是自己自觉选择的话，放弃便还意味着自己没有按照经济理性行事。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自觉地放弃了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呢？

被我放弃的第一件东西，是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宣传奖。当然，这件东西，严格来说，不是我放弃，而是它根本不属于我，因为按照程序，只有一个人申请了该奖，这个人才有资格获奖。我没有申请这一奖项，别人为我申请时又没有通知我，所以，我不应当获得这个奖。然而，在我去年所兼职的三个学校都大力激励教师获奖的背景

下，在我的名字竟然鬼使神差地上了获奖者名单的前提下，它以及它附着的好处似乎又属于我，于是我便面对着是否放弃的选择。当然，程序第一，我的获奖违反了程序，所以我只能放弃这一表面上属于我的东西。

被我放弃的第二件东西，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工作机会。那里的工作，尤其是从零开始建立以现代经济学为导向的经济学专业吸引着我。而那里较高的收入也使我容易建立起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在我兴高采烈地要去报到的时候，那里却以收入较高为理由，收回双方最初商谈好的条件。管理以诚信为本，但深谙此理的管理学院既然不讲诚信，以为有钱便能成事，我也只好放弃可能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到手的收入。

被我放弃的第三件东西涉及到个人的财产。财产是我工作的副产品。为了使别人尤其是与自己有过一段共同经历的人生活的好一些，我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

人的一生，或者说个人在其积极能动的生命阶段中，每一年都可能获得一些东西，也放弃一些东西。获得当然使人高兴，但放弃也能够使人骄傲。获得可以显示成就的高度，放弃可以标识人格的底线。因此，我想，我还能够放弃上述那些东西，我对自己多少还是可以放心的：即使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做过一些错事，错误想必也不会很严重。

2003年3月12日

5. 小说“项链”给我的感受

我几乎没有上过中学。不过，在我的感觉中，这好像更是一种幸运。中学生最辛苦了，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和期望，为了考试要把教师的话奉为圣旨，为了考试要背诵教师都不相信的许多文字，甚至为了考试而使自己逆来顺受。

我的幸运感前几天又得到了一次证明。一个亲戚孩子的家庭作业是续写莫泊桑（de Maupassant）的短篇小说《项链》。如何续写呢？不外是刚刚还清债务的骆塞尔夫人的虚荣心重新膨胀，或者那位借出项链的伏来士洁太太又改口说原先的项链是真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这样续写，为什么不能够正面续写？原来是因为老师要求了，这篇小说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所以，必须从反面续写。这一说，我更加奇怪了。

《项链》是我自己多年前阅读的，没有教师指导，没有课堂分析。但还记得阅读之后，非常感慨也非常感动。世间的阴差阳错让我感慨，而骆塞尔夫妇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时所表现出来勇气和意志使我感动。确实，小说化了大量篇幅描述骆塞尔夫人的虚荣心，但这恰好反衬出她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意志。虚荣心并不可怕。在任何社会里，都有一些人的虚荣心强一些。在任何社会里，包括在“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在向旁人展示自己美的、强的一面的时候，总可能有物质上不满足之处，总可能暂时借用别人的物品。我自认为虚荣心不强，但最近出国，也向他人借了信用卡和照相机。用暂借的方式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不是一件坏事，只要别人没有因此感到不方便，只要这一虚荣心的满足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利目的。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不是虚荣心本身，而是满足虚荣心的方式。那种降低自己人格的方式是应当谴责的，那种给别人造成不便的方式是应当避免的。骆塞尔夫人借项链来满足自己虚荣心的方式，既无可谴责之处，也不必刻意避免。

但《项链》能够成为传世之作的秘密，是它展示了人的一种基本品德，就是对他人责任感和实现这一责任感的正当方式。骆塞尔夫人丢了项链。她可以不负责任，不赖帐但也不还钱；她可以向女友说明真相，请求原谅和豁免，因为她的女友毕竟比她富裕；她可以因为自己在晚会上大出风头而去傍高官、傍大款，用出卖肉体的钱来还帐；她可以抱怨丈夫钱太少，促动丈夫利用权力去找钱。她的丈夫也完全可以利用比如部里公文办理的快慢来收受礼物。这些都不是臆想。我们听说或者经历过许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在刘震云的著名小说《一地鸡毛》中，主人公也是一个科员，但收受几件礼物就让生活变得惬意了。如果莫泊桑真是这样写了，他的小说也就落入了俗套。我们听惯了这类事情。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会觉得生活不应当是这样，世界不应当是这样。只要我们对人世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我们至少会朦胧地希望有人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能够勇敢地承担责任，坚定地用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责任，即使我们自己因为软弱不能够做到这一些。莫泊桑的小说正满足了我们以及世世代代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它塑造了一个或者两个（骆塞尔夫妇）理想人物。他们犯了错误（丢失项链）后，勇敢地承担责任，即使他们“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们也没有退却。他们搬入了阁楼，他们从事各种低级的劳动，他们省吃俭用，整整十年，归还债务、补偿错误。即使在今天，在我们常常自认为的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里，有几位中央或者上海市政府的科员遇到类似情况能够这样做呢？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吗？莫泊桑擅长写普通人。他写的骆塞尔夫妇只是具备了人本来应当有的基本品德的普通人。可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敢具备这样的品德，他写的普通人才成了英雄。这不是某个“主义”下的英雄，也不是造就惊天动地业绩的英雄，但只要世间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还不愿意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并且用正当方式负责，那么，莫泊桑塑造的这两位普通人便永远是人世间的英雄，《项链》便会被人们永远阅读下去。

是的，人世间阴差阳错的可能性很多。问题是阴差阳错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应当如何办。为他人负责、正当地负责，这是我“自学”“项链”时所感受到的体会。如果我也按部就班地上了中学，在课堂上阅读“项链”，我将会有什么样的体会，又将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想来真是后怕，没上中学真是我的幸运。

初稿于2003年6月10日
修改于2003年7月13日

6. 不凡和不俗

我在德国的时候，一次孩子在那里的中文报纸显眼处读到一份征婚广告，广告中形容征婚人“不凡”和“不俗”。孩子即问我何谓不凡、何谓不俗。我当时的回答是不凡指一个人的成就杰出，超出了周围人或者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达到的水平，不俗指一个人的行为坦荡，超脱了低级趣味尤其是斤斤计较。例子呢，比如做出新发现的科学家，执政可彰的政治家，公认的歌手、运动员，很富有的人，都可以视为不凡；一个人不认同农民不卫生的生活但仍然尊重他们，一个会计发现财务漏洞并可以安全地窃取他人财产时而不为之，便可以称作不俗。不凡的人大都属社会名流，因其成就而为人知；不俗的人大都属平民百姓，因其自律而难成明星。因此，不凡但俗和不俗但凡的人都很多。不凡又不俗的人当然也有，外国的如华盛顿、爱因斯坦，中国的如孔

夫子、陈寅恪，但不多。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不俗的人首先关注内心的充实，往往不那么特别在意为人所知的成就。其次他们只愿意用正当的手段去争取成就，因此不俗的人取得不凡成就、尤其在世时就被公认的成就不多。不凡的人如果首先重视外在的成就，就会非常努力、同时既可能用俗气的方式争取成就，也可能在取得成就后变得俗气，因此取得成就而又不俗的人也不多。

那么，不凡和不俗如果不能兼得，哪一种更重要呢，孩子问我。我的回答是不俗更重要。宁可舍不凡而守不俗，不可舍不俗而求不凡。为什么呢？我想，因为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不凡的人虽然风光，但若俗，则幸福之感不多。俗而不凡的人要得幸福，必须具流氓心理，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很少；不俗的人可能风光不多，可内心实在，易得幸福，但真的幸福，不俗而凡的人必须具教徒心理，不因别人的成就而自惭形秽。在宗教社会里，这样的人很多，在传统儒家社会里，所谓的君子或知书达理之人，也不算少。在日常生活圈子内，有权或有名或有钱或其中两者竟至于三者都有的，可属不凡；处世公道、正直、不计较得失的人，可为不俗。市井之人却又铢铢较量，则是真正的凡夫俗子。

在什么社会里，不凡和不俗的问题能够解决呢？我想，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总有一些人比较精明，更多地为自身利益而算计，也有一些人比较善良、正直，容易考虑到别人。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应当能够使不俗的人更加努力或者给予所有人努力的机会，同时又使不凡和希望不凡的人必须采用光明的方式去取得成就。就我们个人来说，需要记住的是，在最坏的制度下，也总有不俗兼不凡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又不能把自己的俗或凡仅仅归之于社会制度的因素。对自己，对孩子，我想，读书，不为任何实际目的地读许多经典名著，待人不要斤斤计较，处事不要敷衍马虎，可能是个人修养不俗之气质、争取不凡之成就的必要途径。

2003年8月21日

7. 事业？

对事业这个概念以及它的价值论含义，我常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

少年时读三国演义，囫圇吞枣，分不清魏蜀吴，但记住了刘关张三结义。后来又读过几遍，内容梗概都记住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桃园结义。有次读到一篇野史，说苏东坡在街上看到那些听三国说书的人，凡听到刘关张取胜都开怀，听到刘关张失利都叹息，才领悟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百世不斩”的道理。那些在街头听书的人，不外煮酒买浆者流，也就是历朝历代的小民百姓吧。这些人中，很多人大概也分不清魏蜀吴，却都知道刘关张。刘关张的故事是典型的男性故事。但就算当今女性地位上升，她们也还是承认刘关张英雄的。比如男主人想出门找几个朋友玩玩，往往受到牵制，那理由之一，便是“你那些朋友能跟刘关张比吗？”

刘关张的故事自然和事业相联系，这就是光复汉室。这事业眼看有成之时，关羽却被东吴所害。刘备若能以事业为重，应当暂不追究，待扫平天下，再为兄弟报仇，亦不为晚。这也是诸葛亮力劝刘备勿伐东吴的理由。刘备若从之，或许能一统天下，重建汉朝，中国历史不复有晋、隋、唐诸朝，中国人在海外也不必为汉人、唐人之分而枉费口舌。但刘备不听，执意为兄弟报仇，结果兵败，光复大业亦付之东流，后世文人为此扼腕者多也。

东坡先生领悟的君子之泽和小人之泽之别，也许就是事业和情义之分吧。如果关羽谨慎，荆州牢固，然后刘备以西川、荆州之师两路北伐，曹魏或可破、东吴或可灭、汉室或可复、事业情义或可两全。但月有阴晴圆缺，事业情义难以两全之时，刘备舍事业而全情义，虽为人所诟，但仔细想来，若刘备事业为重，桃园结义的终局便将落入俗套，刘关张大概早已被遗忘，更谈不上“百世不斩”了。历代开国皇帝，有名的如李世民、朱元璋等，戎马之时，都有几位结拜兄弟。但他们重事业轻情义，“曲线救国”，虽成帝王伟业，但由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百姓心目中留下的记忆和认可很少，“五世而斩”。显然，这样的“曲线救国”无法在民心中把桃园结义画上圆满的句号。况且刘备不迅速为关张兄弟报仇，究竟是因为事业，还是因为“享得一日帝王福，便知千年皇冠欲”，以事业为幌，皇位为重，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世界上或以大局为重或受形势所逼或虑个人权位而采取“曲线救国”方式的人、事太多，他们用的理由几乎都是事业，即使很多人是真的，可有几人的事迹能像刘关张这样直接以情义为重的故事流传？苏东坡领悟的道理告诉我们，在民心上留下烙印的可能不是事业，而是情义和支撑着情义的人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民百姓，民心即我们大家共有之心。刘关张的故事之所以弥久不衰，是因为它激起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代小民内心深处某种欲求的共鸣。这是一种什么欲求呢？我想，它所求的，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要以事业为理由，不要以大局为原因，不要以形势为根据，来掩盖自己的软弱，开脱自己的行为，美化自己的人格。

2003年10月1日

8.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刚刚整理完自己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翻译稿。一位尚未谋面的外国朋友竟然对它发生了兴趣，希望得到它的英译稿。在别人的帮助下，翻译完成了，电子邮件发出了。在这个被中央供热系统变得十分温暖的房间里，我突然想起，正是十年前，新搬入一所房子，没有暖气，手头也没有取暖电器。1993—1994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寒冷，边看书边搓手、边写字边跺脚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但我那时似乎忘却了取暖的问题，恍惚之中，完成了那篇文章。

如今时过境迁，条件改善，凭借着空调，冬天不必搓手跺脚了，脚上的冻疮亦绝迹了多年。但我如今做的，仅仅是翻译过去的文章，那在寒冷的房间里用286计算机写下的文章。新的思想、创造性的思维，不是消失在房间的温暖空气中，就是逃逸出双层玻璃的窗子，到广袤的世界畅游去了。

也许，在寒冷的时候，任何火花，包括思想的火花，都是那么地珍贵，以至于思维全神贯注地在寻找它。而随着生活水准的与时俱进，身在冬季却越来越远离寒冷，火花的价值自然越来越小，思维再也不用心寻找它了。

记得某位哲人说过，人文思想的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历史：人们不断地回到早期的思想重新出发。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由于生活水准大概是不可逆地向上提高的，所以，人文思想就不会和生活水准与时俱进。自然，这是就人类全体发的议论。就个人来说，是不是也如此呢？可能也如此。年龄也许是个原因。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粪土当年万户侯，思路敏捷，容易抓住问题并突破之；壮年后总怕考虑欠全面，不敢擅越雷池，更谈不上大胆突破。可壮年后的生活水

平显然高于年轻时代。就我自己而言，在寒气袭人的冬季出文章，在寒气全无的冬季却只能够复述那些文章，除了年龄原因外，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看上去完全没有促进自己思想的活跃和火花的迸发。由此看来，现在自己没有新的研究，不能够归之于自己的房间在冬季的温暖还不够舒适，在夏季的凉爽还不够惬意，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自己现在不再全神贯注、不再用心地思索和追寻。

2004年1月15日

9. 生命的短暂和漫长

一位来上海讲学的美国朋友突然生病，住进了医院。我去陪伴他时，他和我说了许多自己的故事。在埃及出生的他，到美国读书，在美国工作，如今作为退休教授还忙于国际交流。最后，他对我说：“Dr. Hu, life is short (胡博士，生命是短暂的)”。我理解这一点。生命不仅短暂的，而且还很脆弱。本来劲头十足、一个星期上35节课的人，突然一下子住进了医院。生命竟然如此容易折断，太让人感到它的短暂了。

在离开医院的路上，我不自觉地咀嚼着“life is short”。确实，生命有短暂的一面，但生命也有漫长的一面。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大约为70岁。70年，超过了三分之二世纪，似乎不能说短暂。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够预见70年后的状况。仅仅这一事实便可以表明，70年的生命长度已经超过人对未来的想象力。即使从20岁到70岁这积极能动的50年，也同样超出了人的想象力。1954年跨回鸭绿江投身经济建设的英雄们不会想到50年后的中国按人均收入计算还是贫穷国家，准备文字改革的专家没有料到他们设计的拼音会使中国人不再创造自己的计算机键盘。今天20岁的孩子再过三、四十年从事什么工作，怎么生活，是我们这些做父母无法预期的迷。就此而言，五十年不算短。他们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可能做到自己今天想做的许多事情，因为他们还有足够长的生命；就像许多人喜欢讲的那样“要是我现在才20岁的话……”，那种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表情，常常使我觉得生命活力的发挥远远用不到50年或者70年。

当然，生命的短暂或漫长不表现在生命的绝对长度上。如果一个人的生活目的仅仅是保持健康，那么，生命可能真的很漫长，漫长的容易使人对自己失去信心。所以，我相信巴金老人在医院说的“让我死去”是他的真心话。然而，生命的漫长更多地体现在我们的某个生活阶段。当你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走入一个挣脱不得、忍受不能境地的时候；当你有全身力气却无法施展的时候；当你目标明确，却整天忙于或者闲于让你无可奈何的事情的时候；当你没有任何兴趣，却要一天一天地捱过去的时候；假如这种“时候”变成“时期”，生命就会显得漫长。你根本不愿意，但你必须应付生活。你被无形的力量牵着，你被动地生活着。你还年轻，就已经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未来的渺茫。你不知道这个时期到什么时候结束。你会感到“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你不知道，这其实不是老年人的体会，而是青年、中年人的感觉，因为生命漫长，只是希望未泯的倒影而已。

我体验过生命的漫长。在农村的时候，我至少有过怀才不遇的感觉，那是想为伟大领袖毛泽东献身而又无处可献的困境。在刚刚回到城市的时候，有过想读书而又不得不谋生计的心痛。前者最终让我懂得不必把本领“卖与帝王家”，后者使我学会了“逆来顺受”。那段时间的煎熬告诉我，一生中逃脱了漫长感觉的人是幸运的，尽

管他们可能流于浅薄。虽然，生命的真实含义可能只有在人处于“漫长”生命阶段的时期才能够体验到，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难以承受的：多少人在其间失去活力而不可恢复！我想，无论这个时期多么漫长，只要一个人不放弃对自己的希望，他就能捱过这个时期，重新成为生活的主人；漫长的经历带给他的，主要就不是损失，而是远远超过损失的收益：因为他理解了生命。

2004年3月5日

10. 世事的难和易

几天前在北京和当年的同学聊天，谈到我最近在上海的情况，同学感叹说世界上的事情难办。我还没有那样的感觉，因此回答说世事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容易了。假如我现在还是插队在乡村的农民，假如我还是刚刚毕业的普通教师，也许世事会难得多，而在我今天的位置上，罩着教授的光环，学术头衔已经到了顶峰，事情已经很容易了，已经没有理由抱怨世事维艰。

确实，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很难很难。比如我们在学校内改变教学内容，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比如在社会上惩治腐败者，让别人说话，都很难很难，因为它们都牵涉到一些个人的利益，即使是腐败者也有自己的利益，即使不腐败的人也常常会照顾腐败者的利益。当你遇到只考虑自己利益的人；当你试图说服得过且过的人；当你鼓动没有责任感的人；当你和看法不同的人讨论的时候；当你强调别人不重视的问题的时候；当你要为众说纷纭的事情决策的时候；当你面对考试过关、文章发表、工资升降、职称评定、孩子升学一类的重要事情而无法把握的时候；当你……，你自然会感到难。确实也难，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听到那么多穷人的故事，我们不会叹息腐败太盛。当然，我们也不会需要从孔夫子的慎独到孙中山的让位的先进文化，我们也无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因为，假如世事不难的话，中华民族也不会落到需要崛起的地步。

然而，世事说难虽难，说易却也很易。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把世界上帝制传统最为深厚的中国改成了共和国。即使今天我们依然不能不感叹那么悠久的帝制竟然一下子就被那中国老百姓完全不熟悉的西方的共和体制代替了，而且再也不能够恢复。毛泽东一个长征25000里就走下来了，邓丽君的歌声一下子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就我自己来说，从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够上大学、读研究生、出国，但竟然都有了。我和我的农民朋友一样，以为到学校工作，得到副教授退休就够了，没有想到今天却已经戴上了教授头衔。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当一次院长，按自己的意愿为大家去做事；更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辞去院长，按自己的意愿为自己来生活。所以，如果世事不易的话，自己今天也不会有这样不错的地位。

其实，无论世事难易，按照自己的心愿做就行了。做成了，是幸运；做不成，也是幸运。因为成事在天，做成了，自己在其中出了一份力；做不成，自己在其中已尽了一份力。对于成败得失，我只能够说，如果出力了尽力了，就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份生活、一个天地。

2004年6月29日

11. 就这样风雨兼程

我原来是个十足的音盲（其实现在七音也不准），脑海中记得的仅是少年时常唱的通俗歌曲——毛泽东语录歌，比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造反有理…”等等。后来孩子学音乐，我才在陪伴过程中知道了简谱中“1, 2, 3, 4, 5, 6, 7”的大概发音，也才知道了其它通俗歌曲，比如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当时我还和孩子开过玩笑，为什么没有男声的“太阳代表我的情”。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是歌曲《风雨兼程》中的最后一句。几年前一位朋友告诉我这首歌，并在电话里唱了一段，最后这一句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本月初假期中突然想起这首歌，立即在网上听了起来。这一句的后半句最使我感动：“就这样风雨兼程”。

是的，就这样风雨兼程。就这样，出发吧，也许是一种无奈。不这样，还能怎样呢？时间已到，该上路了。准备不足怎么办？没有办法。就这样，即使“正是风雨浓”，看不到“雨过天晴时”，也得上路，也得风雨兼程。人生有许多无奈，上路的时间、地点、环境、达到目标的预期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或者很大程度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强权者往往能够不管别人意志与否而贯彻自己的意志，但他常常也有很多无奈。更何况我等凡夫，又惯于平等待人，更只能“就这样风雨兼程”。程琳一首歌唱了八遍这半句词。我听了许多次，总觉得她的声音不时也有无奈之感。

然而，“就这样风雨兼程”也是一种决心，是一个人的坚决选择。考虑多种因素后，明白“山高水长路不平”、无人“携手同攀登”之后，甚至在不明白这些之前，一个人到一定时间总得下决心、做选择。人的性格有果断和寡断之分，更有许多人既乏果断也不寡断，但所有人都得选择，即使无法下决心的一声喃喃自语“就这样吧”，也是一种选择。选择的正确程度高低，要视选择以后的发展而定，因此总带着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斩钉截铁一个词“就这样”，又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就这样风雨兼程”，没有顾虑、没有犹豫，没有等待，踏进风雨里，坚定前行，向着自己的目标。但程琳歌声中这种气概好像不足。自然，像她唱的那样，有人“伴你风雨行”、前面“风光在险峰”，也许不大需要男子汉气概。但是，要下艰难的决心和做主动的选择是需要一种气概的，一种传统上被归入男性美德的无畏和刚强的。

确实，任何事情都没有完全的把握，出发的时候都是准备不足的。像郎咸平这次挑起私有化改革方式争论时，准备就明显不足，这可以从他的诸次言论中清楚地看出。批评他的人也准备不足，赵晓说要三个月时间做准备，大概也是真话。但时不我待。一个人想象这里和风细雨也罢、腥风血雨也罢，往往也只好“就这样风雨兼程”。连政府也没有准备，但它又必须做哪怕不作为的“就这样”决定。日常生活亦如此，许多事情我们必须下决心，必须“就这样风雨兼程”。人生六、七十年，说长很长，像茫茫苦海；说短也短，似来去匆匆。但无论长短，生命途中任何一点都是起点，都可以开始一段新的路程。改学一门知识、出国、换单位、准备论文、为孩子选学校、开始跑步、戒掉粗话等等，都是人生一段新路。踏上新路前我们既要多做准备，却也很难等到准备充足的一天。所以，就从今天开始，即使有风有雨，“就这样，风雨兼程”，只要相信康德说的宇宙的神灵和内心的良善会祝愿我们“多保重”、“早成功”。

2004年10月13日

附：“风雨兼程”歌词

今天你又去远行 正是风雨浓
山高水长路不平 愿你多保重
记得那年初相识 也在风雨中
风浓雨浓情更浓 祝你早成功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就这样风雨兼程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就这样风雨兼程

明天我也要登程 伴你风雨行
山高水长路不平 携手同攀登
还是常言说得好 风光在险峰
待到雨过天晴时 捷报化彩虹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就这样风雨兼程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就这样风雨兼程

12. 做普通人

前几天和孩子通电话的时候，他希望我做一个普通人。我们立即讨论起来，因为这恰恰是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孩子今年 22 岁。我 22 岁的时候正在乡村。那时的集体经济，收入很低，可每天还得上工，田地上也确实有干不完的活儿。那是 1975 年，六、七年前和我一样从南京、镇江等城市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不是返回城市就是在乡村总有个无须到大田劳动的事情可干，好像整个公社的知识青年就是我一个人还在和农民一起种田，夏天赤脚下水田不用说了，就是冬天清塘积肥也常常要脱鞋。那时的我尽管与普通农民的关系很好，但不谙如何与大队、公社干部联络感情；加上劳动很认真，多少学会了种田，于是便被视为只配种田的人。好在自己想通了：七亿农民在种田，我凭什么不应当种田呢？农村那么多青年种田，我凭什么由于城市出生就不应当种田呢？那么多人能够种田，我当然也能够种田。种田是一生，干别的也是一生，自己凭劳动得到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就行了。

在农村时满足于种田，这是许多人最难理解我的地方。在那个时代，你如果没有比如“红五类”的招牌，没有特殊照顾，不愿意比如在文字上为干部们写些应时的东西，不愿意特地和干部们搞好关系，你只能种田。自然，你可以到城里找个零工、在乡村学个瓦木匠，但那既要找关系，又不合我希望安宁的性格。所以我宁愿种田。种田之余读读当时只准许读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书还读得津津有味；或者找几本私下流传的小说甚至手抄本读读。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便是那时候偷偷读的禁书之一。后来回到南京，被分配清扫逸仙桥到中山门的一段马路，我同样很平静：这样的劳动总要有有人做的，轮到我就是我。我不愿意用不正当的方式去避免这样的劳动。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好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我当时的想法，直到现在依旧未变。

今天我当了教授，轮到孩子希望我做普普通通的人了。但他可以放心，当了教授仅仅使我感到了更多的义务。它既没有使我离开普通人的感觉，也没有使我离开普通人的生活。实际上，我的物质生活大概不比我今天还当马路清扫工富裕很多（自然是指有城市户口特权的清扫工），而我的精神生活也不会比我在农村幽暗灯光下读书时

快乐很多：还是像农民或清扫工那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家庭气氛有冷暖，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有优劣，偶然际遇有好坏。作为现代人，我们自然不能再以父母之例和圣上之意来回避改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必要，也不能够以能力不足和际遇不佳来回避提高自身修养和改善自身处境的责任。但同时我们又不必害怕“落为”普通人。其实，即使一个人跻身进优秀人群或上等阶层，也没有任何外在力量能够保证他不重新落为普通人。自然灾害、社会变迁、退位下岗、事故疾病，以及无心的错误、无力地荒废时间，都会把一个人从上等阶层“降”到普通人，就像小说“项链”展示给我们的那样，也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的那样。因此，害怕做普通人无异于害怕生活本身。我们需要努力，我们又需要做普通人的心态和自尊。这样，靠自己的良知和努力，假如我们还只能做普通人，我们也将心平气和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享受普通人生活的乐趣，而不为外界的轻视所累。

2004年11月23日

13. 转载：我相信

（约翰·小洛克菲勒，1941）

我相信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
我相信个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相信每一项权利都意味着责任；
每一个机会都意味着约束；
每一笔财产都意味着义务

我相信法律为人而定，而非人为法律而活
我相信政府是公众的仆人，而非公众的主人

我相信劳动的尊严，无论它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我相信世界不会自动养活任何人，但它给每一个人劳动生活的机会

我相信节俭是妥当安排生活的关键，
我相信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而言，节俭都是获得稳定经济实力的首要条件

我相信真理和正义是任何社会秩序长久稳定的基础

我相信诺言的神圣性，
我相信一个人的话应当有信用，
我相信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不在于他的财产、权力或者地位，而在于他的名声。

我相信人类的基本责任是奉献有益的服务，
我相信只有纯洁的牺牲之火，才能烧尽自私的残渣，
让我们灵魂中的伟大之处发挥出来

我相信全知全爱的主，无论人们称呼他的名字是什么；
我相信一个人最高的满足、最深的幸福、最大的价值
是自己能够和谐地照主的意愿生活

我相信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有爱，我们就能克服仇恨，
我相信公正能够并且必将战胜强暴

2006年1月3日

原文如下：

I believe

(John D. Rockefeller, Jr., 1941)

I believe in the supreme worth of the individual and in his right to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 believe that every right implies a responsibility; every opportunity, an obligation; every possession, a duty.
I believe that the law was made for man and not man for the law; that government is the servant of the people and not their master.
I believe in the dignity of labor, whether with head or hand; that the world owes no man a living but that it owes every man an opportunity to make a living.
I believe that thrift is essential to well ordered living and that economy is a prime requisite of a sound financial structure, whether in government, business or personal affairs.
I believe that truth and justice are fundamental to an enduring social order.
I believe in the sacredness of a promise, that a man's word should be as good as his bond; that character - not wealth or power or position - is of supreme worth.
I believe that the rendering of useful service is the common duty of mankind and that only in the purifying fire of sacrifice is the dross of selfishness consumed and the greatness of the human soul set free.
I believe in an all-wise and all-loving God, named by whatever name, and that the individual's highest fulfillment, greatest happiness, and widest usefulness are to be found in living in harmony with His will.
I believe that love is 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 that is alone can overcome hate; that right can and will triumph over might.

(原文抄自于美国布朗大学洛克菲勒图书馆(Brown University John D. Rockefeller

Library) 正厅墙上, 自己翻译。2006年1月3日于美国 Providence。)

14. 请爸爸多带孩子

近年来, 我的年轻同事、朋友、过去的学生中, 一些人有了孩子, 另一些人很快将有孩子。在祝贺和预祝他们(她们)的时候, 我常常表述自己的希望, 就是他们中间已经当上或者很快将当的爸爸, 多带孩子, 尤其多带婴儿。

请爸爸多带孩子, 首先因为他们都爱孩子。“自己的孩子”这种感觉就会使新做爸爸的人浸透了幸福的感觉。他们乐意照看孩子, 抚慰孩子, 喂水喂食, 哄孩子入睡、和孩子逗趣, 为孩子收拾。当然, 和做妈妈的女性相比, 他们显得笨拙、生硬、粗糙, 可带孩子的“机巧”只能通过“干中学”来学得。在带孩子的过程中, 做爸爸的会慢慢地变得灵巧一些、熟练一些、细心一些。而如果他们不带孩子或者几乎不带孩子, 他们就没有机会把自己变得灵巧、熟练和细心。所以, 只要带孩子, 多带孩子, 灵巧和细心自然就养成了。

请爸爸多带孩子, 其次是因为爸爸都希望、也都需要把自己对孩子的爱直接传达给孩子, 而不仅仅通过辛苦的工作、很多地挣钱、很多地为孩子提供物质条件来间接地表达对孩子的爱。爸爸多给孩子创造物质条件的心愿是好的, 但孩子很难体会到。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感情需要互相的耳濡目染来培养, 需要爸爸把时间直接给孩子, 下班后、休假时和孩子嬉戏、照料孩子, 陪孩子玩、吃、睡。孩子要求的就是你的时间。只要你给孩子时间, 孩子就给你感情, 孩子就会喜欢爸爸, 在爸爸带领下吃饭、睡觉、玩耍、交流。

爸爸多带孩子, 同时培养自身的人道主义素质。在男性的生命进程中, 除了学校教育(可惜中国学校教育在这方面太薄弱)和小说阅读外, 能够明显增强自身人道主义素质的机会, 主要是恋爱和抚育孩子。恋爱能够让男性感受到温柔、体贴、为对方着想甚至奉献的善良, 但孩子更能够让爸爸深刻地感受到这样的情操。婴儿、幼儿是那么地娇嫩、柔弱、无助, 只要和他们在一起, 再刚烈再无情的男性也会变得善良、细心、关切, 也会体验到婴儿的需要和自己直接关心他们的义务。这种对他人义务的直接感觉, 虽然起源于对亲生孩子的本能, 可它是人道主义最深厚的根源。我相信, 一位细心关怀亲生婴儿的男性, 有更多可能在大范围关怀弱者、爱护女性、照顾他人, 有更强烈的消除社会丑恶现象的希望。

爸爸多带孩子的关键, 是通过这个途径, 爸爸对孩子的出自本能的爱、理性的爱甚至出自社会压力的爱, 逐渐转变成发自内心的亲情, 转化成对孩子的亲密情感, 并且发展为和孩子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这样, 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本能关系, 就上升为人性的情感, 人与人之间信赖、关怀、依靠的社会性情感。这样, 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 爸爸既能够顺当地教育和带领孩子, 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培养”自己, 和孩子一同成长, 因为孩子在婴儿、幼儿、童年、少年、青年的长大过程中, 爸爸面对着孩子带来的新事物、新思潮, 容易保持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生活兴趣, 并给孩子树立起榜样。

爸爸多带孩子, 更有助于爸爸从根本上杜绝打孩子的恶习。打孩子是中国男性的著名恶习之一。然而, 一个男性是否粗暴、是否会暴打孩子, 在他青年时期几乎是无法识别的。即使一个后来粗暴对待孩子的男性, 在其结交女友、结婚、刚刚有孩子的时期, 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会粗暴对待孩子。其实, 粗暴对待孩子的爸爸, 没有几

个人自己不痛苦。因此，如何把男性对亲生孩子本能的爱或者理性的爱，转变成与孩子的交流和对孩子的理解，是每个做爸爸、妈妈或者即将做爸爸、妈妈的人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这里，杜绝男性今后粗暴对待孩子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爸爸从孩子出生起就多陪伴孩子，多带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爸爸会体验到自己对别人（自己孩子！）的照料，为别人（自己孩子！）的顾虑，男性的情感将细腻得多、在刚强的同时生发出温柔的感觉、怜悯的关怀，而消弭像《水浒传》中许多好汉那种不谙温情、不知怜悯的现象。

当然，面对孩子的哭啼不止，面对孩子的任性和作息时间的差别，做爸爸的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需要做妈妈的更多支持和鼓励，也需要做妈妈的放手和放心。无疑，带孩子带婴儿是对男性耐心的艰巨考验，常常伴随着烦恼与无可奈何，但我的亲身体会告诉我，带孩子也充满了乐趣、幸福和喜悦。只要你耐下心陪伴孩子，你很快就会发现孩子在变化，在成长，三天便有不同，五天就又学会一种新东西，你会从心底里感到你在抚育人，你在成功。而这恰好表示，你自己的心灵也在变化，变得更有入性、更有责任。

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我的年轻朋友如果当爸爸，就找时间多带孩子；如果当妈妈，就让孩子的爸爸多带孩子，帮助他，让他带好孩子。

2006年5月20日

15. 感谢提醒和批评

几天前，署名为“一位关注您名誉的普通学者”的朋友通过电子邮件提醒我，在我从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职位离任之前，曾向教师发放科研启动费。自愿领取该启动费的每位教师个别和学院签订科研启动费合同，其大意是在未来两年内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作者单位发表至少一篇论文或者专著包括译著并达到一定质量；若完不成合同，所领取的科研启动费需要退回。现在两年已经过去，那位朋友听说我本人也没有完成合同，因此关心地问我“如何让那份协议生效？”

收到这封信，我很感动。作为和那位朋友一样的普通学者，除了亲友外，还有人关心着我，对我寄托着希望，希望我保持名誉，这是我的福气。在今年第一期“夜话”上，我翻译了小洛克菲勒的“我相信”。他相信的一点便是“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不在于他的财产、权力或者地位，而在于他的名声。”我也相信这一点，而且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地去做。不过，自我要求虽然重要，但它是绝对不够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都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回避甚至忘却某些不乐于正视的事情。因此，在一个人的自我要求周围，必须有许多人的希望、提醒、批评、警告和反对，这个人才必须面对自己的软弱，勇敢地正视自己并且坚定地实行他对自己的自我要求。没有后面这样的社会机制，一个人的天性即使非常高贵、正直，即使在某些事情上、某段时间内获得了很好名声，他要在所有重要事情上、在一生获得好名声，依然是不可能的。就关注我名誉的那位朋友提醒我的科研启动费合同一事，我自己便没有完成。由于我离开了上海财大，我不再需要在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实施这些合同，因此，我很容易“忘却”这件事情。但那位朋友的提醒，却让我不得不直面两年前亲笔签字的合同，不得不直面自己的良心和世人的监督，而不再能够用“忘却”来掩饰自己的软弱。这

样，我就可以避免人格错误和名誉损失。所以，谢谢这位朋友，谢谢关心我的所有其他朋友、其他人。

也许有人会说，写这封电子邮件给我的人是个坏人，想把我逼到角落，逼我受损失（金钱损失，以及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其它没有完成合同的教师对我的抱怨）。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世界上确实有坏人，网络又使得我们无法辨认发信人的身份和动机（当我们自己在网络上用其它名字发言发信时，别人也无法辨认我们的身份和动机！）。可是，既然我们无法辨认别人的动机，为什么我们要把别人想象成坏人呢？难道我们希望别人在读到我们的网络发言前先把我们看成坏人吗？就关注我名誉的朋友的这封信来说，在数额有限的科研启动费和价值无限的个人名声之间，无论希望我重视前者还是后者的朋友，都值得我感谢，都是好人，因为他们都在为我着想，都希望我生活得尊严一些、愉快一些、舒适一些。只是他们想法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同时，把向自己提出意见、批评甚至激烈反对自己的人想象成好人而非坏人，这一念之差，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好，这个世界值得我为之工作、为之奉献，我的心就充满着温暖，生活就充满着阳光。所以，我完全没有必要把别人想象成坏人，没有必要抱怨别人、抱怨世界。人世间有成千上万的例子说明世界是好的，又有成千上万的例子说明世界是坏的。然而，归根结底，在一个人的心中世界是怎样的，在这个人的眼中世界就是怎样的。把别人尤其批评者设想成好人，世界就会变得美好，生活就会变得轻松，自己也会无形地变得更好，一个人也才可能永久地获得他的最高价值——名声。

2006年9月29日

16. 转载：给我未来的孩子

（张梅）

孩子，我首先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当你童年，我们讲英雄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要你一定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当你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道路往往不尽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决不可怜。在那种貌似坎坷的人生中，你会结识到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选择平庸虽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无法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你，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

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而虚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过于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浮；如果你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

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长大后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但决不要放弃。

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容易。交友的过程会有误会和摩擦，但你想一想，偌大世界，能有缘结伴而行的又有几人？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生活中能有人伴在你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你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你的眼波要像春天一样妩媚。你要会流泪、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

希望你不要媚俗。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要学会欣赏真，要在重重面具之下看到真。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的人极少。而往往出类拔萃又隐藏在卑琐狂荡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会羞愧地掩脸而去。世俗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你会因此无所适从，人云亦云。

在具体的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娇气十足。你每天至少要拿出两小时来读书，要回信给写信给你的朋友。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应该为你做些什么，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

借他人的东西要还，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要记住，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己的。

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地长大，你渐渐会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一点地加以改正。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

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网友雪芳推荐了这篇文章。这里转载于 <http://www.e-duzhe.com/bbs/dispbbs.asp?boardid=2&id=380>，并改正了个别别字。这篇文章可能发表在 1992 年的《读者》杂志上。如果这里的转载侵犯了版权，我谨表示道歉并愿意承担责任。接受网友推荐，把这篇题为“给我未来的孩子”的文章转载于此，首先是提醒自己，因为尽管年过半百，但深感自己依然在成长，所以依然需要把志士仁人们对孩子和青年的希望继续看作对自己的希望。 胡景北 记）

2007 年 1 月 2 日

17. 回乡有感

国庆长假期间，我回到第二故乡——当年插队的农村。阔别农村已经 23 年，离开上一次的访问也 3 年了。年轻时同滚一个草铺、共在一田插秧的农民朋友，熟知我当年大碗喝酒的“劣迹”，如今虽然蓝边碗升格为高脚杯，但车轮大战摆开，一餐之饮，却也超过了我平素三、五年所喝的酒精。谈到如今粮食的高产量，不禁欣然；说到若

干熟人的生活甚至今不如昔，又感愀然；提到一起挑粪清墒插秧割麦挖河砍柴玩笑逗乐的当年二十岁左右的朋友们，有四位已经不在人世，更觉惨然。好在现在世道开明，谈锋所及，再无顾忌，况且大家皆在半百前后，虽然无夫子之德，不敢说略知天命，但做官发财扬名纳妾子孝孙众悟道升天转世神童等等万千百种想法，虽不能说全无，却也淡薄：因此都能畅怀，且至尽兴。

酒足之后，我走出房门。一阵凉风过来，顿时吹散了我的酒意。我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浓重的夜色之中：面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暗黑夜色，不远处的村庄只能凭借感觉知道它的存在，而再也无法分辨出它的影迹，远处高高低低的山，完全被暗色笼罩着。在仲秋的夜色中，一切都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抬眼处，才呈现出弧形的初月，此时却早早地升上了天空。暗重的夜色，把围着弯弯月牙的两条美丽弧线，清清楚楚地映射在暗蓝色的天穹上。刚刚收完杂交稻而袒露在月光下的田野散发开来的泥土味，和成熟的晚稻分泌出来的秋香味混合在一起，在这蒙蒙胧胧的暗色之中，好像又团成一种淡淡的气体，氤氲地弥漫在被新月的柔弱光线安抚着的广袤土地上。

好一个安静、温馨、平和的世界，我不禁感到了醉意。

好像又回到年轻时的某个秋实季节。白天在大田里平田砍垡做底肥种麦子，晚上到打谷场拉起灯来给稻子脱粒。电动机在暗淡的灯光下沉重地哼着。丰收的年头，稻粒欢快地从脱粒机的转盘上跳开，再在木锨的指挥下聚成一垛垛金黄色的粮堆；灾荒的季节，懒懒散散汇拢在一起的稻粒，把本来暗淡的灯光映得更加阴涩。而不管风调雨顺还是旱涝洪蝗，土地在慷慨地献出水和营养的同时，也慷慨地送给稻子许多灰土。站在脱粒机旁，几分钟以后，鼻孔就塞满了灰尘，吐出的痰都是黑的。秋天的夜，脱粒结束，下塘里洗澡已经太冷，于是就朝脸上扑几下塘水，然后挟床被子，和三两个同是年轻人的朋友睡在稻堆旁。天上也是这样清晰柔和的月亮，四周也是浓重的夜色，想搞清月亮身旁究竟有没有相伴的星星，眼皮却早已合在一处，更不顾及是先到的早霜在打湿着被子，还是迟归的晚露在滋润着面孔。

又一阵凉风吹来，把我从记忆中拉回。但我已经清醒，已经知道，在这块土地上，在这片月光下，曾经有过自己真实的生活。我的青春在这里度过，而青春据说又是人生命中最艳丽的一页。

是的，青春是艳丽的。这首先因为青年人无忧无虑。无忧无虑使他们能够信奉真实和善良、追求美好和崇高，而健壮的体魄又使他们能够承受甚至是残酷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不过，青年人又是肤浅的：信奉来自书本，追求出于激情。但书本抵不上社会现实，激情拗不过平常生活。所以，不管他们在青春阶段经受过多少残酷的劳动和沉重的打击，如果他们不能把肤浅变为深刻，在他们跨入有忧有虑的成人阶段以后，他们就可能把自己青春时代的信奉和追求，看成一场浅薄的虚幻，而把那尘世表面的沉浮视为生活的真实内容和生命的具体实现，把覆盖在泥土之上的柏油层，和耀眼灯光照亮了的半空，当作自己所立的地和所顶的天。

23年前，我不期然地从宁静平和的乡村回到光怪陆离的城市，现在又忝列教师之伍。在喧闹的环境内，在成绩的竞争中，在金钱的烦恼上，在感情的纷乱里，在理性的局限处，既不能免于年轻时留下的肤浅，又增加了成年人特定的忧虑，应酬往来更使我陷入飘渺的幻觉。然而，站到年轻时信奉过的实在的土地上和追求过的纯洁的月光下，似乎忧虑之感顿无，惭愧之心忽生。生活的真实原来在这里，土地的真、朋友的善、月色的美，原来在这里，在几乎被我遗忘的乡村的大自然里。

“我还会到这里来的”，我对站在身边的青春时代的朋友说。

2000年10月

（本文曾载于《上海财经大学校刊》，2000年10月15日）

九、追求高贵

1. 追求高贵

今天，改版后的我的个人主页面世。改版起因于过多的广告留言。为阻止广告留言，在重新设计留言板的时候，我的主页也重新做了全面的设计。和原先的设计相比，首页最明显的特征是多了一个格言栏。在格言栏里，我将列出一些箴言、警句、希望，以提醒、鼓励和警示自己。

作为格言栏的首次使用，我列出的是多年前一位朋友给我的希望：“高贵、平实、深刻、纯洁、正直”。是的，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做到高贵、平实、深刻、纯洁和正直。这里我仅就高贵说说自己的体会。

高贵是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文明品质。低级趣味是什么？低级趣味是粗话脏话，是猥琐不洁，是暧昧阴暗，是粗暴蛮横。一个高贵的人应当脱离了这样的低级趣味。一个高贵的人谈吐应当风趣幽默，喜怒笑骂更顺其自然，但粗俗词语、黄色笑话，却需要避免。饮食着装，整齐、干净、大方；行为举止，谦让、和气、自然；对待女性，尊重、礼貌、关照，对一个高贵的人是不言自明的。当然，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会争酒斗胜，会狼吞虎咽；会不修边幅，会高谈阔论，会视旁人如无物，因为他也有自己的性情，因为他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因为他本来就不拘小节。但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却都不会猥琐暧昧，不会对弱者粗暴，对女性越轨，所以，一个高贵的人，必然是文明的人。

高贵也是一种脱离了农民或小市民习气的宽广胸怀。农民或小市民习气的主要表现是狭隘，在金钱上狭隘，在名声上狭隘，在情感上狭隘，在眼光上狭隘。因为狭隘，所以他们斤斤计较于一得一失，斤斤计较于眼前利益，斤斤计较于别人对自己的回报，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高尚行为和别人的小市民乃至低级趣味行为。一个高贵的人应当脱离了这样的习气。一些着装讲究、彬彬有礼的人看到别人在商店里不知疲倦地讨价还价，会觉得那些人“太小市民”；可当他们为了金钱而作假、为了名声而违心、为了获得职称而写作，为了失去职位而恼羞，他们自己并没有脱离农民或小市民。诚然，一个高贵的人也需要金钱、需要名声、需要情感、需要眼光，只是他们明白，无论一毛还是千金，无论官位还是职称，自己放得下这一得或一失。所以，高贵的人，必然是大度的人。

然而，仅仅脱离了低级趣味、脱离了农民或小市民习气，还不足以让一个人具备高贵的气质。一套名牌服装和一副高大的身材或美丽的形体，更不足以让男人或女人表现出高贵的气质。高贵不仅意味着文明和大度，而且意味着正义和正当，意味着善良和慈悲，但这一切加起来还不能达到高贵。在我的心目中，高贵的真实含义，是以高雅与庄重的方式来展现一个人的礼貌、正义与善良。同样善良、正义和有礼貌的人之间的文野之分就在这里。一个高贵的人，不是通过服饰或地位，而是通过言谈与举止，在举手投足之间，谈笑风生之内，慷慨激昂之时，日常事务之中，处处表现出自己的文雅与庄重。一个高贵的人在欢乐的时候不会忘记别人，在痛苦的时候不会抱怨别人。他在兴奋的时候不会夸夸其谈，在愤怒的时候不会气急败坏。在胜利的时候，他不会趾高气扬；而在失败的时候，他会宽容所有人并且坦然地承认失败。他不以倨傲的方式给别人帮助，也不以阴暗的方式与对手竞争。他坚决拒绝放冷箭，而平静地接受决斗场上可能的失败与对手可能的冷箭。他不和对手争论家长里短，也不评论飞短流长。对一个高贵的人来说，宁可光荣地失败，不可卑鄙地胜利；宁可清白地贫困，不可贪婪地富裕。这是因为，对一个高贵的人来说。善良与正义如果不能通过文雅和

庄重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些美好的心愿与正义的事业就会大大贬值，个人的尊严就难以提高，人与人的信任就难以建立，人间公道就难以实现。任何一个社会都不缺乏善良和正义的人，但它可能缺乏仅仅用高雅和庄重的方式来展现善良和正义的高贵的人，缺乏追求高贵的人。

我愿意追求高贵，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朋友们的希望。

2007年6月23日

2. 春节的作用

今天是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记得童年时候，没进腊月就盼望春节了，因为到了春节才有糖果含，有肉吃，有压岁钱领，有炮仗放。后来到了农村，和农民在一起，夏收夏种的五、六月份和秋收秋种的十月，收割、脱粒、整田、栽种，几乎全靠人工，真正残酷的体力劳动。可就在那每天十几个小时劳动的农忙期间，农民还只是像毛泽东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那样，中午甚至晚上吃些干饭，可肉是舍不得吃的。但到了春节，没有什么农活，农民却无论怎样穷，还是要买点肉吃、买点酒喝。我曾经惶惑不解，为什么不在农忙反在农闲吃肉？后来我逐渐体会到，过年其实是穷人们为了心安理得地享受一下物质生活而找到的一种方式，一个借口。对那些善良的穷人来说，平时再苦再累，买点肉吃也是一种奢侈，心理上难以承受；而到了过年，再穷再欠债，不买点肉吃，心理上也难以承受，觉得太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对不起节日。

如今，我和许多人一样，不但过年、而且平时也常常有肉吃了。我们的孩子也不再盼望过年了，因为糖果、压岁钱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为了偶然地享受一下“高消费”的物质生活，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节日来安慰自己了。这是我们的努力和运气共同产生的结果。那么，现在春节还有什么作用呢？我想，至少可能有两个作用。第一，它给我们一种心理提示，使我们觉得我们应当和父母、和孩子、和亲人共同生活一下了。这样的共同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亲情或坦然的感觉是一种心理享受，它完全不亚于穷人通过节日得到的物质享受。脱离了物质贫困的我们，常常太需要这样的心理享受了。第二，作为穷人创造的节日，春节同样提示我们，中国和世界还有许多人，和我们一样地努力甚至比我们更加努力，但因为缺乏运气，他们继续停留在贫困状况中。例如，出生在贵州山区的孩子比起我自己的孩子来说，是太缺乏运气了。我们这些获得现代生活的人，只要想到“人生而平等”这一现代生活的道义源泉，想到我们自己在贫困时（或者可能贫困时）多么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同情，那么，春节就会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幸运和自己面对穷人的义务。现在，世界上穷人还很多，根据国际社会的贫困（每人每天低于2美元）和极端贫困（每人每天低于1美元）标准，世界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中，中国更有两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我们的户籍制度、我们的高考制度、我们的官吏制度，以及我们每一个不穷的人可能有的对穷人的歧视态度和巩固自己相对优势的无意追求，都压抑了穷人的声音，加重了他们改变自己处境的困难。但每年一度的春节会触动我们善良的本性，提醒我们注意贫困的存在，使我们在心理上特别地感到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一种状态，特别地感到行善为仁的必要。也正因为春节的这一作用，当我在前往欧洲的飞机上想到春节的时候，

25年前在农村的贫困景象历历在目，我明白自己现在的幸运，更提醒自己尊重穷人，在工作、生活中想到穷人和他们承受的不公正，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2002年2月12日

3. 五十而知天命

时光如流，逝者如斯。对我来说，到本月份，人生已入第五十个年头。还清楚地记得在二十岁的时候，想起孔老夫子的人生说法，便以为自己年十五而志于学，二十而立，因为当时在经济上已经独立，思想上大概也独立了。三十年过去，今天又想起夫子的说法，才意识到自己应当是知天命的年龄了。

然而，什么是天命呢？夫子没有明讲。后人的解释似乎也不多。我想，天命也许是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假设不是夫子自谦的话，则连圣人都过了半百，生命度过了三分之二，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可见知天命之难。当然，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今天的人完全可能比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更早地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否则，我们如何能认定历史真在发展、时代真在进步呢？

可是，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我想它存在于夫子说过的“仁者爱人”上，也就是善上。人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它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群体生活又使得它最终成为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因此，人自我意识的对象，本质上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每个人或早或迟都能体会到，最能令我们对生活有所感悟的，不是我们对物的感受，而是我们对人与人关系的感受。而在人与人关系中，最能拨动我们心弦的，是善心善行。这也就是我们至今仍然在读唐诗宋词、歌德莎士比亚，而不去读牛顿、爱因斯坦的原因之一。在真善美中，善是最重要的。没有善，人依然可以求真求美。大大小小的自然科学家在寻求宇宙的真，大大小小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在寻求社会的真、人的真。一个人完全可以认为财富占有就是人与人关系的真，并且认为自己在人与人的财富竞争中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完全正当的。同样，追求美的人也不必是善良的人。但只有善才能使我们感悟到生活在人类群体中的意义，感受到真和美给我们带来的享受，而避免真和美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无望甚至绝望。善良的人也可能说“善意的谎话”，可能在追求大家公认的美时退避三舍。而此时，我们不但不会感到假和丑，反而会感到一种更深刻的真和美，这就是善对我们心灵的重要性高于真、美之处。善良的人完全可以参与竞争包括财富的竞争并取胜，他和不善之人的区别在于他自觉而不是被迫地遵守竞争的规则并且以爱人之心平等之礼对待失败者。因此，夫子说的知天命，就是懂得以善待人，凡事出以善心。至于什么年龄才知天命，我想是不重要的，尽管我也是在50岁才写下这篇文字的。重要的是，在许多社会精英知行背离的今天，自己如何把对天命的知付诸实践。

2002年3月28日

4. 男性“阉割”之责任

暑假时在家里谈论到小说《沧浪之水》内男主人公池大为对制度先抵制、后屈服、再到得益并维护的经历，在一旁的孩子忽然激动地插进来说，那都是女性对男性“阉割”的结果，因为那都是书中的女主人公董柳迫使男主人公所为的。于是一时间观点各异。我虽然支持孩子的男性阉割论，但却反对女性所致论，因为我相信，男性的阉割是自己对自身的阉割，绝不能怪罪到女性。

第一，尽管现在男女比过去平权或平等得多，但社会还是男性在主导。池大为的被阉割显然和马厅长一手遮天有关。如果厅长权利受到实质限制，池大为显然就不需要改变自己而迎合马厅长，董柳也不需要动员池大为那样去做。但马厅长的一手遮天，说到底还是男性造成的。进一步说，如果在现时的中国，男性之被阉割首先是一种制度性的现象，那么，这一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至今还主要是男性在起作用。

其次，就各个人的情形而言，即使有女性阉割男性之实例，但关键还在于男性是否接受阉割。如果是阉割，那肯定就有痛苦；有痛苦就会有抵制。在小说中我们确实也看到池大为强烈的心理痛苦。他在坚持、在反抗、在挣扎：一方面他在抵制董柳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在向男性的智者请教并获得屈服的启迪。他的最终屈服固然有女性的因素在内（可惜他遇到的女性都先于他而屈服了），但主要因素无疑是他自己的转变。

第三，我相信绝大多数女性并不愿意阉割男性。哪位女性愿意看到自己的配偶在另一位男性或者女性面前低声下气？哪位女性不希望自己的配偶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女性不到她们确实认为、有时甚至连男性也认为的难以忍受的困难境地，一般不会劝说男性去低声下气的。因此，如果她们确实如董柳那样希望池大为去迎合马厅长的话，那么男性倒应当问问自己为什么让对方陷入那种困难境地，问问自己有没有能力既不违背自己的最初意愿而又把自己和女性从困难中解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不愿意低声下气的男性，不但要有正直的感觉，而且要培养自己正直地立身于社会的能力。

第四，如果说男性受到阉割，那么，在这个男性为主导的世界上，女性受到的阉割更为严重，甚至严重到了被男性和女性熟视无睹、视为正常的程度。我们只要感受一下社会上对女强人的一般观念、对女性成为男性陪衬的压力、对女性应当比男性比如更多地从事家务的要求等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可以体会到成为一位正直的女性要比成为一位正直的男性困难得多。因此，男性若被阉割，失去正直和良知的感觉，从社会和个人两个角度看，都主要是男性自身的责任，而非女性所致。

2002年9月24日

5.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

34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12月29日，我作为一名中学生，离开城市到农村落户务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已经过去，现实主义已经回潮。大学仍然不招生，高中规模本来就小，因此整个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

六届学生几乎全都需要离开学校，以便让滞留在小学的少年、青年进入中学。不过，当时的自己意识不到这些，而是像许多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学一样，主动报名到农村去。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很兴奋地去迁户口，心里想着的是毛泽东的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一年，我 15 岁。

今天的我，近 50 岁，坐在城市里的 7 楼办公室内，望着窗外的广阔天空和狭窄地面，似乎又看到了农村的天地。确实，分清韭菜和麦苗对我的工作毫无意义。街头的卖菜者大概不至于把麦苗当韭菜推销给我。不过，我们每一个自认为关心国家的人毕竟需要了解农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还生活在农村。了解农村当然不必要变成农民，但变成农民毕竟也是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正是变成农民，使我明白了城乡的差距，明白了农民所承受的不公，明白了农民的心理，明白了生活的艰辛和欲求的有限，也明白了希望的力量和生命的潜能。如果说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下乡务农也许是历史错误的话，那么，对我个人来说，8 年半的农村生活，却成了我的精神源泉。当我最初挑起担子的时候，笨拙的动作使农民发笑。他们担心担子把我压倒，担心我长不高。确实，许多次我被担子压倒在地，但后来，我成了村里最强的劳动力之一。同时，农村的担子虽然使我背驼，但我仍然长大长高了。

生活的信心是什么呢？当我挑着 100 多斤的担子在雨水里的田埂上，五个脚趾紧紧地扒住地面，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生活。在晚间的油灯下，我想到这可能就是自己一生的生活。可是，在那么多人这样生活的时候，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不应当这样生活。况且，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生活中站立起来，那么，生活就可能永远摆脱不了恐惧的阴影。我想，一个人也许只有承认穷人的人格，才敢于直面艰苦的生活；而敢于直面艰苦生活，生活本身才不会让他感觉累。当然，在我 15 岁的时候，我只明白我必须养活自己；而在我 50 岁的时候，我明白是农村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生活态度。天地也许有阔狭之分，作为似乎有大小之别，但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问题，可能还是“活着累吗？”

2002 年 12 月 29 日

6. 信任

本月 24 日来到德国，在吉森大学（Universitaet Giessen）做点文献工作。27 日星期一拿着联系教授的一封信到经济学院的图书馆办理借书手续。管理员既没有核对我的证件，也没有收取费用，填个简单的表格，三分钟，就可以把书借回家了。而阅览更无需任何手续。过程之简便，用这里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说，你在中国根本不敢相信。是的，我从上海财经大学到邻近的复旦大学仅仅阅览，就要办各种证明并提交证件甚至交费，更不敢幻想借书回家了。有人说这些手续是图书馆为创收而设，有人说这些手续是为了防止孔乙己似的“窃书”，当然还有更光明正大的理由，比如为国家财产负责或者遵守制度等等。不过，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别人或者整个制度不相信你会归还借出的书籍，除非你要索回押金或者担心更大的处罚；因此就尽可能地不让你阅览和借书。而在德国，别人信任你，制度信任你，相信你会安静阅览，会归还借出的书籍。不还书的人中外皆有，我自己也有过。但德国管理员碰到这种情况也许只是遗憾地甚至理解地摇摇头，而不会想到改变信任人的初衷。他们相信绝大多数

人都会珍惜别人的信任。即使犯过一、两次失信的小错，也知道自己错误所在，并且会融合到这种互相信任的环境中。

信任据说是人与人关系的润滑剂，它把人与人关系变的平和、轻松。中华民族素以“性善”为信仰、以集体主义为指向，比起例如相信性恶、崇尚个人主义的其他民族内部成员关系来说，应当是更加信任同胞也让同胞更加信任自己。没有出国之前，自己也以为如此。出国之后碰到各种大、小事情，才发觉当今国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不上许多民族。国人的理由是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别人不值得信赖，所以自己信任别人或者让别人信任都没有用。每个持有这一理由的人都有亲身经历为论据，而且也都有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初衷。初衷改变的原因，既有制度腐败的问题，更有个人经历的教训。不过，我想，还是抱着信任别人的态度处事为好。也许别人不值得信赖，包括那些大谈诚信是管理之本的管理学教授都不值得信赖。但需要自问的是，自己是否值得他人信任。可能，不管别人如何，我们还是先让别人信任自己；可能，不管自己有多少受骗的感觉或者经历，还是不要改变信任别人的初衷。无论如何，世界还是美好的一面更多些，生活还是光明的一面更强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心态为人处事，即使受骗，即使失败。其实，受骗和失败给自己造成的外在损失再大，也比不上改变初衷心态给自己一生造成的精神损失大。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比较地平和、比较地轻松，为了体会在得到别人信任时才能够产生的感动心情，还是先信任别人，先让别人信任。

2003年1月30日

7. 五月的夜晚

五月的深夜，我走在小区外的人行道上。风轻轻地吹着，柔和地掠过我的脸面；马路已经完全安静下来，习惯了噪音和废气的耳朵和鼻子享受着久违的轻松。没有月亮，淡淡的路灯似乎更加平和。

五月的夜晚，应当是一年中最为舒适惬意的夜晚了。

这时，从对面人行道上走过来一个女孩，走在我的前面。她的步伐不像散步，也许是夜班，也许是朋友聚会，这么迟才回家。突然，她轻轻地跳起来，好像要摘一片树叶玩耍，也好像要抚摸一下树叶，那身影，那姿势，无声无息，但却给本来无声无息的春夜带来了生气，恰如画龙点睛，春夜一下子舞动开来，世界一下子完美了。

我突然感动了，原来，把世界美丽起来，是如此地容易。一个无意的动作，一个欢喜的蹦跳，就会让世界美丽起来。

我也想摘一片树叶，摸一下小树。

但我的手停在了半空，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树叶上树干上满是灰尘，只有在雨后的短促时间内，它才有幸展现自己那令人类心旷神怡的绿色和苍莽深重的褐色。

前面的女孩已经走远。

我突然怅惘了，让世界美丽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如果在我的身后，有一位类似我的心情的人在散步，他是无法欣赏到刚刚感受的美丽的，因为我没法让自己欢喜地亲抚树叶，没法把生命赋予春夜。

我是理智的，我要估算树叶带给我的灰尘，我只有在了解成本和收益后，才能决

定是不是应当摘一片树叶来欣赏。

前面的女孩这么晚还在这里走，应当也是这里的居民，应当也知道树叶上的灰尘。但她还是高兴地和树叶玩耍。

也许，让世界美起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智。

2003年5月2日—3日夜

8. 信任别人

刚刚一位同学看到我的网页，发现很容易就可以留言，感到惊讶，这样太危险了。她问我如果别人用我的名字发留言怎么办。我说信任别人吧，还是要信任别人，信任这个世界。

是的，我不能够排除别人用我的名字发留言到我的网页上，也不能够阻止别人用我的名字发留言到其他网页上。什么人能够阻止这样的事件发生呢？我想没有人能够阻止。在网络这个自由的虚拟世界里，甚至在不很自由的现实世界里，都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样事情的发生。即使法律也无能为力，因为法律对不严重的“假冒”留言不会处置。对严重的“假冒”留言，要找出假冒者，却又不是一件易事：而无被告，法律不会受理。

其实，无论在网络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关键还是信任。信任别人，信任我们周围的人，信任我们日常接触的人，信任我们第一次接触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美味的饮食和得体的服装，但我们最需要的是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只有信任才能够使我们心情平静，才能使我们心绪踏实，才能够感受到世界的美丽和生活的乐趣。

但是，如果我们要得到别人的信任，我们首先应当信任别人。一个不信任别人的人是无法得到别人信任的。当然，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我们信任我们的家人。但是这些还不够。我们应当信任人，信任这个世界的所有人，这就像教徒们敬仰上帝并且把其他人都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上帝子民来信任一样。我虽然不是教徒，但信任大家，信任每个人都有“性本善”的一面，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互相都给别人更多一些信任，我们每个人就会更多地表现出自己的“本善”，我们自己也才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

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信任别人的前提是相信别人都是好人，相信世界的美丽和生活的乐趣。如果我们除了少数家人和朋友外，不信任别人，假设别人都是坏人，那么，这个世界，这番人生对我们便失去了意义。我们将会生活在恐惧之中，打电话不愿报自己的身份，怕对方是坏人；写文章不愿意讨论，怕被人剽窃；遇人先揣摩对方的心思，防止上当受骗。这样，我们也许能够把自己保护好，但世界在我们心目中却变得无比困难，生活便使得我们心力交瘁。自然，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都归之于别人不值得信赖，我们可以举出大大小小的例子来证明别人之不值得信赖。当然，这些例子都是确切的，在生活中我们确实需要谨慎和稳重。可是，所有这些别人不值得信赖的例子加起来也不足以证明我们日常接触的大部分人是不值得信赖的，不能够证明我们周围的人文环境的险恶。如果我们换一种心态，我们首先信任别人，即使在自己因此而受窘受难的时候仍然相信人间的美好，那么，我们将会获得别人的信任，将能够体会到生活的价值。

2003年9月15日

9. 新年的感觉

在温和的冬日里，新的一年来临了。我的个人网页也进入了新的一年。我的网页常常更新“双周夜话”。但近来的缓慢更新，却在新年伊始的时候，把我推到了必须直面的决策前：继续或者停止。如果说在去年元旦，我想过停止“双周夜话”；可在今年元旦，却好像有一种激情，继续写下去。网络是自由的天地，是每个人可以说话、可以说真话的地方。既然已经开始在这里说话，既然内心里好像还有话可说，那就继续，即使是自言自语。网络的自由也包括了自言自语的自由，这是纸质媒介和其他商业性、宣教性的媒介无法比拟的地方。

新的一年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幸运地跨入了新的一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危险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们：假如地球的转动偏了半度，假如地震发生在上海，假如公共汽车急刹车时被撞头部，假如吃了毒猪肉，假如染上非典，假如…无数的假如随时都可能打断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我很幸运，在这无数的致命假如的包围中走过了半生，又走入了新的一年。

我的幸运在于，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走入新一年的。在过去的生活中，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帮助和指点；许多朋友、许多书籍教会我生活。我能够从一个贫穷且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的孩子，成为一个说得过去的教师，经济上不拮据、文化上不苍白、情感上不孤独、人格上不屈辱、而且未来风险也不大。所以，我是太幸运了。社会给了我太多，别人给了我太多。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谢同学，他们给了我一同学习的机会；当我和朋友共事时，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启发和帮助了我。我不是基督教徒，没受过感恩的教育，但竟然也有了感激的心情，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还在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懂得了放弃的好处。照说，在我从贫困低贱的底层走向社会时，应当学会的是抓住一切机遇，而不是放弃。但我学会的竟然是放弃。如果不放弃的话，我可能做了官，可能有两三套房子，可能…，至少也不会还乘公共汽车吧，就像一位外地朋友听说我在公共汽车上被撞时说的那样。但我不但放弃，而且竟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放弃，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并且在于，在放弃了那么多机遇以后，我竟然还获得了许多；而且，在我从社会、从别人那里获得许许多多的同时，竟然也为社会、为别人做了一点可以说是自己的工作。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幸运。我不特别看重经济学、最大化、博弈论这些自己专业的知识，就是因为我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都不去盘算。似乎都很吃亏，但五十年过去，却发现不但省却了盘算的精力和烦恼，不但获得的远远超过了放弃的，而且都是光明正大地获得的，心情自然是愉快的，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我相信，新的一年同样会令我感激、平静和愉快，会让我保持幸运的感觉。

2004年01月07日

10. 平安夜

今夜是平安夜。

我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也许是少年时候崇拜毛泽东的口号听得太多了，崇拜毛泽东的决心也下得太多了，以至于产生了逆反心理，难以接受在教堂中听到的那些

崇拜言词，因此至今才没有皈依。

其实，我对所有信奉宗教的人都很尊敬，包括信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其他宗教，因为在我看来，至少就平均水平而言，信奉宗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更加善良、更能自律。

同时，我非常喜欢“平安夜”这首今夜教堂内必定吟唱的歌曲。

我第一次感受到“平安夜”这首歌是在五年前。那一次，我突然感到这首曲子是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脑海里不由地映现出一幅图画：一个可爱、可尊的生命就要诞生了；人们围坐在即将成为母亲的玛利亚周围，安静地等待着、安静地期待着，没有烦恼、没有急躁、没有焦虑；这时，有人低声哼起“平安夜”，然后大家轻轻地、慢慢地、柔声地唱起来。音乐渗进静谧的气氛，气氛融入平和的音乐，玛利亚所住的马厩变得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让我的心绪在歌声中安定，烦躁在歌声中消散……

那时我还不了解歌词。现在令我喜欢的，仍然是它缓慢、平和、安详的曲调。

今晚我本来要去上海大剧院聆听“平安夜”的，和我所尊重的教徒在一起。

但上午接到通知，音乐会临时取消了。

现在，当我接近午夜时分从办公室回到家，我仍然按捺不住地弹了几遍“平安夜”，平静而温馨的音乐，平静而温馨的夜晚，愿我所爱的人平安、平静，愿天下人平安、平静，也愿我自己平安、平静：

$5 \cdot 65 \quad 3 \cdot \mid 5 \cdot 65 \quad 3 \cdot \mid 2 \quad 2 \quad 7 \cdot \mid 1 \quad 1 \quad 5 \cdot \mid \dots\dots$

2004年12月24日

11. 210 感怀

“去年你怎么能在210室度过了冬天？”一个朋友在刚刚过去的北方寒流中问我，他感到那里冷得难以忍受。

“也许去年冬天没有这么冷吧？”我回答说。

搬出210，已经有7个月了。但我仍然常常想起它。210室是一间宿舍，位于校区的最深处。墙外的工厂十几年前还很有名气，现在已经停产，几无人烟。隔壁房间基本无人居住，整栋楼居民也不多。因此，只要墙外不远工地上的混凝土搅拌机停止吼叫，周围便是一片静谧。楼旁小径有几颗树，不高，形似棕榈，冬天也苍翠着。我喜爱在那里散步，百米左右距离，来回走走，很安宁。

然而，210室内没有它的环境惬意。超过三米的净高和超过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面积，仍不容光线穿过。老式长条地板留下又宽又深的缝隙。在我搬入之前，管理部门刚刚用石灰填塞了它们，涂漆后，外观很受用。但一走动，石灰便跃然而起，成了扫之不尽的垃圾来源。冬天冷，坐在床上看书，似乎又回到了30年前农村小屋。当然，和30年前相比，现在有了可调可阅的素琴、金经，只是谈笑虽无鸿儒，往来亦少白丁，一如既往。

不过，30多年前我去农村，带着的是壮丽的革命色彩；这次搬入210，却怀着更多的自责。我到农村时正值青少年。那时候，听到的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学习的是雷锋爱憎分明。谁好谁坏，好事

坏事，伟大领袖定了标准。领袖一声号召，我们立即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跟地（主）、富（农）、反（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斗争。可是，当贫下中农在集体劳动时教导我要偷懒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没有了标准：这些被定为我们学习榜样的好人，为什么竟有如此想法？后来我渐渐体会到，农活太辛苦了，好人也只好设法偷懒：好人和坏人原来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

让我最终从爱憎分明的极端走出来的是看书和自省。文学向我展示的复杂生活，远远超出了我的经历。电影“泰坦尼克”里，船上维持秩序的保安开枪打死了一个在紧急关头会造成骚乱的乘客，接着自己自杀了。为什么他要自杀？他难道不是好人吗？他做的难道不是好事吗？他难道不应当恨那个破坏秩序的乘客吗？是的，他做的是好事，但任何好事都有另一面；他不得不伤害另一个人，可他又毕竟伤害了另一个人。他不会恨那个迫使他开枪的人，相反，他甚至用自己同样的死表达了他对那个人的内疚或者对那个人的大爱！

今天，我认识到，生活常常迫使我们做出选择，可生活不需要爱憎分明！当我们“为人民服务”时，我们并不需要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样去问顾客“你属于人民吗？”更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憎”。我们周围没有任何人足以让我们去“憎”。任何人都有她/他需要我们尊重的人格。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伤害别人。可是，生活的复杂性恰好在于，我们的所有重要选择，不管它如何“好”，几乎都要损害或者伤害别人。这就是善良的悖论。当我们为避免自己心灵的扭曲、当我们在窘迫的场合不得不说“不”的时候，我们明白别人也会受到的伤害，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从而尽可能地牺牲自己、补偿别人，即使有时候无法从根本上补偿。

于是我搬入了 210。

当我在 210 里构思“一个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中国自由主义”一文时，我特意留心，不让 210 给它染上太浓的愤世嫉俗色彩。后来，我在 210 写完“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特地细读几篇，好像还算平实。

当然，210 给我的变化也是明显的。

我从农村劳动起开始有规则地做饭。但 210 厨房的幽暗和厨具的油垢使我丧失了兴趣，令我在新居也无法安心做饭了。

在 210，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内心世界。如今我发现我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兴趣远远大于对外部世界的兴趣。

210 让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有爱、有文化品位、经济上不拮据的平静生活，是我在下意识中追求的目标。在 210 室，我也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接近这个目标，尽管我几乎失去了外在的一切东西。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在 210，我离自己的目标也许最远，因为无论我怎样选择，总都会伤害别人，而我又是那么地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人。正是在 210，面对世界、面对永恒的心灵和宇宙，我开始领悟原罪的道理，明白自己的谦卑，以及自己的价值。

2005 年 12 月 22 日

12. 夏威夷观浪

夏威夷是茫茫太平洋当中的一群岛屿。今年寒假，我来到夏威夷群岛中的瓦胡岛（O'ahu）。瓦胡岛四周环海。游人最多的地方是岛南部火奴鲁鲁市南侧的海滩。但观海最好的地方，应当是岛北部海滩。火奴鲁鲁海滩，秀丽、雅致，赏心悦目。尤其背对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你不得不感到回归大自然的享受。可北部海滩就是大自然本身，人烟罕见、交通稀少，只是在山和洋之间，鬼使神差地横插了一条陆地走廊，大约三百米宽，而海滩仅有五、六米宽。山是野石山，不高却峭直，灌木的绿色刚刚遮盖住苍劲的岩石。滩是天然滩，不宽但绵长，暗绿的礁石不时穿出金色的沙层。除了“不准游泳”的警告牌与间或出现的长凳外，这里看不到人工的痕迹。沙层和礁石共生的海岸，既不适于游泳亦不宜于散步，因此也没有游客。往往几个小时，漫长的海滩上只有我一个人，带着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的自传《Me》（我）。

也许受到旷无人烟的感染，大海显得非常宁静。我是农历大年初一和初二在海滩的。年轻时在江苏省乡下种田，知道初三潮、十八汛。特别是农历八月初三前后，海潮上扬，抬高长江水，逼得村前河水倒流，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海的力量。夏威夷与江苏省有别，或者正月和八月不同？面前的大海，表面上宁静，潮水带着哗哗声，一波一波地涨退着，不慌不张、不急不忙。坐在它的前面，我努力使自己宁静，脉搏不紧不慢地跳动着，一滴一嗒，一张一弛，在这辽阔的一人世界里。

海浪来得缓慢。大约距海滩四百米远，平静的海面突然折起一星点皱纹。后面的海水推着这皱纹长大。过了好像五十米，皱纹成了凸折，也许有十米宽，五十厘米高，深蓝色，看上去像海面上一支中间粗、两侧薄的长月牙形水晶棒。凸折继续向前，并且越来越高，两侧凸起的更快。到了距海岸200米左右的时候，凸折俨然已成海浪，可能有二米多高，十五到二十米宽，酷像一堵水墙，又像一条正面修剪齐整的深蓝色灌木丛，被一股神秘力量推向海岸，模样是那样厚实、步伐是那样坚定。这时候，后面的海水也许性子太急，不断跃过高高的墙顶。海水一涌上墙顶，瞬间铺开一层白色的水帘，再散成白色的水花，好像灌木丛上盛开的白花，给海浪注入了活泼的生气。水帘往往很大，一时能罩满水墙。有时候，一些更性急的海水等不及从顶上翻过来，便飞快地窜入海下，从海浪前方涌出来，形成在水墙前的舞蹈，就像灌木丛前低低的野草随风摇曳。下方窜出的海水常常跳跃很高，宛如欢快的白色水花，和从顶部落下的水花交相辉映。水花不但给海浪带来明快的色彩，而且给海浪带来奔跑的声音。这时候，海浪开始呼叫了，哗哗的声音渐渐地从低到高，从细小到深沉、从模糊到清晰，越来越强。海浪也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宽。突然，相邻的两条海浪搀起手来，形成很长很长的条浪；更多的时候，左右、前后相邻海浪互相推动，你追我赶，出现一片一片向前的波浪群。哗哗的浪声也从独唱发展成合唱和大合唱，歌声开始表现出广袤大海的气势。看着高唱着进行曲坚定向前的水墙，你也许会紧张，你也许下意识地做出大水扑身的准备，但到离海滩七、八十米前后，高高的海浪突然像手持盾牌的士兵方阵听到卧倒令，迅速低了下来。一米高、八十厘米、五十厘米、二十厘米，海浪边卧倒边向海滩奔来，响声变得清脆起来，色彩也从暗蓝快速换成淡绿，气势更从磅礴转为温柔，好像远看显赫的伟人，近前却是谦和的君子。海浪终于奔上了沙滩和礁石，淡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脚和腿，跳跃的水花顽皮地扣击着我的身躯。一波过去了，大约三、五分钟，新的一波又来了，像永恒的宇宙，又像细心的恋人，不断抚慰着我，在这辽阔的一人世界里，体会着凯瑟琳·赫本饱含泪水的坚强。

2006年1月

13. 家父胡业仑九十大寿暨家父母六十婚庆祝辞

各位长辈、各位来宾、亲朋好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庆贺家父九十大寿、庆贺家父母结婚六十周年。我代表兄弟姐妹，代表全家，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家父如今已步入九十高龄。九十年沧桑巨变，九十载风云际会，家父既继承了家族的优秀传统，又见证了中国的历史变迁。

我们的家族尊师重教，历代出了许多举人、进士。家父自小聪颖好学。中国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后，家父成为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在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中央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并定居南京。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早期，家父不但把家族从乡村带入城市，也把家族从传统带入现代文明，为后辈人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家父亲和、乐观、有主见。早在中学时期，他就负责起当时最为艰难的学校消费合作社工作。进了大学以后，他又在自由竞选中当选为中央大学学生会主席。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大学的学生领袖，他渴望建设和平、自由、民主和富强的中国。但他刚过而立之年，中国政治格局发生剧变，他亦失去机会，甚至 50 多岁时还得到农村务农维生。尽管如此，家父始终保持平静、开朗的心情，从没有抱怨过命运和社会。60 花甲过后，邓小平主持的拨乱反正为家父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家父由衷地拥护 20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多次组织海内外校友聚会，为祖国的和平、自由、民主和富强尽力。

家父对子女要求严格。他教育我们坦诚为人，认真行事。他要求我们热爱知识，求学不倦。正是在家父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即使在最艰难、最不重视知识的时期，都不忘记学习，不离书本。更令他老人家欣慰的是，孙辈们正在把这种热爱知识、追求文明的传统发扬光大。

家父、家母最为家族所称道的是对感情的忠贞不贰。早在少年时，家父母就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做主定亲。后来家父出外救亡求学，整整八年与故乡失去联系。家母在家苦守八年。家父的才华使他不乏女性朋友，家母的美丽更让提亲者接踵而来。但他们谨守儒家之训，不疑不惧，互相等待，终于盼到抗战胜利，两人团聚，终成眷属。从那以后，无论在兵荒马乱的艰苦阶段、缺衣少食的困难时期、文化革命的不公年头，父母亲都相濡以沫，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共同撑起家庭，共同抚养教育我们子女，共同走过了六十年的人生道路。今天，在恭贺家父九十大寿、家父母六十婚庆的大喜时候，作为子女，我们无比感谢亲爱的父母亲，最衷心地祝愿父母亲大人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谢谢大家！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14. 春节感恩

看一下时钟，国内已然除夕上午。父母、亲戚、朋友大概在准备今天的晚餐吧？网上有人建议除夕放假，我很赞成。春节前后，除夕是最忙碌的，不但要准备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饭，而且要为节日几天准备好饭菜。家母信奉“大年初一不动刀”，需要动刀的节日菜肴必须在除夕准备好，所以童年时每逢除夕，不但我们孩子要被母亲叫住帮忙，连从不参与烧饭理菜的父亲也得打杂。今年，虽然我离开上海前便在信箱里发现了餐馆年夜饭广告，但绝大多数同胞肯定还是待在家里，毕竟这是个家庭的节日。所以，除夕放假，对家庭主妇和参与家务的男性都是一个福音。

由于时差，Stanford 还有好几个小时才入除夕。除夕、春节做什么、吃什么呢？前天一个朋友让我去他那里，并且要为我买飞机票；另一个朋友促我立即改签机票回上海过年，反正年后学校很快开学，我也得上班的。我谢绝了他们。可对除夕、春节做什么、吃什么，脑袋里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概念。向父母、孩子祝福春节，在网络上向朋友贺岁，是必不可少的。其余呢？不知道。一个人平平静静、安安静静，读读书，散散步，是我过去的梦想，也许今年除夕、春节就如此吧。今天又刚刚买了一本《Great American Short Stories》（美国优秀短篇小说集），够春节的周末两天看了——况且计算机里还有音乐、柜子内还有酒与茶。

朋友的邀请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感恩情结。平平静静、安安静静应当是生活中最昂贵最难得的东西。但如果它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外界的强加，它是没有价值的。过去在农村过年，也是平平静静、安安静静，但那和贫穷、闭塞联系在一起，谈不上 free to choose（自由选择）。如今，可以和朋友过年、可以和家人在牌桌上等待午夜的鞭炮焰火、可以大快朵颐，美餐一阵、可以“侃山”，上至天文下及地理；但还是喜欢平平静静、安安静静。内心明白，能够自由地选择如此的过年方式，是自己的运气，应当感谢上天、感谢家人、感谢朋友的。

怀着这样的感恩心情，我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数据表发到网上，让网友自由使用。通过沈建飞先生的帮助，这些数据去年底就整理好了。我还根据这些数据显示的图形，写了一篇夜话，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发了一通感慨。可为自己整理和为大众整理毕竟是两回事。让大众使用的数据，应当清楚而没有歧义、简洁以方便使用、缺陷也能够让他们一眼看出。为此，我在书桌前坐了差不多两天，核对数字、检查程序、编写说明、征求意见。现在终于完成，可以发到网上了。

同时，我声明，不但上述数据表，而且 www.hujingbei.net 网址上的所有内容，网友都可以自由、免费地在网络上转载和使用，而且不必要请示或者通知我。网络是自由世界。信息自由交流的前提是信息自由使用。我自己的文字，是使用包括免费使用了许许多多人的文字才写成的，因此它也应当让别人免费自由取用。即使我的文字有错误有缺陷，它们也只能在交流过程中发现和纠正。所以，在承担对这些文字责任的同时，我愿意把我的文字作品变为自由使用的公共物品。

公布上述数据，是我整理这些数据时就做出的决定；公开声明自己的网络作品是公共物品，是我得知网络作品专利权争议后便有的想法。春节的感恩情结促使我完成这些心愿。我们民族有清明节感谢祖先的传统，有事情成功后谢佛的习惯，有谢天谢地的成语。记得三十多年前一次知识青年开会，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出了“谢天谢地”，立即被旁人用“应当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抢白得无地自容，自己也深感思想还没有改造好。如今，在春节来临之际，在感谢朋友和家人的同时，我又感受到“谢天谢地”，感谢上天，感谢世界，感谢社会，让我能够自由选择，能够安静平静地享受我

们民族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也让我能够回报一下世界、朋友和家人。

2007年2月16日于Stanford

15. 体会苦难

今、明、后三天是全国哀悼日，悼念在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的受难者，抚慰受伤者和受灾者，感谢救援者。

地震那天，上海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可是，在1000多公里以外的汶川，却发生了罕见的人间灾难，二万多个生命瞬间消逝、更多的伤员在呻吟，还有更多的人在暴雨中的帐篷里度过不眠之夜，而救援者甚至用手在挖……悲惨的状况、苦难的人们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三十多年来，我们民族没有遭遇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饭吃了，有屋子住了，有书读了，有事情做了。尽管年年有洪水、有台风、有雪灾、有沙尘暴，但毕竟很少死伤、毕竟没有牵动大家的心。

因此，我们几乎忘却了苦难。前年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的是新唐山的雄伟，甚至是“宁愿死伤几十万，换得新城亦雄壮”的潜台词。受灾者的苦难、民族的困难甚至耻辱，似乎都不存在。

唐山地震时，我是毛泽东的迷信者，我的想法和官方报纸一样，反对国内外势力利用唐山地震来干扰毛泽东的批判邓小平右倾路线的伟大战略部署，唐山人在抗震中的英雄气概激励了中国人民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的革命斗志。

那时候，报纸上没有苦难，只有唐山人的英雄事迹。

当然那时候也没有捐款，因为没有苦难。

三十二年了，我们民族是踏踏实实地向前走了一步。

政府公布着死亡人数，电视播放着苦难情景，网络流传着悲惨和勇敢的镜头。那些震撼心灵的照片，自己不敢正视却又不能不正视的照片。

苦难唤醒我们的怜悯心。苦难让我们意识到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是一家人。苦难让我们张扬人性，苦难让我们良心有愧，让我们不能不从心里怜悯他人、同情他人，不能不为他们做点什么。

苦难唤醒我们的敬畏心。苦难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自然灾害前的无助与个人的渺小。在上天面前、在大自然面前，在人类历史面前，我们每时每刻都应当怀有敬畏的心情，都应当战战兢兢，多询问几次上苍：“我这样做对吗？”

人间是有苦难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苦难、社会灾害造成的苦难、民族不成熟造成的苦难。

今天，苦难落在别人身上。我能够体会，我希望死者安息，生者坚强。

明天，如果苦难落在我的身上，我会坚强地承受苦难。如果苦难不落在我身上，我会好好生活，超脱名利，做一个自由而又自律的人

2008年5月19日

16. 从《寂静的春天》想起的

美国女科学家卡逊于 1962 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因为是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的第一本著作而闻名于世。我有这本书的中文版，我知道。只是由于不断地搬家，不知道放在哪个纸箱里而已。今天，评读一位学生的毕业论文，是讨论环境问题的。论文当然也引用了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的几句原话，然而却没有标明出处，参考文献中也没有列出卡逊和《寂静的春天》。我一时冲动，翻箱倒柜，想找出这本久违的旧书。而当我真的找到它的时候，却大吃一惊，书面上清清楚楚的盖着方印“上海财经学院图书馆藏书章”和书号“221176”。上海财经学院，就是现在的财大的书，竟然在我的手上，那位同学找不到所引文献的责任，原来还在我的身上。

不过，我很快就释然了：书后更加清清楚楚地盖着一个“注销”的方印。回忆起来，这本书是我在当年学校图书馆廉价处理旧书的时候买下来的。那时图书馆在中山北一路 369 号，书库狭小，不时要处理旧书，以便新书入库。因此，《寂静的春天》被我碰巧地从旧书里觅得。财大图书馆大概是 1979 年重新建立的吧，《寂静的春天》中文版也是 1979 年第一次面世。被当作旧书处理大约总在 1987 年左右。那时。卡逊的书乏人问津。八年内可能无人借阅，自然应当处理，而中学数理化复习参考书很热门，加上后来书库也鸟枪换炮了，因此二十年来巍然不动地屹立在供大学生借阅的图书书架上。

不知道是写作论文的同学偷懒，没有去查找图书馆仍然藏有的“寂静的春天”的复本，还是图书馆不再藏有这本书了——两者都是令人遗憾的。但无论如何，更值得欣慰的是，从 1979 年，到 1987 年，再到 1999 年，在我们的身边，已经有学生以环境保护为题撰写论文，已经有更多的学生和职工关注环境问题，这是可以告慰于生前饱受围攻的卡逊之灵的进步。《寂静的春天》不是学术著作。作者的目的是，不是建立理论，而是以振聋发聩之势来冲破阻力，“唤醒民众”。今天，每日难以忍受的空气污染，已经唤醒了我们的环保意识。比《寂静的春天》写得更好也更新的环保读物已经很多，因此，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特别的必要去了解卡逊的原话或者原著，也没有必要像我评读的论文的作者那样为此而思索。我们所要做的，大概仅仅是用我们自以为已经觉悟了的环保意识，提醒自己离开教室时顺手关灯，丢弃垃圾时随手分类……

1999 年 12 月

（本文曾载于《上海财经大学校刊》，1999 年 12 月 30 日）

十、从农家的小桌子想起
——我的青年日记（1971年1月27日—
1971年9月9日）

1. 从农家的小桌子想起（第一本日记发表时引言）

十多天前，在湘西山区一个农家里，凹凸不平的泥土地面，被烟熏黑的屋顶，低矮昏暗的房间，我轻轻地问一个光着脚丫的小女孩在哪里写字做作业。她指着墙边的小桌子说：“在那里”。

那是一张大约 60 厘米高、60 厘米宽的酱色旧桌子。上面放着我不敢正视的脏碗。那也是这家农民仅有的一张桌子。小女孩常常坐在小凳子上，在那里写字。

我突然激动起来。三十多年前，比她略大的年龄，我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房子里，伏在这样的桌子上写字。只是我的桌子是桔色的；我已经离开学校，每天写的不是作业，而是日记。

从 15 岁到 24 岁，我在农村度过。那时候，和我同龄的同村男青年都在上学。可我是作为劳动力来到农村劳动、作为城市青年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以我已经无学可上。因此，我本来不应当再与文字有缘，但是，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一张涂着让人开朗的桔色的小桌子让我写字。现在，除了日记本，这张小桌子是唯一一件依然在我身边的农村时期的物品。

今天，我把自己保存下来的农村日记中的第一本输入计算机并且公开。日记里记载的是我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的一段历史。我是坚持着读完自己日记的。在阅读过程中，我既常常脸上发烧，亦常常心潮澎湃。然而，无论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好是坏，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特别是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历史。虽然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可以变化，但历史事实是不可改变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现实，也敢于正视历史。那天在湘西，我终于正视了小女孩家用的饭碗，那些从没有仔细刷洗过的放在小桌子上的饭碗。今天，我也需要直面自己那段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历史。

在重读这些日记之前，我知道我曾响应着毛泽东的号召，自觉地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知道我曾深受专制思想的影响；我知道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和沉重劳动；我也知道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对自己没有丧失过信心。可是，我没有想到，在我记忆中引为骄傲的这些日记，大部分内容竟然类似报纸摘要；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虔诚地相信着“二报一刊”，把它上面的每句话都当成真的；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热烈地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和世界的唯一救星，即使林彪事件发生、毛泽东的做法受到许多人怀疑后，我仍然坚定地相信他是绝对正确的。今天，在这些日记面前，我必须承认，我的青春时期是学习、接受专制思想并把它溶入血液的时期。我完全不知道世界，我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顶峰，生活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自己是精神上最幸福、物质上最享受（因为资本主义下的人民生活在缺衣少食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所以，无论农村生活多么苦，劳动多么累，我都坦然地接受，而没有任何独立的想法，没有任何自由的思考。

我是幸运的。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让我写字，让我学习，让我成为有知识的人；我又不幸的，在小桌子上把“独尊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当成唯一正确的文字写了下来，因此，我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大部分知识又是无用的。如今，当我终于排出满是专制主义毒素的血液，换上新的血液从而能够呼吁学术自由的时候，我对主张“独尊马学”的刘国光和其他学者的个人际遇有着深刻的同情，因为他们和我在绝对专制的环境下写过同样真诚的文字，因为换血的过程是那么地痛苦，我们实在难以指望大部分人能够承受。另一方面，想到今天仍然伏在小桌子上写字的湘西小女孩，我又不能不大义凛然地反对刘国光们提出的专制主义回潮。今天，中国已经远远走出了

绝对专制的状态。我的同龄农村朋友当年进中学时，连物理、化学课程都不允许上，因为这两个名称是资产阶级的；语文课本则等同于政治教材。湘西的小女孩今天虽然还必须接受某种政治说教，但学校教授的知识毕竟大大扩宽了，世界也在她面前敞开了大门，所以，她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知识，大部分将是有用的。中国只有在继续减少专制、继续扩大自由民主的方向上前行，湘西小女孩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我希望自己当年在小桌子上写的日记既可以给我以做人做事的教训，也可以提醒我自己和别人不但看到中国的变化，而且认识到中国变化的正确方向。

2006年7月26日

2. 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第二本日记发表时引言）

今天，我把自己十八岁时，也就是1971年写的第2本日记上网公布。这是一段我个人的历史，也是一段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的历史。

重读这些三十六年前的日记，我不能不百感交集，那个社会、那一时代、那种语言、那些人；那挑秧时每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紧紧抓住田埂的步子，那对真理的渴望和对毛泽东的崇拜……

重读这些日记，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年头、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生活，我不想说青春无悔，因为面对刘少奇的冤魂、面对在忆苦思甜时因为提及“1958年更苦”而受到批评的农民，我不能说青春无悔；我也不想说青春有悔，因为我很难想象自己会有一个更好的青春，在那个时代。

重要的是教训，为自己，也为由于那个时代而陷入了“有悔”和“无悔”悖论中的中国，为了中国不再出现类似的灾难。

对我来说，在所有教训中，最深刻的教训是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

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好像是一个常识，一个最浅显明白的常识。可是，恰好在我的日记中，在我的青春信仰中，成为好人的路只有一条：在大千世界里，在茫茫人生中，只有一条路才能让人成为好人，这就是“听毛主席的话”。

从我上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要当好学生，就必须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就不可能是好学生。

接着我知道了，要当毛主席的好少年，毛主席的好青年，毛主席的好农民。我没有当过兵，做过工，但我知道如果当兵、做工的话，一个人就要当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工人。

我相信了这些。我相信了一个人要做好人，就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蒋介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不听毛主席的话，赫鲁晓夫、肯尼迪不听毛主席的话，他们不是好人；同学、亲戚、父母如果不听毛主席的话，也不是好人。

好人自然要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可如果对不听毛主席话的人善良，善良就会变成罪恶（对敌人的善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如果在坚持和毛主席不一样的话上正直，正直就成了“死不悔改”；如果不是为毛主席努力，不是为毛主席负责，那就走到了反面，反而会成为危险的坏人。

十八岁的时候，我坚信这一切，我的日记渗透了这样的信念。

那时候，我希望自己是个好人，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

又过了两个十八年，今天我认为自己是好人，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可我

不同于自己十八岁时所想象的“好人”，因为我今天认识到了：成为好人的路不至一条——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

如果毛泽东是好人，听毛泽东话的人是好人；那么，不听他的话的人也完全可能是好人，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

是的，毛泽东可能是好人，蒋介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赫鲁晓夫、肯尼迪也可能是好人。

如果说我自己十八岁的时候听毛主席的话是好人，那么，今天我不听甚至反对他的话，我同样会是好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才是好人。如今所有人都承认，当时的保皇派、逍遥派都可能是好人，而造反派也有许多不好的人。

今天我明白，一个孩子是做爸爸妈妈的好学生，做班主任老师的好学生，做共产党的好学生，做耶稣基督的好学生，还是做孔夫子的好学生，她/他都能成为好学生。

今天我明白，一个人不管是革命还是不革命还是反革命，都能成为好人。

今天我明白，仅仅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还不足以成为好人。一个好人必须同时认识到，自己成为好人的路不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成为好人的路。一个好人同时还必须宽容，必须让别人有走别的道路的自由。

今天我明白，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主义的路，完全可能让一个人成为好人。但是，把它说成唯一正确并且强迫别人走这条路，则不应当是好人所为。同样，把爸爸妈妈的话或者老师的话或者耶稣基督或者孔夫子说成唯一正确并且强迫别人相信的行为，也不应当是好人的行为。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让别人选择最适合她/他自己的道路。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在担心别人选错路的同时，也让别人担心自己选错路。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相信和自己不同的人也能成为好人，也是好人，那就互相尊重、互相宽容、互相自由。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放弃强迫别人走自己道路的专制和暴力，从家庭开始，到单位、到地方、到国家、到全世界。

我希望，我的青春日记，我在那个不但为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其实也为 1949 年、1965 年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时代写下的日记，能让我自己和其他读者更加尊重别人的观点、别人的道路，使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社会更加宽松、更加自由。

2007 年 4 月 22 日

我的青年日记 I

（1971年1月27日——1971年5月15日）

注：

1968 年，在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从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来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坛大队建华生产队（现改名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凤坛行政村建华生产组）。从那时起到 1977 年，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农民生活和劳动。就大的政治和文化形势来说，那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68 年）基本结束、思想革命化或者说文化法西斯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在那一阶段达到顶

峰后，又继续向社会基层结构扩张和向人的心灵渗透的时代；从经济形势来说，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和物质匮乏的时代，是一个农民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够获得基本物质生存资料的时代。

我在农村生活的年龄是 15 岁至 24 岁。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下了一些日记，估计超过 50 万字。现在，部分日记已经丢失；尚保有的日记，有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一些纸页已经粉末化。为了保存这些个人历史记录，谨打印于此。

这里刊登的我从 1971 年 1 月 27 日到 1971 年 5 月 15 日写下的日记。按照过去某个时候的整理，它应当是那时保存的第四本日记。如今它是还保存着的第一本日记。

在打印这些日记时，没有对原文做任何修改，也没有对文法错误或内容难以理解之处做任何解释或附注。考虑到这些日记所记载的人、事已经过去 30 多年，所以对涉及的人、事，没有做任何“避讳”性质的修改。

不过，这里的打印文件可能存在个别打字错误。

2006 年 7 月 28 日于上海

1971 年 1 月 27 日

很凑巧，新的一年日记，从新的日记本第一页记起。

春节，是我国人民传统的节日，它预示着春天的来到。

哥哥今年不回宁了。寄来一封信，内有一段，也很能表达我的心意。他说：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新年佳节里，我也不由得遥望南天，浮想联翩。我们全家六口人，分居五处，你们和我虽相距四、五千里，但心却相连。尤其我们兄弟姐妹，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广阔天地里，处处受到党和人民的教育和关怀，时时在进步中，是深引骄傲的。我们的一生都交给党和人民来安排，一切都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的前程必将是光辉灿烂的。想到这些，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1 月 28 日

关磊于二十五日回宁，今天来我家玩玩。下午，从内蒙回宁的沙震国、严圭、周铮，接着章铮也来玩玩。下晚，我亦去房守为家玩玩。

上午和关磊观看了东方红路画廊。画廊里展出了我国一片大好的国内形势和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最引人久久不肯离去。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靠毛主席领导，每一步路都靠毛主席指引。你看：去安源，会井冈，到北京，毛主席率领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披荆斩棘，推翻了三座大山，烈火中诞生了新中国。你看，从开国大典，到国庆二十周年，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高饶联盟的失败，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破产，从八大到九大，新中国的每一步，都是毛主席指引，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是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是工农大军最伟大的统帅，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人寄予无限的希望，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

1 月 29 日

下午到人民公园参观了“井冈山的斗争”展览，瞻仰了“毛主席诗词”展览。毛主席诗词展览馆展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诗词，充分表现出：毛主席不仅

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最伟大的诗人。

《井冈山的斗争》展览展出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井冈山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亚、非、拉各国人民已纷纷走上这条道路。

晚上到小学同学刘维维家玩玩。他现在南京煤气公司，情绪很好。

南京现在工业战线形势大好。九四二四工程第一期已完成，西钢出铁，储气柜只用六十八天就造好了，开创了煤气工业的先例。郊区又发现了石膏矿。工业战线正在大跃进。

1月30日

上午到彭士林家，下午到沙声平家，又遇关磊与老杨来找，大家谈谈农村情况，都表示在七一年要大干一场。

批判刘少奇反对、诋毁“井冈山道路”的反动谬论。井冈山道路，即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对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大发展，是毛主席对世界革命的伟大贡献。它比十月革命斗争形式更具有普遍意义。

可是，大叛徒刘少奇却说什么：不管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先城市后农村，都能取得胜利。这是刘少奇反对井冈山道路的铁证。

在中国，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井冈山道路，还是走先城市后乡村的道路，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老修正主义激烈斗争的问题，这两条道路，只有一条是对的，根本不像刘少奇所说随便哪一条都行。刘少奇这种说法的罪恶目的有二：1、树立他的威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井冈山道路是毛主席亲手开辟的。而刘少奇害怕艰苦，不愿到山区农村去，躲在大城市里，搞什么白区斗争。刘少奇一直企图把白区斗争凌驾于武装斗争之上，拼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2、破坏世界革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像中国这样的。在这些国家里，农村是极其广阔的，而阶级敌人势力较小，城市较少，资产阶级势力较强，所以，革命政党必须以乡村为中心，在乡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能取得胜利。刘少奇却要把革命政党拉回城市，让他们迷醉于议会斗争，罢工罢课，而不能最后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押上了历史审判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真理已深入人心，各国人民纷纷走井冈山道路，到处点燃了井冈山的烽火，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广。

1月31日

房守为同志在农村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于昨晚才回宁。今天上午到我家来玩，和他谈谈。

晚吴宗宁来找，谈谈农村情况。

浙江省新省委顺利诞生。南萍同志任第一书记。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社论着重提出了路线和作风问题。路线问题决定一切，我们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风是路线和世界观的反映，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保证。当前主要任务是反骄破满。

2月1日

上午整顿内务，决定带本《农业基础知识》回乡，要搞些科学实验。

下午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学习方法》、《鲁迅和他的教导青年的话》还给彭士林，接着回乡。

南京搞五大会战，钢铁要在五一出焦、出铁、力争出钢，；煤炭，做到日产千吨；石膏，五一完成初期工程；一酸（硫酸）二碱（烧碱、纯碱），还有长江护岸工程。南京，即将以一个工业城市屹立在扬子江畔。

2月2日

今天上中心河水利。中心河搞好后，我队就不怕水患了。

生产队决定把我调回队，我反正到那里都干。

我们全家六人，分成五处，我和哥哥、姐姐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于六八年分别到了牧区、农场、农村。接着，父亲又在七零年下放到江浦农村。我们是为革命而离开的。虽然彼此想念得很，尤其是父母，更是十分想念我们三个孩子——当然他们也是支持我们在农村干革命。我觉得我们应做的，一方面是从政治上开导他们——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用革命大义使他们放开眼光，振奋精神，让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于革命的利益，个人需要服从于革命的需要。另一方面，经常给他们以安慰，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使他们放心，让他们心情愉快，在经济上更要尽量照顾他们。我们应当坚决抛弃资产阶级“人情论”，但同时又要防止极“左”，对属于敌我矛盾的父或母，要在政治上划清界限，经济上还要给予照顾，这就是我的态度。

2月3日

为了迎接县革委会组织的大检查，今天不搞水利，各队回去搞田管。上午挑水粪；下午打垡子。

挑粪时觉得右边肩膀突出的骨头经不住压。原来，我总发觉农村不少贫下中农是左肩高、右肩低，并也知道这是担子压的缘故。现在我亦要出现这种情况，这虽然是不可怕的，但应该注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可能情况下应该注意。

2月4日

挑一天粪，现在是不怕苦、不怕伤的时候了，咬牙干吧。现在正是农业学大寨的关键时刻，不能怕苦怕累。

关磊下午回来。南京正在办知青学习班，要破获一起破坏上山下乡的案件。并查揪中学的五·一六分子。

今天立春，预示着春天来临，农活即将转忙。我应做好准备。

2月6日

挑母液水浇麦子。由于天旱，麦子返青不好，各地都正在抗旱。生产队号召社员每个劳力都搞一百斤肥。这是争取农业丰收、降低农业成本的很好措施。去年由于买了不少化肥，农本很高。如果像这样搞群众运动，缺肥问题就能很好解决。

印度支那局势现在十分严重。尼克松早就口口声声的念“结束战争”，但实际上却加紧扩军备战。一月二十九日，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公开叫嚷要在印度支那无限制地使用空军力量，并为使用核武器打下伏笔。泰国反动部队在美帝指使下入侵老挝，大量美国侵略军和西贡伪军也将进入老挝，美国的飞机直接参加柬埔寨战斗。看来，美帝是想孤注一掷。但是，与尼克松的意料相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今天，全世界人民空前觉悟，印度支那民族解放力量空前强大，美帝在谈判桌上骗不到的东西，在

战场上同样也得不到。如果它铤而走险，只会导致自己的彻底灭亡。

2月7日

今天是震撼世界的京汉铁路大罢工 48 周年。二·七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表明工人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位置。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人阶级团结起最广大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终于成为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万岁！

《红旗》杂志发表短评《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文章指出：坚持认真读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基础，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这说明，坚持认真读书，并不是什么书呆子，而是要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文章要求我们“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中发生的实际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给以理论的说明，这其中也包括思想问题。这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澄清了头脑里一些糊涂思想。今后，我应加强学习，尤其要注意学习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

2月8日

浇了一天油菜。晚上到老顾处玩玩。我们队今年茬口布局已出来，准备栽 45% 多一些双季稻。

谈谈当前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央二十号文件传达后，各地都掀起了围歼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高潮。南京也揪出了不少。现在，中央特别强调努力学习，分清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五·一六分子惯用的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从极“左”方面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主席指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六十年代最大的隐患，就是因为它能迷惑人，吓唬人，使人分不清真假。现在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顽固地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运动的最大敌人，就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实际上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人虽少，活动能量却很大，像王关戚林等都混进了中央文革。吴传君、潘梓年等在六六年到六七年初一段混得也很出名。在六七年九月，姚文元同志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就点了“五·一六”的名。现在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继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为了夺取彻底胜利的一次重大战役。

2月9日

《新华日报》发表了新沂县住行大队党支部的文章《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介绍了新沂大队用毛主席思想教育人的经验。农民，是勤劳朴实的，是社会财富创造者，但又由于他们是小生产者，以前长期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所以眼光比较短，容易满足。学大寨，不但生产要跃进，首先要搞人的思想革命化，要把人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一代新农民，这是最根本的。改造农民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我们知识青年，应该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来要求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如果把自己混同于老一代农民，那就违背了接受再教育的目的，不但不会作为革命的动力来推动历史的前进，而且往往还会成为历史的惰力。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跟老一辈农民所处的时代不同了，在他们的时代，产生小农经济是自然的，资本主义倾向到处泛滥也是不奇怪的。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的今天，想成为一个老式农民，

整天埋头苦干——但却是盲目的，或是为私的，不问政治，不想前进，不想革命，那实际上就是想把历史车轮拉向倒转。这种倾向也是值得我警惕的。前一阶段，我头脑里就经常出现不问政治，一心只想挣工分思想，我有时还强调外因条件造成了这种思想，殊不知，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我要坚决抛弃不抬头看路的思想，“关心国家大事”，为革命种田，用革命精神种田。

2月10日

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今天在南京开幕了。这是我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喜事。

许司令出席了大会。吴书记在会上作了报告。来自全省各地的三千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将把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像这样的大会，只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才能召开。文化大革命前，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猖狂反对和压制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说这是什么“庸俗化”、“简单化”、“形而上学”。刘少奇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开支持现行反革命，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

“庸俗化”、“简单化”的谬论不值一驳。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最高级的，是最宝贵的精神。只有刘少奇一伙，贩卖其《黑修养》之类，拼命维护资产阶级，才是最低级、最庸俗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应用于革命实践，是最伟大、最光荣，同时也是最艰巨的事业，这是要费很大气力的。只求简单、不费气力，只会滑到刘少奇一伙宣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上去。庸俗只能属于刘少奇一伙，他们的思想也是庸俗的。刘少奇谩骂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庸俗化”、“简单化”，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本性。如果广大革命群众都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那么，刘少奇就会陷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被彻底埋葬。所以，刘少奇非常害怕群众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想尽心机破坏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

历史车轮不可阻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风暴，摧毁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打翻在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以空前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且将越来越广阔、深入。

2月11日

学习了空军积极分子韩玉芬的文章“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谈了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体会，很能给我以启发。这篇文章准备好好学习。

今天下雨，把粪坑做好。一直忙到很晚。我觉得，这次百担肥运动，对我队来说，可以算一次广泛的群众运动。而且它可以说是一个第一个圆满成功的运动。意义是较大的。

2月12日

我国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是我国和非洲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今天晚上，我们队青年政治夜校正式开学了。我们队不少青年是不识字或识字不多，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兼识字，还是很好的。

2月13日

今天上午冒着小雨和泥，下午雨较大，就在一起办青年政治夜校。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时事政治。

现在，国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当代世界四大矛盾，尤其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已经面临白热化地步。美帝国主义竟然出动大批美军和西贡伪军侵略老挝，增派西贡伪军侵略柬埔寨，并提高美军参加柬战的程度，在越南，美帝阴谋发动对北越的突然袭击，它还妄图在印度支那使用核武器，泰国军队也在美国指使下入侵老挝，印度支那局势十分严重，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坚决斗争，已经取得很大胜利。拉丁美洲国家保卫领海权的斗争已获初步胜利。石油输出国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控制的斗争正在进行，非洲独立国家更加团结一致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国际形势大好。

2月14日

响应我国政府二月十二日声明，首都五十万军民今天走上街头，南京也有二十万军民，强烈声讨美帝在印度支那犯下的侵略罪行，全力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直到取得彻底胜利。表明，七亿中国人民誓做五千万印度支那人民的后盾。

学习了顾阿桃老妈妈在省首届积代会上的发言。顾阿桃老妈妈解放前受尽了旧社会的剥削压迫。解放后，她翻身当了主人。顾妈妈不忘阶级苦，所以她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着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她不仅自己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且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像顾妈妈年纪这么大，又不识字，而毛泽东思想却学得很好，用得很活，我年纪青青的，通文识字，却不能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自己对毛主席著作缺乏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没有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力量和转化出来的物质力量。不是“我要学”，而是“要我学”，不是主动积极地怀着强烈的改造自己的要求学，而是被动地为了装饰自己而学的。总之，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世界观问题。老三篇是改造人们灵魂的根本武器，顾阿桃老妈妈就是在努力学用老三篇的过程中成为积极分子的。我亦要如此。以老三篇入门，努力学习老三篇，暂时放下一些书，集中精力学习老三篇，改造世界观。

2月15日

大队下午开了社员大会，反骄破满，农业学大寨。革委会主席储道生在会上讲了话。七一年，是大跃进的一年。今年，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大队今年计划增产六十万，我们队要增产四万多。任务是较艰巨的。但是，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定能完成。

看了《仇恨的火花》。很感动。工人、贫下中农、少数民族同志、革命干部、文化工作者等都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例，控诉了在旧社会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的苦。我看过几次，但都没这次这样。若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今天还不知怎样，或者去压迫人民，成为历史的罪人，或者被别人所压迫，成为会说话的牛马。毛主席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得我们才有今天这样的生活。毛主席亲手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这个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主观和客观，才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要靠毛泽东思想指路。归根结蒂，我要努力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认真地改造世界观，才能对得起伟大领袖毛主席。

2月16日

服从分工，今天又重新上林业队。原先我不愿去，一则因路远，每天都很匆忙，家务事做不到。二则队里加班工做不到，又不靠工，工分少。更伤脑筋的是社员有意见，说快活啊等等。怎么对得起这些事情呢？我觉得，第一是服从分工，“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对一些个人意见，求大同，在林业队，我要好好干，主动挑重担子挑。有时间干加班就干，家务事抽空干，养成雷厉风行的作风。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而我到林业队不过两三里，与白求恩比起来，我的这些思想就显得极其渺小。总之，到那里都是干革命。

林业队又添了几个人，总人数将达二十五人。林业任务也是很重的。今春要大搞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2月17日

继北京举行声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美救国斗争的示威游行，南京、沈阳、南宁、上海、武汉、昆明、西安、广州、天津、重庆、兰州等地都有十几万至几十万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它使美帝胆战心惊，使革命群众欢欣鼓舞。

晚上在林业队学习了“六十条”和“四十条”有关林业的部分。生产队也开了发红旗大会，每个粪坑插上一个，表彰贫下中农为革命积肥。

2月18日

省首届积代会十六日胜利闭幕。杨政委在会上作了讲话。省委决定表扬四十个先进集体和十二名先进个人。并号召全省人民向他们学习，我一定要响应省委号召，努力争取做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公社开了以实际行动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斗争的大会。会后到我队参观。我队农业学大寨虽然前进了一步，但还是很差，对国家贡献还小得很，要反骄破满。

2月19日

上午挑水粪，下午修路。一开始，我因没有挑粪爬过盘陇山，头一担害怕挑不上山，想少挑一点。但想起老愚公移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雄壮声音就在耳边回响。我想，只要下决心，一定要挑上山，学大寨出点力，就能不怕腿酸肩膀疼，而达到目的。结果挑一担粪，似乎也没经过多大困难就上山了。从这里，我尝到了一个甜头，只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用老愚公的榜样鼓舞自己，就能不怕困难，战胜困难。洪泾人说得好：“学习老愚公，遇到困难朝前冲。”以后，只要遇到类似情况，就要学习老愚公。

发现了一个极其糟糕的问题，就是连老三篇也不能熟背，这就不能保证随时都能学用老三篇。首先，要学会背老三篇。

2月20日

今天早上下雨，思想麻痹。直睡到近八点。明知林业队要上工，不想去，想在队里拿开会工。若不是后来别人拉，还不得去林业队。去了林业队也迟到了。现在想想，还是怕苦情绪作怪。为什么一再反怕苦情绪，而又一再重犯？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发生作用。世界观问题是根本问题。如果不注意改造世界观，不注意把错误言行提高到权、线、观上，那么，虽然错误言行好像被克服了，但根子没挖，还有重犯的可能。怕苦情绪批了好几次，但没上纲上线，所以一直怕苦情绪都在作怪。

学大寨，就是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命干，加油干，出大力、流大汗。林副主席提出的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中也指示要有很大的革命干劲。而大叛徒刘少奇却宣

扬什么“要钟爱自己”，鼓吹“活命哲学”，这对我毒害很深。“钟爱自己”，就是把自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要让革命利益服从个人利益，也就是鸠山说的最高信仰，“为自己”。如果大家都这样，就谈不上革命，谈不上全民，谈不上集体。“钟爱自己”，也是怕苦怕死，畏首畏尾，只想维持现状，不敢大胆革新，只敢渐进，不敢革命。“活命哲学”，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是学大寨的一个顽固的绊脚石。

今后，这类事再也不能发生。要大反怕苦畏难思想。大批资产阶级世界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

2月21日

今天，镇江专区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王克非主任讲了话。省革委会负责同志也讲了话。会议一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晚上，开了会。公社武装部吴干事讲了话。一大三反运动的标准是看你拥护还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专政。对敌斗争政策是二十七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究。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具体是：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隐蔽是不能持久的。你不讲，别人也要讲，攻守同盟是不行的。坦白比不坦白好，早坦白比迟坦白好。

2月22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大会选出了新区委。韦国清同志任第一书记。

下午下雨，学习了河南鄢陵县绿化经验。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今年栽的树就少得说不能起来了。还要努力作战。

2月23日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光辉指引下，甘肃省召开了第五届省党代会。选出了新省委。洗恒汉同志为第一书记。

晚在煤矿看了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无产阶级的英雄代表杨子荣的高大形象时时激励着我。把杨子荣的一段唱词录下以供学习：

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拣重担挑在肩。一心要砸碎千斤铁锁链，为人民开出了万代幸福泉。明知征途有险艰，越是险艰越向前。任凭风云多变幻，革命的智慧能胜天。立下愚公移山志，能破万重困难关。一颗红心似火焰，化作利剑斩凶狂。

2月24日

栽了一天树。晚上学习了北京鼓楼中学军宣队的一位同志的忆苦报告。这个报告虽然已听过，但一次比一次更感到无权的痛苦、有权的幸福、失权的危险，保权的重要。旧社会没有权，劳动人民吃尽万般苦，受尽万般罪。大救星毛主席把广大劳动人民从火海里救了出来。今天，权掌在人民手中，就要把他紧紧保住，不让阶级敌人篡夺。尤其是作者文章最后的几段话，更引人深思。如果我们不紧跟毛主席，拼命干革命，能对得起他老人家吗？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一定要革命千秋，保住江山万代红。

吴干事讲了话。他特别提到出身不好的同志要与家庭划清政治界限。我是不背家庭包袱的。出身不可选而道路则完全可以自己选择。我总要注意，一定要走毛主席指

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2月25日

上午栽树，下午挑母液水。接着又浇桑树。开始我打算是不比别人少挑就行了。在挑水过程中，我发现，由于种种原因，要想大家都挑的一样多是不可能的。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应该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能多挑就多挑，尽自己能力干。“不比别人少挑就行了”的想法还是怕苦畏难思想的反映。这种思想一定要批判。

学习了《新华日报》刊登的四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文章。它着重谈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面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的问题。写得很好。也批判了我头脑里的一些极“左”的东西。

2月26日

上午浇母液水，下午修路。县委组织公社与公社对口大检查。下蜀、亭子公社与县委负责人检查了我们队，要求我们反骄破满。

下午有人竟替刘少奇翻案。虽然他可能是无意识的。竟说对刘少奇一分为二，有反革命一面，也有“革命”一面。我说，对刘少奇一分为二，是他有反革命一面，还有假革命一面。他是纸老虎，在大批判中首先要藐视它，同时又是铁老虎，还不容易批判它，要重视。有人又提出为什么他能爬这样高。我认为，这表现了我国阶级斗争的复杂。刘少奇原来也似乎做过一些“好事”，但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为了掩护自己。这个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啊！

2月27日

拖砖，下午公社开了广播大会。杨主任传达了镇江专区党代会的精神。王司令在报告中谈了专区在社教、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总结了经验。最后要求我们努力学习，加强团结，认真改造世界观，认真搞好斗批改。

杨主任向全公社公布的最近发生的一起署名为“操为”的反革命通谍案。要求全社革命群众迅速行动起来，打一场人民战争。

柬埔寨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由叶剑英同志陪同，下午从无锡到达南京参观访问，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2月28日

听了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文件，反骄破满，文件指出，要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立新功的观点。及大破骄傲自满情绪，大立谦虚谨慎作风。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我一定要牢记。

晚上搞了四类分子评审。对评审有几项政策。

(1) 摘帽子九种人必须做到以下几条：

- 1、拥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 2、能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 3、老老实实遵守政府法令；

- 4、低头认罪，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
- 5、在历次运动中无破坏活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2) 在评审中要注意区别的几个问题。

- 1、把一般地不满、偶尔说错话、做错事与有意识地宣传封资修，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区别开来；
- 2、把有借有还、应还没还与复辟倒算区别开来；
- 3、把九种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与不参加集体劳动的，逃避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区别开来；
- 4、把小偷小摸与一贯盗窃区别开来；
- 5、把出卖自己东西、少量贩卖与投机倒把区别开来；
- 6、把一般事故、技术事故与有意破坏区别开来；
- 7、把历次运动中的错案、错定与那些不低头认罪、搞翻案区别开来。

(3) 对九种人经济政策。

- 1、反攻倒算回去的一律退出；
- 2、贪污盗窃国家、集体、群众的财物及一切不义之财一律退赔；
- 3、私分国家、集体的财产一律退赔；
- 4、搞投机倒把的按照政策处理。

3月1日

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农业新丰收》。社论分析了当前全国农村的一片大好形势，提出了夺取农业生产第十个连续丰收年的光荣任务，并特别号召我们知识青年，投身于蓬蓬勃勃的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新的战斗号令。我一定要坚决响应，为革命不怕苦、不怕死。

上午拖瓦。晚上下了大雨，没有回家，就在林业队睡了。聊聊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形，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深入的继续，是清理阶级队伍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从三年暂时困难起，经过社教、文化革命、整党、清队等运动，并没有真正触及到每一个农民的灵魂，也没有真正解决农村社、队，尤其是大队、小队领导班子问题。这次一打三反，比以往运动更深入、更广泛。几乎每个劳动力都被卷进去了。一打三反运动是保证农业学大寨运动健康向前发展的。

3月2日

上午冒着西风开荒，下午拖瓦。早上以为下雨，起得很迟，结果同志们都来上工了，我们还没吃饭。上工时，就发了一些怕冷的议论。说来说去，还是怕苦畏难思想在作怪。以后不能这样。早上要早起，学习杨子荣“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晚上看了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巴桑同志的忆苦报告《血泪的控诉》。想想我们今天所谓的“苦”，比起翻身农奴以前所受的苦，真是有天壤之别。早上那个西风，比起领主的皮鞭，真是有天壤之别。我们干一下活，到时就收工，而农奴却是整日整夜地干着比牛马还重的活，从没听说过“休息”。巴桑同志被领主婆打的皮开肉绽，寸米不进，还得冒着严寒到河边替领主洗尿布，这是什么日子啊！与我们现在的日子比，真是有天壤之别啊！和他们受的苦比起来，我们今天所谓的“苦”，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如果怕现在的并不苦的“苦”，就会受第二遍巴桑同志所经受过真正的阶级苦。为了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就要不怕苦，不怕死，革命加拼命，

拼命干革命。

3月4日

学习了浙江省勤俭大队贫下中农学哲学经验。摘录几条：

“毛主席辩论法是个宝，继续革命不可少”

“一分为二是个宝，对敌斗争不可少，贫下中农掌握它，头脑清醒斗志高”

“有矛盾就要斗争，有斗争才有胜利，如果用‘包’矛盾来‘保’先进，结果‘保’先进必然成为‘保’落后”

“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越学领会越深，越用效果越大”

“辩证法就是分析法，辩论法。越辩，是非越清，越辩，真理越明”

“带着一个问题，学习一个观点，明确一个思想，用出一个成果”

3月5日

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八周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用有限的生命在平凡的工作中作出了伟大的为人民服务的功绩。这是十分值得我学习的。我们天天都在干着平凡的事情，这是社会上最大量、最普遍、最平常的体力劳动。如何在这个日常劳动中自觉地为革命多做贡献，雷锋同志为我们作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我要学习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日常劳动、生活中，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言行，自觉地多做一点。

生病一天。到宝华医院配了点土霉素等药。给哥哥、姐姐各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在思想上多帮助我。

晚上看了《大寨之花遍地开》。毛主席亲手培育的大寨之花，已在全国辽阔的大地上盛开。学大寨、赶大寨，已成为全国农民的自觉行动。我国农业生产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迈进。

3月6日

上午去干活。下午地质队支援我们一辆跃进卡车，拖石头造蚕房。我们负责下石头带修路，一直干到黑。

学习了林豆豆的文章《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林豆豆不仅讲了写作问题，还讲了政治问题。林副主席对林豆豆，同时也是对我们青年谆谆教导说：“你们这些在新社会长大，没有经过大风大浪，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没有直接感受的人来说，（阶级斗争）是一门不可缺的基础课。希望你很好地到实际生活中去，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做永远的彻底革命派。”林副主席还指出，一个作者必须做到思想过硬、生活过硬、技巧过硬。我比较喜爱文学，对写作也很感兴趣。林豆豆的这篇文章是我学习的好材料。

3月7日

我们镇江专区第一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了。王克非同志当选为地委书记。在这以前，淮阴专区也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董铁山同志当选为地委书记。

今天下石头。在林业队吃了饭，也是干到黑。

晚上送老顾去火车站。谈谈生产队之事。队长到百丈大队参观，受到很大鼓舞。现在是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们生产队比百丈、三台阁等先进单位还差得多。不能有任何骄傲自满情绪，要谦虚谨慎，赶先进、超先进、多做贡献。

3月8日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这几天报上发表了许多妇女的英雄事迹。《新华日报》也发表了《妇女的伟大革命力量》社论。毛主席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妇女起的革命作用是非常之巨大的。我们要与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作斗争，充分发挥她们的革命作用。

上午挑水煮石灰，下午下石头。干了一天。晚上看了朱志亮同志英雄事迹介绍《红心贴在红线上》。朱志亮同志“毛主席叫我挑千斤，我决不挑九百九”的英雄气概鼓舞我，在革命工作中就要有这种精神，我要努力培养自己。

3月9日

陕西省第五届党代会在延安隆重召开。会议新闻又重新刊登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四九年给延安地区人民的复电。会议选出了新省委，李瑞山同志为第一书记。

上午把山芋下了炕。林业队往年栽山芋都靠买苗，今年要自力更生，自己育苗。下午挑水煮石灰时，我的脚有点疼，挑近处我挑了几担。后来到处挑，我先不想挑，准备用个钉耙在坑边搅搅。但我想起昨天晚上学习朱志亮同志事迹时，又觉得上一种想法不对头，脚疼怕什么，怕的倒是思想上怕苦畏难。于是我又挑起粪桶。

3月10日

由于脚疼，上午搬石头，下午也搬石头，给别人抬。我感到自己很对不起人，不能抬，换不起来。但我有一分力就出分劲，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应越南党中央和政府邀请，周总理为团长、叶剑英、邱会作为副团长的我党政代表团于五日至八日对越南进行了友好访问。越南党政领导人和革命群众无比热情地接待了我代表团。代表团访问成功是中越两党、两国人民友谊的生动体现。

3月11日

上午和下午都挖墙角。墙角挖的较深。整个蚕房工程将由公社建筑站来完成。蚕房造好后，将给林业队发展养蚕以方便。

今天发表了中越两党、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说：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也郑重宣布：“中国人民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地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如果美帝国主义沿着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一定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胸怀世界风云，立足本职革命。以实际行动，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斗争，直至彻底胜利。

3月12日

河南省第三次党代会隆重召开。刘建勋同志为第一书记。

上午把墙角清清。下午大队叫我们去短那些违背大队命令去扎柴的人的柴。一直搞到七点钟。一开始，我是带着想替林业队搞点柴的想法去短的，但后来决定把柴还给群众而去找干部打通思想时，我就没有热情了。想想这完全是小团体思想作怪。有了这种思想，就只从狭隘的小团体出发，不顾大局。以后不能再有这种思想。什么事都应该从大局考虑，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3月13日

上午挑水粪。下午倒荒。原先我想自己脚疼，就找点别的事干干，甚至歇歇算了。后来又学习了朱志亮事迹。朱志亮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处处拣重活、脏活干。毛主席号召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为什么一见挑粪就不想干呢，这是怕苦的思想。贫下中农天天干重活，可是今天挑粪还是踊跃参加，没有人想休息，可是我却想歇歇，这种想法实际还是种田为自己，把参加劳动看成是高兴就干，随心所欲。而没把参加劳动看成是自己的责任，是为革命，为毛主席作贡献。我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脚疼算什么。我要在集体生产劳动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自己。

3月14日

青海高原又传来一个喜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下，青海省第五次党代会隆重召开，会议选出了新的省委。刘贤权同志回到青海任第一书记，张江霖同志为第二书记。各族群众的杰出代表参加了领导班子。

蚕房正式开工。干了一天小工，抬了不少大片。下午想自己脚又没好，又抬了一些，该别人抬了。这种思想一露头，我就想起昨天挑粪的事，不能怕苦，应该拣重担子挑。抬了一下午，也没什么。尝到了甜头。

《新华日报》发表了海门县大兴公社中兴大队的调查报告之一《用毛主席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章着重讲了如何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农民。生产建设首先要搞思想建设。搞物质首先要搞思想，搞精神。我们不但要注意物质成果，尤其要注意精神成果。在一定条件下，思想决定一切，精神决定一切。人是决定的因素。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教导，抓紧思想教育，提高人的思想水平。

3月15日

中央开了八十三天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现在逐级传达了精神。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又可能上去，现在倒要警惕，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翻。”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是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组织工农大跃进。要把冲天干劲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我国工业产值比任何一年高，三线建设进度加快，国防建设超过最高水平，第二颗卫星又上了天。小土群工业大发展，财政收入大余钱，文教战线形势很好。政治思想战线开展了全国性的反骄破满、批修整风。工业要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这次大跃进要做到有数量、有质量、高速度、高标准、有干部、有群众。并提出了大跃进要四靠：一靠毛泽东思想、二靠六亿人民，三靠大寨精神、四靠党的政策。总起来说，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3月16日

上午抬土填墙角，下午大队开了下放人员会议。会上学习了《红旗》三期登载的一篇关于办好五七干校的文章，并进行了讨论。大队周书记讲了话。他要求我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改造世界观，反骄破满、不断前进，争取今年当个五好社员。

因为林业队要干晚班，我散会后径直就到了林业队。当时我想在房子里歇歇看看报，等大伙收工后吃过饭再干。但我一拿起报，看到中兴大队调查报告之二上贫下中农的英勇事迹，立即感到想法不对。贫下中农正在为革命出力流汗，而我却要歇歇，

这种想法是怕苦思想，要批判。

但是，这种歇歇的想法似乎还有理由，即我已散会了，这半天的任务已完成了，工已拿到了，不干也没有人会说什么。整个理由其实是不值一驳的。是“种田为工分”的思想，岂但种田为工分，开会也是为工分。半天工拿到了，半天任务就完成了，就能歇歇。和贫下中农比较起来，他们每次开完会都往田里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劳动是为人民服务，开会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应该像王杰同志那样：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没有什么报酬可要求。要工分，一切为工分，是资产阶级追求发家致富的思想。这是腐朽的思想，必须彻底批判。这种“理由”要彻底批判。我应向中兴大队贫下中农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彻底批判“种田为工分”的思想，牢固树立种田为革命的思想。

3月17日

三月三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在从三日到十五日的十三天中，卫星成功地发回了各种科学实验讯号，现还在进行。

今天，是我实足十八周岁生日。十八年来，我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中，靠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靠着党的关怀，靠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培养，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接受贫下中农教育，逐步长大，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大路。现在，我已经达到了入党年龄，达到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年龄，我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铁梅说：“年龄十七不算小，为什么不能帮助爹爹操点心，好比说‘爹爹身上有千斤担，铁梅呀，也要挑上个八百斤’。”我年龄十八更不小了。毛主席对我们革命青年寄予无限的希望，她老人家说：“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展望未来，前程无限光明。形势在发展，人民在前进，我们肩上的担子是很重要的。为了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一定要更好地学习，更勇敢地奋斗。

3月18日

今天，是伟大的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共分六节：1、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2、革命人民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3、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4、要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5、现代修正主义是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叛徒；6、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百年前，在俾斯麦军队和梯也尔政权的反革命进攻面前，巴黎公社的工人阶级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进攻，用暴力革命撵走了梯也尔。经过著名的巴黎公社选举法选举，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公社的原则是什么呢？即是马克思所总结的：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阐述这个原则时着重指出：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必须首先在战场上争得解放的权利。这个原则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必须遵循的，是普遍真理。

3月19日

上午倒荒，下午做小工。以前我的迟到现象较多，但还觉得自己时间紧，迟到难免。今天中午原想自己没做小工，不需要十二点半上工，迟点不要紧。吃饭时翻开最新指示。毛主席教导说：“世界上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我下乡接受再教

育，就要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而中午一般小工又较紧。我吃饭后就赶紧上工去了。

“迟到难免”论是错误的。时间紧，忙，是客观事实。既要革命，就不能怕忙。一辈子为革命而忙忙碌碌，是革命者的本色。革命，这个词本身就向我们说明：它没有任何逍遥自在，懒散空间的意思。个人的事虽然较多，但再多也不应妨碍集体的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只能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决不能相反。而迟到，就是要集体利益服从个人利益。迟到，还会使自己的组织纪律性受到损伤，并会颓废成无政府主义。这个问题不能小视，一定要注意，今后不能迟到。

3月20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战斗在毛主席身边的北京市广大共产党员，选出自己的杰出代表，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了新市委。率领北京一批干部正在延安改变陕北面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同志兼任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为第二书记。大会总结了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晚上开会。生产队将去十五人到仓头修建龙镇公路。这条公路修好后，将使交通运输更发达，并促使工农业更大跃进。

收到姐姐的信。她现在深挖5·16小分队，搞运动忙得很。她要求我注意反骄破满，谦虚谨慎向前进。

3月21日

收到哥哥的一份信。中央发了十一号文件，重申对内蒙的全面军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肯定了军管后的大好形势和解放军三支两军的成绩，严厉打击了一小撮妄图扰乱内蒙前线局势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发展了内蒙大好形势。现在，各级革委和党组织正在整建。自治区第一把手滕海清犯了扩大化错误，现在由吴涛同志负责革委会工作。无锡的二十七军也到了内蒙河北一线，内蒙形势越来越好。

哥哥还讲了内蒙知青状况。最后，他对我说：“今天是你十八周岁生日，这表示你已长大成青年人了。愿你青春壮志，凌云高飞，做伟大时代的中流砥柱。”

3月22日

又接着做了一天小工。晚上到东阳看了电影。看了砀山梨丰收和畜业发展的新闻简报后，感到全国到处都在大跃进，并到处都获得了大丰收。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紧紧跟上形势。

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将把知青调往三线。还没证实。我反正抱着“一生交给党安排”，当真有这回事，那我立即报名，奔赴新的战场。毛主席还在五五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出了移民垦荒的任务。把沿海的人口向内地疏散，到内地搞垦荒建设，这是一直在进行的工作，并不奇怪。不管到哪里，青藏也好，新疆也好，云贵川也好，内蒙也好，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出发。

3月23日

又做了一天小工。做小工，并不能算苦。有时想想，这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山河啊。改变面貌并不能也不会像神话描述那样突然产生的，而是靠一砖一瓦，一锹一锄逐步完成的。现在，我们在这原是坟堆窝的窑头上建起了五座房子，以此为开端，今后又会造出多少房子啊！这样想，也就并不觉得怎样苦了。

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茶缸里的米不知怎的泼在地上，但我见到了却不管。一直等了两天。队长今天向我提出了批评，会计夏后济并讲了过去没粮的苦。他们语重心长的教育我要爱护每一粒粮食，节约每一粒粮食。我一定要注意。古人就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确实是这样。每一粒粮食都是贫下中农战胜了各种灾害后好不容易才拿到家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爱护、不节约呢？我应该向贫下中农学习，节约粮食，节约闹革命。

3月24日

《红镇江报》发表了在内蒙呼伦贝尔草原落户的天津知识青年张勇的英雄事迹。去年八月，十九岁的张勇在为抢救生产队落水羊群时英勇牺牲。

张勇在插队一年多的时间里，虚心地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迅速成长。贫下中农（牧）看他对毛主席无限忠诚，给他起了个蒙族名字“乌思琪”（忠诚）。

我要向张勇同志学习。张勇说：“接受再教育，要在主动、自觉上下功夫。”主动、自觉，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不容易。张勇同志是做到了这一点，而我在这一点上却差得很远。许多事情，没有主动地贫下中农请教，自以为是，要贫下中农批评才能改正。甚至贫下中农说的话，做的事，也以为是他们应该做的，而不知道他们正在以实际行动给我们教育。没有自觉地拜贫下中农为师。这个问题很大。下农村只是环境的改变，如果不自觉地接受再教育，那下不下农村还不都是一样吗？这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我一定要向张勇同志学习，主动、自觉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谦虚谨慎向前进！

3月25日

给房守为同志写了封信。谈了我对参加农业劳动的点滴看法。我以为不参加劳动，就是许多知识青年颓废的根源。

上午林业队叫我上街买点菜给拖拉机司机吃。而我上街拖了个把小时，却没买到什么东西。回来受到批评时还强调原因。想想这完全是错的。叫我上街，是对我的信任，而我却辜负了贫下中农，事情如此，那就接受批评吧，可是我当时却不愿接受批评。这是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思想作怪。小资产阶级爱面子是一种很坏的思想。有了这种思想，就只愿听表扬话，不愿听批评话，只能升，不能降，最后，就会导致害怕批评，拒绝批评。我一定要抛弃这种错误思想。

3月26日

《红旗》三期发表了北京大学“闻军”的文章《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这篇文章批判了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的反动的“国防文学”。

“国防文学”是三十年代，窃取左联党领导的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迎合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提出的一条反民族反革命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当时文化战线上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口号。而鲁迅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针对“国防文学”这个反动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这两个口号的论争，就是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解放后，窃踞中宣部和文化界负责人的“四条汉子”在刘少奇的庇护下，利用他们篡夺的一些宣传工具，贩卖他们的那一套，反而把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革命口号说成是错的，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直到六六年江青同志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才把这个案翻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过去在学校中，我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周扬一伙的影响较深。我看的书也比较多，除了古书与外国书外，本国一般的小说和戏剧、电影的书，都有周扬放的毒在内。我也比较喜爱文学。因此，我要很注意文艺界的大批判斗争，学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学习文艺界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批判“四条汉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肃清在我头脑里的影响。

3月27日

上午做小工和泥，下午做小工。中午公社开了林业广播大会，要求在林业战线掀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晚上扎芦柴至九点。

午饭后写了首诗。我对汉语拼音不很懂，也没学过诗词格律，仅按五十六字写诗。即：无意一天日至午，阳光灿烂春光媚。已从诸师力教地，更应真义满头颅。草舍出得奋勇人，征途万里脚下始。犬吠之声何足奇，军车浩荡大路行。

3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热烈祝贺九号公路大捷》社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紧密团结、英勇战斗，终于粉碎了美帝“蓝山七一九”军事行动，在九号公路战场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

现在，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武装力量已经能整团整旅的消灭敌军，并像拍苍蝇那样打落许多直升飞机。这标志着，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印度支那人民解放的曙光已经映红半边天空。

跟拖拉机装了一天渣子。晚上学习了朱志亮同志的英雄事迹。我要向朱志亮同志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完成烈士遗留下来的任务而斗争。

3月29日

我国和科威特国经过谈判，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是我国和阿拉伯人民友谊的又一发展。

《“合二而一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一文发表。“合二而一论”是叛徒杨献珍在其主子刘少奇旨意下在六四年抛出来的，它集中的代表了唯心论的反动哲学，必须彻底批判。

上午扎芦柴把。因下雨下午生产队开会。老顾同志给我们讲解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对照白求恩，我差之何止十万八千里。今天，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纪念白求恩》，更感到亲切。我要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努力做到两个“极端”，努力争取做五种人，以不辜负贫下中农的期望。

3月30日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及周总理，今天打电报给苏发努冯亲王、西哈努克亲王、宾努首相、阮友寿主席、黄晋发主席、孙德胜主席、黎笋同志、长征主席、范文同总理，热烈祝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九号公路战场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吉林省第三届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选出了新省委。王淮湘同志为第一书记。

批判“合二而一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说：“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它无论对自然界、对人类

社会都是适用的。一分为二，就是革命的辩证法。

刘少奇在哲学界的代理人杨献珍，为了提刘少奇反革命政治路线提供哲学根据，竟抛出了反动的“合二而一论”。这种论点，就是只承认对立面的统一，不承认对立面的斗争。用这种观点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就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四个存在，就会接受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用这种观点来观察世界，就会看不到复杂激烈的斗争，而接受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合二而一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种“合二而一论”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流毒极深。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受“合二而一论”的影响。而且，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自发的就会产生，“合二而一论”不自觉的也会渗透到我们头脑。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合二而一论”，自觉的学习和运用“一分为二”辩证法，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武装头脑。

3月31日

上午上瓦，瓦上得较快。下午在魏村学习。公社批准了我大队下放人员每月集中休息一天，这是对我们的很大关怀。我们应该抓紧这个学习时间，好好学习。

今天学习了中央二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讨论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及在今天的意义。

会上谈到了扎根问题。看来，多数知青是没有扎根打算的——他们也坦率的承认这一点。自然，我没有讲话。但这个问题在我头脑中依然是存在的。下农村是个形式，扎根到底才是革命的内容。如果下了农村，但不想扎根，不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形式也是空的，没有收到真正的效果。

我的扎根首先从根本上说还是不牢的。如听讲有人分配工作就感到羡慕，有时回避扎根问题等。并用“一生交给党安排”来遮羞。一生交给党安排，是革命青年的革命壮志，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并到干什么就好好干，干出成绩，到那里就安心干，扎根钻研。现在党叫我们到农村，我们就应该安心地干，如果见异思迁，这山望着那山高，那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扎根农村干革命与一生交给党安排这两句口号并不矛盾。如果不扎根农村干革命，那就谈不上交给党安排。因为党安排你在农村，而你不扎根农村，那怎能说是无条件的服从党安排呢？我必须彻底批判见异思迁的错误思想，批判“读书做官论”和“下乡镀金论”，在头脑里先扎下立足农村干革命的根，在实践中，努力学习毛主席思想，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一年更比一年深。

4月1日

今天是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九大召开二周年。两年来，全国人民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继续革命，乘胜前进，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现在，党中央指示我们要深入批判叛徒刘少奇散布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个黑四论一直影响着革命生产的发展，在当前对黑四论展开大批判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看了彩色影片、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这部影片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看，都是非常成功的。影片塑造的洪常青、吴清华等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4月2日

和一天石灰。房子看看是快造好了。

我一直这样觉得，林业队的方向是否有点偏。如对搞钱的副业比较热心，而在大搞植树造林这方面却很被动。林业队应该以林为主。清明节这几天应抓紧育苗，生产队育苗已走到前头。而南瓜稍迟一点不太要紧。我们种南瓜应主要喂猪，而不能主要为钱。总之，应该以林为主，以副养林，全面发展。

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湖北省第三届党代会隆重召开，会议选出了新省委。曾思玉同志为第一书记，武汉部队政委刘丰同志为第二书记。

4月3日

我国政府和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喀麦隆在非洲中部的西海岸边。最近一系列的外交承认，说明我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我还认为，也说明民族解放运动和不结盟政策正在向社会主义靠拢。

又干了一天小工。还是比较愉快的。

在第三十一届乒乓球锦标赛上，我国男队夺得了团体冠军，日本亚军；日本女队夺得团体冠军，我国女队亚军。

4月4日

干了最后一天小工，房子已告完成。

《人民日报》最近连续刊登了浙江省江山队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介绍《哲学的解放》。

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勤俭大队能做到的，别的地方也应该能做到。我向勤俭大队的贫下中农学习，努力学哲学用哲学，指导自己的实践。

苏修二十四大在苏修进退维谷的窘境中匆匆开幕。勃列日涅夫竟在会上诬骂中国，猖狂反华。苏修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反华只能导致他更快的倒台。

4月7日

在毛主席光辉建党路线指引下，中共福建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选出了新省委。中央委员韩先楚、周赤萍分别任第一、第二书记，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任省委书记。

第三十一届乒乓球锦标赛今天闭幕。我国选手夺得了男子团体、混合双打、女子双打、女子单打四项冠军和女子团体、男子双打、女子单打三项亚军。在这次比赛中，我国运动员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为口号，以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友谊为目的，向许多国家运动员学到了许多长处。

4月8日

下了一天雨，也休息一天。上午到后西玩玩，和张小峰谈谈。对于知青内调，看来很有可能。我想，很大可能是到军垦兵团。因为如到农村，一则知青生活较忙碌、政治学习时间很少，二则不易使知青很好地接受再教育，如到工厂，那是不太可能，因为提出的是移民垦荒。到军垦兵团，较易培养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集体生活容易锻炼人，适于战备。

我想，不管怎么样，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就立即响应，随便到那儿，也随便干什么。

4月9日

今天下午在新盖起的蚕房里开了“批斗高志华大会”。高志华是我大队王冲生产队的。解放前是汪精卫、蒋介石、白崇禧的忠实走狗。解放后不接受改造，破坏革命和生产，破坏农业学大寨。像这种人，如果不揪出来，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就无法展开，革命生产就搞不上去。千头万绪抓根本，这个根本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只有抓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狠狠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才能促进生产的大发展，才能把各项工作搞好。

省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编印的71年第1期学习材料已发到。这本书介绍了许多上山下乡人员的先进事迹，很值得我学习。书中登载了“解放军报”为纪念古田会议决议发表四十一周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发表十周年和开展四好运动十周年发表的社论“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前进再前进”。社论指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斗争也更加深刻，形式也比以往更隐蔽、更曲折、更复杂。在新形势下，一些曾被批判的突出军事的观点会改头换面重新钻出来。所以，就要求我们紧跟形势，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牢牢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当旧的东西一露面就批判，就打击，就消灭。

4月10日

批判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和基本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很普遍的常识。人的思想、观点、理论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了实践，任何思想、观点、理论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大叛徒刘少奇出于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一贯鼓吹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人具有完备的大脑，而思想则是从脑髓得来的。即人的思想，无论正确错误与否，都是天生的。人们用不着改造思想，用不着参加实践。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论点完全是胡说八道。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大脑是反映客观外界事物的器官，思想就是客观外界事物在大脑的反映。去掉客观外界事物，就没有思想。如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实在无法生活，就会产生推翻剥削阶级的思想。在对自然界的斗争中也是这样。我没下农村时，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到了农村，亲身参加了农业生产实践，逐步懂得了农活技巧。而我的大脑跟在城市时没有两样，脑髓也没有什么发展，但由于参加了实践，就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如果照刘少奇的话做，一生一世赖在城市里，那么永远也不懂得农业，而无论头脑如何发达。

在二年的文化大革命和两年的农村生活实践中，我逐步体会到，只要紧跟毛主席，坚定不移干革命，自己就会前进，头脑中无产阶级思想就会战胜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刘少奇为反对我们参加革命，竟说什么有的人参加革命，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刘贼大概要以这个说明他的“脑髓产生思想”似乎还有证据。其实不然。只要真心诚意地参加革命，虚心地学习革命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席思想，就会前进，得到成长。只有像刘少奇那样的，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才不会前进，而日益向资产阶级那方后退。

刘贼抛出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就是反对“实践第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反对人们参加革命实践。我的许多错误都和这种“先验论”相联系。以后，我要经常批判“先验论”，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在头脑里牢牢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积极参加革命实践，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前进。

4月11日

今天搞育苗。育苗很重要，不搞好苗，就造不好林。现在育苗，是为两三年后更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做准备。今天育的是马尾松，还要育泡桐、杉木等，这些都是很好的用材料。

晚上大家在一起搓草绳。这是一个很好的节约闹革命的方法。规定每人搓三十脱，我由于初学，只搓了二十多一点，这还不算，贫下中农给我指出我搓的质量最差。为什么质量差呢？主要是想求数量，想达到规定，不丢面子。有了这种想法，就不顾质量，不管好坏。结果造成了数量少、质量差。伟大导师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质量不好，数量再多也无用。以后，干什么事，首先要注重质量，正确处理质和量的辩证关系，不可再犯重数量轻质量的错误。

4月12日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山东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这是山东人民在同窃据省革委会某些领导权的反革命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反复激烈搏斗的结果，大会将把山东的斗批改运动推向新阶段。

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兼任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袁升平任第二书记，六十八军军长张铨秀被选为副书记。

上午育泡桐，下午育杉木。我觉得，林业队现在劳动纪律很差，无政府主义泛滥，而干部又无有力措施去改变这种状况。林业队的活与劳动时间，皆无生产队重与长。而少数人还在叫苦连天。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办？“领导班子就是政权”。我觉得首先要统一领导班子思想，学大寨就要不怕苦，不怕累。要造成一种政治气氛，提高人的觉悟，加强纪律教育，把林业工作搞上去。

4月13日

南通专区和苏州专区分别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张宝珊和刘金山分别任南通和苏州的第一书记。

上午倒瓜路，下午去扎柴。扎柴时遇到了大雨，路滑坡陡，接连跌了几跤。但柴终究扎来家了。

《人民日报》发表了勤俭大队学哲学用哲学的故事《哲学的解放》。勤俭大队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并把它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要向勤俭大队的贫下中农学习，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改造世界观，树立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

4月14日

由于夜里下雨，上午休息，给母亲写了封信。母亲很希望我回南京玩玩。我向母亲说明，目前农业学大寨，农村比较忙，我们应当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如果有事回南京还是可以的，但无紧要事就不用回宁。

下午拖了几趟猪粪。一开始，我是想拖几趟的。但别人说歇歇，等等，我就没坚持。结果，下午只拖了三趟。这还是怕苦怕累的懒汉思想起作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别人说只是说说而已，而我听别人一说就歇了下来，完全是自己怕苦怕累。批了多少次怕苦怕累思想，而这种思想还起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呢？归根结蒂是世界观没改造好。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世界观不转变，它的表现亦就无法克服。所以我应该狠批资产阶级世界观，把错误思想提高到改造世界观巩固无产

阶级专政的高度来克服。只有这种，才有可能把怕苦怕累思想彻底克服。

4月15日

上午点北瓜，下午在魏村学习。学习了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纪念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的第三、四节“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要有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第三节主要讲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文章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列宁对待俄国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先进事例，要求我们满腔热忱地积极地支持群众运动，参加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本质天然好的。在群众运动中，自然会有各种人物的参加，各种派别的出现，各种思潮的影响，这是不奇怪。虽然它会造成运动的曲折，但它也能锻炼人，尤其能锻炼青年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目前的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我们同样要正确对待，要积极投身于运动中。不能落后。我是知识青年，尤其要在这个运动中经受锻炼。

开了几次会，我觉得像这样下去，这个学习会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因为会上发言少，围绕中心谈得更少，干部主持会场也不主动，思想政治路线方面谈得不多，而谈的都是具体问题。也就是把学习制度变成了形式。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还应靠大队五·七领导小组。现在，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正在蓬勃开展，我们决不能落后。

4月16日

上午在宝华医院做小工，下午去扎担柴。晚上又下了较大的雨。这雨对麦子来说是不利的，但人定胜天。

姐姐去年被评为五好战士，现又被选为连队革命战士委员会副主任，进步比我快的多。她来信谈到她的思想斗争。一开始，当听说有的同学被分配到工厂，感到自己吃了亏，后来学习了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教导，勤学苦想，认识到到农村并没有吃亏，农村工厂只是革命分工不同，而目标却完全一致。在农村只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就能大有作为，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贡献。

我应该向姐姐学习，向金训华、沈秀芹等同志学习，为革命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怕苦、不怕死，争取做个“五好社员”。

4月17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山西省第三届党代会胜利召开，并选出了新省委，谢振华同志为第一书记，曹中南陈永贵张平化为书记。

山西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一个十分激烈复杂的殊死斗争才取得了今天这个伟大的胜利。在全国范围来说，阶级敌人基本上是使用这两个手法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是像江苏这样的在革委会成立前拼命阻挠其成立，而必须把阶级敌人揪出来才能成立革委会，这样革委会成立后斗争就没有非常大的曲折，运动就比较正常。一个就像山西这样，阶级敌人削尖脑袋钻进革委会并篡夺了一部分领导权。这些省的革委会成立都较早，但在革委会成立后斗争却出现了一种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局面，所以这些省的党代会召开就较迟。而像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当时在山西炫耀一时的人物，因为他们总想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就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山西省革委会成立后的事实也证明，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无法诋毁的，广大革命群众总是要革命，历史车轮总是向前的，不可阻挡的。

各省省级党代会大约在七·一之前开完，然后庆祝党成立五十周年，二报一刊将发表重要文章。九届三中全会估计七·一后召开，国庆节将开四届人大，深挖五·一六的战斗九届三中全会大概将作结论。接着，全国可能要有个正常的阶段，即阶级斗争不是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白热化的战斗，形式将表现得比较和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将持续跃进，人的思想觉悟也要提高的一个新阶段、新水平，并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做好准备。

4月18日

昨天有金线厂人来找，讲了黄述白问题。黄述白偷听敌台，尤其在下放后更犯下罪行，现又潜逃，要求我帮助缉拿。我当然是欣然答允。我是一个革命青年，一个心眼是为着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但我为什么没能早就识别这个人呢？一到农村时我到金线厂找黄述白，对他的印象还比较好。虽然他没敢在我面前放肆地说什么话，但他是在想潜移默化地腐蚀我，而我没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识破他的真面目。这表示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还比较低，社会经验还不足，在曲折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还不能明辨是非。这也可以算是一个教训。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我要努力要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觉悟来要求自己，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提高继续革命觉悟，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今天下午生产队近二十人上山扎柴，影响了春耕生产。我没向队里请假，也上了山，犯了无政府主义错误。分析一下，思想上没有组织观念，以为别人能上山自己也能上山，无必要再向队里请假。晚上开会我作了自我批评，并保证以后不能这样再犯类似错误。

4月19日

报上发表了题为《“一点”精神赞》的工农兵评论。介绍了肖好第同志认真读书的先进事迹。他的主要经验是怀着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克服工作忙、文化水平低等困难，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几年如一日，坚持做到早晨早起读一点，劳动间隙读一点，会前会后读一点，晚上睡前读一点。看到好的学习体会抄一点，听到先进经验记一点，学习心得努力写一点。外出在家一样学，任务轻重一样学，农闲农忙一样学，身体好差一样学。活学活用，学了就用。这种“一点”精神正是我最缺乏的。我现在强调农活忙，任务紧，不少天没捧毛主席著作了，日记也经常拖拖拉拉的。主要问题还是对学习没有充分认识，想自己反正懂得一些书本上的词句，嘴上会说几句，睡觉要紧。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一满，就学不好，不想学。骄傲自满是个大敌，要批判它，才能学好毛主席著作。我应该向肖好第同志学习，抓紧一点一滴时间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

4月20日

批判反动的形而上学的“唯生产力论”。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目前，国民经济出现新的大跃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形势下，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散布的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长期来在经济战线上散布了“唯生产力”的反动谬论。他胡说什么“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国家就是组织社会生活”等等，

他的代理人也大肆鼓吹“生产好就是政治好”，“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诸如此类的谬论，归根结蒂，是鼓吹“生产第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革命统帅生产。

伟大列宁早就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主席教导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只能是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在经济工作方面，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千头万绪抓根本，始终狠抓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才能把经济工作搞好。

刘少奇鼓吹“生产第一”，就要我们放弃无产阶级政治，丢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之纲，埋头于生产之中，奔跑在报表之间，潜移默化，最后把社会主义经济蜕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如果照他的方法去做，那么，生产上不去，跃进来不了，经济发展不大。更严重的是只顾抓生产，不看路线，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甚至会把产品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

刘少奇根本不懂唯物辩证法。辩证法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之间，生产力是起主要作用的，是根本的。但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有时也能起主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刘少奇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的巨大促进作用。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叛徒刘少奇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批判了他的“生产第一”的黑货，使我们逐渐懂得了政治必须统帅生产的道路。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们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批判“生产第一”、“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论调，批判反动的形而上学的“唯生产力论”，为革命拼命干，重新安排河山。

4月22日

在宝华医院做了一天小工。为医院盖厕所，盖好之后，将大大方便病人，并为林业队搞肥料。

现在有这一种思想。即怕得罪人。别人也跟我说过，即少讲话，做好人，并说我以前在生产队得罪不少人，现在在生产队印象不佳。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以前在生产队劳动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讲了一些话，得罪一些人，这是事实。但我始终不能承认话讲错了，得罪错了。但群众对我印象都不怎么好。别人不理解自己，我怎么对待别人？说实话，继续像以往那样说话，好像很难办。现在在林业队，因为上工时间和吃林业队点山芋说几句话，就把一些人关系处不好了。不讲话，好像也觉得不对。毛主席说过同工农相结合要有一个痛苦的磨练，我想，这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才能使贫下中农了解我。我想以后说话是要注意，但有话还是要说的。老好人是我一贯厌恶的，我决不愿做老好人。我要好好劳动，好好工作，让贫下中农考验自己，让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经受磨练。

4月23日

又在宝华医院做了一天小工。我觉得，革命每时每刻都在发展中，历史的车轮在飞速向前。毛主席指引革命路，前途光明无限美。我们青年人，要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形势，不能犹豫，不能畏缩，不能迟疑，否则就要被历史车轮所抛弃。现在，不能停留，不能小步蹒，不能大步走，不能小步跑，而要迈开大步向前飞奔，才能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形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真学习，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坚持不懈认真刻苦，学以致用，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复杂

的斗争面前，分清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和抵制错误路线，忠实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红色的接班人，使无产阶级江山永远保持鲜红。

4月24日

今天是九大闭幕两周年。两年前，诞生了党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两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年前，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的歌声响遍全世界。

下午从公社拖粪到猪场。有件事对我印象很深。即在倒粪时口子关得很紧较难开。我那时想，反正不是我的车子，我才不找那份脏的干。但我又想起了毛主席教导“为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不怕苦、不怕死，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关键时候不要命。而现在是不甚苦，更不要说对我死还差之很远，而我却怕起脏来了，这是什么行为？深查思想根源，怕脏是由于怕病菌传染，也就是大叛徒刘少奇一直宣扬的“活命哲学”。怕脏是现象，“活命哲学”思想作怪才是实质。记得在城市时，有一次看见粪车，还把鼻子捂起来。像这种思想如果不纠正，那就是很危险，就会怕脏、怕苦、怕死，堕落成社会的渣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句话不是凭空说的，贫下中农每时每刻都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我们的表率。在拖粪时他们不怕脏、不怕苦，跑得快，实在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但后来我去开倒粪口子时，只是手脏了一点，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要锻炼自己，就得不怕脏，不怕苦，不怕死，才行。

4月23日

昨天，美国百万革命群众分别在华盛顿和旧金山举行了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参加的有青年，也有老人和儿童；有学生，也有工农和各方面人士；有黑人，也有白人、印第安人，还有退伍军人和现役士兵等，这次示威的广泛性也是空前未有的。它显示了美国人民的革命潜力和斗争精神。我们坚决支持美国人民反对美帝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正义斗争，并坚信他们必定胜利，成为美国的主人。

由于下雨，上午在房子里剥花生。今年我大队花生种植计划比往年大，我们要学习外地经验，争取把花生种好。

4月26日

晚上在东阳看了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伏击战》。这是一部介绍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二次大战时歼灭德国侵略军的战斗故事。

看了二十四日的参考消息。在美乒乓球队访问我国后，美国又邀请我体育或文化团体代表团去美访问。这本不是一件多大的事，但蒋匪帮的《台湾日报》却为此而慌作一团。哀叹蒋匪帮命不保夕，并也竟然咒骂起主子来了。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起，美帝就顽固的对中国实行所谓“封锁”。但二十年来，美帝“封锁”政策已随着我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而破产，于是美帝不得不在极端仇视我国的时候，又假惺惺的要求谈判，要求改善关系。

这一下可把个蒋匪帮吓得要死。若是不靠美帝支持，蒋匪帮哪能在台湾龟缩至今？美帝在台湾驻扎重兵，维持着蒋匪帮统治，操纵了台湾的经济命脉和军事大权。而华沙谈判第一条，就是要美帝从台湾撤出它的所有军队，这不是要了蒋匪帮的命吗？尽管美帝一再回避这个首要的关键问题而谈论什么“改善关系”，但还是把个蒋匪帮吓得要死，拼命反对。

奴才和主子的这一仗好不激烈。蒋匪帮实在无能，看不到他们大势已去，只有老实投降，才有出路，否则就要被彻底消灭。主子还算聪明，看出了点大势，也知道要喊几声“改善美中关系”来欺骗人。这本不需要奴才开口，而奴才却偏偏要拆主子的台，真是滑稽之事。

但主子尼克松也有更大的不聪明，也不知道要随大势就必须从台湾撤出它的全部军队。如果他不这样，而又需要用“改善关系”之类词语来欺骗人，奴才和主子之间这场争吵就不会停止。

如果解决呢？历史的必然将是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跨过海峡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省，赶走美国佬，消灭蒋匪帮。但到那时，他们的争吵也宣告结束了。

4月27日

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是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召开一年纪念日。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盛大宴会庆祝，我党政领导人周恩来、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出席宴会。宴会上，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战友欢聚一堂，热烈祝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抗美救国斗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决心继续加强团结，英勇战斗，把美帝从印度支那赶出去，让各国人民自己解决各自问题。

中午看了一下记工本。发现收工回家挑粪并没上。心想，大概那不算工。好像感觉自己吃了亏。这是工分挂帅流毒在我头脑里的反映。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在这里是要求我们完全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每天晚上我收工比生产队早。我队是公社学大寨的点，搞不好就会使整个公社学大寨的运动受到影响。生产队贫下中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起早干，带晚干，完全不计较工时。我收工回来干活是理所应当的。多挑一担粪就是为毛主席多出一分力，不挑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可是我挑几担粪却计较起工分来了，还觉得吃了亏，这是什么思想。以资产阶级思想看来，这样干是吃了亏，因为资产阶级是以自私自利为荣的。而以无产阶级看来，这一点也没吃亏，革命青年就是要这样干吗！工分应不应当要呢？我觉得可以不要，因为这是在为集体劳动，不是为私人，根本就不应当追求报酬。雷锋为人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难道他要过一点报酬的吗？“工分挂帅”，把工分看得高高的，劳动是为工分的即为私人的，那劳动积极性永远也不能发挥出来。我们应当树立政治挂帅思想，看事要从政治上看。我应当要求自己，收工回来之后还要在生产队干，并且不要工分。

4月28日

在宝华医院做了一天小工。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央发布了纪念口号，共三十二条。这些口号表达了七亿中国人民的坚强决心和英勇气概，表明了我国的严正立场。

晚上在青年学习时，学习了中共句容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关于学习肖德龙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肖德龙同志虽是盲人，但他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不懈地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能够明辨是非、英勇地抵制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是天王公社天王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我们要向肖德龙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崇拜，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限信仰。学习他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自觉改造世界观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以肖德龙同志为榜样，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觉地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使我适合于党和革命的思想。

4月29日

上午拖石头准备搭棚子。下午在医院做小工。厕所已快造好，但由于缺少水泥和行条，可能要停工。

原先打算五·一回宁，明天下午开路。中午跟队长请假时，队长说生产队有不少人闹哄哄的想在五·一节到南京玩玩，如果批了我的假那影响是较大的，并要求我五·一后回宁。一开始，我还不怎么想通，——虽然嘴里也答应了。我想自己有几个月没回南京了，这次回家拿蚊帐，时间又不长，真是名正言顺。但对照了白求恩事迹后，就立即觉得这种想法不对。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一直到牺牲，兢兢业业，毫无怨言。而我在农村才干了几个月，就想回南京玩玩，还曰“名正言顺”，比之白求恩，差距是多么大啊！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贫下中农的利益出发。现在，贫下中农要求我暂时不回南京，我就应该从贫下中农的利益出发。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利益，就不允许有半点讨价还价。想通这个道理后，我就决定五·一节不回宁，过后再说。

4月30日

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最高指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长期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贩卖了一套反动的“人性论”。这个反动论点集中了封资之大成，还披了一张“人民”的外衣，借以迷惑人、吓唬人。由于这个反动论点有一定的社会思想基础，所以他的流毒极广，必须坚持不懈地彻底地批判它，才能肃清它的影响。

在阶级社会里，人都分为阶级的。各个阶级有自己不同的思想感情。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煤油大王决不会想到北京拣煤渣老婆子的辛苦，富人和穷人决没有同样的喜怒哀乐。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性是为阶级的，只有阶级的具体的人性，决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

刘少奇宣扬什么“人民就是由男的、女的、工人、农民……等组成的。他竭力避开阶级这个字眼，奢谈超阶级的什么“男的女的”。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看法，主要决定于人的阶级地位，思想感情，而不是什么性别，职别。男的女的都分阶级的。

从古至今，一切剥削者为了愚弄被剥削者，维持自己的统治，有意识地宣传所谓“人性论”，大肆宣传什么同族同乡同姓即一家，瓦解被剥削者的思想。但是，剥削者所说的“人性论”只是剥削阶级的人性，它与劳动人民的人性决无共同之处。

对我来说，反动的“人性论”的影响也是较深的。如对父亲，界限也没有划得十分清，也没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教育改造他。对一些朋友熟人的错误思想也不敢批评，怕得罪人。这也是因为我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学习不够，尤其是不联系实际所造成的。所以，我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特别要理论联系实际，在头脑里牢牢确立阶级斗争的思想，看人待事都要从政治出发，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5月1日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

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与首都革命群众和五大洲的外宾共度节日之夜，隆重纪念这个无产阶级的节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庆祝八十年来国际工运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联合社论《全世界人民大团结》。

上午和朱绍柏到南京林院采树种。和我们联系的是一位在林院毕业分配在我县农林局的同志。母亲见我回宁也很高兴。上午到林院找人未遇。后到大桥参观。上有蓝天白云，下是滚滚大江，大桥像长虹一般，跨过大江，把大地连成一片。这个世界第一流的南京长江大桥，就是我国工人阶级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指示指引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成的。她向全世界宣布，我国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攀登科学最高峰。

5月2日

下半夜突下大雨，吃过早饭仍下着。林院已去不成。俟雨下小些，就到闹市区走走，并带买些东西。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各地大搞自己的工业体系，商品轻工业品自给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市场货源充沛，任凭挑选。物价低廉。同西方的金融危机对比，我国财政收入大余钱，物价逐步降低，人民币稳如泰山。它充分显示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富强，更加朝气蓬勃，欣欣向荣。

下午到林院找到了人。她要求我们到大庆路一带去看看有无柏榆树种。于是我们从人民公园北门进去，游览了一下。经上午雨一洗，花木显得格外清新，游人也特别多。人民公园的环湖公路已建成。南京，它在劳动人民手里将建设的更加美丽。

5月3日

早晨又下大雨。朱绍柏决定回乡拿钱来宁买东西。我在上午去林院，如果雨大风狂不好拿种我们就准备回乡了。但朱绍柏回来说等天好打，就不准备走了。

下午到邓小民家玩玩。谈谈下放两年来的体会。后来又一同到夏颂宁家玩玩，并决定一同打种。

给哥哥写了封信。我们虽远隔千里，但都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都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登上天安门和革命群众同庆“五·一”的喜讯所激动。在这个无产阶级节日里，我们决心虚心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接班人。

5月4日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新闻。这些天，报上发表了不少关于贫下中农教育知识青年和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报道，显示了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成绩。

三十二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对延安青年发表的演讲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作标准，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或者是反革命的了。”现在，我到农村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已有两年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完全领会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的精神实质。与工农相结合，

不但要口头上愿意，而且要行动上实行，更要长期坚持下去，不能只结合一天两天，要结合一辈子，一辈子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

为什么说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是革命青年的唯一正确道路呢？我觉得青年人，无论是知识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一般的来说，世界观都还没定型，这时候是决定青年一生的关键时刻，——资产阶级在拼命地利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和意识形态拉拢青年，使青年人变成新一代精神贵族。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政权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就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阴谋，把青年培养成无产阶级的可靠接班人。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一般地说，青年人都具有热爱毛主席、信仰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朴素感情。同时，青年人缺少经验，容易上当。在阶级社会里，两种世界观都在激烈地争夺青年。而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可以自发地产生的，剥削阶级的四旧又从各方面包围青年，在我们当时所进的学校里受到的又是修正主义的教育，所以世界观一般是资产阶级的。

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是自然而然就能产生的，它必须要经过有意识的灌输和坚持不懈地改造思想才能在头脑里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个工作不是光靠知识青年本身力量能做好的。必须由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一个青年人，如果不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整天埋头于书本之中，但不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即使满嘴马列主义，但没有基础，经不起革命实践的考验。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有些青年人不注意把与工农结合和改造世界观联系起来，不注意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他们的衣服是工农的，但面孔仍是资产阶级的。

我现在在农村，生活在贫下中农之中，整天受着贫下中农的教育，有这样的条件，就应该把自己改造的好一些。党中央号召我们要认真读书，毛主席关于与工农相结合的教导是我前进的指路明灯，我一定要认真学习。做到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自觉地改造世界观。

5月5日

上午到林院打种，目前白榆种已落，仅打到极少的一点，决定尽快回乡。

下午到新街口、莫愁路、鼓楼一带买东西。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昨天到南京来进行私人访问。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寿辰。我们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最后抄录一段马克思语录，以供学习：

“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艰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5月6日

乘早班车回到乡下。林业队正在打草帘，我们放下背包就干了起来。劳动是愉快的，乡间的空气显然比城里好得多。

前几天公社开了三干会，强调加强学习。现在，在党中央号召下，全国各地正在掀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我们宝华公社也不能落后。三干会后，各生产队都动了，努力学习，改造世界观。晚上在大队开了学习辅导员大会。大队党支部根据当前形势和要求，有针对性的选了十条毛主席语录供大家学习。我是一个知识青年，有点文化，在学习这方面更应努力带头。

5月7日

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五·七”指示五周年。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照耀着我们的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前进的灯塔。《人民日报》今天发表了重要社论《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今天，我已经走上了“五·七”道路，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共战斗。我不能满足于此，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以农为主，兼学别样”，“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不管干什么，首先这个批判资产阶级的任务总是少不了的。这是大方向的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

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指针，前进再前进！

5月8日

扎了一天草帘子，临晚又搓草绳。由于我搓草绳不熟练，贫下中农搓了四五十脱，我搓了二十脱。这样，跟贫下中农的差距就太大了。所以，我不能有半点骄傲思想，应当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

昨天晚上大队在我们生产队开了讲用会。关磊在会上作了讲用。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各方面都比我做的好，很值得我学习。

今晚大队在林业队开了副业会议。要求副业人员努力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会散后，我们连夜印了十条语录。

5月9日

我国和圣马力诺共和国经过谈判，决定建立领事级外交关系。圣马力诺是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处于意大利共和国中间。

浇了一天树苗。马尾松和泡桐出的都满好。下午我挑水时，看一桶桶拎太慢，就决定下水去按。但是脚上害个疮。在个公私相斗时，到底是为了争速度快些浇好苗，还是慢慢地来？这是我想起了《愚公移山》。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一下决心，下水，疮也不怕。下水去按，果然一点事也没有，这也尝到了一个甜头。

5月10日

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

大叛徒刘少奇长期以来大肆散布反动的唯心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现在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谁胜谁负问题已解决了，国家的任务只是组织社会生活等等。这种谬论流毒极广，必须彻底批判。

在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资产阶级因为自己被推翻而更加疯狂地反抗，小私有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也会成为他们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十分尖锐，它使得人们在这个矛盾面前不能有任何徘徊动摇。在政治方面，无产阶级用自己的革命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这两方面，无产阶级都取得了绝对优势。但在思想战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是很顽固很强大。无产阶级必须占领思想阵地，否则，政治、经济方面的成果也不能巩固。无产阶级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革命的谁胜谁负

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面对着这样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怎么能说“阶级斗争熄灭论”呢？

针对刘少奇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号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亿万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入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终于查明刘少奇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人物，是个地地道道的叛徒、内奸、工贼。他嘴里讲“阶级斗争熄灭论”，心里却在打算如何对革命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是刘少奇用以蒙蔽群众，掩护自己的烟幕弹。如果信了他的这一套，到头来就要让刘少奇上台，把一个人民共和国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

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党中央又向我们发出“批判黑四论”的战斗号令。我们坚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批判黑四论，做到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冲锋陷阵。

5月11日

拖了一天石头，打算在桃园的山包上盖间小房子。下晚，大队抓副业的丁广太来林业队办学习班。老丁主要谈了林业队的发展方向、纪律等问题。要求林业队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实现“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而努力。

5月12日

早晨一早就起床，准备上江北买糠。我们是经栖霞十月公社石埠桥过江，到六合县八一公社划子口镇，因为今天不逢集，卖糠的很少，我们就到加工厂等了很久。到下午才买了一百斤糠，就回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从龙潭地区到苏北农村的。此行更使我感到祖国的美丽，革命的前途，肩上的担子。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年人责任最重大。向前进，青年人。

5月14日

盖房子做小工一天。为了贯彻毛主席“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林业队不请瓦匠，自己动手砌墙滚垛。质量也还好。

我国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访问秘鲁，双方发表联合公报，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达成协议。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国际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5月15日

下午在储山口开了下放人员会议。储道生主任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目前形势大好，一个认真读书的高潮正在大队兴起，读书风气很浓。他要求知识青年也要认真读书，坚持写读书笔记，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各个队的知青都发了言，表示要认真读书，熟背十条语录，并活学活用。关磊作了讲用。

通过与一些知青的接触，感到目前不少知青的思想还不很稳定，各种想法都有，但归根结底，都是不想在此地干下去，即使是到新疆内蒙当农民也好。他们认为这里对知青工作没做好，知青不受重视，以及生活的问题等。我觉的，知青嘴上还是比较会讲的，但理论不能联系实际。“自觉”，这对于一个人是最重要的。但我们这些知青没有做到。如在抽背十条语录时，不少人就不会背，我也漏了一段。这足以使我们警惕。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可以因自己有点文化而为当前的学习运动做点事情，最少也应带个头。而我们连十条语录都背不上，比之贫下中农真是差得太多了。我一定要接

受这个教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实际行动做一个学习的促进派。

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学问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使学问变成僵死的条文或时髦的词藻。

——列宁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九二三年三月）

我的青年日记 II

（1971年5月16日——1971年9月9日）

注：

这里公布的是我尚还保存着的第二本日记，时间是1971年5月16日到1971年9月9日。第一本日记已于2006年7月公布，网址是<http://www.hujingbei.net/shuangzhouiyehua/Yehua2006No14-riji19710127to0515.doc>。有关这些日记的总的说明，请参见该网址。

和公布的第一本日记一样，本文件打印时没有对原文做任何修改，也没有对语法错误或内容难以理解之处做任何解释或附注。考虑到这些日记所记载的人、事已经过去30多年，所以对涉及的人、事没有做任何“避讳”性质的修改。尽管如此，这份文件可能存在个别打字错误。

文件中的斜体字是写于日记本天头的毛泽东语录或当时的口号。它们和同一页的日记内容有关，但又不属于日记内容。

2007年4月22日于上海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两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1971年5月16日

上午拖石头造瓜棚。下午搓草绳。一下午，我仅搓了二三十脱，而贫下中农却二倍三倍超过我。这清楚地表明，我与贫下中农的差距还很远，根本就没有一点骄傲自满的资本，只应当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在生产斗争尤其更要注意学习。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5·16通知”已经发表五年了。在“通知”的指引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支持下，经过极其复杂激烈的战斗，我们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发出了全歼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六十年代最大的隐患，要清除隐患，教育后代。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深挖五·一六集团的高潮。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通过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和深挖5·16反革命集团，使我更深刻的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就拿文化大革命来说吧，首先批判了吴晗，从吴晗又挖出了三家村，接着又挖出了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又揭开了隐藏在我党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刘少奇垮台了。斗争一步一步地深入，阶级敌人也越来越狡猾，但是也失败得越惨。中国最大的保皇分子陶铸完蛋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完蛋了。王关戚妄图毁我长城，杨余付妄图夺权，但是都完蛋了。党的“九大”过后，我的头脑里还以为阶级斗争在我党不会太尖锐了，以毛主席为首、以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坚强地领导着全国人民前进。可我没想到，在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后，阶级敌人还会迅速地再组织起来，向无产阶级进攻。5·16反革命集团就是如此。我一定要按照“通知”精神，积极投入一打三反运动，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战斗。

5月18日

昨天晚上到林业队睡觉。清晨下了大雨。不知怎的，浑身都很难受，一口饭也吃不下、发寒。睡了一上午。下午回家亦没吃午饭，原想歇歇，但是，我看到贫下中农热火朝天的干劲时，忽然觉得这种歇歇的想法是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目前正是生产大忙时节，贫下中农都是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相形之下，我的想法是多么错误的啊。我拔腿就往林业队跑。下午打草帘子。干干，身体也干好了，不再有什么不舒适的了。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时准备、贡献力量。

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5月20日

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红旗》发表的《反帝斗争的纲领》的重要社论以作纪念。

一年来国际的形势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论断，“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地位大大降低。在印度支那地区，它苦心策划的“蓝山七·一九”军事行动彻底失败，在中东，“罗杰斯计划”也遭此命运。在其后院拉丁美洲，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日益发展，使美帝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社会帝国主义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日益暴露出其纸老虎的本质。由于有帝国主义存在，就必然有战争存在，世界大战和以原子弹为武器的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综观五洲风云，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这是历史的本质。

五·二〇声明，是我们进行反帝斗争的纲领。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声明，关心国际形势，为“解放全人类”而在农村扎根、革命。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5月21日

拔了一天太子参草。由于日益更忙，所以决定日记也要少而精。时间很紧。但我应注意，在大忙期间也不忘学习，坚持写日记，写心得，促进思想革命化。

学习了《红旗》五期上登的辽宁省委学习《实践论》的文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篇文章以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实践论》为武器，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从理论上批判了长期以来王明、刘少奇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鼓吹的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王明、刘少奇一伙鼓吹先验论流毒很广，它成为许多人犯错误的根源。我就在许多问题不自觉地陷进了先验论的泥坑。如有许多事情都从主观想象出发，骄傲自满等。我应当认真注意这个问题，经常批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改造世界观，不断前进。

5月22日

上午刻印了和平大队林业队印发的有关当前林业工作的21条毛主席语录。公社要求每个林业队员都要会背，使每个队员都懂得林业的伟大意义和重要性。

下午依旧拔草。公社及大队、林业队负责人在检查了全公社林业育苗的情况后，认为我林业队育苗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的，决定将在这里召开育苗现场会。这无疑的也是公社党委对我们林业队的鼓舞和鞭策。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5月23日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付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选出了中共内蒙古第三届区委。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苏工作并担任无锡市革委会主任的尤太忠同志任第一书记。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曾被点名批判的赵紫阳同志任书记。

学习了中共河南省委写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批修整风的战斗纲领》。它批判了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所提出的“国防文学”、“全民文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纲领性口号与这个口号的理论基础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二十九年延安整风时的必读文件，也是当前全党批修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经典文件。我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

5月24日

上午开会谈了集中问题。现在生产已经进入大忙，今年上级指示，林业队员大忙期间不下队，大搞林业。且林业也很忙，因此决定林业队员大忙期间集中居住，早晚集中吃，中午回队。这样，保证大忙期间有足够的劳力和时间投入林业生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经过动员和适当解决具体问题，林业队员都同意了集中居住。晚上，大多数队员就已经集中。

《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南大的文章，批判反动影片《柳堡的故事》。这部影片丑化我人民子弟兵的形象，丑化贫下中农的形象，竭力散布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毒素。尤其是它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更是起着麻痹人、腐蚀人的作用。长期以来，周扬一伙把它推销全国，使它流毒很广。当前，我们正在彻底摧毁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批判这部影片，使我更清楚地看到

了“人性论”在文化领域的反映。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5月25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周围战斗的河北省广大军民，紧跟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经过反复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河北省第二届党委胜利诞生。原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同志任第一书记，郑三生同志任第二书记。原苏南驻军负责人马杰担任省委书记。

今天大家推我管理伙食。我虽然无甚能力，但大家信任，我自己也决心努力做好这一工作。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5月26日

徐州市党委正式成立。徐州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了极其尖锐激烈的复杂斗争。最后，终于揪出了篡夺了山东省革委会某些权力的政治骗子，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徐州新市委的成立，标志着徐州的社会主义革命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今天下起雨来。趁这个时候，我们冒雨洒化肥。路烂，大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任务。

5月28日

今天是端午节。在农村，它还有相当的地位。感谢贫下中农的关怀，使我这个异乡人也吃到了传统的食物粽子。

给哥哥写了封信。谈了一些看法。

上午挖桑园沟，下午刨瓜路。现在大家学习情绪都很高。公社要求熟背的二十一条语录，正在为大家所领会。

5月29日

我国政府与奥地利政府经过谈判，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此，在维也纳就可以看见五星红旗。

上午林业队叫我去买大萝等。由于我没有经验，买的镰刀都不甚令人满意。下午又花了一番时间去退刀。

我好像是忽然觉得，又好像以前就隐约觉得，不过现在才真正感到。骄傲自满情绪在我身上已发展得十分严重。不但上午买刀一事，主要是中午，当时东阳部队派人到林业队来买红豆种，林业队红豆种是多一点，可是当时没有一个负责人在此。大家都不能做出决定，有同志问我，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应与大家共同商量。而我当时却擅自决定卖给人家，并亲自掌秤。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把大家放在眼里，自高自大。上午买刀也是自满自足，自以为买得还可以。骄傲自满，已成为我的主要敌人。当前，在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三号文件指引下，全党全国人民正在开展一个反骄破满的自我教育运动，而我在这期间，骄傲自满的思想却得到了发展，这不就证明我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了吗？这种骄傲自满的思想必须批判。在我的头脑里必须发动一场反骄破满的攻坚战。我在这一期间，必须着重学习毛主席关于反骄破满的伟大指示，充分认识骄傲自满的危害性，坚决实行“三破三立”，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

习，做贫下中农的小学生，不断地革自己头脑里私字的命。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5月30日

为了检查大家的学习情况，今天上午检查了一部分人，背诵二十一条语录。我觉得，无论什么事，带头人都应该首先做出个样子。于是我自己首先背了。很使我感动的是，许多不识字的同志和识字不多的同志，他们经过刻苦努力，都能背出不少毛主席语录。和他们相比，我的学习精神还是很差的。我决不能因为会背这几条语录而骄傲自满，要虚心地向那些不识字的同志学习，刻苦学习，学以致用，努力改造世界观。

下午刨瓜地时，大队副主任丁广太来开了个会。关于对待犯错误的人，首先应当分清是属于哪一类矛盾。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应当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5月31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天津市第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大会选出了中共天津市第三届委员会。解学恭同志任第一书记。

上午在林业队干。中午回家吃饭时，生产队长叫我在生产队干。于是下午就在队里上工挑粪。南京市的便民河农机站派出两台拖拉机帮我队耕田耙田。大机器真来劲。几小时之内，凡割了麦子的田都给它翻了个身。

6月1日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儿童时代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但回忆起来，总感到幸福，因为我一直是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受到党的教育。我决心紧跟毛主席，就在这大忙中看。

上午割油菜，油菜长得很好，在我公社可列第一。这还是由于搞了科学实验。下午起初也割，下雨后就冒雨栽山芋。我的雨衣没带回来，贫下中农就主动借伞给我，一直干到天黑。

大忙来到了，我在经受它的考验，我相信自己经受得住。干吧！

6月2日

到大队电灌干了一天。夜里又下水田挑粪，干的好欢。

罗共中央总书记，罗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和他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应我国党和政府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到达北京。罗马尼亚处在欧洲，与我国相距万里，但近年来，两国人民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罗马尼亚人民坚持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的正义斗争。

团结起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6月3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以及周恩来、康生等同志，今天

会见了齐奥塞斯库同志和代表团全体成员。毛主席高兴地说：“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早上没干早班，受到队长批评。我想想，觉得批评还是正确的。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样不干，那粪怎能挑到田头，粮食怎能丰收？我一定要克服怕苦怕累思想，坚持顶班干。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6月4日

今年我将比较多的参加栽秧。在栽秧中，我尤其要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努力掌握生产斗争的本领。

收到哥哥的来信。谈到了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关于内蒙局势。谈到报刊上正在不点名地批评陈伯达。

看到他的信，我才觉得，我虽然喜欢看报纸，但往往都是浏览一下就算了，而不去深入思想。如批评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野心家，我初以为是陶铸，“三种境界”论的鼓吹者。我简直就没有去想是谁。罗马尼亚访华，我只认为他们是同志，而没察觉这其中的分歧。这些都说明我并没有认真看报，也说明我在学习问题上存在着浓厚的不求甚解的作风。这些都需要我认真对待，认真改正。

6月5日

栽秧一天。中午和晚上都开民主理财会。晚上老顾讲了话，批评了当前存在着的右倾和怕苦畏难思想。要求我们遵照许司令的指示，千方百计，拼死拼活，用九牛二虎之力，把粮食搞上去，把四夏这一仗打好。

开完会后，我们就连夜把麦子拖往水泥厂的篮球场，一直干到两点多钟。

当我们拖麦子肚子饿子，我的情绪也不高，这时候关磊唱起了郭建光唱的“困难吓不倒英雄汉”一段，鼓舞了我们。我觉得，在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比我强，我应该向他学习，用红军传统来鼓舞自己前进。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6月6日

揉了一天菜籽。许多贫下中农都把家里席子、被单拿出来垫在地上揉，这种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

齐奥塞斯库和他率领的代表团今天到南京进行友好访问。周总理、张春桥等陪同来宁，许世友等热烈欢迎罗马尼亚贵宾。

6月7日

昨晚打了一夜麦子。上午继续揉菜籽。下午想稍睡一下，不料没听见哨子声，一直睡到五点钟才醒。这也说明我还不能习惯农村大忙的生活。许多贫下中农打了一夜麦子也并没有休息。我应该向贫下中农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夜收场，又干到半夜。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6月8日

大队革委会决定要到今天把麦子割完。今天全都割麦。公社所属单位也来支援，我们一些男的挑把子。一直干到八点，晚上又是割麦子，挑把子。大概到十一点左右，下起雨来了，于是又赶快抢场。回家后，公社却广播了我们大队麦子全部割完的喜报，接着，公社干部又来叫我们明天天亮前一定要割了。我觉得，跃进是应当的，但没跃上去却去报喜，岂不是自欺欺人？利用这种方法来逼别人前进，也不会收到多大效果，反之，则反会失去信用。

6月9日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迎接党的五十周年的沸腾日子里，中共云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选出了中共云南省第二届委员会。原省委书记周兴同志任第一书记。原南京部队副参谋长王必成任第二书记。

起早割麦，至九点结束。接着就下起大雨。这雨下得很不好，麦子可能因此会受损失。

6月10日

栽秧一天。尽管电劈雷轰，我们依然是脸朝黄土背朝天，拼死拼活种好田。由于雨大水滚得快，靠彭桥的田里麦把子都跑了。临近天黑，生产队又全力以赴，下田捞把子。我以自己赤脚和脚上湿气等原谅自己，挑两个把子一步一步往埂上移。可是不少贫下中农也打赤脚，他们跑得快，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麦秸戳，相形之下，差距顿现。

怕苦思想是刘少奇“活命哲学”的反映，是屈服于大自然的表现。其实，现在干活并不能说是苦，即使是苦，它与解放前贫下中农所受的苦也是有天壤之别的，有本质区别的。今天，我们为毛主席，为本阶级劳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应该是快乐的，是人生的第一需要。青年人就应当拣重担子挑，拣苦吃。怕苦，就是怕革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这可以算做一条规律。为了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革命接班人，就要敢于吃苦，吃苦在人家前头。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6月11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39号文件传达下来了。毛主席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际大事，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树立“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思想。

自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外交战线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狠批了刘少奇和“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黑货，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开展了广泛的外交活动。一方面，我们坚持自己的原则性，一方面又在原则的基础上发挥了更大的必要的灵活性。今天，外交战线形势一片大好。我们要关心外交斗争，关心国内外大事。

今天又下水两次捞麦把子。把麦把子都从矮埂上搬到了公路或高埂上，基本上不怕潮水了。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的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6月12日

栽了一天秧，手指头据说是得了秧气，不能栽了。我们就在公路上拖麦把子，公社农具厂等单位完全停下来支援我们。水泥厂让出一块装车的有屋顶的站台，给我们打麦子，还借出了电动机等，并派电工前来帮助。在公社各单位和水泥厂解放军的帮助下，在这个雨天里，脱粒机终于也响起来了，并迅速地压倒了雨声。

整整打了一夜麦子，向贫下中农学习，连续作战不下战场。

6月13日

省革委会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农业战线的广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千方百计、拼死拼活，用九牛二虎之力，战胜连续阴雨带来的灾害，一定要把到手的粮食搞好，不能再受损失。用实际行动，用抓革命、促生产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五十周年。

上午继续打麦。因麦把子潮，所以不能打快。下午我去挑麦把子，挑到公路让板车拖。夜里又打麦到十一点。

6月14日

上午全力以赴把埂上麦把子往路上挑。不少麦子都出了青青的小苗，到处都是。为了把粮食夺到手，广大贫下中农不怕累，挑得多，跑得快。我先挑六个把子一担，后来肩膀有点疼了，又看不少人都挑四个，就想去掉两个。但这时又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鲁迅的诗“我以我血荐轩辕”，心想反正活着干，死了算，就坚持挑六个至结束。

但我问什么会产生这种“挑少点”的思想呢？这主要是不怕苦的思想没有扎根，一碰到什么艰苦的情况它就会跑掉。而怕苦的思想在我头脑里还占有重要地位，一出现什么情况它就会起作用。肩膀疼说明我还缺乏锻炼，它是物质的，只要有正确思想统帅，它就能继续发挥作用。所以，我必须尽最大努力克服怕苦思想，让不怕苦、不怕死的思想在头脑里深深扎根。

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6月15日

上午脱粒，下午清场，又扬了一通夜麦子。

在这忙时，必须注意尽量使生活有条理，肚子也要吃饱，免得生病，妨碍抓革命、促生产。

6月16日

天晴了，上午我们把麦子都弄出来晒，水泥厂把除了大门口的一块以外的水泥站台都让我们晒。麦子都已发热，有的并要上霉了，大家快拖快晒，很快就把麦子都弄出来了。

下午水泥厂也让我们把麦子拖到大窑上烘干。站在大窑边，真是汗流浹背。夜里贫下中农照顾我，让我休息，于是也睡了夜好觉。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

6月17日

上午从公社加工厂借来风车风油菜子。今年我队油菜子是大丰收，估计最高亩产

要有四百斤。下午卖菜子，但由于没晒很干，没收。

据讲这两天要有三百毫米的大雨。为了防止雨来再受损失，连夜打麦子，直到雨临方止。

6月18日

下午风车风麦子，麦子有的又上霉了，并且发热。队长要我们今天一定要风了，而不管时间迟早。我看到那么多的麦子，估计今天肯定风不了，于是不怎么想干，要推脱责任。这时，毛主席的教导又在我耳边响起：“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麦子上霉，发热，需要赶快把它风一下；如果不风，就会人为地造成损失，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要向人民负责，就要把麦子风好。迟就迟些，不睡觉也要干，许司令不是讲拼死拼活吗？在关键时候尤其要不怕苦，不怕累。为了把麦子风完，减少损失，我们想窍门，鼓干劲，干了一下午，又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亮时，饭也没吃，坚持把麦子风完并全部拉出去晒，到十点多钟才吃早饭。

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6月19日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许司令和江苏省委的直接关怀下，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第四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大会选出了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第四届委员会。方敏同志为书记，方明、张启、刘其章为副书记。

下午挑秧又栽秧。我的秧栽的既不好，又远远落在贫下中农后面。感到贫下中农到底比自己强，要向贫下中农学习。

6月20日

学习大寨人改天换地的决心，贫下中农正在为夺取今年粮食更大丰收而出大力，流大汗，在这个时候，我检查一下自己，觉得刘少奇散布的“活命哲学”、怕苦怕累思想仍很严重。

如有时到了收工时间没收工，就会嘀咕：怎么还不收工，干得早了，要讲这么早就干了？开会就要睡觉，打麦时闲下来不是去干别的，而也要睡觉，诸如此类的事还很多。有了这些想法，劳动时就好像是被迫的，鼓不起干劲。想到的只是保护身体，而不是革命的需要。这些想法都是消极的，于一抓三促是有害的，于自己的思想革命化也是有害的。

当前已是季节十分紧的时候，劳动时间是看情况而定的。起早带晚，完全是革命的需要，是生产斗争的需要。我应该克服怕苦怕累思想，提高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搞好思想革命化。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6月22日

今天始终觉得头昏得很，有点发烧，但坚持晒麦。晚半天趁收麦有点空闲到采石公司医院一看，热度已达四十，打了一针安乃静，继续把麦子收完。

借来苏联小说《旗手》，是记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大反攻，从越过边境一直打到布拉格这一段，还值得一看。

苏联小说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这时期的小说虽然可以看，但也应批判地看，尤其是战争小说，单纯军事观点、奖金刺激、爱情等东西很多，批判是必要的。一部分就是赫鲁晓夫时期的了，像肖洛霍夫、西蒙诺夫等人的大毒草，应该彻底批判，肃清流毒。

6月23日

今天母亲来看望我。见我在此一切皆好，也很放心。南京也大搞支农活动，妹妹也到农村支农去了。

《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业学大庆》的社论。大庆，是一个用毛泽东思想建设起来的先进企业。大庆的道路，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企业的道路。学大庆，就要活学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才能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6月24日

《参考消息》上发表了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四月三十日给意大利一家刊物写的文章《与毛泽东的一次交谈》。记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十二月接见他的谈话。这个谈话很重要，对国内外形势作了很重要的分析，并特别提到接待尼克松来中国访问，无论是代表政府还是私人访问。

毛主席在三六年就曾对斯诺发表过讲话。毛主席讲话非常谦虚，分析得很中肯，处处表现出他的天才。

斯诺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国政府和报刊都给它以极大的注意。这也表示出毛主席的巨大国际威望。

6月26日

早晨和上午都挑肥。田里放上水，所以必须赤脚，但麦秸桩子又戳脚。贫下中农走到田边，二话不说就挑，而我先还有点犹豫，然后才下田。为什么犹豫呢，还是怕戳脚疼。但是，是脚疼要紧呢，还是季节要紧呢？如果不赶快把这几块田挑上肥，那只好跟白田，而秧苗无底肥，长势肯定受影响。脚疼克服一下就行了。我必须坚决克服怕疼的思想，向贫下中农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夺取今年粮食更大丰收，支援世界革命而奋斗。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6月27日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中共江苏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中共连云港新市委和中共南通新市委相继诞生。

栽了一天秧。今天分为三个组栽，为了尽快把秧栽下去，三个组都鼓足干劲，一个追一个，终于完成了后泉田栽插任务。

6月28日

今天把麦子都扛出来晒。虽然受到阴雨的灾害，受到了损失，但由于毛泽东思想

深入人心，贫下中农艰苦奋斗，几天几夜不下战场，终于把粮食夺到手中，减少了损失。估计亩产大概有四百斤，比去年增产。

抽空看了《红旗》第六期。这一期是教育革命专辑，是为正在召开的教育革命会议出的。杂志编者的话，提出了教育革命中十个关系的问题，各地的文章分别介绍了各个方面的经验。看了之后，感到鼓舞，也感到需要更加关心。

6月29日

为怕下雨再受损失，三点多钟贫下中农就起床收麦子。但天阴沉沉的，却始终没下。相反，却起了风，这一天，我们就在大场扬麦子，并过麦子。一笆斗有七十斤，我坚持扛到*了。我感到自己力量太单，不能适应生产斗争的需要，以后应注意锻炼，增强体质。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6月30日

学习毛主席语录关于共产党的一节，批判刘少奇鼓吹的全民党。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中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叛徒刘少奇为了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竭力破坏党的组织纯洁，想把一个朝气蓬勃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蜕变为一个“全民”的党。刘少奇要把资本家拉进党组织里，说什么“东北有十万富农党员也不怕”，并且“欢迎”各种带着私人目的到党内“找出路”的人。大叛徒刘少奇就是如此不择手段的篡改党的组织原则，想把党变成“大杂烩”。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揭穿了刘少奇的阴谋，并指示要注意发展工人入党，增加党组织的工人成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党坚持了自己的组织原则，使党始终成为革命的坚强领导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押上了历史舞台。经过这一遍最广泛深入的整党运动，我们党变得更加朝气蓬勃，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7月1日

今天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了重要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全国城乡一片欢腾，庆祝这一大喜日子。

中国共产党是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诞生的。从它一成立起，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内部的破坏者、特务就使尽了各种伎俩，妄图扼杀我们的党。可是，与这些反革命的主观愿望相反，我们党不但没有被摧垮，反而在围攻中锻炼得坚强起来，并取得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路线决定一切。依靠毛主席的领导，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党就前进，就胜利；离开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党就受挫折、就失败。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批判了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路线，批判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及刘少奇之流妄图扼杀革命的阴谋，粉碎了他们这些在不同时期里隐藏在我党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斗争就更加尖锐而复杂。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我党先后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等，把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习仲勋等一小撮挑梁小丑揪了出来，并且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摧毁了隐藏在党内达数十年之久的最阴险最狡猾最反动的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经过这些斗争，尤其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党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我一定要认真学习两报一刊七一重要文章，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伟大理论，使自己在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始终站稳立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7月3日

上午搞秧田，预备下后作稻谷。然后又栽秧。贫下中农栽的又快又好。一上埂就挑秧，而我上埂就想歇歇。这证明我和贫下中农的差距还很大，以后栽秧一定要注意带粪箕，歇了就挑秧。

六年前，毛主席在为北京师范学院一报告作的批示中，对我们青年人寄托了无限的希望。他老人家无限深情地教导我们：“今后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岁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证明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我们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忠不忠，看行动。

7月4日

今天就突出政治问题和老顾谈谈。不少天没有进行“天天读”了，也没有读报，没有政治鼓动工作。近来，生产队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队长和社员的矛盾也较突出。我说：这主要由于没有突出政治，正气没有压倒邪气。像前一阶段，政治工作抓得较紧，经常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工作就好做。而现在，工作不大好做，也不能够怪社员。而应首先检查干部思想，切实抓好抓紧政治工作。恢复“天天读”，政治夜校。至于说到忙，这时候确实是忙，但不能借口忙而不突出政治，这是政治、生产轮流突出的思想的反映。忙，就要求突出政治要注意少而精，针对性强，对症下药。革命，就不能怕忙，怕苦、怕累、怕死。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7月5日

又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英雄，济南部队某部战士盛习友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抢救落水的贫下中农，不幸牺牲。中央军委为了表彰盛习友同志的模范行为，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付主席亲自批准，授予盛习友同志“爱民模范”的光荣称号。

盛习友的英雄行为绝不是偶然的。盛习友一贯重视思想革命化。在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里，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定地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终于迅速地成长起来了。

向盛习友同志学习，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7月6日

今天学习了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七一重要文章的前言和第一部分。着重学习了前言。计划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学习，努力学深学透。

前言概括地说了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从此，中国革命就从胜利走向胜利。

社论指出：“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战胜了党内各种右的和极“左”的各种机会主义路线，从几十个成员，几个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为今天领导着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要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做到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转向。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

7月7日

这几天都是栽秧，我队栽秧速度不太快，但正在加快。

最近，在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上，越南南方共和外交部长阮氏萍提出了七点建议。七点建议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求美帝明确规定一个撤军的日期，而以交换美国战俘为条件。美国和一切外国侵略军从南越滚出去后，就由南越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并进而统一祖国。七点建议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欢迎，美帝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境地。

7月8日

这几天大脚趾头害了甲壳沟炎，手指甲也出脓，病魔迫使我昨天休息半天。今天原来是想干干旱地上的活，但由于阴雨，无事可干，唯栽秧耳。我想，这时栽秧最需要人。克服了怕发炎怕疼的思想，下田去栽。结果脚也并不疼，手上脓也出尽了，反而好了起来。这正是“劳动改造人”呀！

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7月9日

上午先栽秧，后又装麻袋，预备下午卖公粮。我和老夏下午去拖电动机。这电动机原是公社党委决定分给我们队的，但却被公社机电站以私人交情送给了别的队。这种情况确实叫人很难容忍，预备电动机到手后，写封大字报给电站。但由于对方大队干部不在家，走到半路又罢。

看了一下“参考消息”。最近，阿格纽、基辛格、莱尔德等美帝军政头目相继跑到远东等地搞阴谋活动。这种动向值得我们警惕。不管美帝耍什么阴谋诡计，都将在中、朝、越、老、柬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坚强团结面前碰得粉碎。

7月10日

看了越南影片《森林之火》和《九号公路大捷》。这些影片时代的反映了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与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集团和他们派遣的特务分子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战斗历程。

想当年，美帝发动侵越战争时是何等的猖狂。东京湾事件后，它悍然出兵南越，并派遣轰炸机轰炸北越。但在南越人民和北越人民兄弟一心坚持战斗面前，它的一个一个战术都失败了。它在老挝扶植万象傀儡集团和王室匪徒，在柬埔寨搞反革命政变，妄图变整个印度支那为它的殖民地。但是和美帝的这种反革命愿望相反，印度支那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并把印度支那变成一个战场，到处都在打击美帝侵略者。你看，九号公路上，印支三国人民协同作战，打得多好啊！从九号公路大捷后，美帝在印支的败局就完全明显了。印度支那人民彻底赶走美帝侵略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7月11日

上午推耙。早栽的晚稻长势不错。下午关秧门。至此，今年晚稻秧已全部插完。

就生产队主要矛盾问题和祁学义谈了谈。有人说主要矛盾是干部之间的矛盾，有的说是干群之间的矛盾。我以为，依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是这样，每一个单位都是这样，没有例外。这一点，不能有丝毫误解和动摇。但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在农村是贫下中农。所以，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贫下中农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他们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在贫下中农这一矛盾着的统一体中，又存在着各种矛盾。这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干部一面，干部领导得好，革命、生产的形势必然就好。“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在农村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已经确定，“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落实”，而落实与否就要看干部的路线觉悟。在干部这个矛盾着的统一体中，第一把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一把手抓紧了思想革命化，就能把整个领导班子带动起来。第一把手应当深刻地认识到责任的重大。

我是这样认识当前生产队的主要矛盾。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7月12日

因脚疼，上午休息。学习马克思的一些教导。

马克思教导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民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在这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掌握哲学这个武器。对我们来说，就要努力学习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哲学这个精神武器。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懂的人的含义。人是阶级的人，是社会的人，除此之外，没有抽象的“人”。知道了这一点，还要知道这个阶级是怎样能够产生和存在的，才能知道自己所负的重任，知道本阶级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物质力量。这个物质力量，因为有深刻的思想根源，所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但能改变自然，更重要的还能

够改变社会。当前，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就要用哲学武装自己的头脑。我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高思想水平。

7月13日

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已经签订十年了。为庆祝条约签订十年，中朝两国人民和政府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并互派了高级代表团。这个条约对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和反对它们发动侵略战争的政策，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磊今天回宁。我现在害脚。不打算带疾回宁，以免父母耽忧。倒是想脚好后到句容走一趟。下乡已近三年，一次句容也没去过，岂不憾也。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7月14日

早稻已开镰收割。今年是我队第一次大面积栽双季稻和搞三熟制。看来，早稻收成还不错。

在母液站干了一天，虽则脚疼，但不碍大事。

（确实，正如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思想决定一切，思想改变一切”。）

7月15日

上午休息。原想上工但又怕人说混工，因此决定不上工。中午想想，觉得不对。现在正是双抢大忙时节，不但稻子要收要栽，山芋草等也要尽快除尽。多一个人就好一个人，就多一点力量。要面子的思想要不得。下午就上山除山芋草。反正“尽力而为”吧。

7月16日

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五周年。每当想起毛主席畅游长江，就觉得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精力非常非常充沛，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愉快。想起毛主席，就有了信心，有了决心，有了勇气，有了力量。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中午十时半中央台广播了中美联合公报，曰“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7月17日

尼克松即将访问我国一事，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大家都谈论它。

有一种说法我觉得不对。即认为尼克松将访华是因为他知道了武力是征服不了我

们的。——即尼克松访华表示他将放弃对我使用武力。尼克松为什么要访问我国，由于我们掌握国际斗争材料极少——仅《新华日报》根本不能满足要求——只能大概说出几点。一是尼克松要竞选下届总统。但名声不好，就想在这个问题上捞笔选票；二是最近地中海、巴尔干等地局势都较紧张，美国大概要多多注意那边；三是联大上要求中国进入联合国并驱逐蒋帮的呼声日益增高，美帝就另想点子。虽然尼克松将访华，但他的本性不会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像尼克松这样的帝国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唯武器论”者。他们只想建立自己的世界帝国，决不能容忍任何一个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存在。他们迷信武力，直到他们被消灭的前一秒钟，他们也不会放弃武力。美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把我国消灭，但与此相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来越强大，使它不得不变换其反革命策略（自然，目的是不变的）。美帝国主义变换策略的目的只是为了它更便于达到它的反革命战略目的。所以，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只应当进一步提高警惕，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把反侵略战争的工作做得更主动，只要有敢来犯者，就坚决消灭。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7月18日

上午拔山芋草，全体人员上山，一上午全部结束。下午就开始除山芋垅子。

学习了七一文章的第一部分“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部分总结了我党在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学习了这一部分，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的党就前进，就壮大，就胜利。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军队，建立了军队，没有革命根据地，开辟了革命根据地，使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了胜利。而如果按照陈独秀、王明、刘少奇一伙叛徒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了革命根据地却丢了革命根据地，有了红军却把它引向失败，并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二十八年的斗争，确实是非常尖锐、复杂。一方面，面临着由国际帝国主义大力支持的蒋匪帮的武装剿灭，一方面，又面临着党内一小撮蒋匪帮的代理人的罪恶阴谋，若不是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怎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民主革命的历史极其清楚地证实了这一伟大真理：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前进、就胜利。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7月19日

关磊今天从南京来。南京现在广泛宣传教育革命运动。形势大好。

队长叫我明天仍上林业队。我服从分工。

为了锻炼，决定不戴草帽，让太阳晒晒看，要做到把皮肤晒的黑黝黝的，把思想炼的红彤彤的。

7月20日

批判“学党史无用”。

学习七一文章时，脑子里曾闪过这一个念头：学这个党史好像对我没有用。自己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学它做什么呢？这种思想阻碍了我学习七一文章的进度，放松了党史的学习。

学党史究竟有没有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如果一个人对历史一无所知，那他对现实定也一窍不通。毛主席的革命路上就是要经常讲、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使每一个人都知道，都懂得。我是一个青年人，并立志要做一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就必须知道并懂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不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力流汗，那么要我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力，就必须懂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知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怎样战胜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所以，党史不是学习无用，而是大有用处，必须学习。

最后，摘录七一文章上关于学习方法的一段话。

“在看书学习中，必须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要带着问题学，带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带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看书学习。这就是要把读书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结合起来，把学习历史经验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把批评历史上的机会主义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结合起来。”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7月21日

除草一天。今年林业队育了不少苗，草荒就很严重。所以就要用很大力量来除草。

四好初评已展开。今年是开展四好运动的第二年。林业队中午亦开会评四好。有的同志也提到了我。从五好社员的标准来看，我是差得很多，够不上五好。首先在政治思想方面就很差。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还很严重。在劳动方面就更差了。但是，我应该努力学习，抬头看路、埋头拉车。争取做到五好。

7月22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已发表了三周年。现在，中央正在开教育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将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经验，将使教育革命进一步深入。教育革命是一件事，我应当很好关心。

仍旧是除草。晚上公社开了广播会。目前已进行双抢大忙。早稻要抢收上来，晚稻要抢栽下去，这真是火烧眉毛的事，一刻也缓不得。况且今年是第一次大面积栽双季稻，就更忙了。我虽在林业队，但有空也应参加双抢。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7月23日

上午给杉木浇粪，防曝晒开裂，下午盖土。虽然是第一次育这种树苗，但长得也还很好。

学习了七一重要文章的第二部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矛盾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党批判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五六年，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时，无产阶

级还要不要继续革命呢？毛主席针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刘少奇一伙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党。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英明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六五年初，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六六年五月的“通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刘少奇的盖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九大”肯定了这个胜利。我们要贯彻执行九大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到全党，使党铁一样的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

7月24日

第一年的杉木，最怕伏天的太阳。我们就给它搭个荫棚，盖上草帘，用人的巨大力量来保护它。

抽空学习了七一重要文章的第三部分“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我们党半个世纪以来的战斗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我们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我们党就前进，就胜利。毛主席英明地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而今天应当特别注意学习的主要有八条：1、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以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为其思想特征的。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必然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广大人民的要求、同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要求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也就必然要在实践中遭到破产。为了就是揭露和批判错误路线，以免上当受骗，就必须把学习马列主义同批判国内外的现代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学会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2、必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正确分别和处理两类矛盾，是加强党的团结和领导的根本保证。3、必须力戒骄傲。牢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个真理。4、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5、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本路线。要同那种口称“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的人物相反，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6、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要发扬民主作风，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但是，我们的民主是为着巩固集中，加强纪律和提高战斗力。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7、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只要有阶级存在，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会发生战争。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战备，随时准备粉碎任何敌人的侵略和颠覆。8、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正确处理本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我们党在五十年代的奋斗中，始终得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永远感谢他们。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同各国人民一起，为打败美帝及其一切走狗而斗争。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我们要学习各国革命人民的长处，永远同他们团结、战斗、

胜利在一起。这八条经验是特别应当注意学习的。

7月25日

这几天抽空学习了七一重要文章。原来是想哪天有空哪天学，但是实践证明，这没有集中学习效果好。今天，想把学习体会总结一下。

通过学习，认识到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两条路线斗争史，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战胜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五十年的历史，提供给了我们一个最重要、最深刻的经验：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胜利。文章最后总结的八条经验，也就是向我们提出的八条任务。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努力学习历史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坚决贯彻执行“九大”和九届一中、二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摘录七·一重要文章的最后两段，它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成千成万的烈士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不论还有多少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止我们前进。

“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同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候相比，全世界的革命形势空前大好。帝、修、反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7月26日

上午和下午都除草。正在为消灭草荒而斗争。

昨晚听了北京鼓楼中学军宣队的成战武同志的忆苦思甜报告。成战武同志的报告虽已听过多次，但一次有一次新的感受。尤其是成战武报告的最后部分，特别能触及人的灵魂。想想解放前贫下中农的悲惨生活，想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想想大救星毛主席的恩情，再对比一下我的思想、干劲、作风，深感有愧于革命先烈，有愧于党。近来，思想上一不怕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少了，怕苦畏难的情绪增加了、种田为革命的精神少了，想工分的时候多了，干劲不如以前大了。与过去贫下中农牛马不如的生活相比，我还有什么理由讲享受呢？与贫下中农解放前的沉重劳动相比，我还有什么理由怕苦畏难呢？与解放前贫下中农劳动一年一无所获的情况相比，我还有什么理由计较工分呢？若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还不知今天会成什么样子。我只有千条万条的理由紧跟毛主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没有一条半条理由为自己。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列宁

7月27日

今天是朝鲜人民祖国解放战争胜利十八周年。十八年前，朝鲜人民在英明的统帅金日成元帅领导之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于战胜了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在它们“第一个没有取得胜利的协定上签字”。今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力量空前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力量也空前强大，美帝国主义再想发动侵略战争，就一定会失败得更惨。

林业队育了一亩杉木，目前长势较好。杉木需要草帘子。架帘用的木桩全是发动群众解决的。但上次由个人解决损失了一点树木，这次发动各个民兵排，每个排搞三十根，不要几天就解决了。这个办法看来还是比较的好。相信和依靠群众，这是党的一贯路线，我们必须恪守。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7月28日

今天写了封信给哥哥。谈谈“公告”、揪“五·一六”等。说实话，我反对写信只写些家常琐事，以为写信的目的是交流思想，共同进步。

下午脚上害疮，发了炎，坚持了半天，没下战场。我自己觉得，应该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前，我带病劳动，总怕有人说是为工分。现在想通了，说这种话人才是典型的“为工分”者。解放前贫下中农就是只有一点点力气还得劳动。成战武父亲身体被地主残害成那个样子还得为地主干活，今天我为革命种田，更应该不怕死，有一点力出一点力。这样，才对得起为我们的幸福而牺牲了的无数革命先烈，对得起党。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7月29日

因为脚疼，本来准备休息的。但朱绍金要我替别人看瓜，抽出别人劳动。我亦知休息是不行的，如此忙时，岂能歇乎？于是看了一天瓜。

西瓜在夏天是最诱人的清凉食物。看西瓜的责任虽是保护西瓜不让贼偷，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首先过的硬，自己不随便拿瓜吃。西瓜是集体的，集体的东西私人没有权利拿一丝一毫。我一定要注意抑制自己。

7月30日

我国政府和塞拉勒窝内政府经过谈判，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是毛主席外交战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下午，大队召开了下放人员会议。大家谈谈农村生活、阶级斗争新动向及对尼克松即将访华的看法。我以为，现在不少知青对当前阶级斗争新动向认识不清，谈生活、生产的多，谈政治、谈斗争的少。而大队领导也未能重视此事。

我觉得，当前生产队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思想领域，两种思想的斗争是非常激

烈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及一打三反运动，地富分子不敢再嚣张了，他们一般的已不能公开地出头露面充当资本主义倾向的先锋。只要看一下他们的活动就可知道，会上，几乎没有谈出他们有什么活动。经济和政治的革命必然要引起意识形态的革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小私有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决不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要完全地占领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不可避免的要同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观点发生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可能不是以一个人物作代表，而是一种思想，一种思潮为代表来同我们较量。如果在意识形态方面退却了，经济和政治肯定也将跟着退却。这种思想斗争归根到底还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的这种看法可能不甚正确，但我觉得大家都应关心此事，用毛泽东思想来回答现实阶级斗争所提出的问题。

晚上又犯了个错误。供销社几个人晚上来买瓜，我先不肯买，但最后竟同意了他们自己下瓜田找瓜。这严重地违反了制度。这件事是坏事，但它同时又使我认识到我的纪律观念不强。我应该作斗私批修，并吸取教导，决不再犯。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7月31日

晚八点，中央台广播了两报一刊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四周年的社论《纪念八一建军节》。要很好学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毛主席和林付主席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诸因素中的主要因素。对于这支伟大的军队，我们必须热烈拥护。

可是，长期以来，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之流竭力破坏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走卒，五·一六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之流竟然把矛头直接指向人民解放军，妄图毁我长城。

我们的军队是工农子弟兵，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军队，是一支纯粹的军队。王力之流别有用心地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许多杰出的军事家，屡建战功的将军，打成“军内走资派”，甚至要进行大会斗争。一时间搞得乌烟瘴气。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发现了他们的阴谋，把他们揭露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扭转了倒军黑风，为我们掌稳了航向。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军队内部是有极少数的坏人，但军队是由党领导的，军队走资派即党内走资派，而整党内走资派正是运动的大方向。我们只应该提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不应该提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王力之流提“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也完全是为了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来掩护他们自己。

正是由于人们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人民解放军不但没被损伤，反而把王力之流揪了出来。这两次强有力地证明了人民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8月1日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四年的大喜日子。四十四年前，林彪、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对蒋介石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打响了第一枪。它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屈服，他们又重新站起来了，并且拿着枪站起来了。

接着，毛主席又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并把起义的部队带到井冈山，开辟了光辉的井冈山道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人民军队，经过二十二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八百万蒋匪军，夺取了全国政权。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二十二年里，尤其是在林付主席主持军事工作以来，人民解放军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为全国人民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为人民又立了新功。四十四年的历史证明了林付主席的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因而也是战无不胜的队伍。”

这两天看瓜，看到了不少不合理现象，由于人情观念，干部中一些人不自觉，吃瓜往往不交钱。我觉得，看到这些现象，只能使我更现实地看问题。我亦不准备看瓜，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8月2日

学习了“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阐述了人民解放军在四十四年的战斗历程中立下的丰功伟绩和原因。社论着重谈了国际形势，当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这是世界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全世界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长期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结果，是全世界所有受到两个超级大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共同斗争的结果。

针对国际大好形势，社论指出，“帝国主义决不会因为失败而改变侵略本性。帝国主义有时不得不变换其策略，玩弄各种阴险狡猾的手段，归根到底还是为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的。”“形势越好，越应当警惕，要防止麻痹大意，注意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在中美联合“公告”发表后，提出这些更是十分重要的。

社论重申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社论号召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际大事，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五·二〇’声明和关于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学习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学习我们党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历史经验，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我一定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这一最新号召，胸怀全球干革命。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8月3日

给姐姐写了封信。谈到对陈伯达及五·一六阴谋集团的看法，摘录如下：

《红旗》杂志第五期、第七期都发表了不少重要文章，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批判“五·一六”反革命思潮。这些文章的水平都很高，每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去批判。看来，陈伯达的问题已近明白，估计不久将召开的九届三

中全会将把它公诸于众。

陈伯达问题说明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给了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被揭露的。随之而来代表资产阶级司令部登台表演的是陶铸。“二月逆流”时是谭震林。谭震林过后，这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由陈伯达挂帅了。他们又组织、有计划地破坏文化大革命。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既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外围组织，是陈伯达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而搞的反动政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极大的罪。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察觉了陈伯达一伙的阴谋。去年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中央二十号文件，吹响了深挖“五·一六”战斗的冲锋号。二十号文件的发出，也经历了斗争。二十号文件是在上半年就定的，（还在六月份，我们就听到了关于增产节约的39号文件）但是，对这个文件一定有斗争，所以直到年底才发出。到九月，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这个文件，并宣判了陈伯达之流的死刑。

九届三中全会将标志着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了。随之召开的四届人大，标志着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

以上是我的一点看法，或估计，如有不对，请指出，并批判。

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8月4日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四年的日子里，公社新团委胜利诞生了。在这前夕，大队团支部也成立了。团的工作将逐步正规。

团的十大不知何时召开，旧团中央基本上是刘少奇专了我们的政，三胡一王把持了团的大权。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团组织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共青团经过锤炼，在党的领导下，以党的九大为榜样，一定能在十大达到新的团结。

我是一个青年，应当争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的缺点尚很多，我决心改正这些缺点，以实际行动，用一颗红心和一抓三促的成绩来回答党对我的关怀。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8月5日

今天的报纸全文发表了美国务卿罗杰斯二日发表的所谓《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和答记者问。罗杰斯的荒谬声明表示美帝继续顽固地推行两个中国的诡计。由于我国的国际威望日益增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国家越来越多。去年，阿尔巴尼亚等十八国的提案，在联大获多数通过。鉴于大势所趋，美帝不得不变换其策略，以更加阴险狡猾的手段来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在罗杰斯的声明里，一方面表示赞成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一方面叫嚷将尽一切力量来反对驱逐蒋介石匪帮出联合国。美帝的“两个中国”的阴谋暴露无遗。

估计今年中国不会进入联合国。因为我们决不会与蒋匪帮坐在一起。蒋介石现在是除了他自己以外不能代表别的任何人，他是人民的败类。在美帝的庇护下，他窃踞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要我国进，蒋匪帮必须滚出来，否则，中国是不会进入联合国的。

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帝妄图凭借武力霸占

台湾，是痴心妄想。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可以想象得到的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跨越海峡，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让五星红旗在台湾上空高高飘扬。

要斗私、批修。

8月6日

我国和土耳其共和国经过友好会谈，决定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土两国人民很早就有来往，这次建交将使两国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

昨天晚上，大队开了群众会，狠抓阶级斗争，促进生产大发展。并点了几个人的名。今天中午林业队也开会，大家斗私批修，互相帮助。主要对偷西瓜的事作了讨论。我虽然在看瓜时没吃瓜，但在才上林业队时却和别人偷吃过一次。赔钱是小事，主要是思想问题。为什么偷瓜吃呢？主要是没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以为吃个把瓜没有多大关系。殊不知关系很大，如果不赶快刹车，发展下去则不可想象，所以，我一定要纠正。

8月7日

由于西瓜已近结束，我今天开始不看瓜了。上午先挑水浇桑苗，后来又挑粪。在挑猪粪前，是两人抬一桶，一人挑，可抵四人。可是我先怕挑不动，挑伤了，但后来贫下中农鼓励我，我也决心挑挑看，结果并没什么。怕挑伤的思想是怕死的思想，这个思想如果不克服，就不敢拣重担子挑。因此，要想干活好，必须思想红。我一定要克服这种怕苦怕死的思想，照毛主席的指示，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面，享受在别人后面。思想通了，下午跳水也就没有气了。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8月8日

我国政府七月三十日就苏联政府六月十五日的声明发表了声明。苏联政府在声明中提议召开五个核大国的核裁军会议，以解决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问题。我国政府的声明驳斥的苏修的荒谬主张，认为像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问题，必须由世界人民来解决，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而如果单靠少数几个核大国来裁判决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并重申了我国政府的立场。

割了一天太子参草。干得都还很愉快。

8月9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昨天会见了来我国进行友好和非正式访问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午开会谈林业队发生的几个事故。我觉得，他们都不是有意的。无论从言谈到行动，都可以看出他们不是自觉地要破坏，而是工作责任心不强、疏忽大意造成的。应该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大家都要吸取教训，避免重犯。损坏了的东西要照八项注意，合理赔偿。至于像平常开玩笑、赚便宜，因为与政治上、组织上的错

误无甚联系，就不必多所指摘。对于林业队的风气，大家应该努力纠正流言流语，创造一种政治空气，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朝气蓬勃。

8月10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英明地指出：“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毛主席亲自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的革命外交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而大叛徒刘少奇在三年困难时期与赫鲁晓夫里应外合，鼓吹反动的“三降一灭”，宣传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当前，批判这种反动谬论，对于我们关心国内外大事有很大的好处。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二十二年就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现在，我国在世界的地位显著提高，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相反，帝国主义的星辰正在陨落，他们困难重重无法克服，一天天走向死亡。这完全是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斗争的结果。试想，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时美国总统不但不肯访华，还想把我国消灭，而现在又为什么要承认我国，尼克松要来访问呢？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我国的强大，说明只要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在国际上坚持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和彻底的斗争，就能迫使帝国主义屈服，也才能最后消灭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

如果照刘少奇“三降一灭”的那一套办，那么，今天的中国肯定是依附于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或者会成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国际事务中，对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就不敢斗争，不敢支援亚、非、拉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而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想一想，这是一条多么危险的道路啊！

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刘少奇一伙押上历史的断头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天比一天更好，而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更迅速地烂下去。正如七十年代第一年的二报一刊元旦社论所说的，“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已经出现。”

8月11日

刨了一天太子参。对林业队来说，太子参是一项重要的副业。贫下中农刨得都很多，而我却磨磨蹭蹭，落在后面，刨得又少。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应该向贫下中农学习，努力多刨一点。

检查自己，最近低级趣味表现很严重。如嘴里经常不干不净，开玩笑都喜欢讨人家便宜，称大，想做老子等等。这些一直没引起我的警惕。直到前天开会储正邦同志指出林业队风气不正才使我注意到。以前我还较注意这方面。但有几个月以来，受到这些旧的低级趣味作风影响，而思想也没给予抵制，就沾染上了，并越来越严重。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我要从思想深处认识到低级趣味的危害，即流氓无产者思想的危害，并坚决改正之。要向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等那样的英雄人物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8月12日

上午撒磷肥压杉木和黑松，下午盖土。现在，还经常有吃亏思想作怪。只要多干一点，就会感到吃亏，情绪就不高。这种思想实质上是名利思想的表现。干了一点事就要表扬，就要有名有利，否则就感到吃亏。名利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一种极端有害的思想，是“私”字的集中表现。我应注意这种思想的发展，要批判它，肃清它；否则，我就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抽空把毯子洗洗。现在一人在外，一切都应自理。不能还像以前把被子、毯子带回去给母亲洗。在这些方面也要学习，还像缝补等。在爱国卫生运动高潮中，我应该注意个人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使思想身体两过硬。

8月13日

上午依旧刨太子参。下午打农药灭土蚕。林业队育苗大部分育在荒地，土蚕很多，它咬断树苗的根茎部，致树苗死亡。无论杉木、松苗、杨槐等损失皆不小。上级批下来的晶体敌百虫效果较好，土蚕的危害已逐渐被制住。

看了柬埔寨和朝鲜的联合声明。现在，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结成了伟大的反帝联盟。以此为核心，团结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组成了国际反美统一战线——这个战线正在不断扩大和发展。九大以来党的外交路线的一个新特点，就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基础上与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求大同——即反美反帝——存小异，争取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周围，加速了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速度。

8月14日

上午刨太子参。大家都带筐来，收工时带一担南瓜回去。可是我以自己无筐为理由，也不积极地想办法，上午就没带瓜。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但自己却觉得内疚。查思想，责任性不强，对工作不是很积极的，没有认识到收工时带瓜是多快好省的一个办法，可以节约许多劳动力。下午我就带了两个麻袋去，挑得也还很好。

晚上在火药库看了最近四天的“参考消息”。苏联和印度最近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它表示，苏印两国反动派为了反华，更加紧地勾结在一起。印度反动派并企图在印巴次大陆挑起战火。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不管苏印反动派如何猖狂，都逃不了死亡的命运。

8月15日

下午大队下放人员集中学习。周亚民书记向我们传达了当前国际形势——尼克松访华的国际背景。随后大家进行了讨论。关心国家大事，国内外阶级斗争，已成为大家的自觉。

回来时到母液站下化肥。一麻袋有二百斤。我对扛包一直有迷信，认为自己比较身单力薄，怕不但扛不好，还可能扛伤。但转念一想，活着干，死了算，非要扛一包看看。扛第一包，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二包、第三包就一包比一包容易一些。后来想想，先前的那种想法也很好笑。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越怕胆越小，越不敢扛越觉得伤人，农活一般都不得伤人。从下农村起，就有不少人劝我注意些，不能伤了，但我一直干活很好。经过这一次，干活的信心更大了。但首要的是，必须记住，“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8月16日

林业队在今年春天栽了几千棵家桑，长势一直很好。但由于一月多月来天气干旱无雨，况且桑树又都在山上，更是旱的叶子都焦了。为了保证秋蚕丰收，需要给桑树浇水。经研究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民兵。我们队是28人的桑树，但能挑粪桶的只有23人左右。因此，生产队、民兵都不太高兴；埋怨任务多了。结果后来想出了把桑树按人分的方法。早晨去几个人，把自己任务完成了；中午去的人，也把自己任务完成了。但生产队仍然没有完成，整个民兵排没有完成。

我觉得，任务即使给我们民兵排给多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领导上下次注意一点就是了——但对我们来说，应该有“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雄心壮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多干一些当作光荣的事，圆满地完成任务。

8月17日

上午下北瓜。下午割草。学习了“实践出真知”这篇文章。赵普羽同志原来对医学知识一无所知。但他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决心做好本职工作，刻苦专研医疗和针灸技术。他对医学从不知到有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在攻克聋哑病的战斗中，他怀着对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冒着生命危险，在自己身上试扎。终于，用他冒着生命危险探讨出来的成果打开了聋哑“禁区”，让聋哑人喊出了我们时代的最强音“毛主席万岁”。

这个事实证明毛主席“实践出真知”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那些臆想什么“聪明过人”、“天才”的人在事实面前哑口无言了。联系到我三年来的农村生活，岂不是也完全证实了“实践出真知”这个伟大真理吗？！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今后，我应当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实践，像赵普羽同志那样，在实践中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的红卫兵永远忠于最高统帅毛主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上课的政治课，是不经考试的考试。群众运动就是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课。

8月18日

今天是伟大统帅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五周年的纪念日。回想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的那些日子，更是令人心潮起伏。

六六年七月底，毛主席针对刘少奇一伙镇压学校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指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决没有好下场”，把大批革命学生解放出来，把学校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得更猛。八月一日，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中发出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伟号召，并教导红卫兵不但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彻底揭开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八月八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八月十日，在中央接待站，毛主席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会议决定林付主席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保证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和林付主席登上天安门，与首都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共庆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回顾这一段历史，使我想起了列宁的一句名言，即在革命时期一个人一星期学到的东西，比他在平常的一年学到的还要多。

文化大革命，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六六年，我还是一个初一学生，整天只知道埋头读书，报纸也看一看，但一看而过，有时只浏览下大标题。社会经验少得很，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简直是少得可怜，对政治是一无所知，马克思主义也只是仅知道少数名言。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虚心地向革命造反派学习，投入了摧毁资反路线的战斗。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空闲的机会，阅读了一些毛主席著作和马、恩、列、斯著作及一些重要文章，联系了文化大革命中所揭露出来的刘少奇一伙的滔天罪行，我初步懂得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初步体会到这一伟大真理“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

但我回顾一下到农村来的战斗历程。深感没有能够更好地读毛主席的书而是找一些小说之类的看。没能够紧密联系实际读书。在思想革命化方面落后了。红卫兵又一句“豪言”，“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要为毛主席争气，就要认真搞好思想革命化。否则，如单凭朴素的报恩思想，那还有可能受王明、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当，好心变不成好事。纪念八·一八，回顾文化大革命，就要激励自己努力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努力啊，朝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8月19日

我国政府和伊朗王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过友好会谈，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为中伊友好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

上午因身体原因休息了半天，下午去跟瓦匠做小工。这些天感觉到很疲劳，虽然睡眠时间比大忙长，但仍感很缺乏。这只能说是不适应农村生活的表现。无论农忙农闲，贫下中农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劳动，从不喊疲劳瞌睡。而我才干不了多少时候，就疲劳的很，与贫下中农的差距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毛主席教导我们“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应当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怕苦，不怕死，努力做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8月20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主席指引了一条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在农村建立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广大贫下中农紧跟毛主席，为把我国农村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努力奋斗。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他抛出了“三自一包”的黑货。自由市场，就是刘少奇为了破坏工农联盟，破坏国家市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毒辣手段。

今天上午我们分工上街卖瓜，给龙潭管理市场人员抓住，以批发价卖给菜场。一开始，我还想不通，但经过市场管理人员的说服对照毛主席的指示，我才恍然大悟。

生产队生产出来的东西，应该分配给社员群众（自然，除了国家任务）。尤其是粮食和可代粮的蔬菜（如北瓜）。社员一时无现钱，也应该给社员，留待年终结账。拿上市场的蔬菜应该送给国家，由国营菜场收购。这是收益分配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长期以来，刘少奇在农村广泛散布了“金钱挂帅”的黑货。在这套黑货影响下，不少生产队都把自己生产的蔬菜、瓜果直接拿到市场去与私人见面，目的就是多赚几个钱。但结果，却是丢掉了无产阶级政治，丢掉了社会主义大方向。

生产队卖东西和私人买菜是两回事。按《六十条》规定，农民还有自留地。自留地上的收获只要不是粮食等，都可以在农村市场上出售。而生产队是集体单位，又是生产单位，而不是商业单位。建立起人民公社，就是要切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小农经济的联系，而生产队上市场直接向私人出售农村产品，则是对这种联系起某种恢复的作用。

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彻底批判“三自一包”的反动谬论，肃清余毒。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这件事情，也教育了我，使我提高了觉悟。今后决不再犯类似错误。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8月21日

我国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重申了我国政府在台湾和联合国问题上的一贯的不可动摇的严正的立场。

继去年联大二十五届常会后，阿尔巴尼亚等十八国的提案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蒋介石集团已成了众矢之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已把我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提到了对联合国来说是第一重要的问题的地位。但美帝不甘心其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妄想拉拢一批走卒，共同提出“逆重要问题”提案，继续阻挠我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但美帝的走卒在国际潮流的冲击下，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最后只有美帝单枪匹马，提出“两个中国”提案。

我国政府在声明中再次严正宣告：只要联合国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独立”或类似错误，中国就决不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这就再次严厉打击了美帝的阴谋诡计。

上午跟瓦匠做小工，下午到公社去拖粪。晚上和大队团支委祁学义同志谈谈。我们都认为目前生产队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较差，致使赶不上形势。但如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是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做起来则不由我们。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8月22日

林业队这两天上午依旧上街买瓜，不过变换了手段。我虽然不能阻止他们，但我自己应做到不再去。

学习了赵普羽同志事迹之二“生于群众，长于群众”。赵普羽同志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集中群众的智慧，打开了聋哑禁区，为人类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是，赵普羽同志牢记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伟大教导，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始终做群众的小学生，努力攀登新的高峰。赵普羽同志的这种谦虚精神是值得我很好学习的。我在许多问题上都犯有骄傲自满的错误，都是必须坚决克服的。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8月23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周总理昨天打电报给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毛雷尔，热烈祝贺罗马尼亚祖国解放二十七周年，祝中罗友谊不断发展。

做了一天小工。接的一间猪圈已基本完工。

借到一本“林副主席语录”。比我先前的一本“林彪同志言论摘录”丰富，决心择其重要的进行再摘录工作。

8月24日

上午刨太子参时和贫下中农青年谈起了扎根农村的事。他们一针见血地向我指出：我现在是人在农村，心还向往城市，想往外地跑。这也确实说到了灵魂深处。仔细回想一下，对别人进厂、上调感到羡慕，有时大谈城市之如何好等，都反映出自己还是留恋城市。更重要的是经常讲要到边疆或内地去，讲是到比苏南更苦的边疆去，但这实际上，却起了一种散布不愿在此扎根的思想的作用。毛主席教导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一定可以大有作为。如果留恋城市，与贫下中农结合不到一起，就肯定是无所作为。至于到边疆等，那要听毛主席的战斗号令。而现在，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做好扎根一辈子的准备。并且不再讲对上山下乡运动不利的話。向沈秀芹、金训华、张勇等英雄人物学习，扎根农村干革命，毫不动摇。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8月25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最近胜利闭幕。西南地区实现了一片红。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西南人民浴血奋战的辉煌战果。

刨了一天太子参。不知怎么搞的，刨来刨去都比别人少，这不能怪天怪地，只能怪自己主观没努力。上工时说说笑笑，有时也妨碍了工作，干劲也不甚足。找出这些缺点，下次再刨太子参就一定要改正。一定要多刨一些，赶上贫下中农的水平。

8月26日

在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举行，大会选出了新的自治区党委和省委。昨天广播的西藏第一届自治区党委由任荣同志为第一书记，翻身农奴巴桑同志为书记。四川省张政委、梁司令员分别任第一、第二书记。原省长李大章同志是书记。张西挺、刘结挺不知去向？！宁夏仍由军委会主任康健民为第一书记。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是省革委会副主任、军区司令员汪家道。这四个地区，尤其是四川和黑龙江，是经过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搏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和关怀下，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战斗，不怕牺牲、不畏困难，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终于粉碎了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和混进红色政权内部的一小撮反革命阴谋家的时而右

倾时而极“左”的罪恶阴谋，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样，从七零年十二月开始，经过九个月的斗争，各省市自治区新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全部健全。全国（除台湾省）又实现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二次一片红。这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8月27日

今天，《人民日报》以《我们党在朝气蓬勃地前进》为题发表了重要社论。全国（除台湾省外）全都成立文化大革命后的新的省一级党委，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一个极重要的保证。我们坚决拥护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的新省委，坚决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毛主席关于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加强党的观念，为实现党的事业而流血流汗。

上午刨太子参，下午就利用刨出来的地种胡萝卜。胡萝卜是一种喂猪的好饲料，应该利用一切闲地种植。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8月28日

今天依然是种胡萝卜。我今天又出现了吃亏思想。原来是大家抬冬瓜，有的抬两趟，有的仅抬一趟就回家了。在这种本来不算什么的情况下，“私”字却趁机冒头。这种吃亏思想是名利思想的一种表现。因为如果有名有利的话，就不会感到吃亏。这是什么吃亏呢？集体利益并没有吃亏，而是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吃了亏，如果每逢这种情况就感到吃亏，这还成什么人呢？这就使自己成为“一口观”、“一家观”，忘记党和人民的利益。试想，革命先烈为了我们的幸福而献出的最宝贵的生命，他们想到是什么呢？他们一点也没以为自己是吃亏了，他们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如果照我这种思想，那肯定会成为叛徒。所以，这种“吃亏”思想并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有许多时候，虽然比别人多干一点，但心情都不是很舒畅的。这也表现了“吃亏”思想。不过它没引起我的多大注意罢了。既然明了“吃亏”思想是继续革命的一个大害，就一定要把它从头脑中驱逐出去。

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

8月29日

学习了《红旗》第九期上湖北省委写作小组的文章《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学习〈论政策〉》。这篇文章阐明了毛主席提出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既团结又斗争”的无产阶级政策。并强调指出，这些政策对于今天的国内外形势同样有效。目前，世界形势一片大好。面对一片大好形势，毛主席既反对了“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又反对了“左”的不注意团结最广大的朋友的倾向，提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和各项具体的外交政策。当代世界有四个主要矛盾，及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社

会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最主要最尖锐的矛盾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民族解放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最亲密的战友。但是，帝国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出于它们各自自身的利益，出于它们各自的反革命战略部署，在互相勾结的时候，也在互相激烈的争斗，甚至有时争斗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社会主义运动就必须而且可以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尽可能争取一部分暂时与人民革命在人民革命和它最主要敌人的最尖锐的矛盾下处于次要矛盾的地位的帝国主义，使它也成为我们反对主要敌人的一个辅助力量。这样，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的政治影响，能够更有力地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在现时，就是要团结世界上最广泛的反美力量，组成国际反美统一战线——这个战线必须执行“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必须由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来领导。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

8月30日

今天的日记照例是大批判。一时，头脑里闪过了没啥批判的想法。真的没啥批判吗？这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弄清这个问题，才能使大批判继续下去。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不断的批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现今，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依然维持着，反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反动思想依然在竭力影响着人们，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世界观还不能说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社会上的一切，尤其要注意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包括国际资本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批判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批判自己头脑中的“私”心。

社会现象经常不断地反映到我们的头脑中来，资产阶级思想每时每刻都在影响我们，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个事实面前，怎么能说“没什么批判”呢？这种“没有什么可批判”的思想，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大开方便之门，本身就是值得很好一批的。

经常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经常地“解剖”自己，这是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和重要的一项工作。今后，我一定要这样做。

8月31日

割草一天，割柴我向来都不行，割不快，不齐，偏偏又规定每人一天要割二百斤干柴。一开始我较犹豫，心想这任务怎么能完成呢？后来我背诵学习了的《愚公移山》的一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个决心，就是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只要坚持下去，不断地工作，就能排除万难，争取到胜利。而且，这也正是走向贫下中农的好机会。割柴不行，就要锻炼。不锻炼就永远也不行。我就跟贫下中农学习，和他们一道挥镰割柴忙。

给哥哥写了一封信。在哥哥给我的信中，他谈到了读书问题。书不可不读，亦不可多读。泛泛地读书是没有多大好处的。要选择毛主席的几篇著作，精度深思。考虑到这些后，我决定在广泛的接触书籍的同时，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目前，主要是要学习老三篇，结合这五篇哲学著作。林付主席指出：老三篇是开门篇，

最容易读，但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那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考虑到自己思想还很落后于贫下中农，以往对老三篇学得不深不透；老三篇最容易结合实际及时间紧等因素，决定要以老三篇为主精度深思，学以致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9月1日

学习了《红旗》第九期上登载的北京七青工给《红旗》编辑部的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他们遵照毛主席“青年应当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的指示，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批判了在对知青进行教育的工作中所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提出了五点建议。这是报刊上第一次对领导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人的批评。它表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知青迫切要求冲破旧思想的束缚，锻炼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封信也再一次地提醒了我，要始终坚持坚定的政治方向，努力提高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而决不能仅把自己当作一个劳动力，只顾埋头干活，而不顾抬头看路。

9月2日

今天母亲休息，到我这儿玩玩。我也计划国庆回宁时经句容吴宗宁处，如可能，准备到父亲处看看。看来时间是较紧张的。

听母亲说，妹妹进步很快，现已加入了红卫兵组织。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促进。应该向她学习，追求上进。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布了新广播体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制定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唯一正确的体育路线，为体育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新广播体操比过去几套体操都有很大进步。我在体育方面一直都不行，但我要改变这种状况。以后要坚持做新广播体操。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死，二不怕苦”。

9月3日

中午，将前两天割的柴捆捆，准备在大雨之前挑走。但是还没挑，风就来了。风力有七、八级。我原先是打算挑四个柴的，但风大，扞不起来，大家都劝我少挑两个，我也有了个“一闪念”，摔下两个，挑两个快走。但这时“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一下子来了精神，风大怕什么，说什么也要挑走。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我迅速地挑起拔腿就跑，好容易战胜了大风，把柴挑到猪场。

但是，我为什么会产生怕苦的“一闪念”呢？说到底，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这个独立王国不摧毁，私字就会经常泛滥。我不但要注意克服私心杂念的表现形式，还要克服它的根源，这样，才能收到较好之效果。

9月4日

上午给杉木抗旱，下午刨地。我觉得，要消灭这样一种念头，即以为自己是知青，什么工作比别人差就原谅自己。而正因为是知青，就更应该什么工作都站在前头，才能接受好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不但要这样想，更重要的还要这样做，理论联系实际。

遵照上级指示，大队党支部开门整风，征求贫下中农意见，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这是一个新气象，体现出党正在朝气蓬勃地胜利前进。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9月5日

苏修叛徒集团对尼克松即将访华怕得要死，大肆造谣诬蔑，有一种说法，就是亚洲问题之缓和会增加欧洲局势的危险。周总理在接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时严厉驳斥了这种荒谬说法。照这种说法，难道是远东愈紧张而欧洲愈和平吗？这样子，就干脆叫美帝扩大远东战争吧，叫美帝进攻中国，美帝打到长江以南，苏修打到长江以北，欧洲才将和平；这样子，岂不是就不要解决印支问题吗，美帝不是就不要滚出印支、台湾、南朝鲜、日本以至远东吗？因为，否则，欧洲危险就会加剧，照这种逻辑，欧洲的和平是建立在亚洲的战争之上的。这是纯粹的混账逻辑，只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才会造出这种逻辑来。苏修的侵略理论是不值“一驳”的，苏修靠造谣污蔑混世混不长了。

教育要革命。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9月6日

上午拆猪圈房顶。决定把猪圈由垫圈改成淌圈，这样，前沿上盖也就不需要了。执行毛主席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自己动手干。

报纸发表了清华工、军宣传队文章《努力学会管理学校工作》。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清华的两条路线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文化大革命初，清华是刘少奇选择的点，并派他的婆娘王光美到清华搞第二个“桃源经验”。文化大革命中，五·一六分子又把它们魔爪伸进了清华园。七·二七，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工人宣传队举着毛主席思想红旗，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托，开进了清华园。从此，清华大学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在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下，经过激烈的斗争，清华大学现在已成为一个工农兵的大学。同样，工宣队在这场斗争中也经受了锻炼，逐步学会了管理学校的艺术。看后，令人十分高兴，无产阶级新教育体系必定要建立起来。

9月7日

上午拖粪，下午拔刺槐等树苗草。看到张双照先生起义归来的新闻。这表明，社会主义祖国威信日益提高。

学习了赵普羽事迹之三《在认识真理的道路上》。赵普羽同志在打开了聋哑禁区后，并没有止步，而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又向尚未认识的必然王国进军。在认识真理的道路上，他敢于承认困难，善于分析困难，勇于向困难作斗争。赵普羽攻下了一个又一个“不治之症”，正满怀信心地攀登医学科学高峰。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8日

《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辉著作已经发表二十七年了。在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感到十分亲切，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是“完全”、“彻底”。这也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完全、彻底，就要不怕死，就要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要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就要抛弃一切私心杂念。完全彻底，就是一心为公，一切为革命，一心为革命。否则，就做不到、谈不上“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张思德、雷锋等英雄为我们作出的光辉榜样，我一定要学习英雄，经常用“为人民服务”来对照自己，努力前进。

9月9日

拖粪一天。领导决定由每天四趟增至每天五趟。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凭着青年人的朝气，跑就是了。

又一个英雄屹立在人们面前。昆明部队某部战士邹前方为了列车安全，用尽最后力气，把马匹推出铁轨，保证了川黔大动脉之畅通。邹前方同志一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在他守护在地段和支左生产队，他都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对工作高度负责任，它像一颗道钉，虽小作用大。邹前方同志忠于毛主席，忘我为人民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邹前方，将成为激励我们的又一精神源泉。

后记

2002年1月1日我以个人名义建立了网页“www.hujingbei.net”。我在这个网页上除了发布部分教学和科研信息外，还不断地在“双周夜话”的栏目内撰写一些短文。本书收集了我从那时到2008年12月的七年间撰写的140篇“夜话”，并收入我在2002年以前发表在《上海财经大学校刊》上的两篇短文。我很遗憾的是七年里我没有能够坚持每两周写一篇夜话，有一年（2005年）甚至仅仅写了9篇。七年不算长也不算短，因此就把夜话汇总一下，编成现在的这本书。

本书的编排体例是每章的第一篇文章和该章的标题一致，其它文章按照发表时间先后排列。本书把夜话分成十章。但分章带有很大随意性，因为大部分文章适合编排在不同章内。

我把书名取为“自由、自律”，是因为把七年夜话收集起来以后才发现贯穿它们的主题其实是“自由、自律”。确实，没有自由，一个人不需要自律；但没有自律，一个人得不到自由。我渴望自由、强调自律。这七年的夜话表达了我的渴望和强调。同时，我深深感到，也许正是这些夜话，让我不断反思，不断警醒，我才能做到自律，也才能够享受到自由。当然，我现在享受的主要是心灵的自由，而不是比如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所以这本书不能正式出版）。不过，无论在什么外界条件下，心灵的自由也许都是最可宝贵的。

本书收集的夜话全部发表在www.hujingbei.net的“双周夜话”栏目中。从2005年起它们又同时发表于我在搜狐网站的博客www.hujingbei.blog.sohu.com上。陆桔利博士曾经为我收集了2002到2006年的夜话。这次收集整理又承蒙张艺的帮助。张艺并且通读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对其中的文字表达尤其标点符号的应用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我对她（他）们两位表示深深的感谢。本书中部分文章在网络发表前曾征求过许多朋友的意见。他们的姓名难以一一提及。这里也向他们表示感谢。同时，他们提出的建议没有完全被我接受，因此本书中依然存在的错误都由我个人负责。

胡景北

2009年9月4日于上海

《经济发展文论》已出版目录

- 2002 年第 1 期 胡景北 农业土地制度和经济发展机制：对二十世纪中国经济史的一种理解
- 2002 年第 2 期 鲁昌 债券利率期限结构—理论与经验研究
- 2002 年第 3 期 胡景北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贫困：以中国为背景的分析
- 2002 年第 4 期 许永国 拍卖经济理论的现状和前景
- 2002 年第 5 期 彭文平 金融自由化批判
- 2006 年第 1 期 胡景北 一位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中国自由主义——对若干误解的澄清
- 2006 年第 2 期 宋开生 湘西南农业土地制度研究—以麻塘苗族乡为例
- 2006 年第 3 期 赖俊平 锁定问题，最优投资和契约理论
- 2006 年第 4 期 陆桔利 为什么有人务农？——浙江省上虞市农民和农业变迁
- 2007 年第 1 期 陈体标 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
- 2007 年第 2 期 胡景北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
- 2007 年第 3 期 陈体标 技术变化的部门差异和经济增长的“驼峰形”事实
- 2007 年第 4 期 卢云鹤 斯威齐的汉堡包经济学——防御假设下的拐折需求曲线：理论和案例分析
- 2007 年第 5 期 饶晓辉 教育体系、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
- 2007 年第 6 期 郑彩祥 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一个新古典的分析框架
- 2008 年第 1 期 胡景北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和均衡
- 2008 年第 2 期 胡景北 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若干逻辑观察
- 2008 年第 3 期 王文甫 财政支出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分析——以中国为例
- 2008 年第 4 期 卢云鹤 谁是中国乡-城暂时性迁移者？——一个迁出地视角的实证文献综述
- 2008 年第 5 期 胡景北 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选择和经济学意义
- 2009 年第 1 期 胡景北 中国乡城移民的宏观经济学
- 2009 年第 2 期 饶晓辉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与参数异质性——一个基于 CES 索罗模型的视角分析
- 2009 年第 3 期 胡景北 从相对价格变化到物价总水平变化

Publizierte Arbeitspapiere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 Nr. 1, 2002, HU Jingbei, Agrarwirtschaftssysteme und Wirtschaftsentwicklungsmodelle: Ein Verstehen der chinesi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 Nr. 2, 2002, LU Chang, Zeitliche Zinsstruktur: Eine theoretische und empirische Studie
- Nr. 3, 2002, HU Jingbei, Städtische Armut im Prozess d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von China
- Nr. 4, 2002, XU Yongguo, Theorien der Auktion und ihre Entwicklungsperspektiven: Eine Bestandsnahme
- Nr. 5, 2002, PENG Wenping, Kritiken an die finanzielle Liberalisierung
- Nr. 1, 2006, HU Jingbei, China's Liberalismus in der Sicht eines Liberalisten
- Nr. 2, 2006, SONG Kisen, Forschung der Agrarlandssysteme in Südwestregion der Provinz Hunan: Ein Beispiel vom Gebiet der Matang Miao-Minderheit
- Nr. 3, 2006, LAI Junping, Das Hold-Up Problem, Optimale Investitionen und Vertragstheorie
- Nr. 4, 2006, LU Juli, Warum arbeiten Menschen in der Landwirtschaft? -- Transformation der Bauern and der Landwirtschaft in Shangyu, China
- Nr. 1, 2007, CHEN Tibiao, Strukturwandel und Wirtschaftswachstum
- Nr. 2, 2007, HU Jingbei, Die Kulturrevolution und die historischen Zyklen in China -- Zum 40. Jahrestag der Kulturrevolution
- Nr. 3, 2007, CHEN Tibiao, Sektorendifferenz des Technikwandels und höckerförmiges Wirtschaftswachstum
- Nr. 4, 2007, LU Yunhe, Sweezy's Burgernomics -- Die geknickte Nachfragekurve unter defensiver Annahme: Theorie und Fallstudie
- Nr. 5, 2007, RAO Xiaohui, Ausbildungssysteme, Einkommensverteilung und Wirtschaftswachstum
- Nr. 6, 2007, ZHENG Caixiang, Humankapital und Einkommensverteilung: Eine neoklassische Analyse
- Nr. 1, 2008, HU Jingbei, Preisschwankungen und Gleichgewicht im Prozess d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 Nr. 2, 2008, HU Jingbei, Einige theoretische Gedanken üb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 Nr. 3, 2008, WANG Wenfu, Auswirkungen der Fiskalausgabe auf Beschäftigung: Beispiele aus China
- Nr. 4, 2008, LU Yunhe, Wer verlässt das Dorf? Eine Literaturrecherche von empirischen Forschungen über Kennzeichnungen der Land-Stadt-Auswanderer in China
- Nr. 5, 2008, HU Jingbei, Messung der Bauernauswanderung: Begriffswahl und Ökonomische Relevanz
- Nr. 1, 2009, HU Jingbei, Makroökonomik der Land-Stadt-Migration in China
- Nr. 2, 2009, RAO Xiaohui, Nichtlinearitäten und Parametersheterogenität des regionalen Wirtschaftswachstums in China: Solow-Modell mit CES-Technik
- Nr. 3, 2009, HU Jingbei, Von Änderungen des relativen Preises zu Änderungen des Preisniveaus

Published Working Pape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 No. 1, 2002, HU Jingbei, Rural Land Ownership Systems and Mechanis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 No. 2, 2002, LU Chang, Term-structure of the Interest Rates --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 No. 3, 2002, HU Jingbei, Urban Poverty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Case
- No. 4, 2002, XU Yongguo, Auction Theory and it's Prospect: An Overview
- No. 5, 2002, PENG Wenping, Animadversion on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 No. 1, 2006, HU Jingbei, China's Liberalism in view of a Liberalist
- No. 2, 2006, SONG Kisen, Researches in Rural Land System in Southwest Hunan Province -- Take Matang Miao Nationality Rural District as an Example
- No. 3, 2006, LAI Junping, Hold-Up Problem, Optimal Investment and Contract Theory
- No. 4, 2006, LU Juli, Why there is Someone Working in the Agriculture? -- Changes in Farmers and Agriculture in Shangyu, China
- No. 1, 2007, CHEN Tibiao,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 No. 2, 2007, HU Jingbei,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Historical Cycles in China -- To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No. 3, 2007, CHEN Tibiao, Sectoral Difference in Technical Change and Hump-Shaped Economic Growth
- No. 4, 2007, LU Yunhe, Sweezy's Burgernomics --The Kinked Demand Curve under Defensive Assumption: Theory and Case Study
- No. 5, 2007, RAO Xiaohui, Educational Systems,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 No. 6, 2007, ZHENG Caixiang, Human Capital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 Neoclassical Analysis
- No. 1, 2008, HU Jingbei, Price Fluctuations and Equilibrium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No. 2, 2008, HU Jingbei,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 No. 3, 2008, WANG Wenfu, Effects of Fiscal Expenditure on Employment -- Evidence from China
- No. 4, 2008, LU Yunhe, Who Leave the Countryside? A Re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Conce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 No. 5, 2008, HU Jingbei, Measuring Rural-Urban Labor Migration: Selection of Concepts and their Economic Relevance
- No. 1, 2009, HU Jingbei, Macroeconomics of the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 No. 2, 2009, RAO Xiaohui, Nonlinearities and Parameter Heterogeneity of Regional Growth in China: A Solow Model with CES Technology Analysis
- No. 3, 2009, HU Jingbei, From Changes in Relative Price to Changes in General Level of Price

Impressum

Jingji fazhan wenlun, Sonderausgabe, Nr. 4/2009 vom 5. September 2009

Arbeitspapiere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Working Pape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SN-Nr. 1860-2207

Herausgeber und Redaktion: Prof. Dr. Jingbei Hu, Verlag: Verlag China Translation Bonn

Druck: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CDHK),
Shanghai, VR China

Tel.: +86 (0)21 6598 0687, E-Mail-Adresse: jbeihu@mail.tongji.edu.cn

Internet-Adresse: www.hujingbei.net